

1919—1927

苏联《真理报》
有关中国革命的
文献资料选编

第一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中国和中国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 И · 马伊斯基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会议简讯 (摘要)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22)

在中国南方的革命者那里

(一九二二年九月七日) Г · 马林 (25)

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的汇报 (节译)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Н · 布哈林 (29)

中国的政治局势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С · 斯列帕克 (30)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 Г · 魏金斯基 (36)

简述中国民族运动的过去和未来

(一九二三年八月九日) (45)

国民党的改组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С · 斯列帕克 (54)

苏联和中国达成协议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Г · 契切林 (57)

广州的胜利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К · 拉狄克 (60)

中国的夺权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К · 拉狄克 (63)

评中国最近的事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穆 辛 (65)

中国的转折时刻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穆 辛 (72)

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斯大林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页)

中国人民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К · 拉狄克 (76)

纪念孙中山逝世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Г · 季诺维也夫 (86)

处于转折中的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 穆 辛 (90)

上海事件的世界性历史意义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Г · 季诺维也夫 (95)

美国在中国玩弄的手法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М · 加尔科维奇 (100)

美国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兰皮书”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К · 拉狄克 (105)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К · 拉狄克 (111)

上海的罢工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П · 格列尔 (117)

广州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К · 拉狄克 (123)
英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 (社论)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129)
广州和香港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П · 格列尔 (133)
中国、关税会议和列强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М · 加尔科维奇 (140)
处于重大事件前夜的中国 (社论)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145)
中国的关键时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谢苗诺夫 (149)
中国和十月革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胡汉民 (152)
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 (社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57)
胡汉民谈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反对恶毒诽谤, 反对日本干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161)
对中国最近事态的评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К · 拉狄克 (163)
在第六次省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节译)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П · 托洛茨基 (168)
再论中东铁路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К · 拉狄克 (172)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К · 拉狄克 (175)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К · 拉狄克 (185)

中国国民军的失败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К · 拉狄克 (188)

衰败中的香港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М · 阿利斯基 (192)

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

(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 К · 拉狄克 (197)

中国革命一周年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К · 拉狄克 (203)

冯玉祥大帅关于中国局势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 (212)

关于国民军第一军的撤退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А · 伊 文 (215)

国民军的处境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А · 伊 文 (218)

中国各种力量的分化改组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А · 伊 文 (223)

占领汉口以后 (军事述评)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 Р · 萨赫诺夫斯基 (227)

广州政府的胜利和中国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232)

广州新胜利的意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Р · 萨赫诺夫斯基 (235)

广州的胜利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谢苗诺夫 (239)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瓦西里耶夫 (242)

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247）
中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与汉口事件（北京来信）	
（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	П·鲁任科夫（252）
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盖利奥（256）
列宁与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К·拉狄克（260）
中国的局势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271）
英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社论）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275）
广州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С·达林（278）
中国的局势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А·伊文（287）
孙中山——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С·达林（291）
中国的革命与国民党（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	（300）
湖南农民运动（湖南来信）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朱湘江（304）
上海工人的胜利（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09）
中国的战略形势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斯托林（312）
南京事件之后（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16）

中国革命和国际帝国主义（社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319）
工人的广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С·达林（322）
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А·斯捷茨基（334）
上海政变（社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339）
中国革命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Н·布哈林（342）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199—207页）	
斗争的辩证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А·斯捷茨基（386）
欧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И·佩佩尔（394）
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А·斯捷茨基（402）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方针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十一日）	
.....	А·艾亨瓦尔德（410）
张伯伦和蒋介石的联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И·佩佩尔（431）
孙科谈国民革命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434）

上海事件的意义——纪念1925年上海事件二周年 （一九二七年年五月二十九日）	Φ·拉斯科尔尼科夫（437）
中国革命和社会力量的不断分化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谢苗诺夫（444）
新阶段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	E·采特林（4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节译）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Н·布哈林（452）
革命过程和“动摇”的势力（社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471）
同路人的叛变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A·艾亨瓦尔德（475）
艰难的阶段（社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482）
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	Н·布哈林（485）
在危险的转折关头（社论） （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	（495）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	Н·布哈林（498）
中共领导为何失败？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T·曼达梁（515）
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社论）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526）
论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B·阿斯特罗夫（530）

关于中国（《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298——325页）

中国的工会与革命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С·洛佐夫斯基（541）

附录：译名对照表……………（550）

中国 和 中国的 斗争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И·马伊斯基

一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又重新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在各种事件五光十色的画面上，闪烁着将军们、部长们、城市和省份的名称，这些名称出现在电影胶带上，听起来非常奇特，有时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色彩的印象。普通读者往往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和相互关系。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内部斗争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另一方面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则是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庞大的独特的东方国家。因此，哪怕只是粗线条地描绘一下奇异的中国全景，评述和分析现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也完全是及时的和适宜的。而且目前恰好是远东在我们共和国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开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

中华民国的人口约为三亿二千万（毫无疑问，通常所说四亿的数字是夸大了）。其中三亿零二百万为中国本土的人口，一千八百万为它的“外藩”（满洲，蒙古，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人口。因为中华民国领土的总面积为六百五十万平方俄里，因此全国人口的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俄里五十人。但是，如果只拿中国本土来说，它的面积为二百三十万平方俄里，那么人口的平均

密度就很大，达到每平方俄里一百三十一人。

整个中国本土按地理和经济状况可分为三个不均等的部分。华北，包括黄河流域六个省，人口一亿零二百万。华中，位于长江流域，包括七省，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最后是华南，居西江流域，有五个省，人口五千五百万。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划分方法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在目前的事件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中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比较可靠的资料，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居住在农村的小农。大量占有土地的情况在中国是没有的，农民的土地几乎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不超过一俄亩）。耕作方式是极其原始的、落后的，人力的消耗十分惊人；在许多地方，中国人用锹挖地，种庄稼时采用畦植法。种植的主要是稻、小麦、茶叶、高粱和其他一些作物。

中国的城市人口不超过百分之十至十五。最大的几个城市是汉口（一百五十万人），北京（一百多万人），上海（一百万人），广州（九十万人），天津（八十万人），南京（四十万人），等等。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城市代表着什么呢？

现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人们指出，三个重大事件极其有力地促使“中华帝国”转入新的经济轨道：一是著名的1900—1901年义和团起义，这在历史上是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干涉的一次行动；二是1911年辛亥革命，它推翻了阻碍国家经济繁荣的封建旧王朝；三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它削弱了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推动中国自身生产的发展。

这种看法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非常清楚地可以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说它不对，因为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议论中有许多谬误之

处，发展的程度通常被夸大得远远超过实际情况。在这里象常有的情况那样，往往把希望的和期待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

在了解中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以后，就会更加证实我们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1919年中国的采煤量为十二亿普特，即大约为俄国战前年代采煤量的一半。1918年中国的冶铁量为三千万普特，约为俄国战前的八分之一。纺织工业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可是1921年中国所有纱厂只有一百七十五万个纱锭，而俄国在1913年就有九百多万个。

交通运输方面的情况也无二样。目前中国铁路的总长度为一万一千俄里稍多一些，战前俄国路轨的长度则为六万四千俄里。而且中国铁路主要铺设在沿海地带，西部各省为数甚少。因此铁路的经济意义就更小了。

如果我们将“中华帝国”同欧洲各国对比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软弱无力就尤其明显。为了更加醒目，我们拿英国和俄国一起来进行比较，因为英国在欧洲来说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俄国则是欧洲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有趣的情况。

煤和铁的人均产量

	煤（普特）	铁（俄磅）
中国（1919年）	3.6	3.7
俄国（1912年）	11.7	60.0
英国（1912年）	342.0	460.0

可以看出，按照相对数字，中国煤的现在产量只为英国战前产量的九十分之一，是俄国战前的三分之一；而中国铁的产量是战前英国的一百二十四分之一，战前俄国的十七分之一。

铁路情况同样如此，1912年英国每一千三百个居民，俄国每二千六百个居民就有一俄里铁路，而中国在1921年每二万八千

个居民才有一俄里铁路。

因此显而易见，从资本主义发达的意义来说，现代中国是很落后的。根据粗略计算，可以肯定“中华帝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只有战前俄国的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

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在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中国资本，而是外国资本，这个意义就更加深刻了。情况确属如此，中国开采的煤中约百分之六十五是外商（主要是日商和英商）经营的煤矿开采的。中国境内的铁矿开采工作大多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915年出现了一个中英专营公司，当然，英国资本在其中占有优势。这家公司把吞并采矿工业中的中国小企业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业务活动开展得极为广泛，这就更加缩小了中国资本在重工业方面的活动余地。在纺织业的一百七十五万个纱锭中，同样有一百零五万个纱锭（占百分之六十）属于外商（日商五十万个，美商三十万个，英商二十五万个）。最后，几乎所有铁路也都被外国人所控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铁路不超过一千俄里，其余的直接或间接地属于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所有。在非常普遍设立的合营组织中，总是外国人占主导地位。

因此，只有一个领域，即贸易，而且主要是**国内**贸易，是对中国资本开放的，因为对外贸易仍然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也正是把力量投入到贸易方面去，力求在这个领域内建立牢固的经济阵地。

社会力量

经济对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小农是中国居民的主要阶级。世界各地、所有国家的农民都具有思想狭隘、政治态度消极的特点。在恭顺、服从这种千年的传统成为每个农民第二天性的中国，就更加具有上述特性。如果

再加上中国农民的极端愚昧无知和人们常说的吃苦耐劳特性，以及诸如摒弃一切尘世生活的佛教这类宗教对农民心理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那么农民的消极态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有时，这种消极态度也会被“中华帝国”突然爆发的盲目、自发和破坏性的暴动所扰乱，例如义和团起义期间就是这样。

除农民外，中国还有无产阶级。但是，人数极其有限（未必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他们集中在全国少数几个大城市里，按其组成主要还是一些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群众，其中大多数是干粗活、搞装卸之类的工人。经过训练的中国工人的骨干目前数量不多。在阶级觉悟方面，中国无产阶级还有待大大提高。现在它只不过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开始组织工会，试图举行罢工，力求改善自己苦役般的劳动条件。目前它还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上活跃的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同样是软弱无力的。如前所述，我们知道，由于外国人的控制，他们的主要经济基地是国内贸易。结果，中国资产阶级所起的社会作用和经济作用，即使与中国目前资本主义发达的程度作比较，也是小得不成比例。只有在象上海、广州、汉口这样的城市尚有某些从外貌来看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相似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薄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大学生是它的先锋队和先驱者（在这方面现代中国有些类似1905年以前的俄国）。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这支力量是无足轻重的。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成长到明显具有民族意识的程度。各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怀有极其明显的“地方意识”。他们最关心的是本省的生活和事业。他们能了解和捍卫本省的利益，他们感到与本省血肉相连。但是，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把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去考虑和关心的，只有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和上海、广州一些最有文化的资产者。对于中国广大普通的资产阶级来说，这还是将来的事。当然，中国资产阶级因

为感觉到自己政治上的软弱，也没有表现出政治积极性。目前它在政治方面还是一支比较消极的力量。

在现代中国还有一个社会集团是不能不提到的。这就是所谓官僚集团，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习惯于靠国家俸禄生活，死死抱住管理帝国的权力不放。尽管历经新时代的种种波折，直到今天“官僚阶层”仍然完整无恙。在政治上它是完全不定形的。任何人只要肯给钱，官僚们都愿意为他效劳。

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的社会层中具有政治积极性的成分极少。在这种总的环境下，中国的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淡漠和消极的色彩。而这意味着，任何一支积极的有组织的力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国家的主人。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力量。过去在任何政治变革中，在推翻或建立某个王朝的时候，军队都起着决定性政治因素的作用。只要回忆一下元朝（1280—1368年）^①、明朝（1368—1644年）和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644—1911年）就足够了，清朝的垮台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直到今天中国军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政治作用。

省自为政

对于理解中国目前事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特点之一，可以称之为“省自为政”。老的中华帝国是由二十二个省组成的。其中十八个省属于中国本土部分，四个省（满洲，蒙古，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②）属于领地性质。这二十二个省中每一个省都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世界。不仅土耳其斯坦和满洲由于距离中国的核心部分极其遥远，居住的又都是血缘和语言不同的种族，因

① 原文如此。元朝的起迄应为1271—1368年。——编译者注

② 1867年，沙俄迫不及待地尚未完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耳其斯坦”，并将我国神圣领土新疆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这暴露了它的扩张野心。——编译者注

此感到自己是独立的国家组织，甚至中国本土的某些省份彼此间也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相互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国民经济落后，民族分散隔离状态还相当严重。在现代中国有将近七十种语言和方言，中国本土就不下三十种。

管理制度作为实行“省自为政”产生的结果，它最明显地表现在财政和军事方面。财政管理的结构是：省分为若干地区，每个地区按国家规定收税，用来满足地方支出，其中包括地方行政机关经费，而后将一定数量的余款上缴省库。省同样如此，将税款用于本省各项支出，拨充所有省级行政机关的经费，最后将一定数量税款上缴北京。凡能认真向中央上缴规定的数额而且在征税中不出特大丑闻的省长，便被认为是优秀的行政官吏，他在实际上几乎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

与此相同，各省督军各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完全由省财政负担，与北京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清朝廷为了自身警卫，专门建立了满族军队（所谓“八旗”），这支军队主要驻防在首都及其四郊。

由此可见，省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它是旧王朝的国家基本单位。所以，各省都宣扬各省的乡土观念，培植本省的领袖和英雄人物，就不足为奇了。满清王朝为了稍许削弱这种离心倾向，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各省的军事和民政管辖权总是严格分开的，分别设有督军和督办。省的高级官吏必须由外省人，而不能由本省人充任，而且其中任何人在同一个省任职不得超过三年。几个省构成一个更大的行政区，由总督管辖。在旧王朝时代，这种总督共有九个。但是，这种精心安排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省自为政”的现象，而不能根除这种现象。中央政权仍然是软弱无力的。“省自为政”已作为遗产被中华民国继承下来，它对中国的命运起了真正危险的作用。

外国干涉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外国资本的干涉始终是中国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在临近革命前的那个时期，凭借大炮和军舰撑腰的外国资本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中国人民，而且还粗暴地干涉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所有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强盗一起聚集到东亚海岸，互相撕抢这块肥肉。在华北、蒙古和满洲横行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在最南方和华中部分地区活动的则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德国夺得了山东半岛（在华北），法国在华中和华北扎下根来。甚至意大利也要为自己掠取一小块食物。便连那比利时区区小国也向中国企业，特别是铁路投资。

尽管这些帝国主义侵略者互相竞争，但是他们有一个使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目的，即使中国始终处于软弱的状态。他们的任务是阻挠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因为这样的政权会把外来的不速之客抛下海去。在这种企图下，外国人尽一切可能加剧中国各省的离心倾向，促使中国官吏和政客们互相争吵，支持某个党派反对另一党派。

在这方面，日本寡廉鲜耻的态度最为突出。东京政府愿意同任何人结盟，哪怕是同魔鬼和魔鬼的老祖宗结盟，只要能阻碍中国国力的加强就行。稍许回顾一下便可以指出，在袁世凯独裁时期，日本曾允许中国革命者的领袖孙中山在日本避难。1916年日本帮助南方共和派反对北方帝制派，而1917年又反过来帮助北方帝制派反对南方共和派。

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纯粹属于中国的事情。每一个事件都必然有外国人插手。在你听到某个新的暴动、运动或政府更迭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谁在后面操纵？是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组成的联盟？它这样干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二

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极其鲜明的“省自为政”的特点，再加上外国干涉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受到深刻的影响，这一切赋予中国辛亥革命极大的特色。辛亥革命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外部形式上都与典型的欧洲革命很少相同之处。它不是法国类型或俄国类型的革命，却同青年土耳其革命^①最为相似。

当然，这场革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在中国唤醒了正在沉睡的民族自觉本能。尽管软弱和缓慢，但是这种意识终于产生了。外国资本粗暴的干涉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种干涉使中国居民感到愤怒，并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抵抗国际资产阶级掠夺的问题。因为旧的满清王朝不能保卫国家，于是在广大居民阶层中产生了对立情绪。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这种情绪未能以明显的、有效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却成为一切愿同腐朽制度进行搏斗的势力的支持因素。军队曾经是这样的势力。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是中国军队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就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确实如此，辛亥革命是以武昌军队起义开始的，这次起义受到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仅限于鼓掌欢迎，他们并没有积极参加起义。在随后几周、几个月内，革命运动非常迅速地扩大到华南、华中，甚至华北部分地区的各个城市，但是不管哪里这一运动几乎都是纯粹军事性质的。有些地方社会各界也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广州和上海），但所起作用是很微

① 指1919年由凯末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王朝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编译者注

不足道的。革命的积极力量始终是、也仍然是军队。军队决定一切，对一切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综观中国革命史，你将会对一个突出现象感到惊讶：你在其中能找到的“民众”因素少得出奇。

顺便指出，革命的军事性质也影响到革命思想。最初，革命并没有提出建立共和政体的明确目标。军队起义的矛头所向，与其说是反对帝制，不如说是反对王朝，这种情况过去在中国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各国帝王注定灭亡的二十世纪。时代的民主潮流甚至不可能不影响到象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比较先进的广州，这个中国资产阶级的古都，提出并坚决捍卫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这个口号在华南和华中许多省内得到响应。满心希望进一步削弱中国国家机构的外国人也支持共和思想。况且帝制派中也没有一个适合于争夺皇冠的人（在二十世纪皇冠是非常稀少的商品）。结果，“中华帝国”意想不到地、甚至违反大量中国军队的意愿，变成了中华民国。

革命与反革命

中国革命在其本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911年10月11日^①，武昌驻军举行了起义。黎元洪将军并非完全自愿地被推举为起义军队领袖。上面已经提到，运动主要具有军事性质，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各界在运动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主要的代表者是由著名的中国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当然，无论如何不能把国民党同世界社会主义的某一流派混为一谈，过去我们这儿就有不少人混淆过。国民党不过是中国一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11年10月10日。——编译者注

群主张实行共和政体联邦制、争取民主和热爱祖国的志士组成的政党。他们深深感受到外国干涉带给中国的一切苦难、羞耻和屈辱，强烈地希望自己的国家摆脱外国的枷锁。因此，在该党党纲和党的活动中民族主义因素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也许，甚至是首要作用。固然，国民党在其他要求中也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要求，但这仅仅是政治上的装饰品。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要想博取革命党称号的政党，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实质上国民党是集聚在广州和南方某些省内的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先进阶层的代表机关。这个政党同劳动群众没有广泛联系。该党追随者主要在青年学生、受过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军官中。如果可以进行历史类比的话，那么，国民党有些象法国的吉伦特党^①，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山岳派”^②不反对这个中国的吉伦特党。

从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南北两方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大家都清楚，满清王朝的命运虽已定局，但是有关今后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时以老奸巨滑的北洋军阀、清廷大臣袁世凯为中心的北京认为，应以君主政体来代替满清王朝。以孙中山为核心人物的广州则相反，坚决主张建立共和政体。华中各省举棋不定。但是，在这革命初期，社会振奋，革命精神还相当高昂，因此广州取得了胜利。在1911年12月26日的十三省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为共和国，并推选孙中山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同时为了彻底结束帝制传统，决定将中国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位于华中)。

十二月代表会议是革命发展的顶点。在这之后立即开始走向低潮，逐渐变成一场真正的反革命。发展的主要阶段如下。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逊位。同时，根据南北两方协

① 吉伦特党系十八世纪法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1792年退出国民公会，翌年巴黎人民起义，曾组织武装叛乱，被粉碎。——编译者注

② 山岳派系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

——编译者注

议，袁世凯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这个协议其实是一种奇特的产物。南方领袖对袁世凯是很不信任的，认为它是一个帝制派和外国干涉的支持者。袁世凯为了破坏南方人的反抗，花了不少精力，使用了种种阴谋和欺诈手段，花费了很多钱。当然，收买孙中山是谈不到的，但是其他南方领袖远非都是思想坚定者。结果，袁世凯成为新诞生的共和国首脑，而这便是倒退的第一步。

第一步之后，接着就是第二步、第三步。袁世凯组成的政府当然可能只是临时的。国家的命运应由立宪会议或人们通称的国民大会去解决。颁布了颇为民主的选举法，1912年年底进行了选举。全国选出国民大会（两院制），每个省则选出各省的议会。选举结果，国民党获胜，它在国民大会中占有多数席位。1913年4月，国民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这时中国的国会议员们立即暴露出少有的那种高谈阔论的习气和行动迟缓的特点。为了选举国民大会主席就花了整整三个星期，仅此一例便足以说明情况。

就任共和国首脑一年多以后感到立足已稳的袁世凯，开始坚决同国民大会进行较量。贷款问题是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导火线。袁世凯当时正同外国银行集团谈判贷款。4月25日，孙中山代表国民大会的多数声明：如果不经国民大会同意而签订贷款，长江以南的整个中国将宣布独立。尽管如此，4月27日，袁世凯仍以自己名义在贷款文件上签了字。

这是公开的宣战。两个半月后，南京和江西爆发了南方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两地都宣布独立，各自试图建立政府。但是，这个“第二次革命”很不成功。袁世凯派兵进行了反击，很快占领了南京并公开通缉国民党人。孙中山及其最著名的信徒不得不逃出北京，到南方，甚至到国外寻求庇护。孙中山本人则到东京暂时避难。国民大会仍然存在，但群龙无首，并处于帝制派的恐怖威胁之下，变成了北方反动派手中的玩具。

以后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1913年10月6日，国民大会选举

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接着，这个早已向各国许诺遵守过去所签订的一切国际条约的政府得到了外国的承认。国民大会的使命就此完结。1914年1月14日，袁世凯以国会已无需要为由，宣布予以解散。随后，这位野心勃勃的总统开始毫不犹豫地，但很慎重地为跃登帝位而进行准备。

1915年底，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第三，曾就他称帝的问题组织了一次民意表决。当然，表决取得了袁世凯所希望的结果，于是他在1915年12月12日举行盛大仪式，给自己戴上了皇冠。

反革命这时达到了极盛时期。但是，正如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一样，反革命的胜利也同样是昙花一现，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外国列强。宣告帝国成立一事引起了华南各省的抗议。如果不是日本给南方共和派以援助，很可能这些抗议不会取得任何结果。日本由于担心袁世凯过于强大，决定对袁世凯的野心稍加抑制。日本枪炮和日本军官出现在上海、广州和云南等地，同时在北方对过于贪心的帝制派采取施加外交压力的方法。袁世凯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开始退却。在这之后不久，他突然去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中毒而死，迄今仍然是个谜。

国家无政府状态时期

袁世凯去世后的情况，除称之为国家无政府状态外，别无叫法。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独特现象——人所共知的所谓“督军”——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前面我已指出过，在中国“省自为政”的现象是严重的。随着革命的发生，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削弱，甚至得到大大的加强。满清王朝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各省的分立主义倾向，而且拥有比较强大的中央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这个现象。

革命发生后情况变了。中央政府变得软弱了，它对各省的控制已形存实亡。此时北京已不能向各省强行指派它所称心的民

政、军事长官。袁世凯曾想这样做，但是很不成功；各省往往不接受派去的官员，中央政权也远非经常能够坚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各省的领导人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地方观念浓厚，很少关心北京。各省向中央国库的缴款几乎停止了，各省军队完全受地方军事长官的管辖。加之许多省的最高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因而其威望和影响当然只会不断增长。各省这种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长官就叫做“督军”。由于拥有自己的军队、行政机构和财政，他们很快就沾染上了中世纪欧洲封建贵族的习性和思想：独自向居民征收苛捐杂税；独自征募军队；独自开展“高级政治活动”，向北京施加压力，进行战争，同其他省结盟等等。有些特别走运的督军能够统辖数省，那时他就成为督军之上的大帅，相应地具备了更大的行动能力。因为对帝王来说，要取得政治胜利，必须具有实力，而实力首先就是军队，所以每一个督军力图尽可能扩充自己的人马。结果，革命后几年内中国军队的人数大大增加，目前已有近百万之众。诚然，真正打起仗来这些军队是不行的，但是，对于督军们互相倾轧来说，还是完全够格的。袁世凯在其独裁时期曾试图限制各省执政者的各行其是的行为，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一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另一个能起抑制性作用的因素——以民族统一思想组织群众性的国民运动——在中国过去不存在，而且直到现在也仍然没有出现。中国社会各界在革命一开始时曾经短暂地发动过，但随即重新陷入漠不关心的状态，从而为大大小小的将领们提供了自由行动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从1916年起中国进入真正的国家无政府状态时期，这就不足为怪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甚至象袁世凯统治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所谓统一的共和国，也不再存在。国家分裂成许多独立的部分和省份，它们各行其是，只是偶而相互进行友好的交往或敌对的冲突。在为数众多的督军中每一个人都拼命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荣华富贵与统治地位，而对中国始终念念

不忘的外国列强则竭力利用这组复杂的琴键演奏他们所喜爱的政治舞曲。

下面谈谈近六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袁世凯死后，他的职位由副总统黎元洪接替，黎元洪就是1911年指挥武昌起义部队的那位将军。此人与他的前任不大相同，他向南方人作了重大让步。1914年1月解散的国民大会重新召开，国民党再一次获得了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国民大会于1916年8月1日召开会议，一直持续到1917年6月12日。整个这段时期，在孙中山追随者主持的国民大会和参加中央政府的反动北洋军阀之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结果，国民大会再次被解散。从这时起，中国国家统一的一切假象都消失了。中国彻底分裂成几个部分。

在这以后的北方重大政治事件可按时间叙述如下。1917年8月^①，张勋将军阴谋为清朝复辟。但是，另外两位将军——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都属北洋帝制派——担心清朝旧官僚重新掌握政权，于是起兵讨张，在北京附近彻底击败张勋。由于这一事件结果，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改由讨张胜利者之一的冯国璋将军继任。另一胜利者段祺瑞领导内阁，同他一起参加执政的还有由日本人建立和支持的所谓安福俱乐部的成员。

但是，冯国璋任总统的时间也不长，1918年又让位给徐世昌，不过，总的政策方针并没有丝毫变化。北方帝制派政府同以往一样仍然得到各国的承认，但因为上述事件使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此1918年底段祺瑞总理认为必须召开由政府任命的代表组成的特别“议会”。从许多代表不敢在本省露面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独特的大会究竟有多大的威信了。他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17年7月。——编译者注

们由于害怕对他们个人施加暴力，才被列名为各省代表。

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大众，尽管其整个政治态度是消极的，但在一个方面却表现得十分明确：他们强烈憎恨日本人。靠日本贷款维持并执行亲日政策的“安福”政府，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很不得人心，以后更受到全国的仇视。这种敌视态度在1919年5月北京爆发的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情况立即被同属北洋军阀的“安福系”对手巧妙地加以运用。原来当过土匪、后为满洲巡阅使的张作霖和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錕这两位大帅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这场冲突具有“内战”形式，1920年夏以“安福系”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其中曹錕军队的司令官吴佩孚将军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以后，在不久前的盟友之间又开始了斗争。因为日本在“安福系”被击败之后，便把赌注压在张作霖身上，所以这位满洲独裁者成了两个竞争者中最强的一个。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控制着华北，可以任命和变换政府成员、总统和高级军事长官。

日本势力在黄河流域极大的加强，不能不引起英美资本的很大忧虑。张作霖变得太强大了，必须使他有所收敛。要做到这一点也很容易，只要掏出钱包，给张作霖的对手曹錕大帅一个脸色就行了。从1921年年中起，情况已十分明显，两个大帅之间的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了，于是两人都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搏斗。张作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而曹錕则扩大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如果可以谈到居民的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无疑是在曹錕及其将领吴佩孚一边，因为张作霖同“安福系”一样都被看作是日本的走狗。

以上就是目前危机前夕的北方情况。

南方事态的发展基本上是类似的。

1917年6月国民大会被解散后剩余的一部分人逃到广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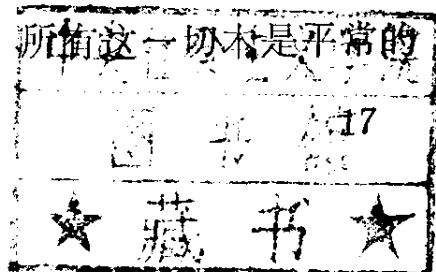
那里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军政府。北京发布了逮捕“叛乱分子”的命令，但是由于没有实际力量，无法使命令得到执行。起初，南方和西南各省还支持孙中山政府，但很快在南方督军之间发生了内讧。广西省督军陆荣廷将军向广州进军，攻占了广州，孙中山被迫出走。国民大会留在广州的那一部分人决定移居云南。该省督军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唐绍仪。可是，在国民大会代表尚未到达云南之前，唐绍仪已经“夺得”四川。这些代表决定随他迁往四川。但是，正当国民大会准备在新的地点开会时，传来了消息：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炯明将军已把侵略者陆荣廷赶出了广州。在这同时，唐绍仪被赶出四川，以后又被赶出云南本省，国民大会代表遂作出决议，重返广州。1920年下半年此决议才得以实现，广州重新恢复了1917年的临时军政府，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全中国的总统。在总数八百七十名的国民大会代表中，参加投票的为二百二十二名，由此可见，从法律观点来看这次选举有多大的“合法性”。1921年下半年，广州政府为同广西督军作战而进行了准备，这一次广西督军得到了北方帝制派的支持。

最近的危机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中国发生的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是上述情况发展的必然继续。

1921年12月18日，张作霖来到北京，撤换了自己的走卒靳云鹏的内阁，因为据张作霖看来，靳云鹏在保护日本利益方面表现得不够有力。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梁士诒被任命为总理。吴佩孚将军利用了这个事件，要求梁士诒立即辞职。因为张作霖并未表现出有让步的意愿，吴佩孚决定用武力对他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中国又面临着“内战”的爆发，或者简单点说，面临着两个大帅之间的新决斗。

如果不是孙中山突然插足进来的话，所有这一切本是平常的



事，不会引起任何特别强烈的反应。这位曾经坚决反对外国干涉的激进共和派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突然参加了反吴联盟。是同谁结成了联盟呢？是同极端凶恶的反动分子、日本爪牙张作霖。事情来得如此奇特，如此令人惊讶，自然而然地引起许多人试图对此事作出解释。我们认为，指导孙中山这一行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吴佩孚不信任。吴佩孚虽然自诩为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但归根到底同中国所有其他督军很少不同之处；二是害怕这位危险的竞争者过分强大。吴佩孚在1920年击败了“安福系”，如果现在再战胜张作霖，就会把非常强大的实力和政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孙中山尽管有其革命历史，但终究是中国人，而且最近十年中国政治斗争环境的腐蚀作用当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最后，也不排除同样有日本人插手孙中山这一行动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张作霖和孙中山的联盟是既成事实，吴佩孚受逼于两个敌人之间。但是，吴佩孚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急忙地夺取了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步骤的结果是大家都已知道的。张作霖军队在北京附近被击溃，满洲独裁者本人被迫逃回奉天老巢，在那里妄图宣布满洲为独立国。吴佩孚占领了北京，撤换了旧政权，任命黎元洪为临时总统，此人是我们已经熟悉的，1916—1917年就曾担任过这个职务。

这时，在南方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件。孙中山的阵营出现了分裂。孙中山最亲近的朋友和战友陈炯明将军不满意孙中山和张作霖结盟，公开发动反对国民党领袖的暴乱，迫使孙中山乘炮舰逃离广州。据最新消息，孙中山正重新聚集兵力，准备从陈炯明手中夺回广州。能否成功，且拭目以待，但是目前南方对吴佩孚的进攻已暂时中止，以后也未必还有恢复行动的机会。

前 景

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报刊上和政界中关于中国全国统

一的可能性问题又重新活跃起来。许多人倾向于把吴佩孚看作是能够使“中华帝国”摆脱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的强有力人物。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吴佩孚是自由主义者、外国干涉的反对者，说已提出了改革纲领，要消灭督军制，发展地方自治，召开民主义议会等等。这些期望究竟有多大根据呢？

吴佩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具有北洋军阀的一切优缺点。过去的事实教会我们要极其审慎地对待这些“祖国救星”的言论和诺言。这种谨慎态度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必要，即在吴佩孚的背后无疑有英国资本在操纵（英国报刊并非白费气力地对他大肆吹捧），因此即使这位将军的意图再好，他的行动也远不是自由的，更何况他是否会有良好的意图还有待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报刊上在论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时所表示出的那种乐观估计实属为时过早。只有在中国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明显地出现某种新的、非常强大的、能够担负起民族任务的社会力量，才能认真谈论中国民族复兴的即将到来。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期望从吴佩孚的夺取政权中出现政治奇迹未必是明智的。

但是，既然中国的民族复兴同目前事件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今后究竟会怎样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作如下的回答。

如果在太平洋区域不发生任何类似新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事件，那么，最近几年看来不会在“中华帝国”的政治形势中出现任何重大变化。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督军们相互之间的斗争，加上外国帝国主义没完没了的阴谋诡计，仍然将充满中国的整个国内生活。这种斗争可能会找到某种新的、稍许缓和的、隐蔽的形式，但斗争的实质将依然不变。

至于今后，今后中国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我们不太相

信凭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建立强大的、独立的中华民国，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它是否有这种可能呢？

人类历史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想养得面红体胖，它必须要有时间。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获得了这个时间，因而它夺得了国家政权。德国资产阶级得到的时间就少得多，因为紧随着它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上它已经起不到国家主人的作用：革命前它必须同容克地主阶级分享政权，革命后又必须同无产阶级分享政权。俄国资产阶级获得自身发展的时间更是非常少了：在沙皇执政时代，它连地主显贵的堂屋都进不了，以后又被无产阶级毫不客气地一脚踢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俄国直接从沙皇专制政体转入苏维埃共和国，越过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当主人的中间阶段。

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出现类似俄国结局的可能性当然将大于遭到类似英、法命运的可能性。很难设想，最近几年能为中国本地资产阶级的繁荣创造必要的条件。现在占领着中国国民经济所有重要部门的外国资本，不打算放弃自己已巩固的阵地。相反，可以预料外国资本将会继续占领新的同样重要的部门。既然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将被夺去它赖以吸取营养而成长壮大的立足之地。

但是，外国资本在阻碍建立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同时，将会促使人数众多的中国无产阶级成长。中国无产阶级在接连不断的阶级斗争的烈火中逐步得到锻炼。在这种类型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将逐步形成重现俄国历史的有利条件：革命积极性将越来越多地蕴积于无产阶级一极，而不是资产阶级一极。一当历史形势许可的时候，劳动群众便将发挥出他们的革命能量，真正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华共和国，但已经不是在资产阶级旗帜之下，而是在无产阶级旗帜之下的共和国。中国存在着大量在经济上受

压迫的小农，正同俄国经验表明的那样，这将保证无产阶级政权可以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中国北面有一个强大的劳动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再加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不断增长，将会有助于中国实现这个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说，从历史前景来看，对中国来说，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比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完全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中华帝国”今日的问题。

(章任贤译，马宝华校)

共产国际执委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会议简讯（摘要）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本次会议上，X同志^①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X同志在中国住了一年半，不久前回国。他详细地研究了这个人般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按照他的看法，中国政治是外国操纵的，中国的各个社会阶级（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了型的阶级）尚未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正在开展着得到旅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读物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整个中国居民中，尤其是在农民中，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农民大部分都是在小块土地上耕种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那里的情况如此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情况如此不同，以致迄今未能为他们制订出总的土地纲领。

在外国资本家控制下的华中、大工业中心上海，还没有能够

^① 从有关资料核实，X同志应为马林。——编译者注

从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社团转到建立现代工会。华南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孙中山的政党对工人阶级也有明显的影响，甚至无产阶级同这个组织还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一次可作为范例的海员大罢工^①就可以看到。在广州有许多工会团体组织得非常严密和高度集中。那里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组织有一万二千人，力量最强。

接着，报告人详细描绘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中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派系，它们各为外国列强效劳，被一个大国利用来打击另一个大国。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改良主义派反对北方占统治地位的反动的满洲民主派的斗争。^②在这场斗争中，看来孙中山遭到了失败。虽然在南方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极为有利，甚至政府也部分地希望开展这一运动，但是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却未能很好地利用形势与工人群众建立联系。他们奉行宗派主义的政策，把自己无所作为和脱离群众切身利益的状况解释为似乎是自己处于不合法地位造成的结果。中国青年，特别是学生，是最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外，没有再做更多的事。

赤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非常适合于有效开展工作的土壤，因此对这一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讨论。

在讨论中，马尔赫列夫斯基用他在华北的所见所闻，对报告作了补充。他认为，那里几乎谈不上工人运动，也谈不到什么工业。城市中有大量无产阶级，他们用自己苦役般的劳动代替牛马和蒸气机。就我们所知，农村居民落后了几百年，但知识分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们完全公开地表示自己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好

① 指1922年初发生的香港海员罢工。——编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感，就同南方的孙中山一样，不过，他们不能接受孙中山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愿望，因此与政治运动毫无联系。他们在与群众隔绝的小组中研究社会主义著作。不管怎样，在中国有可能大步向前发展的当前内战阶段，必须扎实地、认真地力求做到把革命运动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会议决定写一封致中国和日本共产党的信，并委托X同志起草。

（章任贤译）

在中国南方的革命者那里

(一九二二年九月七日)

Р·马林

今年1月我有机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桂林。桂林当时是准备讨伐满州^①的孙中山军队的大本营。为了这次远行，我曾穿过了具有中世纪特殊风光的湖南省。

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认为北方政府是不合法的，为了统一中国，孙中山决定进行新的进军。

桂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公元前几千年的历史古迹。在这里我会见了一些将领，他们虽然不同意国民党纲领，但决心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本人和该党一批领袖也在此地。国民党过去是地下组织，现在已成为公开的政党，参加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国民党是在推翻满清王朝之后成立的，它有一个政纲，只包括三项内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采取民主政府形式；所有中国人均享有做人应有的生存权利。^②

该党领袖大部分都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在日本、法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期间，曾经同社会主义政党交往过，并试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古代哲学调和起来。前面提到的党纲是各种各样的分子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任何集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解释。党的生活还不太复杂，没有达到在策略问题和纲领

①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② 指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编译者注

性问题上发生分歧的程度。因为不应忘记，中国阶级分化的情况发展得不是特别严重。国民党内也还有华南的大资本家，他们并不住在广东省，而是侨居在从新加坡到美国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殖民地内。这些大资本家——商人，工业家，银行家——彼此间很少联系，他们不愿迁回中国，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够稳定。他们的愿望在党内未能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反的，因为国民党是在广大居民阶层中进行宣传的，它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

惧怕那些对中国政治生活有巨大影响的大国，是国民党没有大力展开宣传的原因。特别是在北方，国民党的活动很少，甚至在北方大城市里都没有自己的组织。**南方领袖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全力以赴地在工人中发展势力。**他们懂得，尽管无产阶级还很年轻，人数很少，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目的，他们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他们都对俄国革命和苏俄抱有好感。**只是由于广东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才使中国南方政府未能与苏俄建立直接的联系。

宣传工作非常松懈是国民党的一大弱点。孙中山本人在桂林的确对军官们进行了政治宣传，但高级指挥人员阻碍士兵入党。结果，国民党只有依靠那些态度非常可疑、往往追求个人利益的将领们。他们很可能最终迫使孙中山与温和派妥协，就象1913年^①在南京时那样。

当我在桂林时，满州督军张作霖建议南方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国民党领袖，除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外，都认为吴佩孚是主要敌人，无论如何必须把他打倒，因此尽管张作霖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反对者，反吴联盟还是建立了。孙中山希望北方两个督军

^① 原文如此，实为1912年。——编译者注

自相残杀，两败俱伤，而南方则坐享其成。

当时在孙中山和广东省省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分歧主要是在政治问题上。**孙中山首先是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者，而陈炯明在其军队占领广东后只关心本省的发展。**他主张广泛地实行各省自治和彻底地进行地方分权制，因此他的观点与其他督军相近。因为这种管理方式使他们更有可能进行独裁统治。

陈炯明从一开始就反对北伐。他拒绝担任孙中山军队的指挥职务。孙中山在决心公开反对陈炯明以前，犹豫了很久。当完全弄清陈炯明在设法接近吴佩孚以后，孙中山便从桂林前往广州解除了陈炯明的职务。陈率军队离开广州，静观事态的发展。但是，以后他确信总统决定清洗政府机构，于是发兵进攻广州，迫使孙中山逃走，解散了南方政府，并公开拥护吴佩孚。不过，根据最近消息，桂林已出兵反陈，力图恢复孙中山的政权。^①

在海员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国民党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护孙中山一派的领袖）和广东工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次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轮船公司，具有政治色彩。而英国政府在这次斗争中则支持香港资本家。这样就使得国民领袖能够在罢工者中间广泛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罢工者得到国民党很大的支持，必须承认，国民党对这次罢工采取的路线同正确的革命经济斗争路线是配合一致的。

民族主义思想在罢工者中间广为传播。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举行了示威游行，参加者约有五千名海员。他们满怀激情地倾听国民党领袖们关于中国必须摆脱列强束缚争取独立的演说。在罢工后，广州、香港和汕头的海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在五金工人、建筑工人中，国民党同样博得了好感。目前在工会斗争基础

① 指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环部进攻陈炯明占据的广州。——编译者注

上进行的鼓动工作看来将在中国的南方取得很大的成功。

工会国际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在中国南方工会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地将成长壮大。

(章任贤译)

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的汇报（节译）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И·布哈林

中 国

关于中国，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我们有过不少争论。大量居民是从事小农经济的农民。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缺少土地，受到苛税重租的盘剥，苦难深重。目前中国进行的内战是督军们之间的混战。这些督军分别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影响之下。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例外。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孙中山所依靠的这个党，在最近提出的草案——纲领性文件中，要求农民同地主实现平等。国民党内不仅有小资产阶级、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部分农民、部分尚未脱离全民族脐带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小资产阶级性质比俄国严重十倍的国家，共产党人如果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决裂，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共产党人的义务是建立一般性革命联盟，这个联盟将首先为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当然必须是在加强工人阶级社会阵地的条件下。

（章任贤译）

中国的政治局势^①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C·斯列帕克

内 阁

人们认为，张绍曾总理的内阁现在已寿命不长了。一个月前，这位总理似乎竟敢反对中国声势赫赫的两位军事首脑——曹锟和吴佩孚将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人已是张口结舌，瞠目相视，不知以后又将如何。吴佩孚曾要求政府任命他的走卒孙传芳将军为福建省督军，沈鸿英将军为广东省督军。难道张绍曾竟相信会议和美好辞藻的力量而不服从吴佩孚的指示？吴佩孚已经再一次同曹锟谈妥建立一个反对孙中山的共同阵线，实际上他并不需要北京所谓政府的这个任命，因为上述两位将军反正已经进攻了：一个指向福建省，另一个开往广东省，进攻孙中山。但是，吴佩孚需要的是“合法性”，瞧，这样就与他完全无关，他只不过执行最高当局的意愿，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动，也就是说他在执行“合法”政府的意愿。

当吴佩孚的代表来到首都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发表上述任命时，内阁宣布集体辞职。大家都认为内阁辞职的原因是，内阁不愿对吴佩孚和曹锟的要求表示屈服。这样僵持了十至十一

① 此文为《真理报》驻北京记者斯列帕克从北京发回莫斯科的通讯。——编译者注

天。中国报刊开始纷纷议论，虽然语气还不很肯定，但一致认为，总理终于不再按军阀指示行事，而在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了。可是很快就有一些部长在闲谈中泄露了整个秘密，显然，他们不愿让总理享有在中国史册上第一个敢于违背军阀意志执行自己政策的总理的声誉。原来，辞职的原因是，总理和某些部长不仅同意批准吴佩孚建议的任命，而且还准备满足吴佩孚的另一要求，即致电孙中山，历数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独立政府的种种“罪恶”活动，并要求孙中山重返北方，停止他在南方的独立活动。这是总理向吴佩孚的彻底投降，对某些部长来说，未免太过份了，因此内阁发生了分裂，随后就是整个内阁集体辞职。

现在内阁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恢复了工作，并且出色地执行了吴佩孚和曹錕的所有命令。但是，内阁不可能支撑很久。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内阁能够维持超过四、五个月时间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必须让其他派系也能够捞一点政府的油水，而这种派系在中国多的是。

现在，国会议长吴景濂本人急于想当总理，好组织起一个真正的“议会”内阁。这个“议会”内阁究竟怎样，只要根据这位主要的总理候选人议长本人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但是，为此必须谈几句，所谓的中国议会是个什么东西。

议 会

任何地方都不象北京现在的议会那样，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如果说议会一般是可以做出某些有成效的事情的话，那么，从去年8月1日吴佩孚召开国会起到现在为止，谁也无法回答，中国议会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比如说，直到现在参议院还不能选出一个常任议长，因为那将对某些派系不利。无论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派系众多，如果一一列举将使读者感到厌倦，而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些派系都是一路货色，不

同的只是：一派或一个集团从某个将军那里领取“津贴”，而另一派从另一位将军那里领取。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更换主子，只要对他们更为有利。一当某位拥有巨大财力的将领想要有自己内阁的时候，议会就会突然成为“爱国的”议会，立即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挖出部长们的种种“罪行”，于是旧的内阁倒台。比如财政总长罗文干事件^①就是这样，他之所以被逮捕，因为必须先破坏王宠惠内阁的名誉，然后推翻它。而部长们显然并不觉得委屈。今天由甲，明天由乙担任替罪羊的角色，以便以后自己成为部长，坐上部长宝座，再去寻找另一个替罪羊，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现象。区别仅在于谁先谁后。

但是，他们一个个都逐渐富有起来，肥胖起来，而且为有朝一日倒霉时积攒了一笔钱财。吴景濂作为议长，当然要给大家做出一个品德良好、行为正直的榜样。不久前，这位议长在北京一家餐馆闹了一出丑剧。他被一群妓女簇拥着饮酒取乐，在灌足老酒以后，突然要求餐馆老板换一个大于通常电压的大灯泡。这种灯泡当然是不可能搞到的。因要求未能照办，议长捣毁了所有家具，殴打了侍者，警察闻讯赶来，这位议长便出示了自己的名片，警察立即溜走了。数日后，一些议员在议会就议长在餐馆所作丑事向他提出质询，议长回答说，此系私事，因此无需加以解释。

可见，这位议长正可算是担任总理一职的最佳人选了。

几天前，参议院作出不信任政府的表决，料想众议院也将作出同样的表决。但是，“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正如它自己所说，对此并不感到难堪。要知道它现在只听吴佩孚和曹錕的命令，并寻求他们的庇护。至于曹錕是否会挽救目前的内阁，还是疑问，因为他毕竟想让其他人也能捞到一点好处，何况天津派

^① “罗案”是直系内部保定派（即天津派）曹錕与洛阳派吴佩孚斗争激化的结果。1922年11月18日议长吴景濂以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行为为理由，迫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编译者注

曹锟兄弟曹锐的一派)正特别起劲地想让自己的追随者组成新内阁。

政 府

可见,北方的事务现在是吴佩孚和曹锟领导的。政府本身不能执行任何一项决议。各省各自为政,并丝毫不因北京有一个“中央”政府而感到困窘。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如果说还有诸如盐税、烟酒专卖税、关税等收入的话,那么这些税款都在外国资本的掌握中,作为外国贷款的保证。

当一星期前北京的宪警因为四个月没有发给他们薪饷而以罢工相威胁时,政府费了好大劲才向外交使团乞求了大约五十万元,也就是说经过苦苦哀求,外交使团才同意政府支取中国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现在又爆发了支付教师、政府官员和中国驻外使节薪金的问题,因为他们已一年没有领到薪金,他们同样以罢工来威胁政府。更何况军阀们还需要各项军事用费。政府这次能否摆脱困境,就象它往常做的那样,把自己卖身给外国施主而得救,还很难说。

不管怎样,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无望。当然,这对中国的外国“保护人”是有好处的,他们都打算寻找适当藉口使中国的财政、经济生活以及铁路实行国际共管,寻找藉口使中国变成国际资本的殖民地。为此国际资本已经为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会议制订计划。这次会议名义上要讨论关于是否准许中国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的问题,但实际上国际资本要寻找一种“彬彬有礼的”手段,以便缠住中国使它动弹不得。当然,这并不妨碍外国报刊对中国的不幸状况、财政危机等等流几滴鳄鱼的眼泪。

在熟悉情况的中国各界人士中,对北京政府普遍存在着极其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甚至预言,议会即将解散,议员各回本省,每个省将独立地进行管理,完全藐视甚至仅是形式上存在的

北京政府。

吴佩孚的军事胜利

目前，吴佩孚成功地实现了他夺取四川省的计划。据最新消息，最富庶的四川省还在四月份就落到他的手中。当然，这大大加强了吴佩孚的地位，因为他掌握了丰富的盐场和其他资源。但是，始终希望中国摆脱军阀统治的社会各界人士并没有因为吴佩孚的胜利而感到沮丧。他们指出，孙中山在南方仍然强大，福建、浙江、广西、云南、贵州和其他各省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阵线，反对妄图以武力征服和统治各省的吴佩孚。中国各报把吴佩孚称为新的袁世凯，并且指出，袁世凯已经被迫放弃了他的野心，吴佩孚同样将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幻想。

从广州得到的消息可靠地指出，最近孙中山在南方的地位不断地得到巩固。广州的工人群众为了成立自己的工人联合会曾同广州国民党当局进行过斗争。国民党政府不愿承认它，因为它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而老的联合会是国民党组织的。现在工人群众在取得胜利以后发表宣言说，他们除工人政府外不承认其他政府，但愿意对不反对他们的政权给予支持。

根据这种讲法，看来南方的工人群众现在是支持孙中山的。譬如说，香港的某些工人集团甚至声明，如果需要，他们将组织游击队同孙中山的敌人作战。南方的商界也行动起来，准备给孙中山以财政援助。

现在，中国学生也支持孙中山。所有这些情况导致吴佩孚在广州的走卒沈鸿英将军未能成功的在广州组织一次反对孙中山的新政变。结果相反，3月23日沈鸿英被迫把军队撤出广州。

这样一来，吴佩孚和孙中山之间的斗争暂时可能以不分胜负而告终。吴佩孚的力量还不足以征服不听话的南方。孙中山在财政方面，因此也是在军事方面的实力不足以战胜吴佩孚。当然，

张作霖可能在使天平倒向孙中山一边的行动中起着重要因素的作用，虽然传说最近他与吴佩孚的冲突日益严重，不过目前他还没有爬出他的老窠。

在这场斗争中，被剥削的中国工农群众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遗憾的是，他们由于本国统治者和外国“朋友”的恩典暂时还不可能积极参加斗争。但是不管怎样，已经开始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会突然登上舞台，并立即决定这场斗争的命运。

4月13日写于北京

(章任贤译，马宝华校)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Г·魏金斯基

一

在中国出版的美、英、法、日等国资产阶级杂志和报纸上，以及从这些国家归来的无数旅游者所写的书籍中，现在都在谈论“觉醒的中国”，其内容包括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和农村中旧生活方式的破坏，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欧化”，最后还有，近两三年来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中国政治现实生活的年轻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工人运动。

死死抱住世界帝国主义不放的思想家们不胜惋惜地、满怀忧郁地哀叹中国已“今非昔比”。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报刊，——它们在中国各自为有关大国效劳，但追求列强的共同目的，——每天、每周、每月从中国的中心和偏僻地区发来数以万计的文章、电讯和通信，惊恐不安地报道中国人民这个“巨人的觉醒”。

世界大战期间，与正在为争夺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交战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相违，中国开始迅速地振兴工业，很快地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后阶段，在某些工商业部门形成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对抗，最后中国还出现了相当大的工业无产阶级。

不言而喻，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对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社会活动、日常生活、行会、宗教、文化等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生活有了新的巨大的推动，生活的速度加快

了。

在这里我不想列举数字来证实这一情况。已经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中国的纺织业、烟草业、采矿业等在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大大地发展了。上海、天津、威海卫、青岛等许多城市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港口。而象汉口、长沙、南京这样的城市正在变成迅速发展的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中心。京浦、京汉铁路干线真正成为中国年轻工业产品迅速流通的大动脉。

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当然也同时地和并行地发展着。这方面的情况必须用数字来加以证实，因为它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这一原因，不仅敌人而且连自己的朋友都往往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敌人关心的是缩小它的意义，朋友们则关心它的成就。

中国的城市工人共有五百多万，其中二百四十万在现代工厂企业中工作，可以把他们分成以下各类：

铁路工人——十万；纺纱工人——十六万；火柴厂工人——九万；矿工——四十二万；海员——六万；烟厂工人——十万；纺织工人——三十万；电力工人——十万；冶金工人——二十万；丝厂工人——十三万；印刷工人——八万；水泥厂工人——二万五千；蛋品业工人——一万五千；造船工人——二万五千；瓷器业工人——二十万；面粉厂工人——一万五千；制革工人——二万。

其余的三百多万工人包括：建筑工人——六十万；搬运工人——五十万；人力车夫——二十万；盐业工人——三十万；制茶业工人——十万；港口工人——三十万；理发工人——二十万；酿酒业工人——十万；木工——十万，等等。

最近几年来，在上述无产者中约有三十万工人已经组织了不同于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现代工会。

在这些工会中，最大的是拥有五万会员的冶金工会，其次是

海员工会，会员四万五千人，铁路工会四万二千人，建筑工会三万人，烟草工会一万八千人，纺织工会一万人，印刷工会一万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会。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非常明显地分化出来，在组织上因而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为国内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近一年来，有组织的中国无产阶级使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它不仅是“睡醒了”，而且完全按照工会这个阶级组织的规程，以其青春应有的活力和冲劲投入同中外资本的斗争。

在去年1月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直接参加者有二万三千人，以后参加进来的同情者达二十余万人。今年2月京汉铁路的最近一次罢工有三万名工人参加，他们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正如罢工所表明的那样，纪律严明。在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罢工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主义敌对的阶级，极其令人信服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在有组织的工人采取的这两次大规模行动之间，全国都掀起了罢工浪潮，时间持续达一年之久。只要略举一二就足够了，如上海烟厂和纱厂的罢工，唐山煤矿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发展到同曹锟打手们的流血冲突），以及汉口轧花工人的罢工和烟厂工人的再一次罢工。

大概主要是这种现象使得资产阶级评论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们惊呼：“中国人民的觉醒”太快了。应当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开始对工人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有了正确的估计。

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与他们本国的工人运动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为争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斗争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反帝性质。作为反帝斗争，它把

其他阶级的革命力量吸引到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一边，因为这些革命力量在这个时期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小于他们同无产阶级在反对民族敌人，即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共同利益。去年香港和澳门的罢工非常清楚地说明，澳门工人的罢工最后发展为要求将澳门归还中国，香港罢工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广州的南方政府（国民党政府）用来转移英国人从香港施加的压力。

无怪乎英国人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孙中山对香港海员的支持。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要求英国人提供六百万贷款的谈判中（孙中山为了这个目的把自己的儿子派到香港去），去年的海员罢工必定是英国人提请孙中山注意的很不愉快的事件之一，成为顺利达成交易的一大障碍。

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施加何种压力，妄图使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斗争隔绝开来，他们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与此相反，民族主义革命者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反帝斗争中从工人阶级，首先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那里寻求援助的必要性。不仅如此，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将会同意工人向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提出的要求，这一情况将成为中国政治生活舞台上越来越经常出现的事实。

二

目前，由于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到3月26日期满，在全中国再度掀起了反帝运动的浪潮。1898年沙皇政府夺取了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后在1905年又把它让给了战争胜利者日本。从1898年算起，已经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

这是沙皇政府占有这个半岛的规定期限。但是，当旅顺和大连落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以后，他们在世界大战期间便凭藉自

已是在中国居优势的帝国主义力量这一霸主地位，想通过威胁手段于1905年强迫帝制派总统袁世凯签订“租借”期为九十九年，即到1997年期满的新条约。

此外，根据同一条约（这个条约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即所谓“二十一条”的一部分），日本将占有南满铁路直到2002年，占有安奉（奉天至安东）铁路到2007年。一句话，日本资本决定把南满地区也夺取过去，按照日本某些好战成性的外交家的看法，南满是朝鲜的继续（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特别是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以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迄今为止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商人）发起了全国性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和日本政府同僭位总统袁世凯签订的一切条约。1919年春，中国抵制日本资本的活动疾风暴雨般遍及全国，在华南和华中各省表现得尤为强烈。

中国工人群众几乎没有参加这两次行动^①。整个抵制运动的倡议者和领导者是学生——商业资产阶级的子女。抵制浪潮遍及各地，许多日货被焚毁，在中国出版的英美报刊在一旁幸灾乐祸，日本报刊则反唇相讥，并采取耐心等待态度，呼吁中国社会各界表现出理智。整个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商人抬高了物价，革命学生痛苦地感到绝望，学生组织及其在上海的总部“中国学生总联合会”也因此于1920年分化瓦解。

抵制运动在当时不仅没有把广大劳动群众席卷进来，甚至连并非无名之辈的孙中山博士领导的国民党也没有参加这个运动。当然，后一情况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国民党在最近几年主要依靠它在1911年第一次革命期间捞到的政治资本而生存下来。现在这个党似乎重新活跃起来，试图立稳脚跟，如果不能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至少也要在整个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扎

① 此处与事实有出入。实际上，中国工人群众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日斗争。——编译者注

下根来。

不管怎样，最近期间不时传来简短的消息说，一方面国民党已开始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最近的反日活动，另一方面在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中提出的一部分口号是支持孙中山即国民党制订的统一中国的纲领。

目前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革命政党和革命学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联系正在加强。

中国社会各界纷纷抗议日本政府不愿放弃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将继续统治旅顺、大连好几十年（当然，这是指如果在日本同袁世凯签订的条约期满以前，日本无产阶级不能很早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话）的条款。目前这些抗议仅表现在中国政府的照会和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可是，学生们的游行都被那些因最近爆发的工人罢工和青年学生“骚乱”风潮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警察所驱散了。但是，这些行动同1919年一样，目前仍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工人群众。

英美报刊围绕这个运动发出了一片喧嚣，这归根结蒂反映的是英国资本对日本资本的态度，但是，从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本侵略野心反抗的程度来看，这些喧嚣声与这个运动的实际规模并不相符。

其实在日本出版的英国报刊也相当坦率地确认了这一点，当然它不是作为自己的意见，而是以反映日本主要报刊看法的形式表示出来的。例如，在3月29日《日本纪事报》刊登的一篇长文中就引证了《国民新闻》、《时事新闻》、《商业周报》、《报知新闻》等报和英国在中国出版的半官方报纸《字林西报》的意见，其中除了把中国社会各界丑化一通，说他们的行动莫名其妙，令人不解以外（《时事新闻》甚至就此声明说：“决不同这些疯子对话”），在所有文章中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即中国的反日舆论是美国所策动的。

但是，在中国的英美资本对日本的态度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希望能稍许深入分析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人值得认真注意的特别重大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对上述问题只要再补充一点就够了：无论是日本报刊还是英国报刊，不管它们就二十一条如何进行辩论，但在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这一点就是，它们对中国的利害关系总的来说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关于中国独立性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两国报刊主要都强调指出，各国对中国政府不应认真看待，因为中国政治上一片混乱，权力也不集中，北京的势力只能到达很小的一块地区。

在这方面，尽管在华帝国主义者存在内部矛盾，但是他们现在同过去一样都卑鄙无耻地采用了共同的帝国主义手法：先制造混乱，制造政治上的分裂和行政管理上的紊乱，然后以这些事实为借口，声明他们的受害者咎由自取，因此不能期望得到“好心人”的尊敬。

三

但是，在1919年的抵制运动（确切点说，在这一运动所发生的环境）和目前的抵制运动之间，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这三年中，中国的工人运动形成和发展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别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而登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还不小，当前还不能直接对本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中国社会各界已不得不认真对待工人运动和共产党。

最近的反日运动，既缺少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参加，又没有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它是一次没有主心骨的运动，是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都没有定形的运动。帝国主义分子凭其多年的经验

非常熟悉这一点，因此甚至尽可能利用这一运动为自己谋取利益。

中国资产阶级当然不拒绝在自己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获得中国群众的支持，但是今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寻求群众的援助。

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曾全力以赴地争取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抵制运动，而且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之所以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都不关心政治），可是现在资产阶级不想再吸收无产阶级参加这一运动了，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这一运动变得过于庞大，而不仅仅是反帝斗争。

不言而喻，目前这只是中国资产阶级不必要的惊慌，这种庸人自扰在很大程度上对资产阶级自己也是有害的。

固然，在铁路、矿山、工厂和外国商行最近发生的一些大规模罢工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国内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能够站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外顺利地为自己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是在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国主义的桎梏从而取得独立的基础上统一全中国。

中国工人运动在本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脱离全民族革命战线，而且恰恰相反，中国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愈强大，政治上愈成熟，它就一定更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争取国家独立和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使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可能把自己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

不言而喻，无论建立何种策略上的联盟，阶级矛盾是不会消失的，现在和将来都会直接根据这一联盟中力量对比的不同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目前这样的半殖民地，反帝斗争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基调。

被最近工人罢工吓坏了的中国资产阶级，推迟并局部地取消了它准备举行的反日示威游行，从而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不成

熟，这进一步表明，与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处于不可靠者的掌握之中。这还表明，中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不可免的应当成为推动全国反帝运动的强大动力，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动摇于各个派系之间，而真正去做他们非常爱说的事——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目前在中国正在酝酿中的对日抵制运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这不仅因为资产阶级不想这么做，也不仅因为中国工人对中国资产阶级为之鼓掌叫好的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事件记忆犹新，还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实质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消极态度，这不可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一旦工人阶级真正参加反帝斗争，那么斗争的规模和形式，甚至斗争的结果都将大为改观。

这个时刻已为期不远了。

（《真理报》编者按：编辑部认为，魏金斯基同志对农民和孙中山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

（章任贤译，马宝华校）

简述中国民族运动的过去和未来^①

(一九二三年八月九日)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十二年前，中国革命推翻了异族政权，宣告成立共和国。秘密革命团体是逐步摧毁满清王朝的统治的，当汉族封建主义分子同地下运动的领袖联合起来反对满清时，清朝便再也支持不住了。这些封建主义分子自从在南京同地下运动领袖达成妥协以后，实际上成了所谓中国革命的领袖。当袁世凯把政权夺到手中的时候，事情就完全清楚了：中国生活中将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国家的统治权只是从封建满族的手中转到了封建汉族的手中。对革命起推动作用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激进派，实际上没有任何势力，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根本变化。

中国的革命运动总是带有秘密活动的性质。持有革命思想和革命的政治领袖们从来不广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只忙于组织军事集团来支持革命，为了准备革命，他们还谋求海外华侨的财政援助。

这场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什么结果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国家的农业状况没有重大改变，交通运输没有迅速发展，支持革命运动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只是在最近时期，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现代工业才开始在中国得到发

^① 原文署名为“N.N.”。据《真理报》编者按，该作者为中国一国民党左派。——编译者注

展。

在政治方面，推翻满清王朝后并没有因此而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在袁世凯掌握国家统治权的时候，他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还能挫败试图推翻其政权的任何活动。袁世凯虽然是中国封建阶级的代表者，但获得中国各种资产阶级分子的尊敬和支持，革命没有建成一个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甚至没有发动本国的大部分居民。

中国革命可以与1918年的德国革命相比。那里的情况同中国一样，革命后掌握政权的依然是原先的阶级。在那里，革命没有成为新的力量源泉，使德国人能够在同世界大战后奴役德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在中国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状况，比在满族统治下更为悲惨。自独裁者袁世凯去世以后，内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的军阀们，时时必须找一些借口（用抢劫和俘虏外国人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对全国的统治。因此他们组织土匪集团，用来完成军阀本身要进行的破坏活动。

但是，未必能说，在列强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日益增长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意识就一定会增强。固然，我们有时也会看到民族感情的爆发。例如，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当中国再次受到把它卷入世界大战的盟国欺骗时，就是这样。不过，这种热情是极其短暂的，迄今为止，它的力量甚至还不足以建立一个保卫祖国独立的组织。虽然我们在今年看到，中国掀起了一个废除同日本签订的臭名远扬、丧权辱国的条约的运动（这个条约是袁世凯执政的恶果之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就连这个运动也不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表现。

在目前的反日运动中，可以看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很大影响。例如，上海举行的大示威游行呼吁所有外国反对日本，令人感到其中就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在这次运动期间，思想上已被外国

教育所俘虏的北京学生还拒绝中俄两国密切交往的要求，然而这却是保卫中国反对外国统治的唯一途径。

毫无疑问，中国民族意识的发展是缓慢无力的。当广大人民群众尚未被政治教育和政治鼓动工作发动起来的时候，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支力量。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同腐败的中国封建军阀制度进行任何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仍然仅仅是商业和金融业资产阶级，直到最近几年才踏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很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同外国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拜倒在外国实力之前，把自己年轻的一代作为牺牲品，教导他们完全接受外国影响，使他们变成假洋鬼子。

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很会讲许多漂亮话，说什么中国必须有正常的条件，民主、权利和秩序等等。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中国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他们的权力是不会永久保持下去的。不过，他们能够阻碍作为中国革命力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

民族运动和亚洲的觉醒

在反抗满清王朝期间，民族意识比现在要强烈许多倍。如果拿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差别还不太大。但是，如果只指知识分子和中间阶级而言，那么差别就很大了。

我们常常听到，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发动第一次革命和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原先的革命者在完成这个任务后斗志又减弱了。第二个原因，人们指出，是许多革命志士在革命后反对军阀统治的各种活动中先后牺牲。我们还听到一些老同志抱怨知识分子中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对政治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如果我们把我国的情况同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明显

地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无疑是非常落后的。

土地革命、现代化生产和政治独立是“亚洲觉醒”的标志。对这一“觉醒”过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四支主要力量是：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以及俄国革命。

俄国伟大的工农起义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整个亚洲至关重要的大事。苏俄是世界帝国主义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苏俄成为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天然盟友，唯有它支持革命的民族运动，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纷纷前往世界革命中心——红色莫斯科——参观学习。他们往往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才到达那里。他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而在罗曼诺夫王朝沙皇政权和克伦斯基政权统治下，广大群众处于有可能成为外国资本的奴隶的危险之中。这些革命领袖看到这一点，都表示钦佩，并亲自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在了解新政府的性质和目睹红军的组织情况以后，其中的优秀分子立即认识到，只有同苏俄携手并进，只有同赤俄保持紧密的接触，才是使他们本国民族运动强大的唯一途径。

以俄为师的实际意义最明显地表现在土耳其的事例中。土耳其在革命运动初期的局势是非常艰巨的。正式设在君士坦丁堡的政府，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旧正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对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但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友好关系。新的革命力量是在远离首都，接近俄国边境的地方组织起来的。年轻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当然害怕俄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求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接近，而后者向土耳其人献殷勤，则是为了在推行反德政策上得到英国的支持。尽管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反抗，但是革命运动领袖还是接受了苏俄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援助。这样一来，结果是一支由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由怀有强烈民族感的革命农民组成的新军得以从安哥拉胜利进军到士麦那和各个海峡^①，而且这支

^① 安哥拉现名安卡拉，士麦那现名伊兹密尔。——编译者注

军队还恢复了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态势。

当我们把土耳其在战后民族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同我国相比时，我们有种种理由感到羞愧。我们知道，中国外交官通常喜欢吹嘘说，他们中某个人曾经担任过国际联盟某届会议的主席，另一位中国外交官曾经是国联所属国际法院的一名成员。但是，这对于我国的复兴又有什么意义呢？近一年来，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前进了一大步，在印度，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可是在我国，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民族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找出原因。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才能指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根本变化。

民族运动和民族政党

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民族政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内的民族运动又怎样能够存在下去呢？在中国，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民族政党参加民族运动。这个民族政党是在反清斗争胜利后组织的，由所有策划第一次革命的秘密团体组成。甚至在全国都终于表现出民族感情的时候，我们仍然几乎没有看到这个政党参加民族运动。为了证实这一点，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1919年大规模学生运动期间，国民党是怎样参加的呢？它为反对二十一条，即反对在1915年同日本签订的那个条约做了些什么？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当学生团体、商会、摊贩联合会和中间阶级的其他组织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订某个新的辱国文件的时候，这个民族政党并不是一个起推动、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学生团体干脆把国民党给忘了，在1922年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期间，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举行的无数次游行中，甚至没有提起过国民党这个名称。同1919年完全一样，那时国民党的领袖们又没有把大规模

的学生运动掌握在自己手中。

老实讲，很难说国民党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组织。我想起一位著名的北洋军阀下的断语，他说，中国不存在国民党，而只存在一个孙党（孙中山的党）。南方的叛徒陈炯明也持有同样看法。他在1922年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从那时起他就变成了北洋军阀和英国军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国民党是第一次革命后建立的唯一政党，但是它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同旧秘密团体一样。一开始时，全国各地各色人等纷纷加入这个新的革命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用这种手段就能真正建立强大的政治组织。

只有预先做好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的准备工作，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就。但是，国民党在保卫第一次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采取的工作方法经常是，只凭武力夺取某一块地盘，作为同北方反动敌人作战的基地。

许多人在推翻满清王朝后曾经加入这个党，但以后又退出了组织，其中不少人甚至愿为北方反动派效劳。当然，这些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尽管他们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员。可是，党的领导人没有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当然，不应有任何怀疑，党的领袖们是真摯的、忠诚的、经过斗争锻炼的革命者。但是，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党章中加进个人对党魁的纪律性这一部分时，已经清楚，使党成为现代政治组织的可能性更小了。没有严格的纪律，革命政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纪律性同秘密团体或宗教组织的纪律性毫无共同之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在国外进行的，在工作方法的问题上仍然保持旧的观点：首先夺取对某一地区的控制权，利用这个地区作为同北洋军阀斗争的基地，在胜利后组织一个“好的”政府和管理体系，只有在那以后才开始进行改革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在国内没有政治行动自由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一块受我们控制的地区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能

够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呢？可是，这种论点是没有意义的。难道在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有宣传的自由吗？他们是不是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宣传工作呢？他们难道没有受到各种残酷迫害，难道不正是在受迫害期间建立起那个终于完成革命任务的强大政党吗？而我党领袖为了控制国内某个地区，不仅忽视了革命宣传工作，而且总是不得不采取一些对任何革命组织都是极其有害的方法。

由于革命政党本身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切军事冒险行动都建立在同各种军阀集团头领勾结的基础上。我们与之联合的军阀比我们使用武力所反对的军阀，丝毫没有更多的革命气味。我党最忠诚的党员在各种毫无希望的军事行动中牺牲了，他们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为革命事业作出大得多的贡献。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夺取地盘，但是当某个地区处于我党领袖的控制之下时，国民党的形势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了。对某个地区的统治总是变成党的一种损失，削弱了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力量。党的优秀力量必然分离出去。党成为一省或数省纯地方性的政党，党的领袖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小心，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经常为地方政权制造各种困难。这时，主要问题就不是全国性民族革命，而只是如何保住该省政权的问题了。

国民党之所以未能领导民族运动，因为在党进行改组后，全部力量都集中到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上。从来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组织问题、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须知道在中国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比统治某个地区更为重要，何况这种统治是通过那些偶而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将军们进行的。过去十二年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党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进行彻底变革的必要性。

民族政党的未来

对于中国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主要任务是进行本国的民族革命。世界大战所形成的条件对实现这一任务是极其有利的。

一个强大、独立中国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目前它已进入衰退和力量削弱的时期。采取在全国广泛进行反帝宣传的手段，革命政党就能成长为封建军阀所无法对抗的强大力量。

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贫苦农民和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我们应当在全国组织党的分部，如果不能公开进行的话，则应秘密进行工作。在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我们应当以土耳其和印度的民族运动为榜样，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发扬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精神。苏俄的敌人也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的敌人。

但是，在我国如果不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能不能进行革命呢？我们知道，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困难：贫穷无地的农民不得不募当兵或到工厂做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谋生之道。要使我国民族革命获得胜利，就必须通过宣传鼓动寻找接近农民的道路，同样必须把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吸引到我们一边。

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住亚洲觉醒的过程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俄国革命使帝国主义势力遭到第一次打击。因外国奴役和剥削而受尽苦难的亚洲各国应当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巨大作用。中国还有许多人决心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人们对于为第一次革命而捐躯的七十二名年轻烈士的怀念，以及朱执信同志和在中国工人阶级为保卫自己组织权利和结社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京汉铁路工程师^①林祥谦同志的英雄事

^① 原文如此。应为京汉铁路工人。——编译者注

迹，这一切表明，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只要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工作方法，国民党必能引导中国人民取得真正的独立，走上生产大发展和实行生产新体制的道路。这种生产体制将给群众带来幸福安宁，给全国人民带来繁荣富强。

（《真理报》编者按：本编辑部收到国民党左派一位成员以“N.N.”署名所写的内容极为详尽的文章。由于技术原因，本文作了删节。这篇文章颇有价值，尽管其中对中国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意义估计不足。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竭力争取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但又害怕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暂时还同外国资本一起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此外，本文对年轻的工人运动的意义估计也不足。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中国不久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和随后进行的社会解放的可靠保证。）

（章任贤译）

国民党的改组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C·斯列帕克

中国不存在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迄今为止，国民党一直走的是纯军事斗争的道路——在某些地方，工人组织对它抱着疏远的态度——但是当国民党在年轻的共产党帮助下走上正确道路时，一切优秀的民族革命力量都结聚到国民党中来了。

对于一切关心中国革命运动和或多或少注意观察当地革命力量结聚情况的人来说，国民党现在的改组乃是此时此刻头等重要的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国民党有必要改组，而且要进行彻底的改组。直到不久以前，被称之为国民党的组织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群对自己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人的结合体，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而一个党是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善于和懂得如何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行奋斗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思想上志同道合并且立志为把中国人从内外压迫下解放出来而献身的志士。说实在的，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仁人志士，国民党才得以支撑至今日。从1905年在东京组织同盟会（秘密的革命团体）开始，经过1912年改组为国民党，直到最近，这个党之所以能克服种种危难，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仁人志士。可是问题在于，党内这批上层人士尽管满

忧，却既不甚了解自己革命任务的性质，又不太懂得解决革命任务的方法。

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部分以外，不存在欧洲人概念上的那种政党。在中国只有因利害相关而在某一时刻结合在一起的帮派和团体。中国的四分五裂对中国的那些外国“朋友”十分有利，所以他们竭力促成这种局面。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帮派集团经常地改换门庭，投靠新的主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考虑采用中国惯常的夺取政权的办法——招兵买马，与敌作战，也就不使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国民党多年的斗争经历表明，靠一支既不是出于良心，又不是出于受威胁，而是单为挣钱而来的军队，是干不出大事业来的，何况国民党四面受敌，招兵条件还不如敌人：敌人钱多，而且得到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也多。

国民党本身热衷于打仗，渐渐脱离了群众。近几年情况更为严重。在北方，群众对国民党一无所知。华中地区对这个党的了解也不多。只有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主要是广州地区，不仅人们都知道国民党，而且这个党有相当的基础。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过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接触和凭自己的无产阶级嗅觉，懂得了国民党与其他帮派的区别。正是这些工人群众在当地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基础之一。国民党在遇到危难时不止一次地得救也是靠这些工人群众。但是，国民党由于组织不健全，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党纪，常常因为自己的行动失当而在广州工人和商人中引起误解，甚至招致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即使情况较好时，南方工人群众对国民党的命运也只抱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年初，当孙中山打败陈炯明回到广州时，此前不久在广州成立的新的工人联合会一度曾决定不理睬国民党而只搞自己的工会活动。

一切珍惜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人都懂得，国民党虽存在许多缺点，但那怕从潜在的因素来看，它也不失为是中国的民族革命

政党（几乎所有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也都同意这一点），因此不必建立新的政党，而只需改组现在的国民党，使之成为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中的民族革命政党。近几年来，中国的革命力量已开始向这方面努力。可是，直到前不久为止，改组国民党的种种尝试都毫无结果。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懂得，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近期内不可能在国内实行社会革命，因此决定帮助国民党，与国民党结成暂时的联盟，可是国民党却不愿放弃它一贯的行动纲领，即上面所述的单纯依靠雇佣军对军阀实施征讨的行动办法。这样一来，共产党自己的主要工作——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接近人民群众，组织和结聚本身力量等被搁到了一边，却要去为那个采取错误行动，专给形形色色的将领们发横财的党卖气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实际上是不会有成果的。

但所幸的是，共产党的骨干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头脑和实力（不过没有能符合所需要的方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克服了对改组国民党问题的消极态度，使改组工作在三、四个月前得以加快速度开展起来。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进行的工作清楚地说明，国民党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改组工作能照目前这种速度和按目前这样精神发展下去，那末，不要很久，国民党便可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民族革命政党。

斯列帕克 1924年1月18日发自北京

（马宝华译）

苏联和中国达成协议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Г·契切林

任何一个俄国人和任何一个懂得本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人，当他得知曾把中苏两国分割开来的荒诞而不可思议的墙终于被推倒的时候，都会感到松了一口气。早就该这样了！中国本身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恢复同我们的正常关系。中国政府不是我们的债主，它不可能利用承认问题试图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我们偿还债务。它长期推迟对苏联的承认并非出于本身意愿。它在1918年封锁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它后来又为外国武装干涉出力，最近又迟迟不承认我国，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出于协约国列强各国的压力。这次加拉罕同志同中国外长威林顿·顾^①签订协议的工作是在极端保密和外交秘密的掩护下筹备的。列强各国的外交界破坏了我国与中国第一次协议的签订，如果这次不是绝对保守秘密，使他们无法知悉预备性外交行动的话，那么，他们这次也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中国政府这次签署协定的行动，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在使自己的政策摆脱列强各国控制的道路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因此之故，中国政治界这种独立性的表现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这是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中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以此表明，它现在走的道路正是土耳其当年在萨卡里亚

① 即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外长顾维钧。——编译者注

河和洛桑走过的道路，是波斯1920年走过的，也是阿富汗在阿迈努拉埃米尔开始执政时走的道路。东方各国人民觉醒的过程，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巩固自身完全独立的行动正在逐步地但不屈不挠地向前发展。

他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因此而日益加强。这种友好关系是现今席卷整个东方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的成功又取决于东方各国人民在其解放道路上取得的每一成就。同样，中国同苏联建立正常的关系，是中国在彻底摆脱外来压力道路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而进一步巩固这项胜利反过来又将促使其同苏联的友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苏中两国的正常关系不能不是最为友好的关系，中国广大群众已深深懂得这一真理。苏联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将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手拉手一起前进。中国广大群众（他们中许多人都知道列宁的名字）十分清楚地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唯一的、始终不渝的和毫无私心的朋友。正因为中国舆论界懂得这一点，所以才坚持不懈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同苏联达成协议。美国外交官力图通过恫吓和公开施加压力的手段阻挠中国同我国达成协议，但是这种蛮横无礼、厚颜无耻的粗暴态度更加激起了中国舆论界的愤慨，反而促使苏中两国间持续过久且十分荒诞的危机得到了更快的圆满的解决。

由此可见，促使苏中两国间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总的的原因是，东方各国争取解放的人民日益奋起，各国的内政外交正走上新的轨道。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强国的国际政策也在转向新的轨道，尽管这种转变还只是局部的，但已经是相当明显的转变。一些最强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已经从右边马背跳到了左边马背上，顺便提一句，这样做的原因是，它原来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采取的方针对它来说已存在迅速破产的危险。它必须采用另外的办法，实行某种妥协，试图推行和

平渗透的政策。列强各国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殖民政策必将遇到一个基本的障碍：资本现在和将来都必然要在殖民地寻求超额利润，它决不会去那里只搞它在家里都能搞到的一点利息。而要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一定要力图造成相应的政治条件。

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永远是东方各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不过，列强各国由于其在东方推行的铁腕政策已完全失败，现正被迫寻求妥协路线。虽然英法两国的新政府现在没有立即全面实行新的妥协性殖民政策，也许以后也不会全面实行这种政策，但这条历史性道路本身已展现在眼前，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明白，东方各国人民国际关系方面出现的变化也应当通过中国实行较为独立的政治路线反映出来。

苏联作为同中国友好的大国在太平洋一边的出现，立即提出了太平洋地区的世界意义的问题。在古代，文明世界环绕地中海而存在。现在，世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太平洋这个未来的大洋。随着苏中两国间建立起正常的，即友好的关系而开辟的前景，只能逐步展现出来。但是，这一事件的巨大历史意义我们现在已经大致可以看清了。

（马宝华译）

广 州 的 胜 利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K·拉狄克

粉碎广州商人的军事组织(所谓“纸老虎”)①,无论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形势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

孙中山政府是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发展的唯一的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某些省份有军政府,它们依靠的是注过册的资产阶级组织,依靠的是一些相当于苏联地方自治运动左翼的组织。只有孙中山政府才是民族统一运动的基地,才是同企图把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基地。孙中山政府软弱无力,这导致了1921年的暂时失败。②这种软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像过去所有的中国政府一样,原先所依靠的是少数的雇佣军,加上一些由旧军官指挥的军队。众所周知,这就造成了军队的指挥官陈炯明的叛变,他把雇佣军掉过头来反对国民党政府。除此之外,孙中山的弱点还在于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再加上又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不能很好理解在自己周围组织一定阶级力量的意义。国民党可以说具有民粹主义思潮,上层组织程度很差,并不是一个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通过1921年失败的教训和在苏

① 指以大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首的反动武装商团。——编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实系1922年的失败。——编译者注

联革命的影响下，国民党才开始向左转。一些与富有的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和买办（欧洲资本家与中国小商人之间的中介人）有联系的右派分子脱离了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党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利。它开始把贫苦人民组织起来并支持共产党员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同时，国民党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首先是培训军队的干部。加入国民党的年轻人在最近建立的军事学校里学习军事。眼看孙中山的党日益接近人民群众，不断组织自己的力量，富有的商人们在汇丰银行（这家银行是英国资本家在华势力的主要中心）大买办的领导下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期使孙中山屈服或者将他推翻。孙中山8月份对商人作了让步之后，赢得了时间加强自己的军事组织工作，随后粉碎了商人们的军事组织。孙中山过去的不坚定性不仅出于军事上的软弱，还因为在财政方面依赖于商人，因此他害怕商人反对他。现在孙中山认识到，商人们看到和感觉到他的组织力量之后必然会老老实实交税，而以前只靠说好话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这样一来，广东在团结第一个民族民主运动方面首先迈出了一步，这一步是这个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国家组织的第一个范例，这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运动来说将有一定的意义。孙中山政府的团结工作刚刚开始。孙中山政府内部的敌人，如同依靠黄河与长江之间一些省分的资产阶级及直隶和山西省内的资产阶级的吴佩孚政府一样力图消灭孙中山政府，以便为自己扫清道路，在资产阶级军人领导下统一中国。吴佩孚在上海取得胜利使孙中山面临的危险增加了。因此，孙中山对基地的团结工作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加紧进行。

从国际上来看，孙中山的胜利也具有重大意义。八月份，当孙中山没收商人军事组织购买的武器而发生冲突时，英国领事竟敢于向孙中山发出最后通牒。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也公开进行威胁，扬言英国的巡洋舰为了保卫力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的资产阶级将进行炮击。现在商人的武装已被消灭，而英国巡洋舰上的大

炮并未开火。迫使英国保持中立，不仅应归功于孙中山军事力量的加强，还应归功于我们的报界和苏联的社会舆论大力反对英国资本家厚颜无耻地干涉中国的革命斗争。苏联的抗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民主和平主义帝国主义分子的队伍里引起了恐慌。起初，他们全部否认或者企图缩小英国工党政府帮助扼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这一事实的意义。几天前我们曾在《真理报》上引用了伯特兰·罗素为英国工党机关报《新领袖》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说明英国帝国主义者企图掩盖其肮脏行为未能得逞。英国工党及其《每日先驱报》发出的同情论调使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显然，麦克唐纳先生给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下达了暂时保持“中立”的命令。

当我们满意的看到“不许干涉中国”这一口号获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当然并不简单地用一种希望来安慰自己，似乎英美干涉中国的危险已经过去。如果保守党在英国选举中获胜，这种危险还将加速地发展起来。因此，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不应满足于初步的胜利，而应当加倍努力地帮助中国的革命运动。“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在工人的报纸上不应就此消失。“革命中国之友”组织应当利用这初步的胜利向各国的工人表明，这个组织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国革命。

（胡树林译，乌传袞校）

中国的夺权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K·拉狄克

中国内战北方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对这一变化的意义尚难作出全面估计。从表面现象看是吴佩孚军队的第二师师长^①离开其原来的阵地率兵来到北京，占领了政府的主要部门并逮捕了直系政府，即吴佩孚政府。这就使驻在北京北面的张作霖部队得以采取迂回行动，置吴佩孚在北方的部队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据某些报导称，这支部队甚至已经被消灭了。这样一来，北方的夺权斗争从解决的结果来看暂时对张作霖有利。我们说这是**暂时的**，因为吴佩孚的主要力量还在上海一带战场；吴佩孚的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也就是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些省份，如河南、湖北、江苏和安徽等省不仅还没有被张作霖占领，而且未必会轻易地被占领。因此，很显然，**现在给吴佩孚唱挽歌还为时尚早**，因为在这之前吴佩孚不仅表现为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一个同华中地区工业资产阶级有紧密联系的人物。

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斗争已成定局的看法是为时尚早，而且**对北方政变的整个演变过程发表肯定的见解也还远不是时候**。所谓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美国报刊简称为冯将军）在此之前一直被人看成是美国的一个普通走卒。很多人认为，如果吴佩孚想发挥过分独立的作用的话，那么冯将军将来一定会被美国用来扮演同吴佩孚进行对抗的角色。但是，冯玉祥在这种情况下

^① 此指冯玉祥。——编译者注

去反对吴佩孚正好帮了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忙。这是怎么回事呢？按照资产阶级报刊的看法，东方的官吏都是可以收买的，并且似乎东方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收买的。根据这种观点，就很容易解释基督将军被日本人收买的全部奥妙。但是，现在美元比日元坚实。它怎么会允许冯玉祥去骑日本这匹马呢？要知道这样会使美国的处境变得十分糟糕，他们为加深基督将军对基督教的信念而花去的几百万美元将付之东流。显然，在这方面还会发生各种各样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说吴佩孚已被彻底打败尚为时过早，同样，**大叫大嚷说日本人已战胜美国人也为时过早。**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吴佩孚彻底打败张作霖后，一个时期以来**孙中山**政府始终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现在，即使吴佩孚的势力还没有被打败，他也得为收回北方失地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是不肯放弃这一斗争的，因为谁握有北京，谁就控制了中央政府。张作霖拥有二十五万军队，冯玉祥将军和倒向他一边的直隶省督军一起共拥有三万人的军队。吴佩孚要对付这两支军队也不那么容易。这样一来，**孙中山就能有一个相当长的喘息时间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使张作霖最后获胜，有一点也是清楚的：他将会像吴佩孚一样力图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政权，忘记他曾和孙中山结成联盟反对过吴佩孚，掉过头来试图消灭孙中山的人民民主政府。但是，**张作霖**即使能打败吴佩孚，他在北京的宝座上也坐不安稳。他不是从华中社会的发展中发迹起来的，他要和那里的资本界建立联系还得花相当的时间和经过一番斗争。这将**不仅使孙中山而且使整个中国民族民主运动有机会振兴起来。**各省督军之间的斗争使中国国力日衰，但是，这种斗争拖延下去，各派军阀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消耗，这就使中国的危机日益尖锐，迫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这种势力在中国相当大）组织起来并试图从下面采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军事资本集团无法解决的中国统一问题。（胡树林译，马宝华校）

评中国最近的事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穆 辛

仅凭现在收到的关于北京军事政变的点滴消息，要对中国当前的局势作一个全面而明确的描述，那是非常不够的。但是，我们仍然想尽力指出这次政变发生的原因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后果。

局面所以如此复杂，主要在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尽管封建时代上层建筑的遗迹还存在，但拥有大量私有土地的封建主阶级从经济上看来在中国早已消亡，不过其习俗、传统、以至官僚体系和军阀势力在国内也仍然非常强大。从另一方面看，在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中国工业资产阶级还非常软弱，尚未组织起来，也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或者确切地说，其共同的经济利益很少，因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农民直至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至于无产阶级，目前人数很少，落后和没有组织，当然还不能看作为足以夺取政权的阶级。因此，中国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将处于过渡阶段。其间旧政权，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形式已经崩溃，而新的形式尚未出现，因为能够管理国家的新的阶级还刚刚在形成。

在过渡阶段，由于内部冲突的结果中国国内势必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外国资本的侵入又将使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于解决。在国内各阶级之间，在新旧中国之间，在没落的旧的社会关系形式和日益形成的新的关系之间均存在矛盾，此外还要加

上外国资本和中国所有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中国领土上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为争夺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斗争。

上述种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国各种派别集团之间的斗争中，而且也表现在每个派别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国家统一起来并夺取政权，其原因是各阶级都没有自己的政党。政权掌握在旧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一方面和国家过去独特的封建君主制度残余（包括这种制度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残余）联系着，另一方面现在又渗透到年轻的中国工业，因此和新的资产阶级也有联系。同时，第三方面，他们又是某一帝国主义集团用以奴役中国和同其他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的工具。这种某一个集团，而且有时甚至是某一个“大人物”，同相互斗争中的各种力量的利害关系的相互交错就造成了复杂的中国政治生活，这要求我们对它进行经常的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因为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正是这种各类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构成了中国的现实，其中就孕育着发生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军事的突然事变的可能。

吴佩孚在上海一带的胜利和他在北方的失败，其外部原因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方，都没有进行决战，因为问题的解决并不直接取决于前线的胜利和失败，而是由于某些将领“背叛”了自己的老长官并倒向敌人一方。上海督军卢永祥就是这样遭到失败，而被迫逃亡日本的。现在“背叛”这种武器又用于对付吴佩孚本人。

因此，如果说上海作战中的“背叛”促使吴佩孚将军获得统一华中和扩大其政权的条件，那么北方的“背叛”将使直系军阀原先的统治解体和垮台，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吴佩孚本人。

直系同中国其他军阀官僚集团一样，是英美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而在最近几年已成为国内最黑暗的反动势力。这次政变的主要结果就是直系军阀官僚集团的垮台。

直系集团同中国其他军阀官僚集团一样，从来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最近几年内，这个集团经常发生内讧，有时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直系集团本身分裂为好几个相互之间经常发生纷争的小派别，如津（天津）派（以曹锟之弟曹锐为首），保（保定）派（曹锟的嫡系），洛（洛阳）派（吴佩孚派），以顾维钧和颜惠庆为首的外交派，等等。正如上面讲过的那样，其中各种个人的、派系的和阶级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不仅具有向心力，而且也具有离心力。

吴佩孚和直系其他首领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有时尖锐到频于破裂的地步。如192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吴佩孚战胜张作霖以后（顺便指出，他现在的“背叛者”冯玉祥在这方面曾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声名显赫不可一时，开始排挤直系其他首领，甚至包括自己名义上的长官直系首领曹锟在内。曹锟使用了一系列阴谋诡计成功地把吴佩孚实际上孤立了起来，以后由吴佩孚的亲信组成的政府被解散，某些部长被逮捕。吴佩孚被迫向曹锟认输，把自己部下在北京夺得的地盘让出来交给曹锟，甘居第二位。在1923年曹锟“选举”总统前，这样的事又重演了一次。吴佩孚对此长期不予同意，后来在直系其他一些首领施加强大压力后，大概也还有美国人的一再“劝告”，他才被迫作了让步。

吴佩孚和直系其他首领的关系不断恶化，而最近几年同冯玉祥、王承斌的关系特别严重。冯玉祥是中国一支优秀军队的指挥官，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站在吴佩孚一边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冯玉祥对自己的长官不满是有许多理由的。这位“基督将军”本人不仅和美国的传教士，而且还和美国的银行家及外交官保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使吴佩孚非常不安，因之尽力设法排挤他。1922年9月，吴佩孚夺走了冯玉祥从1922年5月起一直担任了几个月督军的河南省的领土，从而使其失去了河南这个征收财物的

基地。于是冯打算在内蒙古得到一个新的物资供应基地，但又遇到了吴佩孚的阻挠。这样一来，冯玉祥便留在北京这个接近外交使团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的中心，并拟订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但是，吴佩孚突然被孤立和遭到失败的原因当然并不在于个人之间的倾轧、内讧与不和。这方面有深刻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有的个人倾轧都是在这个因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吴佩孚将军的主要基地在湖北和河南两省，他代表了长江流域中国最发达的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在最近几年内这一部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有控制全国的趋势。同时，直系大部分首领与之有联系的北方几省的经济基础非常落后，吴佩孚提出的用“武力统一全国”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不仅要把全国置于直系的统治之下，而且要把直系置于以吴佩孚为首的中部地区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因此，直系很多首领对这个口号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

最近一年半至两年内直系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不仅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而且还是英美外国资本从外部施加压力所造成的。为了和日本的势力作斗争，为了排挤日本在中国占领的阵地，美国资本家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他们认为这个拳头就是团结一致的直系的力量。但是，吴佩孚的力量不断增长，在反对外国资本的斗争中有可能成为将来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对美国资本家来说也是危险的。吴佩孚违反其外国“庇护者”的意愿坚持主张承认苏联，更使这种危险性变得特别明显。

内部因素固然是吴佩孚垮台的前提，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其代理人的直接干预就能够发生这一次政变。在整个这次政变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用非常明显，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直系是英美资本家反对日本势力的工具，

它的垮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削弱英美资本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迫切希望这次政变能迅速实现。日本报纸对这次政变深表欢迎是不足为怪的。《朝日新闻》根据10月26日东京电讯评述中国当前局势时写道“由于中国局势的变化，所有关于可能危及日本权益的担心也随之消失。”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对日本非常有利的局势，也暴露了北京政变后第二天日本即开始奉行的侵略政策。

但是我们认为，目前过份夸大日本势力在中国的胜利是错误的。英美帝国主义不经过顽强的斗争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它们也不会打消竭力排挤日本势力的念头。冯玉祥所作的一项声明很有代表性。他说，他没有和张作霖事先达成任何协议，完全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独自采取行动的。

直系军阀官僚集团内部的分裂将要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目前还很难预料。现任总统曹锟在新的胜利者掌权的情况下将继续执政，还是将被政变抛到一边，这要过几天以后才会清楚。关于这个问题的电讯前后不一，而且自相矛盾，这可以从驻北京外交使团现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和各种谈判中得到解释。

看来，美国人企图在一个时期把吴佩孚一个人排斥出中国的政治生活，以此来制止和限制政变的扩大。让在美国人帮助下当上总统的曹锟继续在位执政，无疑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就是说，用新的“胜利者”冯玉祥将军来代替吴佩孚将军，以此来保持美国人的主要工具直系的“团结”。顺便可以指出，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并无特别的理由同冯玉祥发生争执。英美资本家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用一匹新马换下老马，而新的工具在为他们服务方面并不会亚于老的工具。

当然像这样的变化也将意味着在北方暂时停止内战和在满州保留日本的势力。美英资本家既然取得了在上海一带的胜利，他当然应该作出这样的“牺牲”。这种局面将使强盗们暂时在远东

停战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推迟冲突的解决。不过，这样做不会让日本的势力在满州之外得到加强，从而能维持华北原有的“政治局面”。

新的胜利者如果不仅仅和吴佩孚破裂，而且也 and 曹錕破裂，那末很可能不但在北方，而且尤其是在华中，将导致内战扩大和激化。曹錕吴佩孚集团的力量可能仍很雄厚。吴佩孚在湖北和河南的主要基地暂时尚未被摧毁。现在占据上海和浙江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可能会和这个集团联合。这样在有许多工业基地的华中可能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在北方和华中之间进行战争将消耗国家的元气和削弱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反抗，这符合日本、美国和其它所有想把贪婪的魔爪伸向这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利益。

这场新的内战可能成为大国进行武装干涉，以及占领和瓜分整个中国，使中国沦为“标准”的殖民地的有力借口。

但是，强盗们之间在中国的矛盾非常大，相互关系非常紧张，指望在目前达成这样的“友好”交易是完全不可能的。进行这样的瓜分，当然要分给英国、日本、法国和其它所有大大小小的强盗。一心想统治整个中国的美国在实行这种瓜分时只能分到中国的一部分。这未必能满足它的欲望，并可能导致世界性的武装冲突。在目前总的国际局势下，这类武装冲突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来讲都是非常冒险的。但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据东京的电讯报道，日本正增派新的部队去中国，而目前日本在中国的兵力有上海的五艘新型的驱逐舰以及天津和秦皇岛（在直隶省和满州交界处的一个北方港口）有六艘驱逐舰。另一方面，驻北京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热拉尔上校率领专门的代表团前往日本。此外毫无疑问，英国海军现在正大量驶向中国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卫自身的利益”。

北方直系军阀集团的垮台必将减轻最近二年至二年半以来统

治华北和华中的黑暗反动势力的压迫，并将促使内部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得到发展，也必然要大大促进全国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而这种高涨有可能在中国造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变化。

（胡树林译，乌传袞校）

中国的转折时刻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穆 辛

中国的事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越是往后越有利于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桎梏，争取解放的民族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冯玉祥打吴佩孚，这并非冯玉祥与英美资本达成某种协议的结果。从他发动北京政变后与英美资本的关系日趋尖锐这一事实中便可得到证明。吴佩孚来到了华中重镇武汉并以这个富饶的工业地区为基地准备进行新的拼搏，这就说明吴佩孚仍然得到英美资本的支持。

那么，冯玉祥这一行动是否意味着日本人真正取得了胜利呢？北京政变是否仅仅意味着日本势力取代了英美势力，日本重新起四、五年前在北京所起的那种作用呢？毫无疑问，英美资本在北京的失败对日本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所以它正极力利用既成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事态把过去的亲日集团和人物推到了中国政治生活舞台的前台。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无力将这些置于自己影响之下。其实，在获胜的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了斗争，例如张作霖和段祺瑞反对冯玉祥的斗争。北京的实际权力现在已不在冯玉祥手里；政权已转到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手中，而且十分显然，他们“赶走了”冯玉祥（尽管从北京发出的电报称冯是自愿离开）。冯玉祥被迫离职出走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冯玉祥虽被他不久以前的“盟友”所排挤，

但并不排除冯玉祥有可能东山再起，再次成为英美资本手中同这些“盟友”进行斗争的工具。

但是，与此同时，近几年来一直对这个国家实行残暴反动统治的直系的垮台，也使民族解放运动政党国民党及其领袖老革命家孙中山登上了中国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广阔舞台。获得胜利的将领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从外部获得足够的支持都缺乏信心，这就迫使他们在本国寻求广泛的支持以巩固既得胜利和保住自己的政权。而所有这一切使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新的发展并成为今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

召开由“工商界、教育界、学生界、军界以及工会和农民组织”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讨论国家今后的政治方针，这是孙中山的基本目的。这次国民大会在各组织直接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应充分保证竞选运动的自由并预先大赦所有政治犯。在这次国民大会上，国民党将象开展竞选运动一样，准备全面阐明自己的民族纲领。这个纲领包括消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集团的双重压迫，实现国家民主化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等。国民党的这个纲领将把现在登上中国政治生活广阔舞台的所有民族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当然，不能指望现在的胜利者——中国军阀会采纳国民党的纲领或轻易地同孙中山达成协议，召开这次国民大会。相反，他们会敦促孙中山同他们达成那怕能暂时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威信的某种交易，以便尔后再抛开孙中山。国民党本身内部就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右翼势力，这股势力一直想拉孙中山走同军阀和外国资本妥协的道路。如果不忘记这一点的话，那么上面提及的危险就更为严重了。这股右翼势力将不惜采取任何卑鄙龌龊的办法作出妥协，因此，他们毫无疑问将力图同新的胜利者勾结到一起，以谋得一官半职。这种危险要求国民党左派和孙中山本人肩负起特

殊的责任，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不要让右派分子把党引到同这个和那个军阀集团实行肮脏的妥协这条死亡的道路上去。

孙中山途经上海时就曾发生过一起典型的事件：英国报纸主张不让孙中山在上海上岸。于是孙中山便就此发表声明宣布，上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是上海的主人，而外国人只是客人。“中国要求取消外国人在其所占地区实行的一切限制的時刻已经到来”。

事态发生上述演变不能不使外国资本的代表，首先是美国和英国感到十分惊恐。原先一直避免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作出全面评论的英美两国报界也开始日益焦躁不安了。11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摆出一副吓人的样子写道，“到了英国该实行更坚定果断的对华政策的时候了”。这家报纸还说，英国“自有对付中国动乱的办法”。美国《纽约时报》则厚颜无耻地宣称“新的道威斯计划将是美国干预中国事务的最佳方式”。

束缚德国手脚的道威斯计划在欧洲的“成功”，早已使帝国主义的远东政策制定人动心和感到坐立不安了。美国资本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刊物之一《密勒氏评论报》在10月11日曾写道：美国必须在中国实行更活跃的政策。该刊物还提出同一套所谓“新的道威斯计划”作为最根本的措施。这家杂志问道：“既然道威斯能使欧洲的财政混乱状态得到整顿，那为什么他或者另一个美国人不能在中国问题上也如法炮制呢？”当然，为此必须和日本达成协议，没有日本的合作，任何“道威斯计划”都是行不通的。杂志在谈到这一点时强调指出，“均等是合作的前提”（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时的均等），日本不能也不应该在中国享受任何“特殊的权利”。

但是，众所周知，日本是不会同意和英美资本进行自由竞争的，每当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时，它提出的恰恰就是：在中国的“特权”，在满洲、蒙古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殊利益”等等。

可是，这家杂志恰恰对目前在美、日之间达成协议仍然抱有希望。我们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在最近一年半中，美国银行家向日本提供了约两亿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开发满洲。尽管这笔巨额贷款是美国私人银行家提供的，但不可能不对美国在远东的政策，特别是对日本在满洲的企业产生影响”。说得更简单些，就是通过财政压力将有可能迫使日本接受美国的条件，就对华实施新的“道威斯计划”达成协议。

上面引述的文章写于冯玉祥举行政变之前及中国最近发生的事变之前。不言而喻，炮制“新的道威斯计划”的设想现在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了。为了炮制这一计划而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美、日之间达成临时协议，以便共同对中国实行剥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据传，吴佩孚已同意承认中国新的亲日派总理段祺瑞。不管这一传说真实程度如何，它却反映出正在幕后进行种种谈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这种谈判是有可能达成临时性协议的。当然，这种协议不可能消除美、日之间基本的利害冲突。**现在，英、美两国均由极端反动的势力执政。因而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加强干涉中国事务的危险性更加严重了。**为了全面攫取中国的铁路和财政这两条国家政治生活的命脉而炮制“新的道威斯计划”的意图早就存在，现在则更加强烈了。

现在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在中国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只有世界无产阶级才能迫使世界上残暴的侵略者放弃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行十字军远征的计划。

（胡树林译，马宝华校）

中国人民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K·拉狄克

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觉醒的旗帜——孙中山逝世了。经历了巨大的苦难而觉醒起来争取生存的广大中国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肃立在他的灵前。一度称颂他为伟大革新者的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做出一副沮丧的面孔把孙中山讲成是落入了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一个幻想主义者。苏联无产阶级以及同他在一起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则把孙中山看成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向他告别。中国人民的这位伟大领袖积四十年的经验，懂得了东方各国人民只有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得救。不久前，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同我们一起沉痛哀悼列宁的逝世。这个事实证明，不仅孙中山，而且中国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都懂得，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盟友。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在他的墓前垂下共产国际的旗帜并同战斗的中国人民一道为他的逝世而同声悲恸。中国的革命分子力图了解？列宁象征着什么？他是何种阶级力量的代表：同样，我们也应该了解中国人民伟大导师的生活和工作，以便实现列宁的遗训，使斗争中的国际无产阶级与东方各国人民联合起来。

国际资本侵入中国和中国进行改革的尝试

孙中山是穷苦人家的子弟，1867年^①生于中国南方的广东

^① 原文如此。应为1866年生。——编译者注

省。他是在英国少校戈登指挥欧洲亡命之徒和满清王朝雇佣军镇压太平军起义之后三年诞生的。孙中山诞生时，起义的星火还在闪烁，起义军的残部还在断续进行游击斗争。在外国资本面前，中国处于毫无自卫能力的境地。仅仅由于欧洲不久后出现了经济萧条，中国才幸免遭受立即被瓜分的命运。资本主义的间谍分子在全中国窜来窜去，窥探中国的资源，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选择将来的进攻目标。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开放的港口广州和上海渗入中国，当时还仅限于沿海一带。清廷对这种势力的侵入深感震惊。人民群众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牺牲了约三百万人，他们对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外国的控制和清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依靠其官僚机构贪婪地榨取国家财富，吸尽民脂民膏）失去了希望，现在意志十分消沉。法国人和英国人正从南面，日本正从北面向前逼进。一些熟悉国际情况的中国学者眼看国家日益衰弱，逐渐产生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的想法。1880^①年康有为上书指出，中国的官僚是一些贪官污吏，不知自己的国家已陷入总督分割的局面。他写道：“泥守旧方而不知变，永固旧历而不更新，非徒不适于时用，……且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他以日本的改革为例，说明只有采取这种根本性步骤，中国才能得救。北京的最高研究院^②领导人却视康有为思想为异端邪说，拒绝代呈他的上书。诚然，中国已失去其原有的力量，但它还保持着中国所特有的古代圣人孔夫子的正确学说。所以，外来的野蛮人不能对其造成危害。中国对日宣战，结果不仅被战败，而且向全世界暴露了他的软弱无能，缔结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北京举行了意义重大的聚会。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第二次上书要求改革国家官僚体制。他写道：“在中国担任官职的不是懂得如何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办事并知道如何管理国家的人，而是一

① 原文如此。应为1888年，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编译者注

② 指当时的国子监。——编译者注

些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而不惜花大钱的人。一些人学非所用，另一些人则用非所学”。他谈到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要求在中国鼓励发展现代工商业。他要求取消各省地方关税，扶助农民。在战争失败的影响下，监察御史们才把康有为的上书呈送太后和皇上。皇帝下诏将上书分送各省总督，以便将改革付诸实践。皇帝还打算亲自召见变法者，但没有得到允许，因康有为没有相应的官衔。不过康有为后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获得了职位^①，有了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便接连不断地上书，试图让朝廷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危险。他指出北方存在沙皇和日本的威胁，南方存在着法国的威胁，德国则占领着胶州湾。只有建立现代新军才能拯救中国。他写道：“自我对日作战遭到惨败，欧洲各国对我极为藐视，视我如野人，待我如愚民，将我与黑人等同。过去他们责我人民傲慢，仇视我们；现在则嘲笑我们既痴又瞎，又哑”。外国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想建立租界。“外人食我骨肉，割我肢体，毫无止境。他们还租借我铁路。我国有被从南到北割断咽喉之危险。应记住土耳其、朝鲜、安南和波兰的遭遇”。康有为著有《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法考》。他还写了彼得大帝生平传略呈送给皇帝。皇帝把康有为视为谋臣，急切而热心地推行康提出的新措施。朝廷派出的信使马不停蹄驰往各省，传达皇上要求设报馆、兴学堂、建新军的旨意。这次从上层进行的变法尝试持续了一百天，官吏们就起来反对这次变法。这些变法措施要唤醒人民群众，使官僚们不能为所欲为并限制他们的收入。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官吏都是靠花大钱买来的官职。有权有势的旧礼教卫道士们把变法维新看成是对旧礼教的亵渎行为。慈禧太后是这批搞阴谋的奸臣的主使人，是她发动了政变，将年轻的光绪皇帝幽禁于岛上^②豪华的宫殿中。光绪被囚禁后直至去世，仍

① 指康有为曾在总理衙门任章京之职。——编译者注

② 指中南海瀛台，参见《戊戌政变回忆》。——编译者注

坚信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没有群众的压力，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改革，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的，这条原理再次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康有为逃亡国外，中国作为本国官僚制度的牺牲者和外国资本的牺牲者在继续腐败下去。慈禧太后眼看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企图把这种不满转向外国人。于是决定资助义和团起义组织。这次起义遭到国际远征军^①的残酷镇压，从此软弱无力的、被宰割的中国遂落入外国之手。二十世纪标志着瓜分中国的开始。这一时期国际帝国主义的所有书刊都充斥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内容。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在英、德、法等国开始出现的经济高涨促使这些国家寻找新的市场。沙皇俄国不甘落后，急急忙忙占领了朝鲜和满洲。后来在中国领土爆发的日俄战争也在酝酿之中。看来中国似乎无可挽救了。

孙中山采用革命密谋挽救中国的尝试

孙中山长大成人求得发展的南方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也是维新派康有为的出生地。他在国学堂毕业后即赴香港就学于英国人办的西医书院^②。年轻、满腔热血，富有同情心的孙中山不以学习科学为满足，他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太平天国人民起义使他深感失望。不识一丁的中国人民怎能斗得过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呢？先要让人民提高文化，学到知识，那时人民才能和欧洲各文明民族处于同等地位。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呢？孙中山不属于中国式的书生阶层，他不相信中国能通过满清王朝属下的旧官吏自愿实行的变法获得复兴。他坚信必须推翻野蛮的满人十六世

① 指帝国主义组成的八国联军。——编译者注

② 1884年入香港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第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编译者注

纪吞占中国后建立的这个王朝。他打算搞密谋活动，但是在他熟悉的人当中只有三人愿意同他一起走这条危险的道路。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创建了兴中会，开始在军队中进行宣传，购买武器。密谋败露后，孙中山的同志陆皓东于1895年9月9日惨遭杀害。孙中山遂逃亡国外。

从此他开始了侨居国外，备受贫困的磨折和探求真理的岁月。年轻的孙中山周游各国，遍访有中国人侨居的国家——日本、英国的一些殖民地、美国和英国。孙中山靠自己写作和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者的资助度日，努力接触在外国学习的中国青年，以及中国商人。他认真研究欧美各国的制度。他看到，资本主义各国福利的背后隐藏着人民群众的困苦。孙中山本人历尽此种困苦，对此不能漠然视之。他对社会主义有好感，但却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不适于中国的时宜，因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他认为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是理想的国家政治结构，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是通过密谋，主要是通过军事密谋。康有为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确信决不可能指望清王朝实行国家的改革。那么依靠谁呢？只有懂得不能离开民主改革的一代人才能完成政变，这就是学生和懂得军事并相信不同旧事物决裂就不能救中国的青年军人。孙中山把他鼓动起来的学生派回中国，联络各地守军。他四处奔波，进行宣传鼓动。他十分注意研究国际局势，不断寻找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在日本建立了许多联系渠道，希望在这个通过彻底的内部变革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束缚的国家里能得到帮助。他在日本，甚至在政界中（这些人认为，宣传将使趋于崩溃的中国更衰落下去）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他也得到美国某些人的支持，但这些美国人士所希望的恰恰与日本所希望的相反，他们指望革命运动能迫使中国政府实行改革，从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上强大的美国不怕其它列强的竞争，它在当时是反对瓜分中国的，它主张“门户开放”，即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时应享有同等

权利。

孙中山和他的朋友在军队中开展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俄国首先响应十二月党人行动的是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从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中，从俄国同欧洲的对比中懂得，俄国虽大，如不进行改革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婴儿。如同俄国一样，中国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军官也懂得了威胁着中国的巨大危险，于是投向了革命阵营。由于国家财政衰竭，加之连年歉收，招致军队情绪动荡不定。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不断扩大，节节取胜。孙中山立即从美国出发，经由伦敦赶回中国。他是这次起义的旗帜。因此，起义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后，他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①。

孙中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南京召开了议会。可是，孙中山的胜利却变成了他的彻底失败。满清王朝虽然已被推翻，这个王朝所依靠的全部机构、各省官吏和军事将领均原封未动，因为举行起义的只是军队本身，人民群众才刚刚发动起来。议会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反映。原先不愿提供贷款支持摇摇欲坠、腐败不堪的清王朝的各国列强，现在也不愿贷款给孙中山。他们担心彻底的改革会使中国强盛起来，而中国革命是受俄国革命影响的最危险的标志，它将可能在印度和法国的亚洲殖民地引起反响。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军阀串通一气，袁世凯就是这一联盟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没有任何真正的实力与袁世凯对抗，只好让位给他，放弃执政地位。军事密谋足以推翻腐败不堪的中央朝廷，却无力彻底肃清全国的反动势力和扫除麇集于中国躯体上的各种寄生虫。外国列强正向袁世凯提供贷款。

从军事密谋到人民起义

孙中山再次出走国外，开始了新的困苦生活的新的思考。世

^① 应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编译者注

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军队从德国手中“解放”了中国，可是目的只是为了占据山东，进而侵占全中国。各国列强侵略者陷在欧洲战场不能自拔。美国不久前才建立巨大的舰队和庞大的陆军，还无力阻止日本的贪欲。美国外交部长兰辛在同日本大使石井会谈时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日本卡着中国的脖子，企图迫使中国同意实际上是全面奴役中国人民的二十一条。中国想通过对德宣战以图自救。很明显，中国是没有任何能力进行任何战争的，但是它指望作为列强的一个盟国，通过这个办法得到列强的保护，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突然，希望之光照亮了中国暗淡的未来：威尔逊鼓吹起民族自决了。北美伟大的民主宣告了这个“伟大的词”。群众和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希望又燃起来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日子来到了，结果是将拥有四千万中国居民的山东省交给了日本。高兴和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并和祖国南方保持经常联系的孙中山一时看不到出路何在。此时传来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声音。英美通讯社散布种种诽谤诬蔑之词，攻击俄国革命，但是，他们的疯狂攻击恰恰向孙中山证明了俄国大地上还有一支与世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新生力量在成长。孙中山开始注意一切来自俄国的报导。凡尔赛的胜利者向苏维埃俄国宣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宣而战，开始了旨在消灭苏俄的斗争。但是，俄国进行了自卫。它使那些备受战争拖累已感到极度疲乏的人民群众又鼓起新的巨大力量，经过两年半的英勇斗争，终于战胜了协约国。孙中山感到意志振奋：他在俄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新盟友。

开始时，对于孙中山来说，俄国还只是表面上的盟友。孙中山不理解革命的力量何在。他在中国南方广州夺得政权后，还不善于同人民群众联系。对人民群众来说，他只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独立的捍卫者。他仍然幻想通过一系列外交交涉和军事讨伐行动使中国获得解放。一旦取得胜利，外国列强为了避免战

争，便会放弃瓜分中国的企图，并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使中国站立起来。红军粉碎高尔察克后，一度使中苏联系中断的障碍消除了。从俄国不断传来比较确实的消息；俄国革命者纷纷来到中国，中国人也前往俄国。此时，孙中山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却从不停止学习，他看到自己所依赖的资产阶级和广州商人是不允许他进行任何重大改革的。可是不进行重大改革，孙中山就不能成为民族革命的领袖。而不进行民族革命，中国就无法打倒那些各据一方，在各省进行残酷剥削的军阀势力，他们在清王朝垮台后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孙中山渴望同苏俄建立联盟，不可能永远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行动，这个联盟必然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出现（仅以产业工人计算，现在中国就有三百万工人），而且也开始对农民产生影响。而在此以前，农民只知道组织游击活动。面对工农运动，资产阶级也在采取对策，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广州建立武装，反对孙中山。孙中山采取了果断步骤，着手组织革命军队以对付资产阶级并提出农业改革纲领和劳工政策纲领。孙中山不仅在广州而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民力量。他遇到了党内那些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并反对组织人民革命的人的抵制。但是，孙中山没有动摇。英帝国主义者（他们去年策划过反对孙中山的进攻）的威胁也罢，党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也罢，都阻挡不了孙中山。孙中山选定了自己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多么艰难曲折，他始终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至逝世。

孙中山的遗产

我们看到，孙中山的一生是一个伟人的一生，他将作为唤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觉醒的伟大象征而被载入史册。他的一生是历尽辛劳，呕心沥血战斗的一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他开创，但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在孙中山鼓舞下觉醒起来的，把孙

中山看作为自己导师的中国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将继续其未竟之业。孙中山一生的伟大在于奋发向前，每遇失败，总是注意总结经验，学习新的东西，振奋精神继续前进。孙中山奉行过密谋政策，奉行过在外交上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政策，他在经历了这一切仍遭到失败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中国南方爆发了这场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现在所处的环境已不同于太平军当时所处的环境。当时，孙中山的伟大先驱——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于1864年逝世）看到中国农民的深重灾难，利用圣经创立了劳动的理想王国（“拜上帝会”）。太平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它没有得到欧洲工人群众的支持。欧洲工人群众甚至不知道在扬子江两岸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人民悲剧。现在中国革命运动有俄国革命和日益壮大的世界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强大盟友。欧洲帝国主义现在不冒在本国引起巨大震动的风险，已不可能对革命的中国发动进攻，中国本身的力量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外国资本要把中国控制到手就得动用成百万军队。因此，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将会实现。中国人民还会遇到种种苦难。为了得到中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的革命者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孙中山播下的种子将不会再遭践踏，它将结出丰硕之果。

1916年正当世界大战激烈进行之时，列宁在伯尔尼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小型会议讨论民族自决权问题时，提出了未来的中国革命和武装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幻想。那时侨居瑞士，住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家里，总共才五、六个布尔什维克，还想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将和千百万中国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谁能想到我们能活到这个理想实现的时候。1918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叛军、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匪徒把我们和中国隔开来时，列宁曾经问过，能否在被赶到俄国做苦工，受到十月革命鼓舞的中国工人中找到一些能去和孙中山建

立联系的勇敢的人。现在，中国人民群众建立了这种联系。我们的现实任务，中国革命者的现实任务是要在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建立这种联系。到那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现在，站在孙中山墓前向他告别，我们可以平静而满怀信心地宣布：他生前的任务定将完成。

列宁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在欧洲无产阶级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盟中看到了能推动世界前进的阿基米德定律。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中国人民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孙中山是东方人民第一个理解列宁这一思想并竭尽全力实现这一思想的伟大领袖。这一点使孙中山在许多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中享有殊荣，备受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怀念。

（胡树林译，马宝华校）

纪念孙中山逝世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Г·季诺维也夫

由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逝世，每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必然要再一次认真思考在我们眼前发生和壮大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命运。

列宁同志在1912年11月写道：“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①但是，这四亿亚洲人曾经不得不（现在也是如此）一次次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而西方帝国主义正越来越粗暴地威胁着亚洲人的自由和独立。

孙中山是作为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内东方民族革命运动最伟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的。他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纲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②本身就带有中国社会关系中一切落后事务的痕迹。他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但是他怀着正当的义愤仇视过去和现在压迫他的祖国的帝国主义。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整个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人民，而主要的，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清楚地懂得，各国受压迫民族要想解放自己和为新的生活创造条件，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编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编译者注

孙中山已经不是甘地。甘地（印度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走下坡路**。甘地对付英国帝国主义暴行的办法是采取三十天的绝食斗争。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派别软弱无能，必然导致他们同帝国主义压迫者妥协，而实际上等于是投降。

孙中山则不是这样，尤其在他生前最后几年仍然不断前进。几个月之前，已故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因在华南受到新的压力傍徨于歧路，当时孙中山敢于坚决地、毫不手软地镇压反革命法西斯集团（“纸老虎”）^①。他有力地鼓舞自己的同伴对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和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进行坚决的回击。他就这样拯救了国民党的荣誉。他就这样向人们表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万万**人民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②

列宁1913年5月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

列宁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说明问题。列宁说，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尚存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艾伯特不久前逝世。他过去是工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们非常自然地把他和孙中山进行比较。艾伯特在现今欧洲社会民主党中不是一个坏的领袖。这是欧洲工

① 指广东的反革命武装商团。——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4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人阶级资产阶级化上层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人物。把孙中山和艾伯特这两个人加以比较，足以证实在现在条件下列宁关于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在整个现代欧洲，已经不仅只有资产阶级是反动的力量，而且还包括和资产阶级绑在一个战车上的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上层工人贵族。艾伯特曾参加过欧洲先进工人阶级的一个一度先进的政党。他自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是德国工人阶级确实最大的政论家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他的继承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反革命，成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刚刚形成，马克思主义也还仅仅只作出初步的成绩。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使孙中山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向前发展，起到了成为同在共产国际旗帜下进行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相联系的民族革命的领袖的作用。

苏联革命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它对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这是列宁的话。如果我们1905年的革命（这次革命甚至未能直接战胜沙皇，更不要说战胜资产阶级了）都对东方的觉醒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1917年发生的伟大的大获全胜的十月革命现在和将来将会对此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啊！即使我们的革命除了唤醒东方千百万人以外其它一事无成，那就在这一点上也总还是完成了它的世界历史使命。

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被压迫各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是日益增长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极其重大的贡献之一。像刚刚逝世的孙中山这样一种人的生活和活动就是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的鲜明例证。

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全世界先进工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像孙中山这样的人对世界革命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培育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的前途将是多么的宽广。

在马克思和列宁旗帜下工作的共产国际既不向自己也不对别人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甚至最革命的代表人物身上也存在有各种弱点，他们的纲领不明确，有着各种倾向以及妥协情绪。但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想的强大盟友。

全世界加入共产国际的先进工人将永远怀念孙中山这样一位为反对帝国主义而同世界无产阶级先进队伍联合在一起的被压迫民族运动的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和为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活活地腐朽了的资产阶级”。^①这些话是列宁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一年写的。现在，当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八年和整个东方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如此迅速地成长起来的时候，列宁的这些话具有特殊的内容。张伯伦和艾伯特之间的区别远比艾伯特和孙中山之间的区别要小。艾伯特之流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孙中山一类人物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丝毫不应怀疑，最后胜利将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他联合在一起的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大军。这个胜利已经不远了。

（胡树林译，乌传袞校）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者注

处于转折中的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月)

穆 辛

孙中山的逝世标志着中国民族革命一个时期的结束。孙的一生及其逝世本身就最充分地反映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经历过的曲折复杂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本人便是整个解放运动的光辉体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从反对满清王朝，同军阀和少数“列强”大国结盟到一致反对外国资本，反对一切“列强”的帝国主义，反对他们的走狗——中国军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最近几年来，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代表者的国民党，日益成为中国劳动大众利益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这个党同苏联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并且开始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建立普遍的联系。

1924年2月^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该党发生转折最为鲜明的标志。由民族革命运动领袖主持的大会走上了史无前例的开展群众性革命斗争和捍卫农工利益的道路。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包罗各色各样人物甚至包括有中国大资产阶级参加的大杂烩（这也反映了这个党的历史发展情况）。而中国大资产阶级是从买办发展起来并一直与外国资本保持联系和缠在一起的。国民党一方面同外国资本之间有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同中国军阀中少数时刻不忘谋求私利并力图利用国民党威望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24年1月。——编译者注

以营私的将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能设想，处于这种状况的国民党会跃身一变而成为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真正的工农政党。国民党要由一个散漫的、无明确宗旨、对本身目标的认识极为模糊不清的组织转变为具有明确目标的群众性工农政党，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最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并且至今犹未終了。国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是这一过程的实际表现，也是国内农村中农民同贵族封建地主分子(土豪)之间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反映。

通过南方发生的斗争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右派分子的某些公开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最典型的表现。中国教育界的报纸《晨报》(此报对国民党并不抱特别好感)在就广州国民党军队打败陈炯明一事发表文章时也认为，广州赢得这次胜利首先靠的是广州新的军政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其次是农民对作战双方的态度。该报在3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仗主要是军校打的。他们一路进行宣传，召开有五至六千人参加的农民集会，由军校毕业生发表革命演说，于是，整个作战地区一下子都处于这种宣传影响之下。农民提出了瓜分土豪劣绅土地的要求。”这样一来，南方的斗争就不再是农民群众漠不关心的军事将领之间的斗争了，它成了农民反对农村封建地主、废除地租和分田地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些封建贵族分子离开了新的国民党，因为(这一点需要讲清)他们原先是同旧的国民党有联系的。这些分子在离开新的国民党的时候不是没有进行过反抗，他们曾企图迫使党屈服于他们并利用国民党原有的威望。少数将领，如滇军将领唐继尧，曾多次试图控制广州军队的指挥权，这实际上就是企图控制国民党，把运动扭向倒转，退向已经成为过去的发展阶段。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右派委员反对党的现行政策(确切地说是准备实行的政策)的某些言论也颇具代表性。有一位著名的右

派中委名叫石瑛^①，是北京某大学的工业化学教授，在孙中山逝世前不久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目前的组成状况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开展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与共产党人关系过密。这种中国的司徒卢威式人物愿意同外国资本进行斗争，但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却持公开的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当为“民族”利益牺牲一己之利益。这种人代表着极端害怕工人运动兴起的中国大工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工人运动的矛头之一是指向这个阶级的。

因此，这位教授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由北京转到华中工业重镇武汉的行动仿佛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离开国民党的一种象征。孙中山逝世后，这位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石瑛教授又回到北京并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演说，要求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像这样来去无常的现象在当前的转折时期是极为普遍的。

孙中山的逝世加速和加剧了国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早就存在，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象唐绍仪等一些国民党过去的显要人物早就不再参加党的活动了。不过，孙中山在世时还可以利用他的个人威望暂时延缓党的分裂，防止党分裂为代表几种不同阶级的主要派别，现在，这种分裂则发展得相当迅速了。

党的右翼和党组织（因为国民党大多数成员持“左”的至少是“中派”的观点）之间的斗争在组织上采取何种形式，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孙中山逝世前几天，即3月7、8日，就有人开始策划筹建所谓“国民党俱乐部”，实际上这就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基础。“俱乐部”的创办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把这个组织设想为是受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分支机构，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包括

^① 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任南京市市长，1938年被选为湖北临时参议会议长。——编译者注

现有党员和前几年已被开除出党的党员，甚至包括根本不是党员但是同情右派的分子在内的完全独立的组织。而且这个“俱乐部”从成立之时起便不单单是地方性组织，而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该“俱乐部”章程预定要在各省建立分部，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等等。

这个“俱乐部”的基本任务是“同渗入国民党的共产主义思想斗争”，“反对把国民党变成共产组织”。至少这个组织的创办人是这样提出它的基本任务的。还需指出，所谓“同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概念同“与共产党员作斗争”的概念相比，含义宽得多。当然，要害首先是把共产党排挤出国民党，但实际上还涉及到为今后同军阀达成妥协甚至让段祺瑞（现北京政府首脑）参加政府等等创造前提条件的问题。

总而言之，国民党要继续成为一个真正的捍卫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党，就必须清除这些分子。

右派分子在组织这些“俱乐部”（作为成立新党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力图取得握有实力的将领们的支持。在南方前面提到过的滇军将领唐继尧便是这样的人物。在北方，右派分子企图同去年十月实施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和打败直系）的所谓国民军将领，首先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接近。可是，这些人本身当时正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他们只会同国民党中在社会上有实力的那部分人走到一道去。而现在起这种作用的恰恰是国民党左派。因此，可以推想，这些将领必将寻求同左派接近的途径，而不会去同右派接近，因为右派分子自从脱离国民党后越来越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阀和派系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运动中已发挥不了什么独立的作用了。

段祺瑞反动政府同样力图促使右派加快分裂党的步伐，以便倾其全部反动势力去摧毁留在党内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上的最后分裂大概要到定于今年夏天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才会发生。

现在的斗争是围绕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地点（是在革命的广州还是在反动的北京）和代表选举方式等等问题进行的。无须怀疑，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仍将坚持其在1924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立场，必须摒弃一切阻碍其发展的分子，沿着把国民党变为真正群众性的、中国工农阶级的政党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现在尚难预料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能否完成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它将为国民党今后继续得到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因为把国民党同中国反动势力缠在一起的分子最终将被清除出党。

4月6日于北京

（马宝华译）

上海事件的世界性历史意义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Л·季诺维也夫

运动起始于最起码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要求对少年和童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成年工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每周一天假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

运动后来**发展为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刻政治事件。**

从提出十小时工作日发展到要求撤出外国军队，中国工人现在只用几天的时间。俄国工人群众在1905年1月也很快地走完了类似的道路，不过事先经过长期的准备阶段。英、日帝国主义者军队现在给于中国工人的回答与当年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反动军队给于俄国工人的回答也是一样的。

当时，俄国工人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研究并弄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因此，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步比一步明显地形成政治斗争，**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也喊得越来越响亮。现在，中国工人也正在通过切身体验弄清经济与整个政治的关系，了解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政治——血腥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的关系。

英、日帝国主义者军队枪杀了数十名中国工人和支持工人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宪兵还抓了上海电厂和水厂的工人。上海工人被迫在枪口下（从直接意义上讲）作工。然而，罢工照样在扩大，运动此伏彼起，不断壮大，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喊得

更加响亮，更加坚定。不必要当预言家也能看到，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对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仇恨必将日益加深，“滚出中国去！”的要求必将提得更加明确而响亮。

英、日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靠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无法生存的。不对中国这类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剥削，就不会有超额利润，就不可能收买本国国内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上层份子。要么对殖民地进行掠夺，要么加速本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两者必居其一。英帝国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如此。可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对殖民地的压榨恰恰加速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熟，因而也加速了英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上海事件^①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它明白无误地，恰如人愿地证实了这条真理。中国工人开始时只是提出最最起码的改善其经济生活的要求，但最后提出的口号已是“外国军队从中国滚出去！”此时此刻，中国工人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曾在一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中写过这样两句话：“无产阶级占百分之五十一还不如占百分之二十，如果在百分之五十一中存在更严重的帝国主义的腐蚀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话。”

长期以来，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声望一直不高，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许多受“帝国主义腐蚀”的分子，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抵制。近来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出现了迅速高涨的趋势，这是与英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有极为紧密的联系的。被压迫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人阶级革命觉悟的提高和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中的“帝国主义腐

^① 指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编译者注

蚀”的减少，这是两个同时发生，并行不悖的统一过程。

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百分之二十（六百万对四亿）。但是，（一）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它不可能受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腐蚀，相反，事态的发展正推动它成为全体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外国资本家的斗争的领导者；（二）由共产国际领导的欧洲无产阶级先锋队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所起的伟大作用，正高举列宁主义的火炬为中国工人阶级照亮前进的历史道路；（三）第一个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中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坚强而理想的革命后盾；（四）在中国所有中心城市（如上海、汉口、北京、青岛、南京等），中国无产阶级都拥有相当的力量，例如，上海即有二十余万工人；

（五）对于中国大多数居民来说，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大事，中国人民群众越来越觉悟到需要进行社会斗争，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六）特别是农民，他们受整个形势的客观推动，正奋起支持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注意到上述种种因素，那么十分清楚，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工人是能够而且一定能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力量和领导者的。

在中国目前这种总形势之下，在民族解放运动目前已达到的这种水平之上，英、日帝国主义强盗们的镇压行为毫无疑问只能起火上加油的作用。

最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全会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变化，指出东方革命成熟的速度比预想的速度快得多，西方资本主义任何局部性的“稳定”都不可能长时期地阻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上海发生的事件可作为全中国以致印度、埃及和爪哇等国的榜样。在印度，工人对全国人口的比例是八百万比三亿五千万；在埃及是一百五十

万到二百万工人比二千万；爪哇则是二百五十万比三千余万。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上面提到的六方面情况。在所有这些殖民地和附属国中，一旦条件成熟，工人阶级毫无疑问会给这些国家伟大的解放运动打上自己的烙印。

列宁曾给世界革命的实质下过这样的定义：“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起义加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起义。”现在，这一公式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了。上海和加尔各答之间，汉口和马德拉斯之间，青岛和开罗之间以及北京和亚历山大之间互相呼应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时，以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些中心城市为一方面同以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革命声援也将不断加强并得到巩固。在中国和埃及，情况已发展到工人占领工厂的程度。来自东方的革命运动的火花正透过笼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黑暗势力的阴霾，发出闪光。上海工人要求从中国撤出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军队，这一行动不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且在世界各国首都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工会已行动起来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义务。“趋于稳定的”欧洲资本主义对本国工人的嘲弄和折磨愈烈，欧洲无产者最终抛弃欧洲“地方观念”的狭隘性就愈快，他们给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关心和支持就愈多。欧洲工人之所以关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支持，不仅因为他们是未来世界革命唯一的、彻底的革命领导阶级，而且因为他们是普通的出卖劳力者。

自从共产国际首次宣布出现稳定状态（指欧洲资本主义局部性的稳定）至今还只有几个星期。这几个星期中发生的事件十分清晰地表明，当今世界形势在政治上的稳定状态是相对的。**摩洛哥战争，上海事件，英国失业的增长，德国兴登堡的胜利，保加利亚事件，法国财政出现危机预兆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掘墓人就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

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对自己说，上海工人的事业也是我们自己的事业。上海的纺织工人、印刷工人、铁路工人和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站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前哨，我们将全身心地同中国工人团结在一起。

（马宝华译）

美国在中国玩弄的手法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M·加尔科维奇

1922年以前构成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基础明显的是两项原则，即“门户开放”和国际财政合作。美国所以需要这两个原则，是因为当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时中国境内的势力范围已经形成。在提出这两项原则的同时，美国认为必须使中国逐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言而喻，这种态度同前两个原则一样都是从现实的角度也即从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出发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使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它产生了好感，并让它获得了中国的“无私的”朋友的美名。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的这样一位朋友。1908年，美国暗示它准备放弃一部分庚子赔款。尽管这一项承诺经过十六年之后才经立法手续通过，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正式生效，但友好的情谊事实俱在。就在美国奉行这种和平主义政策之际，美国对中国的扩张也相当迅速地发展起来。但和英国、日本相比，美国在经济上的利益还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情况迫使美国把自己的不干涉方针改为干涉政策。对于自己的“门户开放”原则，美国愈来愈理解为不断限制其他列强通过这些门户。美国的这种心理从以下事实足以得到证明：压迫英国中断英日联盟，废止日美兰辛——石井协定，以及主要由美国主宰华盛顿会议。

与此同时，在对待中国内部事务方面美国开始改变自己的做

法。于1922年末夺得政权的直系军阀和美国实业界就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致这个派系的中心人物吴佩孚大帅的总顾问就是美国人林肯。此人至今仍然健在，并在一份美国大报《世界报》上不断发表自己的颇能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主要写他怎样把声名显赫的大帅玩弄于股掌之上）。除林肯担任财政顾问和政治顾问外，还有康纳将军担任军事顾问。在1924年内战爆发前不久，他就曾几次巡视吴佩孚的军队。自1922年至1924年期间，美国试图采用英国和日本的办法，即施加压力和进行直接干预，来使中国屈从于美国的目的。美国驻华公使谢尔曼执行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他在中国周游期间在各地租界向美国公民（有时是所有外国人）所作的关于维护治外法权的演说，同他在苏中谈判期间所发表的盛气凌人的照会一样，人们都知之甚详。而与之相反，关于“门户开放”、关于中国的主权，甚至关于开发中国自然资源的国际财政联盟等等的提法却大大减少了。

当美国人发现其他集团未必容许他们在银行团中把持一切，就干脆暂时退出银行团而创办了几个完全依靠美国资本的银行，如国际银行公司^①就是其中的一个。

吴佩孚失败，段祺瑞上台，张作霖的势力也即日本人的势力得到巩固。这又使美国重新回到原先的同中国友好的政策上来。谢尔曼奉召回国，7月初麦克默里来到北京接替了他。5月、6月和7月初中国的事态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的和平政策。例如，这一次美国就没有象去年那样采取任何派军队登陆或是在中国领海增加海军兵力一类镇压措施。

尽管一部分现今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对中国的事态表示抗议，美国政府仍然不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不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这种不偏袒的态度背后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① 即“花旗银行”。——编译者注

么？是出于对中国的爱国精神觉醒的真诚赞赏，还是由于其他一些在美国实业家看来比某些中国人剖腹自杀更为有份量的原因？新任命的美国驻华公使麦克默里比任何人都更能使我们看出美国实业界的心理状态。麦克默里热烈主张对中国进行金融渗透。不只如此，麦克默里认为他自己（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别人也这样认为）是这方面的优秀专家。可以有把握地说，麦克默里来到北京以后，关于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关于“银行团”的话题又要重新提起了。

组织银行团来为中国开发自然资源提供财政援助，是早在1909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旧主张。他当时提出的建议（不过主要是指满洲而言），可归纳为：满洲的铁路不作为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而应由美、英、俄、日四国组成的专门的银行团来管理。银行团当年随即成立，并吸收德国和法国参加。不过正如所料，满洲铁路根本不受这个银行团的影响。银行团的活动并无多大作用，因为中国原先存在的势力范围并未发生变化。于是美国人在1913年退出了银行团。留在银行团内的各个集团就从事于安排中国每年用于改组的借款。1917年初，一家美国银行利用世界大战造成的局势和各国忙于本国事务而无暇顾及之际，试图同中国政府就修筑若干新的铁路进行谈判。结果发现，列强并不因为战争而不维护自己的权益。俄国虽然受到削弱，仍然宣称反对在满洲修建铁路，法国反对在广西省修建，英国则反对在长江流域修建。由于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而美国又必须介入战争，于是被迫签订了对自己不利的兰辛石井协定。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战争结局对美国有利，美国遂提出组织新的银行团。此后，美国政府采取的一切步骤都以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为依据。这些步骤包括：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建立新的银行团（准确地说，是恢复旧的银行团），并于1923年重新退出。这一段时间正好是美国对中国直系军阀政府的政治影响日益加强的时期。直系下台，美国的

对华政策也随之改变。

美国的所谓社会舆论对于目前中国的事态反应相当强烈。例如，外交委员会主席、著名的参议员波拉就说：“我看不到有理由要美利坚合众国参与中国当局和中国人民的冲突。毫无疑问，局势是严重的，但并没有严重到需要美国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并未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而且我相信，美国人民高兴看到中国的民族权力和利益全部得到恢复。我个人赞成尽快实际废除对中国的治外法权。”^①不过，《华盛顿邮报》6月18日的社论《美国和中国》唱的调子稍有不同。这篇社论说：“中国的局势要求极端慎重地加以对待。我们不能不同情中国人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护（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人的财产和生命。中国处于内战的纷乱之中，国内没有坚强稳定的政府。最近期间内废除治外法权只会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干涉，而不能避免干涉。”《纽约时报》6月18日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恐外症》的文章说：“最近中国的事态和反英示威游行不能说明英国是中国人愤怒和表达愿望的唯一对象。”这家报纸警告美国实业界说：“绝非如此。几个星期以前是日本人，明天就可能是美国人。”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喉舌《商业日报》6月20日在《中国事态的预测》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在美国资产阶级人士中对于中国的事态目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官方的观点是谨慎的。一方面，这种谨慎的态度可以解释为美国不干涉中国事态和美国对于反对外国人的示威游行不提出抗议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谨慎态度促使美国在广州留有两艘驱逐舰，以及使一名美国军官在山东开了枪。美国人的想法是：中国人的行动可能是正当的，但美国公民

^① 1925年6月17日《华盛顿邮报》。

的财产不能因此受到损失。

为了缓和中国人同外国人之间的摩擦，而主要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美国有可能试图以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承诺的精神来解决问题。但不管怎么说，麦克默里向日本报界发表的声明是不容置疑的。他宣称：“美国打算严格遵守同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大国合作的原则。在没有事先同驻北京外交使团详细讨论之前，绝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政府的行动。”

同一个麦克默里在他接到前往中国的使命以后（中国事件发生前不久）所写的一篇文章《外国资本在中国》^①中揭示了美国的真实意图。他写道：“只有以银行团作为国际合作的手段和实行门户开放原则，才能为中国健康而正常的发展打开道路。”新的美国驻华公使是主张金融渗透和进而控制中国的。尽管他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是：银行团首先应使中国人得到好处。可以有把握的说，得到暴利的首先仍然是摩根。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种种手法在于：利用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因五月事件和六月事件而遭受相当重大打击的机会，迫使英国和日本接受国际合作的主张，也即接受美国控制下的合作，接受银行团中以摩根为首的三十七家银行控制下的合作。

（乌传袞译）

^① 《外交季刊》，1925年4月号。

英国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兰皮书”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K·拉狄克

1924年3月，英国国会就中国境内外国工厂工人的状况进行了一场短时间的辩论。其间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贯彻实施华盛顿劳工会议决议的问题。根据劳工部的要求，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为此指示英国驻华各领事对中国工人的状况提出报告。各领事所作的答复，现在已由保守党政府用“兰皮书”的形式予以公布，题名为：

《关于中国劳动条件的文件汇编》(“Papers Respecting Labour Conditions in China”，1925年伦敦版，计130页)。

我们不知道保守党政府是否在上海事件以后才发出指示出版这本“兰皮书”的，但无论如何，英国各领事的报告中所包含的材料，完全证实了美国人舍伍德·艾迪几个月前在其所著《劳动的新世界》一书中所描绘的那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可惜俄国出版界对于这本书却未予重视。

英国领事们的报告提供了酿成上海事件的可怖背景，同时，尽管这些领事千方百计企图作出相反的证明，报告还是打破了关于外国工厂，首先是英国工厂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比中国工厂为好的神话。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即先介绍各领事报告中所描绘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境况。1923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个改善

中国工人状况的临时法令。这项法令所要禁止的事情和所作出的规定，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它禁止雇用十岁以下的男孩和十二岁以下的女孩做工。它要求成年工人每月有两次假日，青年工人每月有三次假日，每日上工时间内有一小时工间休息。它要求至少每月发一次工资。这一切竟然都要一一作出规定。所有领事都报告说，这项法令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执行。就这一些已足够使人们看清情况了。不过还是让我们看看来自各地的具体报导吧。

巴顿总领事报告了**上海**的情况：“值得令人怜悯的事实是：使用童工干活没有任何限制；无论在英国工厂、其他外国工厂，还是中国工厂，童工日夜工作，时间之长闻所未闻；年龄太小不能做工的儿童也随着父母到工厂来。英国棉纺厂的正常工作时间是连续二十三点五小时，分为两班，每班十二小时，每班工间休息只有十五分钟。日本工厂工作二十二小时，分为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工间休息为三十分钟。中国工厂每班工作十四小时，中间没有休息。童工和青工的工作量，同成年人一样多。”巴顿接着写道：“中国没有民法，没有统计机关和卫生机关，没有工厂检查机关，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帮助工人申诉自己的困难。没有一个可以贯彻执行法律的中央政府，权力掌握在各省督军手中。他们对待有组织的工人只有两种做法，当工人组织在举行罢工或进行宣传鼓动而同他们的军事机构发生冲突时就镇压工人运动，而当需要利用工人组织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就予以支持。前一种做法的例子，就是华中地区吴佩孚当局屠杀工人领袖的行动。后一种做法的实例，就是广东的孙中山和浙江的卢永祥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一名英国官员竟把枪杀工会领袖同支持工会两件事等量齐观，确实难能可贵。

关于上海童工的状况，“**兰皮书**”还载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指定的委员会专门编写的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明了工人的一般情况。成年工人的工资每月不超过十五美元，勤杂工

每月不超过八美元。最贫困居民两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每月十六美元。这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每月收入十五美元，即三十个卢布，还不能养活自己和妻子，抚养子女就更谈不到了。上海肺结核病十分猖獗。工厂中儿童的生活状况比农村的儿童还不如。“把女孩子卖给别人做丫头成了普遍现象。一当她们有了体力，就得开始干活……委员会有根据证明，许多幼女被卖到妓院，经过一番调教去卖淫。”有的儿童在幼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家庭作坊去当学徒，五年之内他们作为“徒弟”，拿不到自己干活的分文工资。报告认为，这是纯粹的奴隶制度。在纺织厂，这个委员会看到日夜干活的童工，他们最大的不超过六岁，一天干十二小时活，而且往往一直站着干活。除了过年，没有任何假日。雇主每月付给介绍人四个美元，而介绍人只给孩子的父母二个美元。工厂中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夜间婴儿睡觉的摇篮就放在工厂内轰鸣的机器旁边。许多工厂童工累得倒在地上，就在角落里睡着了。在丝厂，童工要比成年人先上工，作好准备工作。他们用沸水清洗蚕茧，常常被烫伤。在火柴厂，委员会看到五岁的童工。有些幼儿刚刚学会站立，就已经去工厂，在充满白磷毒物的环境中睡觉、嬉戏。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工厂主联合会还说，工厂雇用童工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是一种慈善行为，可以免除他们的父母因把幼童放在家中而担惊受怕。

驻**广州**的英国领事报告说，在广州工厂的劳动者中，妇女和儿童占多数。火柴厂只有男工每月领取十五美元的工资，妇女和青年按日计工，每日可得三十美分左右。他们每天干活十二小时，每周干七天。其他工厂的工资，青工约相当于六美元，勤杂工约八美元，熟练工人约十二美元。上工时间从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六点。没有星期天。工人一年在工厂干活七到八个月，然后回到农村去。

驻**长沙**的领事报告说，在湖南矿区，由于缺乏任何医疗卫生设备，整个村庄整个村庄地中毒死亡。在该省其他矿区，百分之八

十一的工人患有传染病。儿童从十岁起就开始干活。工人生病，除在工作时被机器轧伤者外，一律拿不到工资。女工分娩得不到任何补助。

关于山东烟台劳动条件的叙述，大致如下：工资为每月六点半五银圆，约相当于三点五金圆。一年只有四天假日。丝厂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工人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中干活，大家都住在工厂。每天夜晚干完活以后，工人就打开自己的破烂铺盖，睡在地上、干草上或长凳上。工人生病几天，可以留在厂内得到食物。一周以后仍不见好，就要被赶走。如果工人住在厂外，生病时就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学徒期间，学徒是工厂主的私有财产。经常可以看到年轻工人夜间睡在机器旁边，以致造成许多不幸事故。

“资本家专制地对工人实行极其严格的监督。”罢工极少，而且要受到惩罚。工人经常被大批解雇，却被认为是合法的。任何罢工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警察镇压，工人只好又在原来的条件下继续干活。

驻四川省重庆的英国领事报告了军事当局强行拉夫的情况。甚至在重庆港口，每天都可以看到用绳子捆成一串在士兵看押下做苦力的人。在四川没有一名士兵是自己扛行李的，有的连枪都不用自己背。苦力得不到分文劳动报酬。工人们建立过组织保护自己，但是被军事当局取缔了。克列涅尔领事在一份长达二十四页的报导中试图描述福建省的整个情况，其中也讲到军队土皇帝拉夫的这类事例。“工人每天都可能被这些匪徒抓去。如果他们不肯象奴隶一样为这些士兵干活，或者他们的家属拿不出赎金，他们就可能被杀死或被折磨死。

驻哈尔滨领事的报告非常简短，但却值得逐字引用：“劳动时间毫无限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失业现象或举办职业介绍所。妇女夜班劳动。对此没有任何法律加以限制。对于锡中毒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政府的卫生部门没有对工厂实行任何监督。

对于使用童工没有任何禁令。对儿童夜班劳动也没有任何禁令”。

驻九江领事报告说：“使用童工干活非常普遍。罢工时时有发生。大米涨价是造成罢工的原因。中国苦力只要工资每天够吃两顿米饭，他们就愿意整天干活”。

驻天津领事报告说：“这里和中国各处一样，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这样就使解决女工和童工问题的任何企图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工人无法不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尽可能自行谋生。”工厂里到处拥挤不堪，通风很差，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火柴工厂使用白磷，因此磷中毒坏死病在工人中十分猖獗。机器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工作日达十二小时。在某些火柴工厂，工人连同童工在内从早上四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星期日也不休息，生病得不到任何保障。

这些报告真正粉碎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是中国工人骚乱根源的烂言。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报告还粉碎了所谓所有外国人办的工厂，特别是英国人办的工厂，工人生活状况较好的神话。这个神话在英国国会中和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上曾被人喋喋不休地大肆渲染。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英国领事们在报告中按照这种情况陈述一番，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吗？然而从“兰皮书”中可以看出，领事先生们颇想复述这个神话，可是找不到一个事例可以作证。当中国政府公布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个劳动保护法时，驻北京总领事鲁纳尔德·麦克莱于1924年4月12日发电报给麦克唐纳说，他曾经向英国工厂主提出询问，他们回答说，“他们将坚决抵制中国当局的何任监督和干预。”英国领事把这解释为英国工厂主对中国当局的不信任：因为中国当局不了解情况，可能把维护工人的法令用于支持当地工厂主反对外国工厂主。不过他自己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政府坚持实行这类法令，那就很难加以拒绝，因为各大国都投票同意华盛顿劳工会议的决议。驻上海领事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坚持实行

这项法令，在上海的英国资本家将不会表示反对，“但这要看法令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同时，他汇报了虔诚信奉上帝的英国人对这项中国法令提出的修正要求。法令规定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而他们建议先禁止雇用十岁以下的童工，过四年以后再提高到十二岁。这些讲人道的英国人要求规定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劳动不超过十二小时。换句话说，对于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可以剥削十二小时。驻汉口总领事报告说，他曾建议中国商业部派代表来研究工人的状况。这位代表给领事寄来了调查表，请求分发给各英国工厂主。结果怎样呢？领事报告道：“我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只有两位工厂主在同我谈话时说他们已把调查表寄给了在上海的总办事处。但是，这位英国领事接着自豪地补充说：“英国商行没有任何原因害怕检查，但是它们不能允许中国人干预他们的事务”。

驻奉天领事通知说：“我无法得到有关您提出的问题（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任何消息，甚至连在奉天大量雇用工人和童工的大英烟厂也什么都不提供。对于我要求提供情况的请求，这家公司答复说已把我的要求寄往上海”。最后，驻南京领事宣称：“应当承认，国际工人组织（指国联劳工局）的许多决定现在实际上是无法贯彻的。对于工作日的某些限制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有可能予以实施，但是如果这些改革引起生产费用的急剧增长，那么在经济上大概是行不通的”。

这些极其贫乏的材料和英国领事们敷衍搪塞的回答，可能迫使英国新闻界不再宣扬英国工厂主的人道主义，英国政府也可能因此不再公布本国领事们的报告。

（乌传寰译）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①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K·拉狄克

中国的事态有力地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对于东方产业工人的状况知道得如此之少，因而对于任何一种让欧洲读者看到他们亚洲阶级弟兄生活境况的新的努力都应当表示欢迎。所有这些努力也只能提供局部的消息，因为只有由各工会按工厂逐一搜集资料，才能提出材料与政府发表的官方资料进行核对。在许多亚洲国家，政府根本不提供任何有关无产阶级生活情况的消息，连经过粉饰的材料也不提供。不久前出版的美国作家舍伍德·艾迪的《劳动的新世界》(Sherwood Eddy: 《The New World of Labour》，1924年，纽约，S·多兰公司出版)一书，虽然所描绘的东方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图景并不系统，但作者与美国使团人员关系密切，在亚洲旅行时专以搜集无产阶级状况的材料为目的，他又有权威人士的介绍，得以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普通欧洲旅行者所不能看到的東西。作者写这本书时，满怀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对骇人听闻的现实不作任何粉饰。因此，值得在读者直接阅读该书之前，先向读者介绍其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状况，作者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对中国工资、工作日和一般劳动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展现出一幅令人

① 这是拉狄克所著《亚洲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的第一节，原题为《中国》。——编译者注

极为震惊的景象，这种情况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看到过的。在所有的现代化工厂，大部分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在原始的中国工厂，干活时间为十二至十六小时，某些地方甚至长达十八小时。每周七天，天天上工。许多纱厂、丝织厂、棉纺厂都雇用六至十二岁的童工干活。童工的工资每日为六戈比至二十四戈比。（原书工资数以美分计算，我们已换算为戈比）。几十万学徒每天只有饭吃，伙食费用约为十二戈比。在工厂因工致残者以及死亡者的家属通常都得不到任何补助。工厂中容易发生危险的机器没有防护设备，因而事故极多。旧的家庭体制在现代工业的打击下遭到破坏，因为全家人口日夜倒班干活。”（见该书第14—15页）

作者接着叙述了有关工资的具体材料。他写道：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纺织厂男工的工资约在十戈比至一卢布三十戈比之间；平均每天三十三个戈比。女工的工资在十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每天二十六戈比。钢厂、铁厂、铜厂，男工工资在十二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三十戈比。女工收入在十戈比至三十戈比之间。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每周工作七天。港口城市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相当于每天二十五个戈比。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人生活低于这个水平。在这方面作者还引用了阿加塔·赫森提供的材料。赫森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在已成为工业专家，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根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在许多她曾经到过的工厂，女工把婴儿背在身上干活。她曾看到一个女工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两手还在工作。当她问厂长有没有什么卫生机构时，厂长回答说：

“没有。”所以，我们在工厂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来的工人。斯皮尔医生向作者说：如果说中国存在人口过剩现象，那么现今的摧残人命的工厂制度将会使中国避免这种现象……罗斯教授宣称，现今的工厂制度正在把千百万工人的生命压成齑粉。作者引用罗

斯教授的话说：“为了怕饿死，人们不停地干活，只求获得一块面包。在许多情况下，工人由于体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毁灭自己的生命。有的工厂，机器是用脚踩动的，苦力在这种工厂工作，生命显著缩短。医生们承认，扛重活的苦力很少有活过四十五岁的。人力车夫只能坚持干四年，以后就要成为残废。”

作者描述了他到过的许多工厂。在上海，他在清晨走访了一家棉纺厂。在那里他看到七至十二岁的男女童工分日夜两班工作，干十二小时，工资为十六个戈比。女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赚三十个戈比。一般工人每天可得到三十至三十六个戈比；熟练工人可得到四十至六十个戈比。作者看到有一个女工就在机器旁边睡着了，一些儿童在干活的母亲身旁整夜在机床之间玩耍。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在工作四个小时之后打瞌睡，睡梦中摔倒在机床上。

舍伍德·艾迪也参观了工人住房。一个木匠邀请他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住所。全家人住在一间屋内。他本人患有肺病，传染了全家。他每月工资收入约二十个卢布，要养活三口之家。他们的住房是在一幢两层的小楼内，那座小楼被隔成一间间很小的房间，像一个个阴暗的窑洞，共住了四十口人。舍伍德·艾迪叙述道：我们看到一间十英尺宽的房间，里面住十个人。一半人夜间睡觉，一半人白天睡觉。室内没有炉子，人们直接在地上生火，煤烟熏满整个房间。室内没有厕所，用一个便桶来代替。不论男的，女的，还是儿童，白天黑夜吃、喝、玩、睡，都在这一间屋内活动。

作者描述了他在中国曾经参观过的唯一的一个医院。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七岁的男孩，这个孩子在织布机上干活时被砸掉两个手指。孩子和两个姐姐一起干活，每天总共收入二十二个戈比，伤残后，工厂没有给他任何补助。邻床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也是在同样条件下丧失了一截手臂。她的面孔显得十分平静，

因为她一生中第一次得到休息，第一次能吃到饱饭。

在另一间病房，作者看到一个因发寒热倒在机器下面受伤的工人。他每天收入三十二个戈比。

资本主义的这种牺牲品，住过这家医院的每年就有几千人。大部分工厂为病人每天支付二十个戈比。有的工厂经理拒绝把病人送到这家医院来，以免增加开支。

谁也没有听说过发给补助金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个矿井发生爆炸，死了一些人。每个死者的家属得到四十个卢布的补贴。“一头死去的骡子当时还值一百卢布。人是中国最便宜的商品。”

为了说明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提供了多么大的利润，作者引证了一个事实：根据海关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一家有二千五百名工人日夜干活的棉纺厂为资本家提供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他还引用了正式报告的一段说明：“这家工厂条件特别优越。原料产地就在附近，劳动力过剩，非常低廉。它无需考虑任何工厂法，因此，在此种条件下这家工厂的利润超过资本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这份正式报告提供的材料，这家工厂每天付给每个童工七至十个戈比，成年的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最多六十个戈比。

作者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事实：也有一些工厂主试图使工厂多少接近欧洲的劳动条件。一个中国工厂主把工作日从十四小时减少到十小时。他告诉作者，工人现在比以前生产得更多。他同意让工人每周有一天休假，每月支付每个工人十六至三十二个卢布的工资。按照上海的条件，这是很高的工资。他创办学校供儿童读书，为自己培养熟练工人，还组织了合作商店。尽管如此，他的利润也相当于百分之十二。作者讲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情况。这家印刷所不使用童工，也不雇用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每天工作九小时。每周有一天休息。有医院。产妇有产假一个月。印刷所有三千工人，非常兴旺发达。作者正确地指

出，这些例子说明，就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也是可能的。

舍伍德·艾迪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材料，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增加的东西不多。值得转述的只有两件事。作者在许多工厂都看到有特务，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建立工人组织和逮捕为首者。工会和罢工活动的领导人必须经常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避免警察搜捕。虽然如此，工人已培养起团结精神，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开滦煤矿的罢工工人在一份传单中描绘了自己的境况：“工厂当局对我们的压迫无比凶狠，好象对待匪徒一样。我们在矿里干的是危险活，可是他们对待我们连骡马都不如。骡马死了，一匹还值一百美元；死了一个工人，工厂当局连五十美元也花费不了。工人一发生不幸事故就被赶出工厂，不管他能不能有口饭吃，或者是要饿死。可是，如果一匹马在干活时受了伤，老板就会处罚工人。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工人下井跟下地狱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决心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就是牺牲生命，我们也决不放弃斗争。”

作者是在1922—1923年间访问亚洲的，那时他就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斗争精神，并且预见到风暴即将来临。

作者写到：“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利益对立的两类团体——工会和资本家社体。这两者都来自原先既包括工人又包括雇主在内的同业公会。在北方比较富有的商业行业中，同业公会有变为工厂主组织的趋向。在南方，我们发现工会就是从原有的同业公会发展而来的，往往就称为同业公会。以竞争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目前在中国都已出现。中国人遵守纪律，又有亲属、宗族和同行之间团结和睦的传统习惯，这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统一行动。虽然无论工厂主也好，工人也好，都常常表现出畏缩犹豫，愿意妥协，但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小团体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促使他们进行斗争。”

三十年以前，中国还根本没有工业。二十年以前，中国只有两家现代纺织厂，共计拥有六万五千个纱锭。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家纺织厂，纱锭总数达到一百三十六点五万个。三分之二的工厂是中国人办的，其中一半最近四年才出现。汉口附近的一家钢厂有六千工人。近十年来，中国兴建了一百个电站。仅上海一地就有一百万居民，商业周转额达十亿卢布。汉口的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广州近一百万，北京有八十万。人。“现代化工业使工人离开了旧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基础。在这些城市中，有数百万人因丧失土地、没有任何财产而被迫每天临时找活干，度日如年，生活面临着工业革命的威胁。”作者认为，在现代化工厂干活的一百万工人中，不满情绪在滋长。“资本家现在还有改善中国工人境况的机会，目前为时尚不太晚。”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关于中国工人状况的一章中的最后一句话。

显然，资本家们这一次也并没有听取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好意规劝。这样的改良对资本的存在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为了彻底铲除资本家的这种改良，革命的高潮是必不可少的。

(乌传袞译)

上 海 的 罢 工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П·格列尔

上海的大规模罢工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了。这不仅在年轻的东方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也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绝无前例的事件。

现在，罢工已经部分停止。电讯又传来了关于中国海员工会同日本轮船公司达成协议的消息。这时，谈一谈这一次独具特色的罢工的意义，判断一下罢工的成绩和今后的前景，绝不是无益之举。

上海罢工的特点在于，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两者汇成了一股巨流。

大家知道，起初参加上海罢工的既有工人也有商人。停业的不只是雇用职工的大商店和大银行，而且还有不雇用职工的小店铺。这样的总罢工延续了三周。

自6月23日起，根据同总工会达成的协议，商人罢市结束。只有**英国**和**日本**企业的工人继续进行罢工。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罢工具有民族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十七点要求，更加突出地表现了民族运动的特色。其中包括有：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一些取消外国人在华特权和恢复中国独立和主权的种种次要要求。

不过其中也包含有纯粹工人自身的要求，如：承认工会、提高

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意义深远的民族解放的要求同比较朴素的工人自身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恰好反映了罢工的两个方面：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十分明显，一开始主要的潮流是民族运动和反帝的潮流，罢工工人是为全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大军。全民族一致支持工人的罢工是毫不奇怪的。

虽说是“全民族”，但总还是应有所保留。参加上海商会的部分大资产阶级很早就表现出想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和制止罢工的倾向。他们和外国资本家利害相同之处太多，而对工人运动的胜利又抱有同样的不安心理。除了这一部分颇有影响但为数不多的人以外，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全部都围绕在工人阶级周围，不仅极力表示同情，而且给以积极的支持和提供物质援助。运动的规模所以如此宏大，罢工所以能够坚持到底和持久进行，关键就在于此。

但是困难仍然不少。有来自外部的困难，也有内部存在的困难。帝国主义者并非无所事事。他们不仅试图采用种种残酷镇压的手段来粉碎罢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企图从内部来进行分化瓦解。不应忘记，他们手中一方面掌握着向所有中国报刊提供材料的新闻机构，一方面还拥有欧洲和美国的所谓“舆论”。直接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还有大量“买办”（中介人）以及一大批左右中国工人生活的“工头”。另外，在北京和上海还滋生了一批由工人叛徒组成的专搞敲榨勒索，欺压人民的流氓成性的特务为外国资本家服务。

在上海事件的喧闹声中，张作霖的军队悄悄地开进了上海，据称是为了，正如这支军队士兵臂章上写的那样，“捍卫民族利益”。但不久之后，奉军的真正本质就暴露无遗了，他们原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残杀工人的刽子手。

但是除了这种巨大的来自外部的困难以外，还存在内部的困难。罢工工人的主要骨干是纺织工人、搬运工人和海员。纺织工

人大都是女工。而且纺织工人的组织是在年初才开始建立的，也就是说，参加罢工运动的有许多还是无产阶级中初次接触运动的没有锻炼的成分。而搬运工人中有许多是经常流动的半流氓分子，他们很容易接受黄色工会特务分子的挑动。

可以想到，在小资产阶级中也经常出现动摇现象。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中亲日派占有优势，他们主张为了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和力量指向主要敌人英国人而同日本人“和解”。

不过不管如何，工人的阵线是统一和坚强的。

罢工的时间持续得愈长，就看得愈加清楚：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在十七点要求中得到体现的民族运动的目的，通过任何一种罢工，即使是最有力最持久的罢工，也是无法达到的。要收回“租借地”即被占领土和上海租界这种帝国主义者太平洋上的重要据点，只有通过全中国范围的武装斗争，通过胜利的战争才能做到。同时，罢工运动仅仅局限于上海和香港两地。中国其他地方虽然极表同情，但并没有形成总的民族运动的高潮。工人和学生的发动时起时伏，并且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残酷镇压。汉口、天津、青岛，南京等地均是如此。

南方的香港，华中的上海，一直是各行其是。如今罢工运动似乎已经走上了绝境。必须来一次转折，使罢工运动转上别的轨道，使罢工的目的与罢工孤立无援的状况相适应。于是在这个运动的第二阶段，罢工的第二个方面，即工人自身要求这一部分就突出起来。上海总工会并不放弃争取全民族解放的口号，以之作为进一步开展全民族斗争的战斗号召，呼吁民族的所有力量捍卫这种要求，并提出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有责任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与此同时，它现在已不把全民族性的要求，而是把工人自身的要求作为主要的口号，如：承认工会、提高工资、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每周有一天休息、接受所有罢工工人复工等等。这样就有可能机动灵活地活动、同对方进行谈判，以及作出妥协。

结果达到了初步成效。海员工会同日本航运公司达成协议。条件是：（一）所有罢工工人回厂工作；（二）罢工期间的工资全部照发；（三）增加工资问题专门进行商谈。关于工会问题，协议没有提到。不过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那么尖锐了，因为此时北京政府已经公布了（尚未正式批准）一项关于承认中国工会合法的法案。

第一个协议恰好是同日本人达成，这一点并非偶然。其间各方面的因素都起了作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存在一种希望与日本和解的趋向。但主要的，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日本长期延续的经济危机最近更为尖锐了。失业现象远比英国严重：根据官方的统计，日本失业人数已达到一百六十万人，至少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来说也远比对英国重要得多。中国市场对日本说来简直是生死攸关、生命所系。日本尽管长时间动摇不定，一度试图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即对上海罢工绝不妥协，但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终于利用中国国内的和解趋向，以相当大的牺牲为代价，暂时先同海员达成了协议。

这项协议毫无疑问是中国海员的巨大胜利，虽然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这一胜利改善了罢工工人的整个处境，首先是战线得以缩短。

罢工拖延的时间愈长，经济上就愈加困难。无论中国工人生活多么俭朴，工人最低限度的补贴（每天二十个戈比），仅上海一地二十万人加起来也要每月一百二十五万卢布。再加上罢工给国家整个经济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维持罢工日益困难。日本航运公司恢复工作使尖锐的状况有所缓和。反对英国资本家的斗争就显得更加激烈，更加有力。工人阶级获得了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性。

英国与日本相反，毫无动摇之意。中国民族运动以英国为主要敌人，上海市政会议甚至已为外交使团否认而完全成了英国一

家的机构，罢工已经波及香港这块英国“根本”的殖民地，英国的“威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方都面临打击。所有这一切使英国保守党政府更加杀气腾腾起来。英国的政策从一开始直到最近始终是威胁加暴力的政策。整个问题只是在于：它不得不亲自出马，还是有可能——按照英国的优秀传统——由别人代它火中取栗。英国一度已把日本拉到自己一边，但正如日本和中国海员的协议说明，这时间并不长。现在看来，英国已经完全孤立了，除了还有几个盟国和一些直接雇用的走狗即捣毁上海总工会的那些流氓。

美国仍然在玩那一套在华盛顿会议上使用过的把戏。法国早从一开始就和英国分道扬镳了。

日本知难而退，决定以重大让步为代价寻求同中国工人达成协议。这大大削弱了英国资本家对付罢工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英国最大的可能是把希望寄托在曾在天津和青岛为它大力效劳过的张作霖身上。北方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究竟力量较弱。在北方能够办到的事在上海办就不会那么平安无事。初次试图在上海镇压工人运动的做法已使奉军十分丢脸。现在能做的只有军事干涉或者用收买歹徒对运动的领袖进行暗杀的办法来进行镇压。但是，用这类“保加利亚式”的办法未必能够对付有几百万人参加的运动。而采用英国对广州政府曾一度下狠心准备进行的军事干涉，在华中地区是完全行不通的。英国报刊虽然一再进行恫吓，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好进不好出的”。对西伯利亚进行干涉所得到的教训，帝国主义者还记忆犹新。英国孤掌难鸣，而美国和日本正在伺机以待，只想把英国进一步赶出中国。进行干涉可能带来的风险使英国望而却步。因此，英国资本家尽管绝不甘心和解，最终同上海罢工工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这就是罢工当前的处境和今后可能的前景。

那么，罢工取得了哪些总的成就呢？不管今后事态如何发

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而有一些成就还是十分重大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海罢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千百万人吸引到民族运动中来，而且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这在平常的条件下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

二、工人阶级尽管人数不多，政治上组织程度不强，工会组织也不严密，但已经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不仅中、小资产阶级，连北京政府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人人都已懂得，工人的罢工运动是民族运动的轴心。上海罢工所以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都得到支持，原因也就在于此。所以发生段祺瑞政府给上海罢工工人汇款十五万美元这种绝无仅有的事情，原因也在于此。

三、鉴于民族运动的压力和上海事件的影响，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开始接近，第一次相互“承认”，互派代表团，似乎一起接受了全民族的共同委托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四、通过上海事件，中国人民认清了张作霖的面目：他既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工具，又是妨碍中国解放和全国统一而必须加以摧毁的内部敌人。

五、工人阶级，特别是上海本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有了提高。在上海一地就集中有中国全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罢工的几个月内人数增加了一倍。工会的发展还更快些。

这些成就是极其巨大的，标志着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现在起，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将给自己提出在三个月以前看起来无法完成的任务。

(乌传袞译)

广 州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K·拉狄克

一

中国反帝革命斗争首先是反英斗争的中心，已经从上海转到了广州。无论是广州事态的发展，还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准备进攻广州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中国近代史一开始，广州就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原因在于，外国资本的侵入正是从南方开始的。广州曾处于所谓“鸦片战争”的中心；太平军的革命运动也源自广州，因为这个运动虽然主要是农民运动，但是思想动力却是从广州取得的。中国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面前的软弱无能在广州表现得最为明显，基督教牧师也是最先在广州向进步的中国人士介绍基督教，而这些中国人就把基督教义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成了一种人人平等的学说。外商进入广州在那里造就了一批商人，随之出现了第一批知识分子队伍。同孙中山的名子紧密联系的革命运动，也是从广州和广州对面的小岛香港开始的。

以后，上海、南京、汉口和其他中国工业中心在经济上超过了广州。广州、香港、澳门的工人总数不超过十万人，而且只有一部分是产业工人。从英国驻广州领事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广州附近有一个众所周知在1860年^①就被英国占为殖

^① 应为1842年。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编译者注

民地的香港，而且它已经成为广东省工业的中心，所以广州只有几家水泥厂、一个电站、几座大型磨粉厂、十七家火柴厂、三十家碾米厂、数十家丝厂和造纸厂。广州的大部分居民是手工业者和商人。

那么，又为什么恰恰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而广州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前哨呢？

华侨商人和广州商人是孙中山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中的社会基础。孙中山于1911年革命胜利后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力图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自由派商界人士支持孙中山。当孙中山被袁世凯驱走，而袁世凯在英国和日本资本主义援助下摧毁了中国革命的成果时，孙中山的声誉在广州居民中并没有消失。正是依赖这种声望，孙中山得以在1920年在广州取得了政权。

孙中山政府在这个时期还完全不是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虽然孙中山在美国知道了社会主义，并表示同情，但还不能建立任何工人组织，同农民没有丝毫联系，因此，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革纲领只能是纸上谈兵。他的实际兵力是由陈炯明率领的雇佣军。正因为如此，当孙中山同陈炯明之间就同吴佩孚作战的方法问题发生争论时，陈炯明轻而易举地就赶走了孙中山。支持孙中山的将领和追随他的官僚们本来就把孙中山只看作是一块响亮的招牌。实际上这班官僚对于孙中山的纲领毫无兴趣。当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民族革命纲领考虑进行北伐时，陈炯明以及其他军官和官僚们所关心的只是不要丢掉在广州得到的肥缺。直到1923年孙中山再次取得广州，才开始了广州政府发展的第二阶段：着手在广州工人和贫民中寻找社会基础。有两个主要因素对于这个转变起了作用。第一，1922年发生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得到广州居民的全力支持。广州居民懂得，中国海员反对外国船主首先是英国船主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争取从外国帝国主义桎梏下获得

民族解放。这次罢工之后，离广州不远、被葡萄牙侵占的澳门岛上的中国居民也开展了斗争。这一切使广州的人民群众动员了起来。孙中山必然看到了以在外国资本家和中国顾客之间充当经纪人为生的中国商界态度的变化。这些商人既怕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又害怕遭到中国工人的抵制。他们开始离开孙中山，这样一来，工人和贫民的渐趋活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土壤，而商人的向右转也迫使孙中山在底层人民中寻找支持。除了内部发展的这些事件之外，俄国革命的影响也在同时起着作用：原先孙中山只从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获得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模糊概念，现在他同俄国共产党员以及到过俄国的中国工人有了直接的接触，不仅知道了俄国革命的目的，而且得悉俄国革命的方法。那些同上海及香港的英国银行有勾结的富商，鉴于孙中山已确定新的方针，便阴谋推翻孙中山。商团就是为了筹划推翻孙中山而建立的，以致孙中山不得不使用国民党在广州郊外新建立的黄埔军校的兵力同反革命军队开战。在这次作战中，孙中山得到当地无产阶级的全力支持。从这时候开始，孙中山着手组织工人群众，并试图扩大到广州以外的地区，因为在这之前，孙中山同广州以外的农民联系很少。这样，陈炯明在1923年被赶出广州以后得以组织起农民游击队反对向农民征收赋税的市区。一句话，上述情况使陈炯明扮演了农民“头领”的角色。现在，这支孙中山新组建的、不仅由国民党人指挥而且用国民党的政策精神进行教育的部队，开始向农村开进，同农民建立联系，组织农民，从而奠定了对陈炯明胜利作战的基础。在广州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已经有农民代表参加。清洗广州政府的官僚机关，关怀贫民的利益，规定新的赋税政策——所有这一切使广州政府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

这使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分裂。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脱离了国民党中主张国民革命的人士。左派分子在工人、农民、小

商人、手工业者中寻求支持，右派则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寻求支持。当国民党左派宣传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时，右派则渴望与之勾结。不过显而易见，这种分化不是迅即发生的，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某些国民党人只是在斗争过程中才明确向右转或向左转的态度，还有部分国民党右派则有意识地留在政府中，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激烈关头，左派国民党人不得不逮捕部分部长，为什么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人准备暗杀国民党左翼的领袖。

二

广州政府为什么成为英国帝国主义一再攻击的目标，这从广州成为中国各种最革命党派的中心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解释。不仅如此，广州还成了太平洋所有岛屿上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太平洋地区海员代表会议，有中国、菲律宾、夏威夷群岛、荷属各殖民地和英属各殖民地的代表参加。此外，广州对于香港的战略地位使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广州政府的存在是一个危险。还在就华盛顿会议问题进行辩论时，许多战略问题专家就指出，香港这个英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堡垒有可能从大陆上加以夺占。香港又是英国同华南进行贸易的中心。如果不能从香港通过广州把货物自由运往中国内地，香港在经济上就会失去价值。据上海出版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报道，广州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使广州不再依赖香港。它准备在黄埔建造能停泊大船的港口，并为此引进美国资本。它还计划从广州修建通往汕头的铁路，以便绕过香港。广州政府已经向德国订购一座大型电台，使自己同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讯联系能摆脱香港当局的控制。一发现这种前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香港英国资本家就开始了反对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行动。著名的

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从中国回国不久，就在1924年9月19日的《新领袖》杂志上发表《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文，对于英国资本家的行动写了以下一段话：“中国的督军只不过是一些利欲薰心的匪徒。中国各类政府中唯一的例外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些最杰出的汉学权威人士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香港的英国人对孙中山表现了疯狂的仇恨，一方面大肆进行宣传，一方面策划暴乱。至于香港官方人士的情绪，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最好的说明：一名在香港任职的英国海军军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的妻子反对香港存在的奴隶制度。我们同孙中山的冲突是从如何对待所谓卡塞尔条约开始的。同原先的广州政府签订的这项条约使英国人垄断了广东全省的铁路和矿场。当孙中山取得政权时，条约尚有待批准。但是他拒绝批准这项条约，于是从这时起我们就把孙中山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关于后来英国资本家试图利用商团武装推翻孙中山的阴谋活动，伯特兰·罗素写道：“在英国人眼中，孙中山的主要罪行是他竟想把中国独立主权的剩余部分抓住不放。汇丰银行正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英国人民应当考虑中国事务。汇丰银行想把尽可能多的铁路和矿场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孙中山受到中国所有爱国人士的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把他的事业进行到底，中国有可能抵挡住外国人的进攻。过去这种进攻主要依靠武器，现在则利用行贿收买的办法。要使这些办法奏效，必须把孙中山这样一类正直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排除掉。”

英国资本家后来确信用收买和腐蚀的办法无法除掉广州政府，就要求本国政府对广州政府使用武力。他们期望广州政府只代表中国社会人士中最左的一翼，因而用武力消灭广州政府不会受到其他中国人士的抵抗。在此之前，日本和美国对于英国想把它们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活动一事进行了抵制。英国人又企图通过大肆渲染广州政府实行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广州军队受俄国人指挥等

手法来缓和日本、美国的抵制。为了有利于发动进攻，英国资本家散布消息说，广州政府禁止英国和日本舰船开往广州，这就意味着撕毁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规定英国船只有沿岸航行自由的旧条约。正如中国通讯社所指出的那样，这则消息纯系捏造。但是，围绕着这条挑衅性的报道，英国报刊掀起了一场诽谤的狂热，我们似乎已经面临英国帝国主义对广州的军事进攻了。路透社的这次挑唆行动所以能够得逞，只不过是因为同广州的电讯联系要通过香港，英国人有意把中国电讯压了好几天。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英国政府未必还敢采取这一步骤。看来，英国政府还会遇到其他大国的反对。据东京电讯，《日本时报》就驳斥了英国报刊散布的关于广州政府禁止英国和日本舰船开往广州的消息，并且非常明确地宣称：“如果英国期望在对中国的新政策方面得到日本和美国的支持，那它必将失望……**使用武力，就意味着使全中国都翻腾起来。这对全面和平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欢迎《日本时报》的声明，并完全同意这家报纸对英国帝国主义卑劣挑唆行为后果的估计。中国的革命者也一定不会上英国人的圈套，并将记住：作为运动的左翼，至少应当带动这个运动的中间分子，以便能采用更有力的形式对英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

（乌传袞译）

英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社论）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国的事态在英国资产阶级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对于或多或少思考问题的人来说，中国事态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中国的事态证明，最近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变革，如中国工业化、形成自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被洗劫一空的中国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的事态还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成了这个民族运动的先锋，而城乡贫苦人民尽力支持无产阶级。关于这一点，连英国和美国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作者也已看清楚了。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把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而对之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仍然采用原先的政策必将导致震动世界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却不愿意也不可能认识这个简单的真理，因为这种思想意味着要放弃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曾经给英国带来巨大收益的政策。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不承认这种显而易见的真理，于是只好凭空臆造出前后毫无联系的论调。这类论调有人把它表达成这样的话，即“自从中国人进行了俄国的革命以后，俄国人就进行中国的革命。”不过这种思想上软弱无力的表现（一个面朝后方骑在马上骑士不可能不是软弱无力的），并不等于在行动上无所事事。从表面上看，这种行动只限于在报刊上发动攻击，以及发布一些毫无用处的照会。如果认为英国帝国主义就此不再采取其他措施那就太天真了。那么它能采取些什么措施呢？它面前有两种办法：

一是动用自已的武装力量从外部进行干涉；一是挑动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力量从内部进行干涉。第一种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第一，花费巨大；第二，这要求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第三，这样做可能导致远东较大的战争。《经济生活报》驻北京记者引用了英国在北京出版的《京津时报》8月27日的一篇文章。英国这份在远东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文章中甚至连封锁广州的做法也要求加以避免。封锁本身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帝国主义者只须派出几个师来作战就行了。但这样做却会导致同美国决裂，而苏联则可以在中国西北放开手脚干事。因此，看来进行干涉很不可能，那又为什么不支持广东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便英国帝国主义能借用中国的反革命来同中国革命作战？何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已经开始，这就是广州战线和上海战线。

广州战线上的军事行动是陈炯明发起的。陈炯明的行动目的在于使广州不能成为同香港竞争的中心。中国对外贸易的交易额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通过香港进行的。如果在广州建起一个深水轮船港口，并在汕头（位于香港北方的一个港湾内^①）与广州之间修筑一条铁路，那么广州将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关于这两项工程，广州政府都有所考虑。伯特兰·罗素在8月28日《新领袖》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摩根银行团同广州政府关于这方面的谈判。据最近的电讯报道，至今为止一直在广东省内活动的陈炯明将军已经率领游击队占领了汕头。汕头当局已经撤退。现在的问题是，广州政府年青的军队能否打败由英国人武装起来的陈炯明。广州政府进行作战的内部条件已有所改善，因为自广州政府开始向左转以来它已和农民建立了某些联系。毫无疑问，英国人现在必将扶植广州市内的右派分子起来活动（这些右派分子中为首的是因抵制英货而受到损失的商人）。

① 应是香港的东北方。——编译者注

同时英国人对于支持陈炯明已经不再有所顾忌，因为由于广州抵制英货，他们平均每天要损失四百万卢布，正要尽一切可能设法制止。

第二条战线在上海。上海英国工厂的罢工方兴未艾。抵制英国货的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使英国资产阶级遭受着重大的损失。然而损失最大的还在于英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柏林日报》驻上海记者保尔·舍费尔（不久前他曾任该报驻俄国记者，在那个职位上表现出具有理解复杂事物的才能）报导说，英国人深信抵制英货的时间不会很长，问题只在于英国人要有韧性。英国人错了。继续抵制英货的威胁在于中国商人可能因此寻求其他外国货源。但是怎样才能镇压住英勇的工人呢？工人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有学生的募捐和中国商人的自愿资助。中国商人所以这样做是迫于社会舆论，正如同俄国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以前对罢工工人的支持一样。为此，必须摧毁工人的指挥机关，也即掌握工人群众并不断诉诸社会舆论迫使商人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捐献款项的总工会。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雇用流氓暴徒捣毁总工会，但未能得逞。现在到了使用上海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了。这支武装力量就是张作霖的军队。不过至今为止，张作霖由于担心自己军队瓦解而一直不敢镇压上海的工人群众，尽管他心中蠢蠢欲动，极力想向英美资本家证明，他虽然同日本有所勾结，但也很愿意为他们效劳。在北方天津枪杀工人并未在他的军队中引起任何骚动，这使他下决心在上海也来冒一次险。被警察驱散的北京学生示威游行，还只是对新的上海事件的第一个反响。张作霖今后的行动将取决于中国其他中心城市对上海工人是否支持。

第三条战线，对当前来说也是决定性的战线，可能是北方战线。张作霖对于冯玉祥国民军增加编制和扩大影响极为不安。张作霖已经宣布，他决不容许竞争者的军队占领山东省。但是宣布是一回事，实现诺言又是一回事。张作霖的作战线从满洲一直延

伸到上海。他的军队约为二十至三十万人，要守住这样长的战线是太少了。这样的战线处处都会是薄弱点。如果现在张作霖决定发起进攻，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将进行第一次总会战。

英国人极力策动这一次总会战，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取得胜利，就意味着给即将于10月召开的关于关税和帝国主义者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的国际会议扫清了障碍。大家知道，这次会议是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召开的。英国人只准备作出最低限度的让步，因此前来参加会议未免忧心忡忡。他们只准备同意增加关税百分之二点五。（在这之前，只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和货价的百分之二点五作为国内运输税。）中国资产阶级则要求关税完全自主，以便他们在同外国工业品竞争时能拥有较好的条件。关于在华外国资本家的特权问题上，英国人不愿作任何让步。美国的打算是在会上只以对这些特权今后如何改革进行一番讨论为限。十分明显，在民族运动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召开这种会议，只会导致群众的情绪更加激进。因此，英国帝国主义需要使中国革命力量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从而使自己取得喘息机会，以便同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并建立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

最近几周可能对于今后几个月内事态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情況下今后几个月的作用将相当于若干年的斗争。

（乌传袞译）

广 州 和 香 港^①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И·格列尔

两地相距极近，海上航行只需几个小时。广州在亚州大陆上紧靠珠江入海口处，香港则位于珠江入海口对岸的峭壁重叠的海岛上。这两个迎面相向的城市，在各个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甚至相互敌对的。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还是特别的“王室”殖民地。这是说，香港直接隶属于“王室”，由“王室”任命拥有广泛权利和全权代表资格的总督。岛上英国人不多，不到八千人，为数近六十万的劳动居民全部是中国人。

在太平洋上很难找出另外一个地点，英国帝国主义的行动比在香港更加明目张胆，更加卑劣无耻。在香港，一小撮英国大资本家掌握着政权，以控制在总督手中的相当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为依靠，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但是，你只要乘船穿越分隔这两个城市的狭窄的水流——一道两面是碧绿青翠的高山峭壁和风景别致的海湾相间的别开生面的海上走廊，你就将置身于中国最革命的城市广州了。

这个城市的特点始终如一。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桀骜不驯，不听从北京指挥的南方中心。人民热爱自由，流动性很大，许多人是曾经迁居太平洋岛屿、荷属东印度、英属东印度和美洲

① 本文写于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起最近一次进攻之前。——《真理报》编辑部注

的华侨。

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由于孙中山的盛名和国民党的活动，广州的革命声望更加提高。但是，广州达到自己革命精神的高峰还是最近一年半的事。这一年半以来，国民党力求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政党，在新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广州国民党政府开始实际贯彻新的路线：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联合苏联；对内实行明确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州成了帝国主义者首先是香港特别憎恨的目标。用他们的话说，广州是“布尔什维克瘟疫的发源地”、“第二个莫斯科”，广州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匪帮”、“扼杀文明和文化的刽子手”、“莫斯科的代理人”等等。

事实上，国民党和广州政府，除了外部的困难之外，是十分吃力地、极其缓慢地、犹豫不定地克服了党内和领导层很大一部份人的阻挠才得以贯彻执行成为该党历史转折点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党的队伍内部动摇不定和存在阻力，好几个月以来，无论在税收政策方面还是在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例如，在1924年5月初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许多代表懊丧地指出，人们丝毫也感觉不到现在当政的是国民革命政府。他们还举出大量突出的事实作为例证。一位工人代表简洁地归纳说：“在我们广州，现在同以前一样，工人一个钱也不值，而商人主宰一切。”这句话赢得了全会场的赞同。大约也就在这段时间，政府竟然容许地主富农匪徒捣毁了在广东省成立的第一个农会。

所谓“纸老虎”（由商人子弟、店员、流氓组成的装备精良的商人军队，计一万五千人）企图推翻政府的叛乱，以及广州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危急时刻给予政府的积极援助，导致党的队伍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并且终于迫使广州政府“实现自决”，确定今后究竟依靠什么人。左派国民党人占了上风，国民党和政

府随即果真实行了依靠工人、农民的明确方针，支持农会反对“豪绅”（地主）和大土地出租者，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实行向有产阶层征税的税收政策。

在另外两个重大问题上左翼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第一个是对外政策方针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似乎已经解决。但那只不过是一纸决议。同时，1924年夏季正是俄中条约准备和酿酝的时期。右派国民党人在自己的《新共和报》上疯狂攻击俄国，并不断向美国暗送秋波。最后，接近俄国的方针即联合苏联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右派分子愈来愈成为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毫无疑问过去怕、现在也怕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实质上这就是他们敌视同苏联联合而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友谊”的根源。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取胜的仍是左派。在军队中，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特别紧密。黄埔军校（顺便提及，这个学校在最近的一些事件中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以及其他部队的政治工作，大都是由共产党人进行的。政治工作所以特别必不可少，还因为每一支军队都是由某一邻省（湖南、广西、云南）的官兵组成，同时又由各该省“自己”的将领担任指挥。当时，中国国内“地方主义”仍然十分盛行，各个将领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对待广州政府都采取变化莫测的政策，这些军队均依靠非法收入维持，因而“自行其是”，财政上各自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特别需要。只有政治工作才能把这些雇佣军队变成为革命政府手中多少有些觉悟而且稍微可靠一些的工具。

除了军队工作外，农民工作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在一年时间内，由于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民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吸收了近二十五万名成员。农会常常手执武器，在广州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同装备精良的广东地主、土

地出租者和富农的军队作战。在战斗中，农会往往取胜。

农会提出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减少地租。这一点也达到了。在某些地方，地租减低了百分之四十。

与此同时，广州市内的工人组织也得到巩固。广州这个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大的工厂。你在广州看不到工厂的烟囱。最大的企业是有一千五百名工人的兵工厂和一个三百人的机器厂。市内有成千上万的小作坊，数以万计的手工业者、半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组织从结构上来说也是与工业的这种状况和小手工业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正在从同业公会和行会逐步转为比较合理的现代工会组织。但不管形式如何，目前工人组织还只是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近一年来，无论市内或农村，都建立起了大量群众组织。它们现在已成为广州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的斗争中的依靠力量和政治支柱。

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的五一节游行，就可以看出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展。去年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学生，工人群众只是消极地跟随走在先头的学生队伍行进。今年就不同了。工人明确无疑地成了积极的因素。他们走在前面，高喊口号，有的口号十分具体，不只是“打倒不平等条约！”他们经过华丽的海关大厦时呼喊道：“交出海关！海关是我们的！”途经沙面（外国人的“租界区”）时，工人高喊：“交出沙面！沙面是我们的！这里是中国！”学生们则懒散地、好象十分委屈似地尾随在队伍后面。表现积极的大量军队参加使五一游行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沙面的外国人敢怒而不敢言，注视着事态发展，极其不安。

5月初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①和区农民代表大

^① 此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编译者注

会①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两个会上发言的都是真正的工人和农民（一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他们的发言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两个大会的口号都是：农民、工人、革命士兵联合起来。

广州这个全中国最革命的，已拥有以联合苏联为方针的国民革命政府的城市，这个工人运动自由发展和工农革命军队正在建立起来的城市，情况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的香港对广州极端仇视。而香港的中国工人则对于自己那些颐指气使的压迫者无比痛恨，以期待的心情注视着广州并与之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是香港对上海事件不仅表示同情，而且以实际行动予以声援，这是不奇怪的。靠近广州是一个重要原因。

香港罢工②是上海罢工的直接继续，但与上海罢工又有重大区别。香港的罢工完全是政治性的罢工，纯粹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和方法进行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表现。

罢工是由全国工会联合会③执行委员会领导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是在今年5月初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才建立起来的。依靠广州人民群众和广州政府的积极支持，全国工会联合会执委会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不应忘记，香港罢工是在一个堪称专制国家的小岛上进行的。这个岛上的一切军政权力都集中在专横独裁的英国总督手中。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香港罢工更多的是损害了英国资本家的利益，不象上海罢工使日本受到直接的损失。另外，英国人还想以香港作为实例来证明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方法镇压暴乱。在上

① 此指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编译者注

② 指1925年6月爆发的香港工人大罢工，它同广州工人罢工一起，又称“省港工人大罢工”。——编译者注

③ 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译者注

海还有别的国家“碍手碍脚”，而香港“纯粹”是英国人的天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行动更加不受拘束。但是，尽管香港当局毫无顾忌地采用了一切手段——大规模驱逐出境、刑讯拷打、枪杀等等，尽管他们从一切可能的地方雇用工贼——从菲律宾、邻近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尽管他们甚至动用了白俄分子，在广州工会领导下，香港罢工发展成总同盟罢工，遍及一切雇佣劳动部门。

斗争开展两个月以后，香港经济濒临崩溃。作为香港命脉的英国航运全部瘫痪。香港发生大量破产事件。资本最雄厚的公司也感到困难重重，开始进行裁减。相反，工人的阵线却和三个月以前一样，昂首挺胸，巍然屹立。无论是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凯被卑劣地暗杀，还是在广州策划的险恶阴谋，都不能丝毫动摇工人的阵线。左派主要依靠优秀的部队，牢牢地控制着政权。

看到自己独力镇压罢工已不可能，香港当局惊慌失措，接二连三地向伦敦发出电报，要求立即对广州进行武装干涉，镇压在广州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匪帮”，因为他们正在“毁灭文明和文化”，正在“毁灭中国”等等。

但是伦敦却“并不起劲”。虽然从印度调了一批精锐的军队到香港，还从马耳他开来一条载有水上飞机的军舰，但伦敦并没有积极行动。更有甚者，看来伦敦正准备“背叛”，它一只手准备进行干涉，另一只手却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

香港总督雷金纳德·斯蒂布斯先生的被撤换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是对“煽动者”建立刑讯拷打而闻名于世的，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会使帝国主义死硬分子欣喜若狂。工人代表根本不愿与之打交道的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已被调离香港前往牙买加岛。

英国报刊唱出的新调门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两个多月以来，英国报刊满篇都是威胁性的言论，要求彻底投降、引渡学生、对“煽动者”判处死刑等等。现在情况已经改变。还在8月6日，

接近殖民地部的伦敦周刊《中国电讯快报》在谈到中国事件时郁郁不乐地写道：“当外交家们无休止地开会商议之时，抵制运动已使我们正常的货物流通量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这同一家报纸在8月27日的明显受人指使而写的一篇社论中说道：“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存在实际困难，并将在最短期间内将其消除。应当承认，条约已经过时，应予修订，治外法权的原则对于新的中国来说也应进行修改。”

请看，伦敦有影响的人士头脑变得多么清醒！

保守党政府“在灵魂深处”自然站在香港死硬分子一边。但是鉴于英国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国外和中国的形势，英国未必敢于对广州进行干涉。同广州作战，这将意味着向全世界挑战。

凡此种种都说明，英国同日本一样，必然让步，而香港工人同上海工人一样，即使不能达到彻底胜利，也必将取得局部的胜利。

广州必然战胜香港，如果从纯粹政治的意义上说，这句话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中国当前事态的发展。

（乌传袞译）

中国、关税会议和列强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M·加尔科维奇

中国政府在财政上困难重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原因在于中国的省份各自为政，同帝国主义列强又签订了奴役性的条约。这些奴役性条约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丧失关了税的自主权：所有海关都掌握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按照1918年签订的条约，中国有权按货物所值抽取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统一关税，其中包括了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作为缴付各省行政部门的税收）。实际上外国人支付的还要少些。

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涉及到中国的关税税率，同意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补加税收。不过这个决定要在专门的关税会议讨论之后才能生效。召开关税会议的日期原定最迟为1925年8月。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爆发了1925年事件^①，列强必然还要把会议日期拖延下去。为了转移中国人民的注意力，现在列强又迫不及待地急于召开这次会议了，并预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开始工作。

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补加税额应用于中国政府的直接需要。直到现在为止，全部关税收入都交给外国人用于抵偿中国的国家债务。在偿付债务之前，关税收入先存入汇丰银行，由该行支付。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各大国批准草签的1921—1922年

^① 指1925年的“五卅”运动。——编译者注

协议书之后应立即召开关税会议。当然，不出所料，列强都不急于批准协议书，以便借此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例如，法国就是在中国同意以金法郎支付对法国的庚子赔款之后才同意召开关税会议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事态发展迫使列强不得不仓促召开关税会议。它们的目的在于用提高税率的泛泛之谈来麻痹当前的运动，使其脱离主要方向，对运动加以分化，并使中国国内的反动派能重整旗鼓，并最后将这一运动镇压下去。

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必将在两个方面进行唇枪舌剑的争斗。第一，所有列强联合起来试图平息中国人的怒气；第二，在会上列强之间的分歧必将暴露出来。

在中国广大社会人士中，要求全面关税自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了。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王正廷也明白无误地主张全面关税自主。固然，报刊和北京政府官方代表只不过要求把税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点五，但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可能会更为强硬。至于各列强之间，则各自将为加强本国在中国的势力而进行斗争。

关于几个主要大国同中国的相互关系，值得简要地加以说明。美国表面上似乎是爱好和平的，差不多所有美国报刊都大量登载论述必须改善现今中国生活条件的言论和文章。日本由几个重要活动家出面也提出应对中国实施友好的政策。最为有趣的是英国的观点表面上也发生了变化。一直连篇累牍恶毒攻击中国和“莫斯科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党的顶梁柱《泰晤士报》在9月24日论述中国事态的社论中突然使用起十分友善的语言。这家报纸竟最早承认，“自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本世纪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从世界大战以来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文章结尾重复了张伯伦关于“统一独立之中国”的话。不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说到英国实业界人士关于当前关税会议的任务的言论。按照他们的意见，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两条：取消

厘金（即各省的税卡）和处理尚无保证的贷款。从对“独立”中国的“关心”出发，英国实业界人士正在为中国准备一个处理无保证贷款这样的意外赠品。可以断定，处理贷款时的利息支付仍将从关税收入中开支，尽管华盛顿会议决定关税补加额应用于中国政府的需要。

第二个利害攸关的国家日本将如何对待即将召开的关税会议呢？日本打算在会议上提出完全针对英国并大大损害英国利益的要求。这指的是日本政府各部代表开会拟定并于8月18日交由《朝日新闻》公布的要求中的第三点。这一条声称：“横滨正金银行应列为分别储存关税收入的银行之一。”这就是说，在1924年中国进出口额中占第二位的日本将从关税收入中分去不少于英国的一笔数目。而在日本国内，甚至有人谈到最好把海关管理权从英国人手中转交给日本人。日方要求的第六点是上述第三点的继续，并提出：“海关日籍职员的人数应予增加。”发行量很大的《朝日新闻》在谈到中国人关于关税自主的要求时写道：“日本权威人士始终认为，实行关税自主是绝对不可能的”。

准备参加关税会议的第三个大国是美国。美国报刊上阐述中国事态的文章比比皆是，而且都对中国抱着极其同情的观点。不过，对于中国发生的事件，居住中国的美国实业家同住在本国的美国人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别。居住中国的美国人坚持强硬方针，而住在本国的美国人则坚持海约翰主义^①和保证中国独立的政策。直到最近，华盛顿还在这两种意见之间动摇不定。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宣布自己对中国的态度时，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式代表国务卿凯洛格发表的演说相当谨慎。但是，必须指出，正是凯洛格在7月16日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召开关税会议，必须组织治外法权委员会和调查上海事

① 海约翰主义即远东门户开放主义。——原作者注

件^①委员会。其他大国包括英国在内表示同意美国的这一“愿望”。看来，似乎美、英之间就这个问题已经取得和睦友好的关系，而事实上这是美国外交机构对英国的又一次让步。

关于美国为自己的“近亲国家”又准备了一份意外的赠品这一点，从不久前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就可以得到证明。9月5日，《密勒氏评论报》刊载了一张参加巴尔的摩会议的教授、法学家和传教士的名单。如果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美国不仅每一个教授或传教士，甚至许多大学都同银行团有联系，那就可以看清是谁在上述法学家和“基督的仆人”的崇高的会议后面进行操纵了。美国也完全有可能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税自主的要求，从而使各大国处于难堪的地位，以求自己今后在中国站稳脚跟。

为了全面认识这次会议，还必须对法国说上几句。法国一直不让中国召开关税会议，因为它要求中国以金法郎支付它那一份庚子赔款。直到1925年2月，中国和法国才结束了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商谈。中国作了让步。而从这时起，法国才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中国政府的法国顾问帕图先生就这次会议发表声明说：“中国毫无疑问有权收回关税自主权。但我确信，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后，中国必然要实行级差税率，即保护本国工业的税率制度，那样海关的收入不会增加，反而必然减少。”（9月20日《红黑》杂志）

反对发展本地工业的不只是帕图一人，他不过是比别人更加坦率而已。帕图一一列举了似乎实现关税自主后必将降临到中国商人和政府头上的所有灾难之后，得出结论说：“比较了所有能够得到的资料之后，我的结论是：对于政府来说，最有利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统一税率，而对奢侈品则可由海关另行按价

① 指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编译者注

增收。”

关税会议能否导致实现关税自主呢？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材料，中国政府的要求可归纳为以下内容：各大国同意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关税自主。第一阶段为期二年，税率提高百分之二点五，与此同时废除厘金制度。此后四年内实行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统一税率。到第三阶段（时间为十至十五年），中国有权在必要时提高税率。第四阶段，实行完全的关税自主。毫无疑问，对于这种推迟实行关税自主的办法，外国人必将欣然同意。不过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初步建议是完全无视社会舆论，是受到外国人强大压力的结果。

总之，关税会议最近期内即将举行。无论在中国的官方人员之间，还是在各大国之间，就日程问题都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外交季刊》十月号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正确的。他在文章末尾写道：“中国工业混乱和学生进行煽动是有深刻原因的，这就是民族运动。这样的民族运动既不会满足于百分之二点五的关税补加额，甚至也不会满足于组织专门的取消治外法权调查委员会。”我们要补充说，这样的运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繁荣的中国（按照张伯伦的正确表述），但是既不能有英国的海关税务司，也不能有法国人帕图的意见，甚至也不需要美国的传教士。

（乌传袞译）

处于重大事件前夜的中国（社论）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中国又一次面临孕育着严重后果的重大事件。

初战已经揭开，军事冲突的第一炮业已打响。另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正在爆发，这次战争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前各种力量的布局。

粗略地说，中国当前存在**三种**主要的力量，它们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中国局势的变化。这三种力量是：英美的势力；日本的势力；民族解放的力量。前两种力量由于去年直系败于张作霖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平衡对峙状态。于是民族解放力量得以登上广阔的中国舞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规模和影响之大都远非昔比。

此后，日本的势力通过张作霖又渐次得以加强和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壮大，终于于今年5月至8月期间在上海、天津、汉口和其他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形成一个规模和威力都空前强大的宏伟运动。这一场革命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英国的势力，其次则是针对日本。这自然引起英国资本家的严重不安。他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在中国的主要地盘能否保存下来，因而深感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刚刚过去的上海事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使用军事力量会造成什么结果。英国资本家已经不敢再这样做了。他们一方面让自己的傀儡陈炯明出面反对革命的广州政府，一方面又先是指使扼杀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刽子

手、本性极为反动的张作霖，随之又策动自己的老朋友——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依次出场。在这之前，直系军阀在华中战事平静的情况下得到休整恢复，已经积聚了一些兵力。

这时，军事实力有所增长而本质极其反动的张作霖，得到日本和其他在华帝国主义者的怂恿和默许占领了上海，恰逢上海革命运动高涨形将危及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和“成就”。他鉴于自己兵力的增长，便扮演起落到他身上的中国宪兵的角色，解散工会，用武力镇压罢工，等等。狡兔死，走狗烹。**张作霖所起的对英国有利的宪兵的作用已经完成**，而且他的势力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的势力已经过于庞大，应当设法加以剪除了。于是，孙传芳反对奉军的行动随即发生。杨宇霆的军队先是放弃了上海，随之又把能够控制整个长江一带的战略重镇南京丢弃不顾。

同去年9月张作霖屡操胜券一样，目前的局势又突然对他极端不利。随着他的军队不断向南推进，他的将领们占领南方省份之后势在必然地对他反戈相向。这是因为南方各省的经济情况和政治传统和满洲迥然不同，不象满洲那样早已和张作霖政权，和日本的经济势力融为一体了。

当地的三个师拒绝和孙传芳作战以及孙传芳占领南京，使张作霖在南方的战线发生动荡。他不得不把作战的重心转到北方。结果，张作霖的军队仓促退往浦口（南京以北），看来还要继续后退。

十分可能的是，国民军将在最近期间参加对张作霖作战。自然，国民军参战的出发点同吴佩孚及其所属将领完全不同。张作霖作为中国宪兵的作用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而在上海、天津及其他城市最近的革命事件中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张作霖的势力如果继续扩大，不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会遭到威胁，甚至连开展这类运动的可能性也将消失。最短期间内，国民军的存在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张作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消灭国民军和

夺占它们所控制的省份。这一切使国民军十分警惕，乃至不仅不帮助张作霖，还要帮助别人将他击溃。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在华北的处境更加恶化，因而宣布他主张和平，不愿再继续作战。**其实，他是愿意作战的，只不过希望逐个地击溃敌人，而不是同时和所有的敌人作战。**

要预见到今后中国事态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现在北京中央政府对电讯严格进行检查，力求阻止重要的消息泄漏出去。有一点可以肯定：局势极为严重，中国面临一场新的震动，新的国内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不过这一场国内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相当数量的实际力量是在民族解放的口号下参加这一场国内战争的。而民族解放的口号已经得到中国人民优秀分子的普遍承认和支持。

这种力量十分强大，完全能够取得胜利。固然，如果这支力量沿着革命的方向继续进行聚集，它们获胜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但是就当前它们从中国革命运动中取得的经验和对军队进行的政治教育来看，希望已经很大。

由于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军已获得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仅仅把张作霖打回长城以北这一个事实本身，对于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自然，国民军以后还要同直系作战，不过那已是以后的事，因为同直系还可能达成某些协议，而同张作霖达成协议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国民军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中国将要经历一个最为黑暗的反动时期。我们从张作霖的将领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从陈炯明在汕头枪杀工人的暴行，以及从其他一些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某些迹象。

因此，我们的社会舆论必须密切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从道义上支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国民军。因为目前固然是在

两个反对民族革命的集团——直奉之间进行斗争，但在极短的时间内这场斗争可能发展成为民族解放力量同中国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而这将要决定双方的命运。

（乌传衰译）

中国的关键时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谢苗诺夫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明，事态正在发生逆转。

初战失利后向苏州撤退并准备进行顽强抵抗的张作霖军队又遭受了新的更加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次失败发生在当前最重要的山东方向和通往张作霖主要基地的济南府、天津、山海关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必须定下相应的决心，并着手加以贯彻。关于张作霖军队的骑兵团占领热河三公兴市（位于冯玉祥的侧翼）时发生最初的小规模冲突的消息——消息固然是断断续续的——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消息表明，国民军和张作霖之间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已经开始，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事态进入了主要的阶段——民族革命力量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的阶段**。民族力量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的势力之间的第一个严重冲突已经发生。

路透社从中国发出的关于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已直接进入战斗的报道证实了上述消息。根据这一篇报道，国民军第二军正迅速向济南府（山东省的主要城市）前进，目前已经逼近该市。

国民军直接向张作霖开战这一事实十分重要。民族解放力量加入了实际作战，而开战的时机恰好能保证取得**最大的成功**。

从选择开战的时机来看，形势确定无疑对国民军有利。

目前，张作霖的北军士气低落，相当一部分部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倒向张作霖的敌人一边。当冯玉祥把军队开往主要战场

北京、天津一带时，原先张作霖集结在山海关附近的一个突击集团被迫分散了兵力。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首先是在国民军和张作霖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事。张作霖在华北的扩张活动有可能停止下来。由于国民军必须在两个方向作战，或者说必须考虑到两个方向，作战的进度必将有所减缓，但不致于完全削弱民族解放力量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局势颇为严重。他们不得不重新修改自己对中国相互作战的各种军事集团的态度。他们有可能在这条重要的战线采取某种联合行动。

张作霖的失败将使日本大量丧失去年夺得的地盘，因此日本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张作霖将被赶出华北。从长远看问题要大得多：这涉及民族解放力量同整个中国反动派的斗争，因而这是民族解放力量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斗争。而目前是张作霖基地的满洲，当他一旦在华北失败之后将成为民族解放力量最后一个战场。换句话说，民族解放力量一参加实际作战，问题就涉及同在华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哪一个地方出现。对于日本来说，丧失了满洲的势力不亚于经受一场1923年地震那样的灾祸，而且这种状况将使日本局限于狭小的海岛范围之内，而这不啻是一种大灾难。因此，日本面对这样的前景必然要采取最激烈的措施防止张作霖遭到彻底的失败。很短时期以后，我们必然会听到日本军阀声嘶力竭地叫嚣必须“拯救在华日本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一旦国民军获得胜利，英国的利益也将受到相当的损害，固然在程度上比日本会轻一些，因为至少一开始英国在对它最为重要的长江流域还可以通过在那里仍占统治地位的直系军阀保持住自己的势力。但是，尽管如此，国民军在华北的胜利，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南方的胜利，必然会使华中一带的革命力量发展起

来，从而给予英国在华中的势力以相当沉重的打击。

由此可见，一旦国民军获得胜利，在中国最为得势的两个帝国主义强国便将陷入极端严重的境地。因此，十分自然，它们必将千方百计改变或至少缓和当前的局势。

十分可能的是，它们将设法对国民军施加影响（用外交方式）。“外国人的财产和生命”看来可能会遭到威胁，从而将出现用武装力量保护这些外国人的“必然性”。外国人在中国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惜最近以来它们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

我们的社会舆论一定要密切注视中国事态的变化，因为在当前斗争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决定中国革命斗争今后的进程。

局势十分复杂，情况极其严重。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民族革命力量在华北的胜利，将使目前尚受到压抑的全国的革命潜力大大发展起来。相反，如果民族革命力量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的进度将要大大放慢。

（乌传袞译）

中 国 和 十 月 革 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胡汉民^①

俄国十月革命使我们看到，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战斗的统一战线，推翻了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肃清了所有的反革命分子。经过顽强的斗争，一个新的俄国诞生了。国民经济在崭新的社会基础上渐次恢复。俄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俄国革命有力地证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自由，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无产阶级是革命战线的真正核心。

中国工人是我国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正在加入革命政党，以求为民族革命而奋斗。这一批抱定牺牲精神的人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进战士。当革命党同军阀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时，工人们竭尽全力帮助革命者，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后来，他们又在上海同制造血腥屠杀的罪魁祸首英勇搏斗，在广州同英国人英勇斗争，使全世界为之瞩目。广州国民政府在同反革命势力不断作战中始终得到工人们最有力的支援，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工人们一致宣称，国民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将竭尽全力予以支持。

中国的农民在政治上尚未觉醒，表现消极。不过，对于农民

^① 原文署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胡汉民”。——编译者注

的情绪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由于中国工商业还十分年轻，中国的国家预算差不多全部都直接或间接地靠农民负担。工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是自己的压迫者，但农民所受军队官兵的压迫更为严重。他们因此也仿效工人的榜样，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建立起自己坚强有力的组织，以配合国民革命事业。当革命党在广东同自北方进犯的军阀部队作战时，当革命党在东江一带进行征讨（讨伐陈炯明）和镇压其他反革命活动时，农民和工人一样全力支援革命军队，从而使敌人遭到溃败。

中国先进的工人、农民派出自己的代表前来苏联，以便同国际工农组织建立联系。由于采取了这一步骤，中国工人、农民对于革命的整个进程更加清楚，同帝国主义继续作斗争的勇气也大为增加。因此，我坚决相信：在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中，象克伦斯基一类公开或暗地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分子绝不会有立足之地。没有这一类分子插手，革命必将更加深刻和有效。仅仅因为中国工农组织可以利用胜利的十月革命的经验这一点，我对此即坚信不移。

中国革命有光辉的榜样可以仿效，因此能够开展正确无误的组织工作。在孙中山之前^①，中国曾有一个革命组织，称作“同盟会”。这个组织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运动自1900年开始发展^②，其结果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领袖孙中山的第一个成就。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孙中山试图用各族平等的联盟取代一族的专政，用民权主义取代专制政治，并且把小手工业者的国民经济提高为国家控制的高度发展的大工业。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最后只好和保皇派的残余分子即反革命势力妥协。当时的军阀还没有多大实力，但革命党人过于温良恭俭让，竟停止了

①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05年。——编译者注

革命斗争，放弃了自己胜利的成果。原因在于革命党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既不了解自身的责任，又不明确革命的目的，而且革命组织本身十分原始，力量薄弱。既没有纪律，各个党员又没有统一的思想和一致的行动。统一战线也没有形成。达成和议后政权转入袁世凯将军手中。广大群众渴望和平，对于连年不断的战争恐惧已极。因此，连一些继续对党忠诚并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也倾向于议和。可以说，全党都主张和平。

当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和党内同志一起发起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阻止其向帝国主义者大量贷款。可惜的是孙中山的合作者行动迟缓，推诿犹豫。广东的政权掌握在陈炯明手中，他对自己的部下说：“南北战争必使两败俱伤，那时我再来收渔翁之利。”现在他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在为众人所不齿的情况下，被袁世凯击溃。两次失败充分说明，党员并不了解党的任务和目标，党内既没有坚强的组织，也没有严格的纪律。

同盟会于1912——1913年间改组为国民党时，许多官僚和政客，即许多不革命的分子，加入了党。这是革命党走向衰败的时期。孙中山被选为五人组成的主席团的成员。^①他并不特别关心党的事务。各个阶层和各个阶级的分子加入了这个推翻满清王朝的党。知识分子和小资本家逐渐在党内占据了优势。这些阶层仍然按照旧朝代的传统习惯生活，而它们的发展又受到欧美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影响。只要一实施稍微严格一些的纪律，他们就埋怨生活过于机械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被人指责为专制。因此，党的决议有的党员从来不贯彻执行。绝大多数党员对党的事业漠不关心。即使他们为党做了些什么，那也只是从个人打算出发，冒个人的风险，个人承担责任，而绝不是

^① 原文如此。当时国民党并未设立主席团。——编译者注

根据党的指示。

直到现在，在苏联十月革命取得光辉成就之后，中国革命党人才真正认识到了在革命中领导群众的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他们看到，只有党能够捍卫群众的利益，能够成为群众的领袖和导师，只有作为先进革命战士的党才能帮助群众夺得政权。他们现在看到，党不是私人朋友的简单聚集，而是由铁的纪律连结在一起的团结统一的组织。1923年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组织。草率敷衍和萎靡不振的气氛为生动活泼的活动所代替。党和党员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党员不再是偶而从事一些工作而是经常性地开展活动了。党清洗了执掌政权的反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党员。纪律加强了，原先对于不服从党的指示的党员的容忍态度一扫而空。工人、农民迅速接受了我们党的革命口号。尽管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一再造谣中伤和恶意诽谤，工人和农民的战斗联盟愈来愈紧密了。

中国辛亥革命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一支体现党的精神的军队。同反革命分子袁世凯举行和谈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军队拒绝作战，已经没有别的出路。那时站在革命旗帜下的有十七个师，其中比较有战斗力的是广州和浙江的军队，但浙江的部队拒绝继续作战。士兵不断地要求发给薪饷和军需品。他们一再威胁说要背叛我们和进行抢劫。第二次革命期间，军队的情况更糟，他们和政治完全背道而驰，革命也因而失败。

自从十月革命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建立了红军以后，革命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月革命不仅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且赋予整个军事学以新的生命。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对士兵不只进行军事训练，而且进行政治教育。每一名士兵在政治上都变得成熟起来了，开始理解革命的目标。党有可能领导军队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严格强调军职官员无权过问政治。孙中山与之相反。他

再说：“你们士兵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倒向反革命的中国知

识分子说，“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对此可以回答说，只有建立了革命军队，革命党才有坚实的基础。我们按照俄国的榜样建立了有觉悟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虽然还很年轻，建立至今只有两年，但已经两次击败了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还打败过其他反革命军队。每次作战，敌人的兵力都超过两倍至四倍，但都被击溃或打退。每一名士兵，和真正的红军战士一样，满怀激情，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士兵同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农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把他们称作自己的军队、亲人。凡这支军队经过的村庄，居民们都更加容易接受党的宣传。

海丰地区本来是陈炯明的家乡。当我们的军队把他从那里赶走之后，当地的农会成了强有力的革命组织。现在我们的军队不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而且同时还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如果不是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从哪里能够获得建立这种军队的榜样呢？我毫不怀疑，建立起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其意义绝不亚于国民党改组。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事实，但从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我们恰如一个农民，一方面为丰收而喜悦万分，一方面又考虑当前的农活，生怕有所疏忽错漏。在庆祝十月革命八周年的日子里，这就是我首先想到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肢体是与全身不可分离的。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参加莫斯科的庆祝活动，感到十分喜悦。我们的喜悦心情和俄国同志完全一样，而不是革命者的人则对此截然相反。在广州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俄国革命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如此密切？我回答说：“如果你是个革命者，你就会懂得这一点。”我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来的，我代表我们党、政府和革命群众向苏联的工人和农民表示祝贺。

（乌传袞译）

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社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最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暂时沉寂，没有欺骗得了任何人。谁都知道，这一番“沉寂”正是双方聚集力量准备下一步决战的时期，而下一步的决战必将最后决定交战双方的最后结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我们苏联，人们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签订的临时协议，以及看待临时执政向交战双方发出的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呼吁。任何人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次“和议”的真正含义，任何人也不曾认为中国事态的继续发展会离开中国民族解放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一条主线。

还在最近的事件刚刚发生之时，《真理报》就曾指出：在目前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国民军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全中国反动势力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局部的调整只能暂时延缓事态的发展，而目的还在于进一步积聚力量，以便尔后进行决战并夺取胜利。

这段时间内，直系军阀经历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瓦解过程：一名有影响的将领开始脱离吴佩孚而同国民军保持接触，不仅商谈如何共同反对张作霖，而且研究如何反对吴佩孚。这就是说，反对所有军阀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之中。

张作霖的军队经过两次惨败后一再后退，并且正在瓦解。由内部原因造成的张作霖军队的瓦解，使国民军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张作霖的处境十分不利，他必须设法摆脱困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停止军事行动。日本也怂恿张作霖停战，因为日本看到了自己代理人所处的不利地位，也认识到在这种局势下事态进一步发展将会威胁张作霖的存在，因而也将威胁日本在满洲的统治地位。日本还意识到，发展下去战事可能甚至一定会转移到中国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满洲境内，也即转入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基地。所有这一切使张作霖改唱起和解的调子，寻求长时间的喘息机会，以便积聚力量，制止军队瓦解的过程，进而卷土重来，再同国民军作战。

但是，战事的发展使张作霖的想法落空了。国民军第二军继续进攻，逐渐逼近直隶省境，不断消灭张作霖的军队。张作霖的军队纷纷倒戈转向国民军。其瓦解速度之快，任何坚决的措施也无法制止。张作霖在天津、山海关一线集中了最精锐的部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突击作战集团，以便一方面阻止国民军进入满洲，一方面对它们造成经常性的威胁。但是发生了一件出乎张作霖意料的事：由最优秀的将领指挥的这一突击作战集团迅速瓦解，实际上转到了国民军方面。张作霖的一名最优秀的将军^①在最后关头拒绝服从张作霖的命令，现在正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向沈阳进攻。目前与之对峙的是张作相的部队，另有张作霖的一些兵力将予以加强。但是这些军队面对恶劣榜样的经常影响，张作霖对他们又怎能信任不疑呢？

不应忘记，满洲的精锐部队均已开赴前线，留下来的部队本来就使张作霖放心不下。现在，最好的部队正在逐渐转向国民军，当然不可能忠实地保卫满洲。

由此可见，形势对张作霖不利。如果张作霖只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用中国报纸的话说，“张作霖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① 指郭松龄将军。——编译者注

但是，日本无疑将要为保存其在满洲的势力而拼死努力。**自然，日本为了左右满洲的局势，或至少为了缓和当前的困难局面，必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过，不能把张作霖的部将叛变投敌的作用看得过重。固然从军事观点来说，这种叛变大大瓦解了张作霖的部队，实际上使战线暴露，给张作霖造成困难的局面。但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行动有可能使奉系中的少壮派（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亲日的）在满洲掌权。此外，满洲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满洲的经济是由日本的势力建设起来的。满洲的这种形势必将对新的当权集团（如果出现这种变化的话）发生影响。上述新的力量可能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它们同日本的利益可能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日本可能缓和满洲目前的形势。

因此，中国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完全独特的意义。这些事件的进程本身说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极大地壮大和巩固，而就在去年这一运动只能以广东作为自己唯一的基地。事态的迅速发展说明，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力量强大，而且具有极大的深度。这些事件已经登上了全中国的舞台，革命运动已经汇合为群众性的运动，开始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扫除反动势力。

现在，为数不多的中国反动派只能求救于站在自己背后的国际帝国主义。考虑到中国最近的事态，帝国主义者应能得出一定的结论：或者适应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要求，或者动用自己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镇压这一运动。

但是，在上一世纪中叶能够做到的事，甚至在本世纪初能够做到的事，现在已经不大可能做到了。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壮大到这样的程度，致使要镇压这一场运动，帝国主义者必须动用极大的力量。这不是德鲁兹人的纷争，也不是叙利亚境内的作战，而是一个具有众多人口和强大力量的四万万人民的斗争，而且他们已经拥有数以十万计的民族军队。**这样的军队不仅存**

在，而且正在不断战胜敌人。

尽管障碍重重，困难极大，中国的事态仍在发展，将在极大程度上改变远东的形势，并进而改变全世界的形势。我们再一次号召我们苏联的劳动人民密切注视事态的进程。在中国的事态中，已经可以听到遥远的世界革命的声音。

(乌传衰译)

胡汉民谈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①

——反对恶毒诽谤，反对日本干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和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胡汉民的到达莫斯科和他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国外报刊，特别是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出版的报纸的不少议论。为了阻碍中苏两国革命力量接近，这些报纸造谣说，胡汉民在莫斯科受到当局的监视。胡汉民在《真理报》和其他苏联报刊上已经多次驳斥了这种无耻的谰言。但是，鉴于诽谤并未停止，胡汉民在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就这种恶毒的诽谤表示了自己的愤慨。在致北京国民党活动家李大钊的电报中，胡汉民写道：

“我又听到一些谣言，说我在莫斯科受到当局的监视。帝国主义分子的毒舌依然在喋喋不休。但是，须知黑白既不能混淆，那么，肆意歪曲在全世界注意中心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也是荒谬可笑的。我到处受到热情接待，我会见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在大会上讲话。”

胡汉民在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自己对帝国主义分子种种阴谋诡计的愤慨，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满州加紧侵略活动。胡汉民说：“日本人企图用他们必须保护自己在满州的‘权利’这一点来证明他们的干涉是正当的。但是，这算什么权利？他们是怎样获得这种权利的？难道不是采取强迫中国人民接受不平等条约

^① 这是《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报道。——编译者注

的手段吗？”胡汉民接着说：“日本人支持张作霖，亲自在中国制造骚乱，以便建立他们所需要的‘秩序’。为什么——胡汉民问道，——苏联公民以及德国公民在中国不需要什么特别保护，为什么他们没有遇到中国居民的敌视？这正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以削弱中国主权，谋取特权的手段来寻求保护。但是，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越是更多地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就越是更大的力量去废除它。”

在回答《真理报》记者关于北京新政府将如何组成的问题时，胡汉民说，新政府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方案。至于外传国民党员将参加新政府一事，胡汉民认为，这些传说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想参加拟议中的联合政府，而是指其他政治派系想吸收国民党人参加，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参加也有安福系（亲日反动派）参加的政府。

在谈话结束时，胡汉民指出，广州政府的局势已经大大巩固了。它得到农民和工人，甚至商人的积极支持。商人们在确信广州政府得到巩固，并有能力维持秩序以后，就改变了原先的立场。香港（与广州相邻的英租地）的代理人恐吓广州商人说，广州政府要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国民党充分地考虑到在目前发展阶段中国的客观条件。

（章任贤译）

对中国最近事态的评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К·拉狄克

苏联和张作霖因中东铁路而发生的冲突，是中国国内国外局势尖锐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中国局势的紧张是由以1925年上海五卅事件为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所引起的。

唤起了千百万中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上海事件**，使得在席卷中国的革命浪潮中吃苦头最大的**英国资产阶级**想到，无论如何要在中国本身找到一支能够代替公开干涉而使人民群众俯首听命的反革命势力。英国外交机构着手试探同满州督军**张作霖**接近的可能，尽管张作霖因接近日本已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表。张作霖利用局势，决心以事实来证明他有能力担当镇压中国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希望借此消除**美国**资产阶级因他接近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他的不信任。

张作霖下令军队向上海推进，大肆破坏工人组织，在天津开枪射击示威群众。但是这样一来，他就给了1924年秋被击溃的以吴佩孚将军为首的华中各省督军从侧翼对他进行打击的机会。远离自己满洲基地的张作霖军队不得不撤退，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使得张作霖在自己的将领眼中威信扫地，导致了原张作霖军队参谋长**郭松龄**将军的起义。郭松龄的倒戈尚不能证明民族运动对奉军的影响，却能说明张作霖手下的部分将领已经看清，靠满洲基地提供的人力财力不足以支持奉系军阀在全国范围发挥作用。被郭松龄军队击败的张作霖被迫逃离奉天，但是这又引起了**日本帝**

国主义的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今后在南满的势力前景如何。南满在经济上完全掌握在与南满铁路有关的财团手中。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郭松龄不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一旦奉系将领在火并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随着张作霖的倒台，他们将不得不向工人和商界让步，并将寻求同**冯玉祥**将军指挥的国民军接近。

除此之外，日本所以决定支持张作霖还因为存在上海报界指出的一个事实。几天前，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说，一旦张作霖发行的钞票贬值，日本人将损失**六千万银圆**。昨天，上海各报刊登了一则来自奉天的消息，说郭松龄战败后张作霖发行的钞票立即回升。一旦张作霖战败就要损失六千万银圆的日本人，决心帮助张作霖，认为这样做是有直接好处的。他们能对东京施加足够的影响**迫使日本政府出兵满洲**。最近几周来有多少日军被派到满洲，尚不得而知。日本人一再声称，他们的军队只达到正常的数量，即八千人。而一位十分了解当地情况的美国人断定，**现在满洲有两万日军士兵**。（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1月2日）

日本人对满洲事务的干涉不仅表现为出兵满洲。他们一直在叫嚷自己保持中立，可是非但不允许郭松龄军队使用南满铁路，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铁路沿线作战。不仅如此，日本特务无疑还收买了郭松龄的左右，从而把他出卖给了张作霖。上面援引的那份上海出版的周刊写道：“**张作霖部下的军官秘密逮捕和枪杀郭松龄，郭松龄的部分军官突然向张作霖投诚，如果不是由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和日本金钱的作用，不可能作任何其他解释。**”

现在张作霖的部分军队和原先支持郭松龄的国民军的一部分军队之间还在作战。张作霖在这一场作战中又将得到日本的帮助，日本人也力求消灭国民军，以便为张作霖在**直隶和山东**两省恢复势力重新扫清道路。

中国首都北京就在直隶省内。谁在北京取得统治权，谁就能在同外国列强打交道时代表中国。1919年凡尔赛会议把山东省让给了日本，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①又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拿走了山东。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放弃山东，只是因为那里仍然处于张作霖的走卒统治之下，因而日本人的利益在那里实际上是有保障的。

张作霖为了夺回直隶和山东两省，**必须把他的全部兵力集中到南方**。为此目的，他认为必须**占领中东铁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铁腕。而在这方面他是能够指靠日本人的。日本派驻奉天的正式代表给予张作霖以全面支持。日本外务省在被问及为何日本驻奉天代表的立场同日本政府的正式“中立”立场相矛盾时，只能闪烁其词，支吾搪塞。但这并不能消除张作霖依赖日本实际援助的事实。至于这个矛盾的原因，究竟是日本驻满洲的外交和军事代表机构拥有独立性，还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同军界存在分歧，或者这只是通常的外交伪装，那就难以判断了。

张作霖和奉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政策，得到**英国外交机构的大力支持**。同英国外交部关系密切的英国帝国主义报刊，如《每日电讯报》等，赤裸裸地公开散布说，**张作霖和吴佩孚协商对国民军共同采取行动的谈判**已在进行。这实际上是在执行一项预定的纲领。还在几个月以前，伦敦《泰晤士报》一个深知内情的撰稿人就阐述过这个纲领。当时他指出，如果能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就能够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在这之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大家知道，近一年来英国人在南方曾多次遭到重大的失败。

几个星期以前，英国帝国主义最为咄咄逼人的《晨邮报》援引了一个在华英国商人的意见：

^①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开始，于1922年2月结束。——编译者注

“英国商人对于在同华南斗争中遭到惨败的**香港**的发展前景深表疑虑。害怕这块已成为英国贸易中心的殖民地将会丧失的心情正日益增长。**1925年对英国威望的打击，不亚于十七世纪荷兰大炮对伦敦的威胁。**”

这家报纸还刊载了在华英商联合会主席，有名的英中麦迪逊公司经理利夫先生的答记者问。利夫先生声称：“抵制行动如不加以制止，英国的威信及其在华南的贸易均将毁于一旦。**香港的贸易已经全部瘫痪。**拥有商船队的英伦三岛却不能同**广州和汕头**保持联系。如果英国政府无能为力，只好放弃这里的所有事业。**要在华南进行贸易，商人就不能是英国的臣民，**能否想象比这更加屈辱的境况？**英国外交软弱无力。**外交部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有一种理论，说要进行谈判必须通过莫斯科。**某些人走得这么远，以致断言；所有这些抵制行动都是苏联一手策划的，目的在于报复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英俄条约。派往广州的代表团本应用金钱贿赂以求达成协议，但一无所获。”

看来，英国政府下决心**从北方，而不是从南方**采取行动。自从利用对反革命将领陈炯明的支持来战胜革命广州的希望破灭之后，英国政府必然认为，只有等到北方的反革命努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南方的局面才能改观。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英帝试图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试图夹击国民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向北京派出了一个颇有权威的代表团，以取得中国社会舆论的同情。

国际帝国主义就苏联政府反对张作霖企图夺占中东铁路的坚定立场掀起的这一场反苏运动，是**动员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苏联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他们该向谁去寻求援助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呢？

对于帝国主义报刊上一些无知青年对苏联的指责，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加以剖析。如果苏联因为没有急急忙忙地帮助张作霖筹

划对国民军作战就成了帝国主义，那我们就承认是帝国主义者吧。但是我们坚信，中国的人民大众和中国劳动知识分子将会因为苏联不同张作霖沆瀣一气而感激苏联。

从政治观点来看，在围绕中东铁路冲突而展开的国际宣传运动中间，**另外还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第一点是日本的作用。日本为了维持自己在南满的政权，对于屠杀中国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张作霖准备支持到底。日本能够挽救张作霖吗？恐怕未必。在郭松龄倒戈之后，张作霖的力量更不如以前了，因为他不得不**消灭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在同国民军作战中他消耗的兵力愈多，他在满洲的力量最后必将更加微弱。如果对于日本能否拯救张作霖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有一点则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在中国工农的心目中日本对张作霖统治的存在负有全部责任，对于试图把张作霖的统治扩大到长城以南地区负有全部责任**。

二、英国力促张作霖和吴佩孚和解，将使**日本在华势力加强**。**美国能否**同意这样做，以后就会知道。表示同意将意味着美国恰恰放弃了独立的对华政策。可是日本和英国作为享有外交特权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列强主要代表者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而美国的独立的对华政策却没有引起这样的对抗。

（乌传袞译）

在第六次省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节译〕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И·托洛茨基

同中国军阀的冲突

同志们！近日来，我们全国以至全世界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苏联政府和中国将领（好象还是个大帅，他们那儿元帅不值钱）张作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同志们！你们从今天的报纸上可以确切的了解到，这场可能发展为军事冲突的事件已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而在几天前，当苏联政府要求在三天内对我们极为合理合法的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覆时，眼看事态将演变成军事冲突。我敢说，如果我们这儿不是工农政府，而是最“爱好和平”，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话，那么，事情必将以派兵进入满洲而了结。这是一点不假的。我们同中国北京那个无多大权力的政府签订的中东铁路条约以及同满洲的张作霖大帅签订的关于对中东铁路实行共管的单独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中东铁路变为中国进行和平的经济发展的工具。现在连这样的协定，也被令人愤慨的挑衅性行动所破坏。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浪潮交替出现，中东铁路也时而被卷入这一漩涡。张作霖大帅是中国极端反动势力

的代表，一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但有时也表示愿为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出力。他力图找到一个能给他更多金钱和枪炮的主人。我们就是和这样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他通过自己手下的一个将军（那儿任何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只要能纠集必要数量的土匪，就能被封为将军）逮捕了中东铁路的负责人伊凡诺夫同志，紧接着又逮捕了数百名铁路员工，解散了铁路工会，总之是犯下了一系列暴行，用士兵的铁蹄践踏了他自己同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沉默，不能不提出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职员，更何况有位将军威胁说将把被捕者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资产阶级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保卫民族尊严、旗帜的荣誉等等问题。我们则对冲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争通过协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同大帅先生们谈判光靠发表宣言是有困难的。在发表宣言（在此类情况下称作外交照会）的同时，也不得不辅之以武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危险……只是由于我们在采取坚定措施同时表现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才促使杀人魔王（这位大帅的名字也可从中文作这样的译法）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志并恢复铁路工人工会。我方提出的其他要求，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特别是创造条件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冲突等，就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现正在进行中。同志们，工农国家一般地说是不会玩火和炫耀自己的武力的。迄今为止，只有当战争逼到我们头上和刀子抵到我们胸口的时候，我们才进行战争。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十倍，十二倍的小心谨慎。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中国人是受双重甚至三重压迫的人民。中国一直受到敌人的围攻，欧洲帝国主义者不止一次地想把它扼死，后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帝国主义者又想置它于死地。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人民，中国人民十分多疑而且也是有充分权利怀疑的。当我们起来为保卫被捕的铁路员工而斗争的时候，

中国人民自然而然地也会警觉起来。而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则趁机展开了疯狂的宣传运动，发泄其仇恨和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的仇恨情绪我们是有体验的。受这种仇恨情绪的驱使，阶级敌人步步都想破坏人们对工农共和国的信任。而幸灾乐祸的情绪这次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捉摸不定的心理，即我们可能也将走殖民主义掠夺者走过的老路。“瞧！他们莫斯科和我们也是一样的难兄难弟：触动一下他们的铁路，他们就动起武来了。这不就是我们过去的政策吗？”最近几天以来，资产阶级报刊上充斥着所谓苏联的政策与沙俄政府的政策如出一辙的文章。可是，他们失算了。他们原以为我们一定会利用这次“良机”把军队开进去，直取哈尔滨，呆在那儿再也不会走了。在资产阶级各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历史上，这种方法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先派去神父或牧师，接踵而来的是商人，随后便是外交官，这三步中任何一步遇到一点麻烦，他们便乘机派兵。派兵的目的是为了满族民族“尊严”的需要，可既来了，就不走了。殖民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都不无同情地在盼着：说什么，如果他们也感到黔驴计穷，那才好啦！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给资产阶级世界以这种满足。（掌声）

在怀着满意的心情欢呼冲突获得圆满解决的同时，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布告周知，中东铁路是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沙皇政府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在于剥削中国人民，把中国的一个省份北满从实际上并入俄国的版图，这一令人咀咒的遗产至今仍对中东铁路起着不良的影响。落后的中国群众不完全了解，我们这里已发生巨大变革，不仅中东铁路换了主人，我们的国家也换了主人。所以中国人仍然怀着恐惧的心理看待中东铁路。当然，中国的先进分子明白，我们之所以珍视参与中东铁路的工作是因为我们不能允许把这条铁路变成外国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和反对我们的

工具。一旦中国能成立起坚强的人民政府，我们不必费多大唇舌便可以同它谈清楚的。但是中国的群众还不理解这一点。需要通过事实向他们讲清楚。中东铁路的员工近两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苏联人，这些人犹如我们的常驻代表，就象是苏联驻满洲心脏地区的下层外交家。我们应当再次告诉他们：同志们，我们已尽一切努力使你们中遭到丧尽天良的无理逮捕的人获得释放。今后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受人欺侮。但我们要求你们记住，中东铁路是沙俄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修建起来的，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对这条铁路和铁路主人的不信任感。中东铁路的员工们，你们的任务是要把我们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这种不信任感从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彻底消除干净。为此，你们应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永远根除沙皇俄国播种的种种恶果，根除藐视和蔑视中国人、用污辱性字眼称呼中国人，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以及“白人”骑在中国人头上等等恶习。在满洲，任何一个俄国工人的岗位都很重要。那里不存在“民族旗帜的尊严”问题，那里不需要炫耀武力，而需要展示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就是说需要展示工农之间不分民族语言和肤色团结友爱的旗帜。这就是中东铁路应从冲突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

（马宝华译）

再论中东铁路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К·拉狄克

帝国主义报刊就中东铁路冲突所掀起的宣传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各国帝国主义报刊不仅想让欧洲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相信，而且还想首先使中国的人民大众相信，苏联政府对于企图夺占中东铁路的张作霖进行抗击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表现。苏联终于暴露了自己。现在可以看清，苏联政府的政策同英国、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政策丝毫没有不同。不知道帝国主义报刊想利用这一点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们想以此说明苏联的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政策一样好，因为苏联政策也是帝国主义的政策，那么它们何必大喊大叫，反对一气呢？它们满可以欢欣鼓舞，因为野蛮的苏联人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把自己和“文明”国家联合到一起了。掀起这样一次揭发性的运动又是为什么呢？应该把所有受过割礼和没有受过割礼的帝国主义祭司全部集中到市场上，为浪子回头举行一次隆重的祈祷仪式。需要对虚构的苏联帝国主义掀起了一场揭露性的运动，那只能存在一种前提，就是帝国主义不好。如果帝国主义报刊想以中东铁路冲突为例来证明这一点，那我们就向它们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伦敦的《泰晤士报》、纽约的《时报》，以及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官方报刊可以主动进行宣传鼓动，要求所有帝国主义者，譬如说在半年时间内，放弃在中国的所有铁路。不管苏联的检查制度多么蛮横无理，我们保证全力支持这一宣传鼓动活动。让我们看一看，“独裁的”苏联

政府还敢不敢违背“文明”欧洲的“社会”舆论，在英国、日本等国的银行放弃在中国的其他铁路之后，再多维护一天自己在中东铁路的权利。

在我们还没有收到对这项建议的回答之前，我们先同读者共同弄清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即中东铁路冲突在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引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修建中东铁路是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表现？是的。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修建中东铁路是占领满洲的一种手段，是为了便于我国资产阶级对满洲进行剥削。

第二个问题。中东铁路现在是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不是了。因为苏联既不想占领满洲，也不想剥削满洲的农民和工人。

第三个问题。从社会主义政策的观点来看，苏联在别国人民的领土上，就是说在中国人民的领土上，继续保留铁路的所有权，这是否正常，是否适当？这种状况是不正常，不适当的。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努力摆脱一切由外国托管的状态。中国人民群众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们，毫无疑问，还没有学会区别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这就使资本主义列强有可能利用中东铁路的状况使这部分群众更加难以理解，苏联奉行的政策不同于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的政策，苏联奉行的是同中国人民友好和支持中国人民民族愿望的政策。

第四个问题。那么苏联为什么不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而把它们归还给中国呢？因为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中国。在满洲居统治地位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中东铁路将意味着增强张作霖的力量，使这个中国最反动的土皇帝拥有更有力的手段，不仅将加强对满洲的剥削，而且将加强对中国人民进行打击的准备。另外，如果张作霖取得中东铁路，那就是说日本人的刺刀将从奉天推进到哈尔滨、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这将意味着增加苏联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苏联和中国工农群众的利益要求维护和平，而不是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冲突必然首先引起军备的扩充。

这就是苏联为什么不放弃中东铁路所有权的原因。这些理由同帝国主义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不仅应当向俄国的工人、农民，而且应当向中国的工人、农民讲清楚。英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掩盖这一情况。《曼彻斯特卫报》报导说，英国政府决定现在在中国开展一场反对苏联的强大宣传运动，并为此拨款一千六百万卢布。《芝加哥论坛报》则说拨款的数目为六百万卢布。并称“英国已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应能消除中国人的仇视态度和压倒俄国人的宣传。”我们在中国的宣传工作纯粹是手工业的方式。主张同苏联友好并且了解苏联是唯一的希望中国解放运动不断加强的国家的中国各界社会人士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帝国主义正在策划的这场宣传运动。

（乌传袞译）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K·拉狄克

—

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想鼓舞者和实际领导者孙中山离开中国解放战士的队伍已经一年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状况起了最根本的变化。孙中山所依赖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那时仅有工人群众零星的活动，仅有农民的游击运动。只是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的工人阶级才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只是在他逝世后，才开始有了群众性的农民组织，他所建立的广州政府开始得到巩固，控制着整个广东省。

孙中山是在群众性的民族运动诞生前夕逝世的。他是在民族运动开始播种的时候逝世的。孙中山的活动是在中国群众性运动发生之前进行的，这一情况不能不对孙中山所发挥的思想体系（大家称之为孙中山主义^①）打上深刻的烙印。

① 俄国读者可以根据孙中山的《一个中国革命者的札记》一书了解他的思想体系。该书中文本于1918年问世，同年以俄译本出版。对于评价孙中山思想来说，这本书十倍重要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1925年俄译本）。后一本著作中只有前言部分具有政治意义。其余部分都是孙中山的一些秘书所代笔整理的，目的是向外国资本展示，中国是外国投资十分广阔的天地。为了评述孙中山学说，除上述孙中山的著作外，我还利用了他的美国和英国朋友出版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康德黎博士所著《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一书（1914年伦敦版），另一本是蒙因巴泽尔所著《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一书（1925年纽约版）。——原作者注

研究孙中山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出孙中山出身的环境，反映出还将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中起巨大作用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弄清孙中山的学说，仔细地考察这一学说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弄清中国劳动知识分子的革命趋势及其在革命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这位中国伟大的革命者一生坚持学习，在其生命垂危之际，犹能在思想上**向前迈了一大步**。纪念这样一位革命伟人，如果只是试图粉饰其观点，在口头上把它说得十分激进，而不是与此相反，敏锐地、明确地弄清其观点中哪一部分代表中国革命的过去，哪一部分代表中国革命的未来，那将是很不相称的。1912年，列宁根据孙中山的一篇文章就已看出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与此同时，他不仅看清而且向俄国工人指出孙中山思想与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不同之处。尽管列宁当时因对中国情况缺乏详细了解而在文章中出现了一些局部性错误，但是列宁的文章至今仍堪称是以共产党人立场评价孙中山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现在，从具有一般民主思想的革命大众中产生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海事件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才感到立足已稳。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也在发展壮大。在中国革命阶级两个独立组织建立的进程中，两者的联盟不断得到巩固。但是，正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同国民党联盟，主张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我们就必须同时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词地把我们对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告诉工人群众。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既帮助工人又帮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

二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不过这是一个力图摆脱农村生

活狭小天地的家庭。孙中山十三岁时就到他经商的哥哥那儿当店员，同时在英国学校学习。因此他的经济观点是在农业和商业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以后，他在日本和美国住过，去欧洲旅行过，这使他能够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丰富了知识，扩大了思想境界，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旧中国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具有它的进步性。

人们常常把孙中山说成是民粹主义者。如果指的是渴望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超越过去，那么孙中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与民粹主义连系之处只在于他的观点也依附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

“欧美国家的工业变革使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产生突然的变化。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迅速进入豪华奢侈、讲究舒适的时期。其对社会的影响正如亨利·乔治在《进步和贫困》一书中所说的相似。这位作者说，现代文明的进步就好象一根锋利的轴棒突然刺入下层和上层阶级。在这根锋利轴棒的上端不过是为数甚少的资本家。这些少数人随着轴棒的旋转日益上升，越升越高。居住在下层的是人数众多的工人。他们盘旋下降，越降越低。这就是说，**富者日富，贫者益贫**。这个**工业革命**的结果只是把福利带给这个社会的少数人，却给大部分居民带来痛苦和不幸。无须奇怪，**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因为多数人不能继续成为少数人豪华生活的牺牲品，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个中国革命者的札记》俄文版，第27—28页）

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是从生产成果分配不合理这一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以生产本身发生的变革为出发点。因此，当他企图制定自己的社会纲领（见1921年3月6日的演说）时，他说：“**欧美之一切不幸均因产品分配极其不当，中国则是普遍贫穷，因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不过，这决非说不应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那样说将是极大的错误。既然我们

已看到欧美之错误，我们便须将其除去。无论美洲也好欧洲也好，对产品分配的不当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坏榜样。”（《一个中国革命者的札记》俄文版，第120页）

孙中山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他没有注意到近十年来在沿海地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由于他已经懂得重视资本主义技术力量，因此他提出要吸收外国资本。《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就是完全为此而写的。威廉斯基同志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孙中山为吸收外国资本而进行的这一宣传鼓动不知是开玩笑，是讽刺，还是重演空想社会主义者携带改造社会的计划向百万富翁和国王们祈求帮助的做法。但是，**傅立叶**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坐在自己的斗室里等候百万富翁带着自己的钱袋来帮助他建设空想社会的基本生产消费单位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欧文**老人向梅特涅递交备忘录也不是为了开玩笑。同样，孙中山在同资本主义集团进行具体谈判，以及出版书籍论述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援助来发展中国的时候，也决非开玩笑，而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的。而且将外国资本引进中国以及在外资援助下发展中国经济这一思想本身，丝毫不是什么空想。相反，可以说，孙中山关于促使国际资本在战后着手认真研究中国的原因的论述，尽管其结论未必正确，却表明**孙中山是有远见的**。他指出，交战双方国家的重工业在失去军用市场以后，将被迫寻求新的市场，而中国是其中主要的市场，否则这些国家重工业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势将引起巨大危机。孙中山的这个观点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资本主义稳定的进程在市场问题上遇到困难，正是这一点使中国问题极其尖锐起来。在孙中山的论述中，空想的东西只不过是希望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发生战争将会协调一致地在中国进行活动，而且能考虑到新中国的民族利益。孙中山是否真正相信这最后一点，他是不是为了引诱外资才不说出来，而希望在将来能以强大的民族运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相抗衡，这都是

值得怀疑的。但是孙中山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必要阶段，这却毫无怀疑之处。

孙中山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且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革命运动，那么他究竟想采取什么方法消除这一后果呢？对此他提出的唯一思想归结起来基本上是：**国家有权将土地收归国有，以及随地价上涨而增收地价税。**这种思想完全不是空想，但正如列宁在1912年便已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思想只不过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孙中山没有制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任何纲领。**他的小资产阶级性不是表现在他认为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和必须吸收外国资本，而是在于他预见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却没有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工农群众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纲领。这是因为在孙中山的观点形成时，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尚未表现出其独立性。孙中山在战后的头几年还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能起独立作用，直到陈炯明将军占领广州以前他对待广州工人组织的态度还是相当冷淡的。陈炯明知道这一点，巧妙地以工人利益为借口来反对孙中山。直到逝世前两年，孙中山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开始反对他的事实教育下，理解到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以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正直的国民党人的任务是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孙中山对经济的观点。即使那些并非共产党人，不以解决中国未来社会组织形式为己任的人们也应当懂得，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组织的自由和保障无产阶级利益不受资本主义剥削乃是民族运动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应当懂得，千百万工人是这个中国社会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既不能让他们伸直腰来，又不能让他们参加到国家的文化生活中去，那么就不会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农民问题同工人问题一样，在孙中山的学说中很少研究。他的赋税制度关心的只是使国家能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提高地价税。凡是懂得农民革命运动重要意义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其任务应是研究改善贫苦农民状况所必需的改革，以及同日益增长的农民无地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孙中山之所以没有研究这些问题，是由于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工作，而农民运动只是到他逝世前不久才表现出来。

三

孙中山的政治观点是通过对比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条件之后形成的。他曾对他的朋友美国法官**莱因巴泽尔**讲述，他青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是土匪对农村的袭击和县吏将一个富裕农民的财产没收充公。公民生活没有法律保障，中国毫无秩序，这使他觉得连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夏威夷群岛也好像是一个天堂。他开始坚决地主张以美国的民主为基础，多次以赞美的口吻谈论林肯总统。但是，大家知道，他决定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民主宪法中进行重大改变。他建议以所谓**五权宪法**来代替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他增加的两个新的部分就是考试权和监察权。他对自己的这一发明是非常得意的。不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计划。孙中山说，1912年第一次革命时期他的许多学生就是这样评价他的建议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孙中山在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时，没有发觉这些宪法本身便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假货色：早已臭名远扬的所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在**英国王朝复辟**以后根据英国条件所写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根本不是以民权为基础，也不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他捍卫能确保王

朝势力的机构，他捍卫最高议院，目的正是为了不使出现“无节制的民主”。孙中山不了解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使民主蜕化，尽人皆知的所谓司法独立不过是神话，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分别从两个方面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极其强烈地影响着国民代表的思考过程。孙中山一直在寻求反对这种假民主的手段，但因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没有这种手段，于是他便从**中国人民的过去历史**中进行探索。

封建中国设有**考试**机关，任何人只要在规定的各级考试中应试得中，就可以获得某个官职。孙中山想利用这种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官僚机构中的徇私行为。同时他想按照中国监察官员的样式建立能监督官吏和国民代表的监察机关。大家知道，过去在中国，从中央派往各省的高级官员任职不得超过三年，以防止其培植地方势力。他们还受到监察官员的监督，这些监察官员甚至可以觐谏皇帝和要求罢免官吏。但是，人人知道，这些机关也未能使中国的官僚政体避免彻底的蜕化。考试得中者往往是那些向道貌岸然的宗师们大施贿赂的人。对于达官显贵毫无办法的监察官员则与官吏分享赃物。孙中山的建议虽未能拯救中国民主免遭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命运，**可是孙中山提出这个问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真正希望建立能保卫人民群众利益的机构。**

孙中山虽是坚贞不渝的民主主义者，但却不是民主主义的学究。他非常清楚，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他把它称之为**军政时期**。在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和政权尚未充分巩固的时候，孙中山主张实行**革命专政**。对他来说，民主是建设新生活的工具。这种真正革命者而非民主主义书呆子的观点，使得孙中山对待苏联实行的专政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对苏联的政权形式深感兴趣，非常希望了解其工作情况，以便弄清楚，这种政权形式是否适用于中

国。他在广州失败以后的1922年以及在这之后，一直想访问苏联以研究俄国无产阶级建立的新的国家体制。

四

除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外，孙中山提出了所谓**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三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他在反对满清王朝的斗争中提出的。在华南的民主主义者阶层中，人们把十七世纪占领中国的满清王朝看作是异族，孙中山在组织反清斗争时提出汉人治汉的思想，并把它称为民族主义思想。纲领的这一部分使人非常有趣地看到孙中山的意识形态起源于知识分子思想。显然，孙中山力图建立民国，推翻满清王朝，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民族意义上满人早就同汉人同化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并不试图从**阶级观点**来攻击满清王朝。满清王朝不是单靠征服全国的办法执掌中国政权的。明朝被推翻不是由于满人入侵，而是由于席卷整个华中和华北的农民起义。明军总兵**吴三桂**向满人乞援攻打当时已攻占北京的农民大军。吴三桂和很大一部分汉族显贵变节投诚为满人效劳。满人在进入北京后，发布特别文告，声明他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恢复秩序而来的。在旧的史料中曾经详尽叙述过的这一悲壮的中国阶级斗争史，在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程中却阐述得极其简略。

如果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刻已经开展着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现代以**李鸿章**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就曾千百次地与外国帝国主义勾接起来镇压革命），那么满人执掌政权这种阶级斗争性质正是孙中山极好的宣传鼓动资料。但是，孙中山当时没有碰上这种阶级斗争，不可能求助于人民群众、革命政党的阶级本能。因此他在寻求反对满清王朝的鼓动口号时，提出了反对“异族”王朝，中国人民摆脱侵略者统治的口号。

在满清王朝崩溃，1912年革命胜利以后，这个口号本来会成为反帝政策的基础，但是孙中山在反对袁世凯、拯救民国的艰苦斗争中未能保持总的反帝立场，因为它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有时他为了反对袁世凯而向日本人寻求援助，有时又因对日本人的援助感到失望转而请求美国支援。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口号在某一时期起着对中国历代皇帝所征服的西藏、蒙古和其他地区实行民族同化这一口号的作用。这些口号不自觉地反映了商业资本和居民稠密省份希望向外扩展垦殖的农民的利益。孙中山在逝世前开始明白，中国革命越是明确地、肯定地承认蒙古人、西藏人等的自决权，放弃中国皇帝过去所征服的东西，那就越容易成为这些民族响往的中心。孙中山把民族主义口号和中国人民自决权的口号完全转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使其具有**亚洲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性质**。孙中山把这个口号同**联苏、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联系起来，排除并肃清了其中的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反动倾向。

五

通过对孙中山观点的简述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并非仅仅是某个个人的观点，而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产物。这种思想只立足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必然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它虽然看到也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却看不清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位中国革命者在思想上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但却没有找到实现真民主的手段，因而徒劳无益地在中国过去历史中寻求解决的办法。孙中山思想为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腐朽帝制而寻找根据，但他没有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中找到这种根据，于是必然从记载王朝的非民族起源的史料中寻找。他

在资本主义世界没能找到盟友，于是只好以外国资本主义会考虑中国民族利益的幻想自慰，对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表示容忍。但是，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坚韧不拔精神。无论是在流亡国外从秘密住处派遣自己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时，还是在炮台的大炮旁亲身指挥射击时，或是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他都是那样的坚决果断。孙中山既高度重视理论，又善于考虑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习。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部分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促使他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列宁著作的英译本，从对社会主义抱同情态度转为持有社会主义观点。孙中山在找到苏联这个盟友后，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寄予希望，他急剧地改变了在中国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国内斗争时所提出的口号，把自决权的口号变成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口号。

孙中山遗嘱是这位中国伟大革命者思想革命最集中的表现。右派国民党人企图把孙中山学说中最初的一些提法作为他们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反对共产党人的旗帜。他们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为依据提出反对阶级斗争，拥护资本主义，拥护平常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他们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学说中革命的东西，把孙中山为消灭中世纪的落后而拥护资本主义发展、为摆脱腐朽的帝制而拥护民主、为推翻满清王朝而主张民族自决等所进行的斗争，都转过来用于反对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经成为现实。一小撮用孙中山名字作掩护的反革命分子妄想把一贯是革命者的孙中山变成他们的思想家，这种企图必将被中国革命所粉碎。中国革命将研究孙中山学说的发展情况，它还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发展孙中山的学说。

（章任贤译）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K·拉狄克

在国民军同张作霖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势力再度插手了，张作霖打败郭松龄是日本插手进来给予张作霖援助的结果，而现在，当张作霖军队与国民军在天津附近展开严重的斗争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都进行干预了。张作霖企图在冯玉祥军队的后方大沽港进行登陆。毫无疑问，国民军会阻碍这一行动，对装载张作霖士兵的运输船只进行射击。显而易见，国民军会试图阻止一切舰艇接近天津，因为战斗中不可能判定那一艘舰艇载有张作霖的士兵。帝国主义列强援引1900年义和团议定书^①对此提出抗议。该议定书规定中国应准许各国军舰自由出入天津港并保障它们与北京的联系。帝国主义列强在照会中威胁说，如果冯玉祥不放弃阻止张作霖部队登陆的防御措施，他们将进行武装干涉。这一照会是对**张作霖的直接支持**，因为显而易见，国民军既要同从北面进攻的张作霖军队作战，又要同从南面进攻的张作霖走卒、原山东省督军的部队作战，如果张作霖的兵力出现在后方，国民军的处境将极其危险。

盟国的照会意味着**英帝国主义的外交胜利**。英帝国主义在力图“整顿中国秩序”时遇到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它很难下决心把自己的兵力卷入到中国的斗争中去。第二个障碍是怕

^① 即辛丑条约。——译者注

外交上孤立。对第一个障碍，英帝国主义企图用支持中国本国反革命势力的办法来加以克服。丝毫不用怀疑，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吴佩孚现在都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张、吴、英、日之间甚至不排除缔结有协定的可能性，即在打败国民军之后，为了使华北和华中统一于吴佩孚的领导之下而允许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这将意味着**英国同意日本以张作霖的统治为掩护实际上夺占满洲**，而在华北和华中，吴佩孚则必须考虑英国和日本的利益。

至于英国不可能采取孤立的行动，这一点在最近广州冲突中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曾经摸过底，其他国家是否同意采取对广州政府武装进军的行动。可是，这种行动首先要求长期封锁广州，而这会使日本和美国的航运和贸易遭到很大的损失，因此日本和美国不大愿意支持英国。在最近的照会上美国也签了字。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实际上已有意进行干预，如果形势需要，也可使用武力。美国的这种干预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同英国政策的接近，归根到底也是同日本政策的接近**。著名的美国研究远东问题的作者、《密勒士评论报》编辑、《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米勒认为，美国之所以准备朝着帝国主义的干涉的方向发展，是由于受到被上海事件吓坏了的当地美国工商界影响的缘故。这些人一直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中国的革命势力。米勒非常了解中国国内的各种关系，他警告美国政府，这种干预必将引起对“外国人”，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各国代表的仇恨的爆发。我们确信，米勒教授是对的。**英国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英国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群众的敌人。可是美国正因为过去避免采取明显的帝国主义政策，曾获得很大的好感。**现在，美国为了几千名被革命吓坏了的商人的利益，正把自己对中国的精神影响作为赌注**。美国这样做，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正中下怀。可以期待那些在上海事件期间曾在参议员博尔领导下极其有力地抗议帝国主义对华暴行的美国各界人士，现在也

将行动起来，反对那种归根到底对帝国主义代表来说结局必将很惨的政策。

同国民军作战的不仅是**中国国内反革命的统一战线**，登上舞台公开反对国民军的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以封锁广州相威胁。现在局势更加紧张。英帝国主义在同广州冲突中未能得到的东西，现在在华北可能会达到。不仅共产党，凡是一切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工人党，都应大声疾呼反对这一进攻。

最大的担子落在**英国工人政党**的肩上。如果它愿意做的话，它将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应当懂得，问题**不仅是要对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表示抗议**。问题是要**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准备进行干涉**。要使英国工人们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必将使中国爆发巨大的民族运动。如果住在中国的英商和其他各国商人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损害，那么帝国主义分子将会大肆煽动全面进攻中国。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能够在侵犯中国方面达成协议，明天**分配赃物**时，他们也一定会**互相撕咬**起来。整个远东是一个火药库。谁要在这个大火药库旁玩火，谁就要冒引起爆炸的危险，而**这场爆炸将不会局限于远东**。局势不仅要求中国革命的所有朋友，而且要求一切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都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干预。

（章任贤译）

中国国民军的失败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К·拉狄克

国民军从天津退却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是无可讳言的。一份份报道北京反动势力嚣张的电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情况。这次失败的严重程度究竟有多大，只有在弄清国民军第一军能否有秩序地撤退，能否扼守住自己原来的阵地之后，才能清楚。对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头两个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了，这就是一方面各军阀组成了统一战线，即国内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组成了矛头指向国民军的统一战线。但是，对这两个失败的原因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原因主要是从天津附近触发的交战开始造成的。大家知道，这次交战是上海事件发展的最后阶段。张作霖企图利用上海事件夺取中国中部沿海地区。他扮演了一个戡乱者的角色，迅速派兵进入上海，希望因此得到英国的支持。当直系所属的中国中部各省督军开始撵他时，他只得匆匆撤离上海。直系对张作霖的进攻表明，在对外政策中亲英的直系将领不希望让张作霖取代他们，因此尽管张作霖得到英国的支持，他们仍然掉转枪头，兵戎相见。这使大家看清了中国督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这一总的、十分现实的问题。他们只有在满足其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听命于外国资本。一旦问题涉及到他们本身的生存时，他们就宁愿冒险执行各行其是的政策了。当张作霖开始撤退时，国民军的领袖冯玉祥便十分清楚地考虑过两面受敌的危险性：一面是张作霖，

一面是因本系将领打败张作霖而得到加强的吴佩孚。冯玉祥一直迟迟没有发动对张作霖的进攻，但是郭松龄突然倒戈起义，从而动摇了张作霖的军心，于是冯玉祥决定进行反张斗争，消除从满洲对他造成的威胁，并夺取直隶省。吴佩孚利用这一时机向北面河南省推进以占领开封。当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军队组织方面要比第一军差）在几次战斗中被击败后，第一军陷入了孤立无援、两面受敌的困境。这两支敌军在消灭国民军这一思想下联合起来了。

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建立了统一战线，这是因为日本认为保持它在满洲的影响是它的切身利益，它害怕冯玉祥壮大力量，一旦冯玉祥控制直隶、河南、山西、江苏等省，便可能对日本实现侵略计划构成威胁，换句话说可能威胁日本在南满的地位。中国革命在上海事件期间曾巧妙地使英国陷于孤立，但在这次迅猛爆发的战事过程中却未能巧妙地与日本沟通，孤立英国。结果，两个大国在天津采取反对国民军的共同行动，造成英、日以相当大的海军兵力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后方海河河口登陆的威胁。

国民军的失败向中国革命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国际上采取灵活手段以及有计划地努力去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包围圈，方法就是要向敌人中行动最不受约束、危险性可能最大的一个敌人作出让步。但是，这次失败还有其他原因。研究这些原因可以得出许多政治结论。国民军不是中国革命建立的。他们来自老的军事集团所建立的部分军队。近两年来，国民军第一军最接近民族运动，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革命觉悟很高、组织性很强的程度，而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不会成为一支能为革命目的服务的军队。国民军第一军的指挥人员部分是原来的军士，是冯玉祥提拔上来的，与冯玉祥有密切联系。但是，很大一部分指挥人员是一些旧军官，他们思想上没有革命的目的。我国红军在建军初期也没有自己的革命指挥人员，但是它有革命的政治委员，这些委

员善于教育革命的下层军官，并使上层军官服从自己的意志。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委员。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刚开始渗入这支军队，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遇到上层军官的干扰。士兵群众也是刚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在第二军和第三军中，情况更差得多，而且国民军第一军所辖地区人口稀少，居民落后，对这支军队的革命化来说，不具备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中部各省民族革命力量的薄弱在国民军的失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除上海外，在吴佩孚集团的军队占领的地区内，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中部各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里的力量很弱。这些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革命活动气氛的熏陶，他们只是自己指挥官手中可以任意摆弄的工具。所有这一切向中国革命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从空喊反对帝国主义转为在所有派系的军队中深入地进行鼓动工作，必须把活跃的革命力量不仅输送到革命军队中去，而且输送到反革命军队中去。

国民军的失败会有什么后果呢？这次失败会不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我们认为不会这样。要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失败的一个条件是，世界帝国主义同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及那些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市场之间担任经纪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真正勾结在一起。而这种勾结现在是没有的，正如关税问题会议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勾结也未必会在计划之中。世界资本主义不会在关税自主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而关税自主对于为数很多的中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的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要联合起来为统一中国而开展有效的活动。反革命势力要取得胜利，它必须哪怕是走了样，但必须解决历史所提出的并成为革命运动源泉的任务。但是中国的各个军事集团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各种派系争夺中国的野心，各自与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保持联系，因此不可

能统一中国。张作霖和吴佩孚为了同国民军作战能够实现联合，但是一到分配果实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撕咬起来。反革命势力既不可能解决统一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革命运动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处于上升和结聚力量时期。甚至工业资产阶级也还在犹豫不决：既想解决民族革命任务（这些任务归结起来最终是要建立国内市场和摆脱外国资本依靠特权进行的竞争），又害怕工人的革命运动。由于外国资本竞争而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自己的革命力量。因经济崩溃、军阀混战而受害最深的广大农民群众才开始投入社会生活。虽然可以有信心地说，国民军的失败并不是反革命最后的胜利，但如果闭眼不看失败带来的危险，那也是可笑的。反动势力的气焰嚣张对于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会增加客观困难，假如吴佩孚得以牢固控制中国北方和中部各省，那对广州来说将出现非常危险的局势。但是，吴佩孚为此需要有很长的喘息时间。然而未必会有，即使有，广州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统一南方，并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5年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人民群众起来了。1926年给革命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带来了军事上的失败，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1925年的胜利全部化为乌有。因此，尽管遭到失败，中国革命者必将加倍努力地沿着组织国民革命的道路前进。

（章任贤译）

衰 败 中 的 香 港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M·阿利斯基

香港控制着广州。它非同寻常，是皇家殖民地。香港总督由“英王陛下”任免。香港这块英国重要殖民地是通向华南的咽喉要地。它位于珠江进出口处，距广州九十英里，距荷属殖民地澳门四十英里。

香港殖民地包括以香港命名的本岛、附近几个小岛和广东省一块不大的沿海地带，面积约三百平方英里。

按1921年统计，香港住有六十二万五千一百六十六人，其中中国人不少于六十万。外国人在这里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国际社会”，包括三十二个民族。在香港的英国人总共七千八百八十九名，其中男四千七百零六人，女三千一百八十三人，其次是葡萄牙人二千零五十七名，日本人一千五百八十五名，美国人四百名，法国人二百零八名，荷兰人一百零四名，等等。

香港位于太平洋几条重要的国际航道上，是英帝国主义武装了的一个拳头，它一方面成为南亚大陆的商业门户，另一方面可以控制华南整个沿海地区及其八千万至一亿勤劳的居民。

在最近几年中国军阀混战期间，大批富有的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从大陆迁居香港，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下隐藏自己的财产和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来说，香港就好象是天津、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外国租界。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汉口和广州野蛮地枪杀工人，香港中国

工人为此纷纷罢工，以示抗议。造船厂、精糖厂、水泥厂、肥皂厂、烟厂、陶器厂都停止生产；商店、银行关门；港口陷于瘫痪。

香港罢工不同于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一下子就具有极其明显的政治性质。十五万中国工人离开了香港。这些工人，有的还全家一起，乘坐轮船、舢板、火车和其他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在罢工委员会的率领下转到广州。在这里他们展开了组织活动和广泛的政治工作。香港工人罢工委员会下设若干部门：救济部、安置部、出版部、宣传部、会审处、工人纠察队等。在从香港来到广州的工人中，有十万至十二万人分散到农村和该省其他城市。广州工人和其他社会团体宣布对香港、英国贸易和英国的一切活动进行抵制。

这次罢工和抵制行动是长期的，从6月开始，已经持续了八个月。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香港的财政经济生活几乎完全瘫痪。

香港是一个巨大的海上贸易中心。贸易额估计每年为两亿英镑，约合二十亿卢布。仅对外贸易一项，1923年总数为一亿二千三百万英镑，1924年为一亿三千五百八十万英镑。1924年出口总额为六千三百万英镑，进口总额为七千二百万英镑。

1922年有一万零四百五十七艘海轮驶入香港，而现在，九十艘轮船停在港内已达数月尚未卸货，只是偶尔有一艘轮船开来，但也是顺道而来。英国航运是香港的生命线，它由于罢工而瘫痪，被困在香港动弹不得，有关国家则另求其他贸易渠道，因为竞争的原则是允许发展各种商务关系，允许采取自由贸易立场。生活是不等人的。日、美、苏、中和其他国家轮船绕过香港，直接取道驶入广州和黄埔。轮船络绎不绝，货物进出繁忙，而香港却失去了自己的商业联系、贸易阵地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1925年8月7日出版的一期英国杂志《资本与贸易》承认，香港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商业萧条和崩溃状态。”但是，从那时

起，又有七个月过去了，这是个不短的时间……说得婉转些，这种“萧条和崩溃状态”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所有其他经济生活方面。首先就反映在物价上涨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投机倒把上。因此在香港政府一家半官方报纸上并非无因地出现了一篇标题令人郁闷的文章《银元^①贬值与罢工对粮价的影响》。这篇文章写道：“现在挣钱比任何时候都难，但是命运嘲弄人，目前花钱比老居民记忆中的任何时期却要快得多。”

当时局势使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行情灾难性地猛跌，殖民地的土地价格也大幅度下降。交易所的毁灭在6月底，也就是罢工开始一两个星期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额，1月至6月每月为一亿元（中国货币），7月份（开始罢工和实行抵制后第一个月）跌到六千万元，8月份为三千万元，而9月份已下降到一千万元。

股票行情猛跌和银行收回放款，使整个香港惊恐万状。工商企业和银行破产的日子开始来到了，不得不关闭证券交易所，宣布缓期付款。

还在讨论香港1926年预算期间，香港总督就声明，“由于银根紧缺”，原准备在当地发行的公债未必能获得成功，同时也不能认为目前是向伦敦市场请求援助的有利时机。从英国发来的报导中十分清楚，广大公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我们这里的条件比实际情况恶劣得多。帝国殖民地发行公债的主要对象——小额公债认购者，显然“不敢冒险把其资本投入香港的公债。我认为，在条件尚未接近正常时最明智的办法是等待，在公众尚未看清布尔什维克消灭香港的企图遭到失败时，不要想用发行公债的手段取得借款。”当然，总督对布尔什维克的恐吓是徒然的，因此香港仍然不得不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去筹借借款。

① 一块墨西哥银元或中国铸银元等于我国一卢布至一卢布五戈比。我国报刊常把它和美元混淆起来，一美元等于一卢布九十四戈比。——原作者注

但是，香港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借款，香港和上海的英国权威人士已开始讨论如何利用这笔借款的问题。有影响的英国经济杂志《资本与贸易》坚决反对从上述借款中拨款援助中国银行。由此可见，英国人想把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卸在当时在英国殖民地寻找避难所的中国人肩上。这种企图还可以从汇丰银行（华南各银行的银行）的实际政策中得到证实。这家银行目前的实际做法是，支持最大的、主要是英国的商行，同时要求较小的工商企业归还贷款，并严格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政策首先狠狠地打击了中国人，使他们成为第一批“倾家荡产”的牺牲者。

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法院登记破产的整整一百七十户，这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有一家名叫康允（译音）的当地中国银行，它的规模相当大，在华南各地拥有十个分行。仅这一家银行无法偿付的负债总额就达五百四十万元。因此，濒于破产的各商行代表并非无因地于10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了会议，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暂时或全部关闭企业；（二）香港政府明文规定减低最近三个月的租金；（三）减低企业职工工资百分之五十。这样一来，企业主竭力把因罢工而引起的香港经济危机的全部重担卸给工人劳动群众和职员。当然，他们这样做能取得多大成功，则属于另一个问题了。

这种局势自然不能不影响到“英王陛下”殖民地的财政状况。

1925年预算赤字已结算出为七百七十万元，占预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1926年预计把赤字缩减到二百四十万元，占预算总数百分之十点一，但这是用大力压缩预算，从三千万减到二千三百七十万元的办法来减少赤字的。同样，紧缩预算支出也是首先以大力削减公共工程和各種新建筑的经费来达到的。

所有这些节约下来的款项，部分已经用完，部分还要留备明年使用。可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在立法会议的一次会上，香港

总督“本人”就1926年预算发表演说。他说，预算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来编制的，即顶多再有大半年时间，生活条件就会恢复正常，如果假设有误的话，那么赤字可能大大高于预计数字。同时，他补充说：“我不相信，几百年来以善于经商、有实干精神而闻名的富有理智的广东人民，能够长期地对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并得到从其他省招募来的军队所支持的暴力制度感到满意。我认为，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秩序将会稳定”。

事实向“英王陛下”殖民地的总督证明，稳定的秩序确实已经建立，但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广州。不难预言，在结束罢工和抵制后从广州回到香港的工人，将截然不同于去年6月离开香港时的他们……

最初，香港磨拳擦掌想要动手，它调来海军兵力，不断打电报向伦敦报告，作出强硬的决议。香港在咆哮。香港在威胁。香港准备对广州进行干涉。香港想要动武了，但是……但是伦敦懂得，它将是孤立的，得不到其他帝国主义强盗的支持。英帝国主义想象到，这种干涉将更加严重地破坏它在东方本来就已不佳的影响和威望。此外，英国国内情况也使它根本无法在东方进行冒险活动……所有这一切迫使伦敦勒令香港住手。

香港武装了的拳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它不得不收缩一下自己的傲气，开始谈论妥协。只是在最近鉴于罢工委员会的坚定态度，才重弹武装干涉的老调。

在这同时，香港正一天天吃光自己的老本，越来越多地丧失自己在华南及其附近岛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太平洋重要航道上的经济阵地。

香港的“历史”，就象一滴水珠一样，反映出华南的整个民族革命斗争。从香港这个很小的例子不难看到，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位已是多么岌岌可危了！

（章任贤译）

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

(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

K·拉狄克

几周以前，即在中国最近事件发生之前，我国报刊曾刊载过一篇驻伦敦中国新闻局关于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的报道。这篇颇具冒险精神的报道转述了1925年末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透过红色玻璃看世界？**》（《Why China Sees Red?》），作者是**普特南·韦尔**先生。在剖析该书内容之前（这是值得进行剖析的），应当说几句有关作者的话，因为不了解他的过去就难以正确评价这本书。此人真名叫**伦诺克斯·辛普森**。他是英国人，在中国受的教育，随后在当时著名的**罗伯特·加德爵士**领导的中国海关工作。以后辛普森先生辞去职务，专门撰写时事述评。他写了大量关于远东局势的书，这些书主要是揭露日本的对华政策。对他的这种写作活动的酬金，在很长时期内与其说是由出版社支付的，还不如说是由美国各界人士支付的。在中国光靠稿费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更何况普特南·韦尔先生又生活得那么舒适。中国革命开始后，他突然奋笔疾书，写了一本歌颂变革的书，并开始在中国几个大学讲课。世界大战以后他扮演了一个帝国主义死敌的角色，甚至有一段时期他赞扬苏联的远东政策。

但是，大家知道，感情是建立在物质因素的基础之上的。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的爱情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而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上海事件的爆发和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危险，促使

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在他试图通过苏联大使馆介绍在中国盐务专卖局兼职未成之后不久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变换了阵地，用老的笔名出版了我们所说的那本书。这本书阐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的纲领，并在**美国**公众中为这种思想争取信徒。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是怎样评价中国局势的。

显而易见，不应期待普特南·韦尔能稍许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他看来，革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生和苏联的外交机构。苏联外交机构是在幕后活动和牵线操纵大学生和国民军的主要力量。万恶之源毕竟是**大学生**。他们是运动的罪魁祸首。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住在农村，因此运动只是城市中的事。不幸的是，通过铁路和水路等渠道，城市中的邪恶逐渐蔓延到农村。大学生是一群容易接受任何激进口号的任性的人。当每年有一千万儿童成为文盲的时候，高等学校却收费低廉，学校大门对所有人敞开着。“中国的工业状况和物质状况吸收不了一半大学毕业生。各大学都处于毫无领导和世上少见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大学生可以自行决定要谁教课和教什么，并且利用罢课赶走不受欢迎的教师。”这类可怕行为不仅在中国大学里有，而且在传教士办的学校中也时有发生**“所谓教会学校已变成政治宣传的中心，这种宣传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有无可能采用所谓教会方法教育亚洲人而不致培育出一朵畸形的布尔什维主义新花。”**（第102—103页）你看，大学生们利用象上海事件这样的小事，发疯般地大肆鼓动。这一点他们干得很出色，“**他们做了世界上任何代理人所未能做得了的群众工作，因为今天在四亿居民中未必能找到一个人没听说过1925年夏季发生的事件，不感觉到自己胸中爱国主义的热血沸腾。**”（第113页）

就凭这位出卖灵魂的英国新闻工作者的最后这段自白，革命的中国大学生也该原谅他的所有咒骂，因为这个自白证明，革命

的中国青年作为一支唤醒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中国革命的敌人承认中国大学生覆行了自己对国家的职责。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韦尔在提及帝国主义干涉计划时，要求把**结束中国的现代教育**列为最主要的一点。他说：“基督教在最近几个月里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历史的极大讽刺。新一代的中国人失去了许多过去被认为是中国人性格的东西：他们不再尊重旧道德，而是只培养自己成群结队吵吵闹闹的能力，再也没有人去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了，**供奉着一个个先贤牌位的孔庙大殿已空无一人了。**”（第116页）因此，他要求把**大学迁到各省的小城市去**，在那里大学生就找不到他们能煽动来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工人群众。

所有的沙皇教育大臣都是一些可怜虫，他们为了解决把教育和专制制度统一起来的问题大伤脑筋。除了逮捕为首者，流放一批批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外，找不到别的良方妙药。文明的英帝国主义的代表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简单多了：把整个大学都流放外地，规定大学生除了孔夫子及其门徒的陈腐著作外，不得阅读任何其他东西。我们认为就连孔夫子也帮不了忙。这位万人景仰的圣人在两千年以前便对历史的进程表示过抗议，但却徒劳无益。孔夫子学说是他怀念古代和谐生活方式而抒发的幽思。但是，所有他的教诲都表明，就是孔夫子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封建主义衰落的时代——正是居民各阶层激烈斗争的时代。他的门徒孟子却十分出色地懂得阶级斗争的存在，虽然他在两千年前没有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

（人们很快就可以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了），但是竟然懂得：如果人民对所必需的一切不能获得保障，那就不可能有平静的心情。即使英帝国主义现在强迫中国大学生们读孔孟之道，他们也会从这些陈腐的学说中找到统一中国和反对英帝国主义所需要的一切论据。

但是，按照普特南·韦尔的意见，大学生是唤起群众的力量，而革命的物质中心，按他的说法，就是**广州和国民军**。因此他在纲领中就如何摧垮这两个中心作了发挥。他要求首先进军广州。“假如香港的公民们……不是光发电报请求负担已经过重的祖国给予援助来反对广州，而是想亲自动手帮助自己的话，那他们早就可以把同他们一样仇视赤色分子的人们装载上停泊在香港闲着无事的船只上了。假如1925年夏天向华北派出英国军舰，挂着旗，写上几个中国字：‘本舰由英商提供运送忠顺的中国军队，旨在解放广州，消灭共产党人，’那么这个行动一定会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反响，其所得报答将象戈登将军对太平军之战一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第248页）在南方对广州的进军应当同北方的进军同时并进。“现在把十万士兵运到中国，要比1840年运一万人或1860年运二万人更为容易。”“当基督将军**冯玉祥**大帅咆哮如雷地从北京城外自己的堡垒中反对英国的时候，当他一周又一周地声称要对英国进行抵制的时候，我们就该对此发表声明说，如果不停止这种鼓动，他的对手张作霖大帅将获得英国的援助。这个声明的后果将是很大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深刻地研究过**虎扑**政策。”（第224页）这本书的作者埋怨说，英国已失去了虎扑的习惯，英国应当重新采取这种政策。

他写道：“中国存在着三个影响全国的中心——**北京、上海和广州**。除此之外，其他各地都是不起什么政治作用的。因此，问题是在对待这三个斗争中心方面确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并全力予以贯彻。第一步应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府**。”怎样创造这个奇迹呢？非常简单。问题是“保证中央政府**每月能获得二百六十万美元**，这个数目对于中央行政机构来说是足够了。空谈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和对一个缺乏资金进行日常工作的政府在外交上进行交涉，是毫无意义的。”（第258页）第二个任务是，如

果想撤消使各省相互割裂的税卡，那么必须为现在替各省税卡征税的**一百万人找工作**。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普特南·韦尔主张首先**提高关税税率**。至于谈到军事行动的费用，中国自己可以解决。中国**铁路**现在本可每年收入三亿美元，可是现在的收入仅为一亿二千万美元，因为铁路缺少机车和车皮。假如帮助中国改善运输系统，那么军事干涉的全部费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由此到手。为了进行干涉，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意见，需要“**五个师**，计十万人，和一个由小型舰艇组成的区舰队，这支兵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只需1842年和1860年战争所用的五分之一时间，就可以取得战果。”根据银行家们的计算，所有这些费用不会超过**一亿英磅**，可以用铁路作抵押来予以偿还。即使在这一亿英磅的数字上再增加五千万作为改善铁路之用，一万二千英里长的铁路就将能提供五千五百万英磅收入，纯收入相当于一千七百万英磅，足够用以支付两亿英磅的利息。“即使从经济核算的观点来看，进行干涉也是有利可图的。”（第276—278页）

普特南·韦尔感到，军事行动本身终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虽然可以由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组成中国政府来掩盖对华侵略，但人民群众会怎样对待这一侵略行动呢？于是他为帝国主义占领者寻找中国**内部支柱**，**中国资产阶级**应能充当这根内部支柱。“中国资产阶级人士现在与英国资本利益相同，但是群众的威胁迫使他们说出违背本意的话。不论金钱关系怎样牢固，它并不能在危险时刻给予保障。”普特南·韦尔竭力反对英国人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把各自的在华企业联合起来。“**只有通过同中国人的联合，才能取得对未来永久安全的保证**。（第252—253页）英国企业同中国企业在联合银行的领导下在财政上融为一体，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感觉到自己同英国资产阶级密不可分，并把保卫中、英两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军队看作是自己的军队。

这就是普特南·韦尔先生为了获取优厚报酬而冥思苦想出来的拯救英帝在华利益的办法。那么，他的计划是不是英国政府的**官方计划**呢？大概不是。这个计划概括了**英国在华资本家**的想法，这些想法由一个被认为是中国通，而且就**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来说也的确算是中国通的人表述出来。显而易见，这个计划是历史罕见的冒险行为，因为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是坐在火药桶上，这个火药桶就是农村。外国商品的输入和中国工业的发展摧毁手工业而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足以破坏农村经济，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对它的阻挠，它的发展没有快到足以吸收大批被迫离开农村的人们的程度。这种情况必将**促使中国革命的爆发**。与中国革命相比，俄国革命可算是田园诗般宁静轻快的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就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来说，普特南·韦尔看问题是相当清楚的：他指出广州和国民军是两个应当给予打击的要害。他还指出同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是一条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必须促使中国分裂的路线。不必怀疑，英国帝国主义基本上将按照这个计划行动。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中 国 革 命 一 周 年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K·拉狄克

今天是上海事件^①一周年。由于一次普通的劳资冲突（帝国主义刽子手为此杀害了一名中国工人），学生和工人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进而发展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二十万人之众。这次罢工蔓延到中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小商贩、手工业者也都参加进来。罢工高举的旗帜是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看到，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这个新中国不是那几十万读西方洋书的知识分子的中国，而是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新中国。国际无产阶级开始看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一个新战友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早在五年以前，一位名叫施特鲁韦的德国工程师在其叙述中国工业的一本书中写了下面一段话：“与欧洲相比较，中国较为有利，因为它根本不参与欧美国家存在的那种劳资间的斗争。在中国根本谈不上这种斗争，因为在这个国家中不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矛盾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都更为尖锐。农村中半数以上的居民没有土地，或只有不够糊口的一小块土地。地租制度使大部分土地控制在农村和城市的富农手中，他们不劳而获，从农民群众手中攫取他们产品的一半以上。农村把大批贫困的农

^① 指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编译者注

民抛向城市，这些人形成了一支极为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其人数之多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很少见的。它对劳动市场造成压力，也堵塞了无产阶级通过缓慢的改良主义办法改善自己处境的道路。中国的关税权控制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他们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同外国便宜的工业产品进行竞争。因此，中国发展工业十分缓慢，不允许吸收从农村源源而来的劳动力。中国既受资本主义之害，又吃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在军阀统治下，人民群众无丝毫权利，连求得任何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办不到。这就造成了一种尖锐的革命形势。问题只在于中国的人民群众何时才能奋起。

在上海事件中他们奋起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觉醒起来。沿海省份的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行动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奋起是历史的必然，按历史规律它必然要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则是因日益趋于破产而行动起来的。他们认为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渗透到了中国。在上海事件的第一个阶段，农村还没有行动起来。在只有一万一千俄里铁路的情况下，有关在工业中心城市开展斗争的消息传到农村是很慢的。但是，从许许多多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农村还是知道了这次斗争的情况，所以到革命第一年年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北方（如山东省）或是中部（如河南），还是在南方（如广东省），农村到处都在觉醒。现在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农村必将觉醒。

上海斗争时期的阶级关系是怎样的呢？大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欧洲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自然是反对革命，拥护帝国主义的。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它既想同外国帝国主义斗，又怕群众被发动起来进行革命，于是只好寻求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途径，找军阀给予庇护。小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一边的。中国的手工业者所占的比例数比俄国为大。它在国家经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建立有自己的行业组织。这部分群众在斗争开始阶段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中国落后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尚未

发动起来投入战斗之前，手工业者将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本身在斗争中坚定刚毅，吃苦耐劳。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极低，所以能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政治口号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的。美国商务代办的约翰·阿诺德1922年向政府报告说：“几年前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对中国人民来说仍然记忆犹新，它指出了至今尚未为人们所注意的新的力量。”以国民党的组织、学生团体和共产党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新的力量则为工人群众提供政治口号。本来在罢工开始时工人群众并未提这些口号，可是他们很快接过这些政治口号并把它作为进行顽强斗争的目标。

资产阶级通过商会力图抑制反帝的口号和针对国内反革命的口号，减少这些口号的锋芒，而工人群众则毫不退步，坚持捍卫这些口号。他们不受收买，拒绝进行私下交易，充分利用革命形势造成的客观条件。一度支持革命运动的小业主在罢市一个月后就中止了这一行动。这倒不是因为缺乏斗争意志，而是反映了商业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分散无组织的状况，反映出它没有发挥革命作用的经济基础。即使中国农民行动起来，即使中国农民的革命情绪发展成为反对军阀的游击战争，并对首先由贫困农民中招募来的军阀军队起瓦解作用，无产阶级仍将起突击队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十分集中，而且控制着港口和铁路。这种集中性使它有可能较快地成长为一支有觉悟的政治力量，担负起领导民族革命的重任。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问题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无产阶级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已经是存在的事实。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领导将体现为共产党员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发号施令。由于这种倾向的存在，带来的害处是很大的。无产阶级同城市和农村的贫苦人民还没有联系，现在还应当争取得到他们的信任。

共产党队伍中暂时还只有力量相当薄弱的少量无产阶级成份，党还没有渗透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中去。国民党人数虽多，仍处于初创阶段，目前还只是一个代表那些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很少的知识分子的政党。但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将会在向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渗透方面成为共产党的有力竞争对手。共产党只有当它以自己的政策向农民、手工业者和整个贫苦劳动大众证明，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比任何别人都更果敢、更坚定不移地捍卫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时，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掌握领导权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共产党不是通过理论公式，而是通过活生生的斗争获得自己对国民运动的领导权，而这一领导权是斗争中的中国各类社会力量相互关系中客观形成的。这种领导权并非一成不变，永远只表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这一种固定的形式。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从基本任务的角度看是适宜的，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知识分子的联盟，可是到了另一个时期却可能不适用了。但是中国革命的斗争方法在于建立无产阶级同城乡贫苦人民的联盟，而这个联盟基本上将同苏联的一样，这已为上海事件所证实。

这次斗争要求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上海事件堪称为伟大的历史起点。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也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把四万万人民团结起来，使其觉悟到要参加自觉的政治生活，这本身就必须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事件。但是，中国的人民群众要想团结一致，必须先推翻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动摇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基础，中国是不可能团结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对此十分清楚。因为上海事件使英国在政治上和物质上遭到的损失最大。在整整两个月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费了极大的气力也未能制服上海罢工工人的反抗。前后一年时间内英国人也未能解决中国南方对英国货的抵制。二十万人离开香港，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打击。

这是一次重大事件。它说明普及到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多么巨大！

那么帝国主义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伟大民族的这次惊天动地的觉醒呢？没有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对付中国革命的计划。美国拥有雄厚的资源。它可以放弃治外法权以获得在远东反对老牌帝国主义的资本。看来它应能首先提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可以包括支援中国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革命，只要它不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我上面引用的美国商务代办的那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新旧交替阶段自然为种种胡作非为的行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也会出现种种错误。但是，所有的民族，如同个人一样，都是通过沉痛的经验教训获得进步的。人类照例不能在事先就获得对付不可避免的灾祸的手段。重大的课题在未使用暴力为自己铺平道路之前是不会得到解决的。”这位美国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哲理得到了美国出版的资产阶级报刊的广泛赞同。可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家对哲理都缺乏兴趣，尽管中国革命已试图以暴力为自己开辟道路，他们却仍同英国帝国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这场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尚未制订出一条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路线。它参与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反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勾当，往往事后发表声明，宣称凡此种行为均非由它首倡，表示它对中国一向十分友好。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反应迟钝，不善于采取任何机智权变行动。《泰晤士报》在约翰·约尔登先生死后公布了他关于中国局势的备忘录，做得就极不审慎。约翰·约尔登先生是英国驻华使节，又是英中协会主席，他在英国被人称为出色的中国通之一。那末这位中国通面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的觉醒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算了一笔英国在中国投资的总帐，然后得出结论说：一个钱也不能丢。日本则对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忧心忡忡。它拚命试图保持对满洲的控制，并打算把它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时

它又力求避免同中国的民族感情发生过分激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实行的是纯粹的保守政策。关税会议本应是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谋求妥协的场合，但这个会开得不死不活，完全是纸上谈兵。

但是，帝国主义者单靠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保持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了。现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无力单独对中国发动公开的干涉。这是上海事件获得的最主要的经验。他们不得不借助于中国国内反革命的力量对中国实行干涉和反对革命。帝国主义大国的全部政策在于建立起反革命力量的联盟，以破坏中国革命。它们一方面力图拼凑这个联盟，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考虑，如何使这个联盟不致于发展得过分强大。美国会允许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把它作为保证美国向这一庞大国家进行渗透的工具。而日本和英国都不会实行这种政策。美国拥有足够的资本，即使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政府，它也有能力对其实行控制。对英国和日本来说，建立这种政府便意味着它们将丧失自己的殖民利益和特权。它们不仅将在中国受到损失，而且将要为中国这个虽反动但颇强大的政府将对朝鲜和印度局势发生的影响而担忧。所以，美国对吴佩孚和张作霖可能实行妥协一事未免提心吊胆。它怕这样会过分加强日本的影响，而日本和英国今天是在竭尽全力建立这一反对国民军和反对革命的联盟，不过一旦建成，它们又会想办法去削弱这个联盟。帝国主义是因为单靠自己力量无法对付中国革命才不得不把一切反革命力量调动起来的，它根本不可能采取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政策。帝国主义大国的对华政策有意无意是一项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企图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日益衰败下去的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的根基，这根基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继续受到阻碍，其结果将使上述矛盾更形

尖锐，导致贫困、毫无出路和绝望，而这一切最终必将酿成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上海事件把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都提了出来。它举起了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但是，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为了进行这一斗争还须把全中国的力量动员起来，而只有革命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广东省有一个工农政府，但在它控制的地区只有三千八百万居民，而且这个政府地处南部边陲，不能成为全中国斗争的中心。在北方，冯玉祥将军统率的国民军正跃跃欲试，打算起到这种中心的作用。但是，这支军队所占地盘人口稀少，资源贫乏，难以起统一全国的中心作用，更何况这支军队仅在不久之前才开始同民族运动建立联系。冯玉祥懂得该怎么行动，所以他在北京地区时虽力量处于统治地位，却不想掌权。在北京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因为北京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也收不到赋税，以中国人名义当官的人只能在那个地方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中国只有把中部各省联合起来才能统一。不把长江流域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统一不起来的。而这一任务只有在广州政府的力量不断增强和国民军发展为真正的革命军队之时才能完成。长江流域工业较为发达，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的人民最有条件发挥伟大的革命作用。现在长江流域处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之下。

吴佩孚十分清楚，他本身是革命浪潮的锋芒所向，所以他力图首先消灭国民革命军。把国民革命军作为打击对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吴佩孚一个人可以对付广州政府，而借助张作霖的力量对付北方的革命军；其二是解决了北方的国民军，北京就可以到手，而控制北京便可以在世界面前声称代表中国。由于中国革命还很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也缺乏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国民军的领袖不懂得，即使暂时不能控制奉天，也照样可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但不占领汉口却无法解决政权问题。革命方面对

另一点也不清楚，即中国革命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分化帝国主义列强，要选好方向，打击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就是英国，它虽然相当强大，却无法对中国的事务进行武力干涉。日本虽然经济实力较弱，但军事上却占有强得多的进攻地位。正因为不懂得分化敌人力量的必要性，国民军才遭受了挫折。不过，敌人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国民军依然存在并将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巨大的作用。

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计划的另一点，即消灭广州政府，已成为一纸空文。英国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游击队向统一军队过渡阶段常会发生的摩擦，企图通过国民党中右派买办阶级的代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制造分裂，但是，它的种种努力都属徒劳，反而使中国的革命者警觉起来，使他们看到了两项重要任务：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组织农民进行一场能使之真正摆脱贫困处境的斗争。

中国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两个支柱——国民革命军^①和广州政府都保存下来了。中国革命发展有了这两个工具，确定具体革命任务便会比过去明确得多。山东、河南和广东等省农民运动的发展说明，民族运动有多么雄厚的后备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经常性的斗争时期，逐渐深入到群众和各种组织中去。在上海时期，革命一度获得胜利，后来又在北方军事行动中受挫，但国民革命军^①保存下来了。敌人和反革命没有也不会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能担负起解决历史发展任务责任的、坚强的反革命政府。反革命不可能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不可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对解决土地问题更不会作任何一点尝试。它也不可能同世界帝国主义达成交易。所以国民军在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没有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造成任何

① 此处皆指冯玉祥的国民军。——编译者注

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进展。中国革命可以宣告，它自从在上海事件的烈火中诞生以来的一年中已经发展壮大。它一面手执武器进行战争，一面在锻造新的武器。它已从中国革命者理论上的预言和理想变成为一支伟大的历史力量。

值此上海工人英勇罢工一周年之际，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向走上了伟大历史斗争道路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穷苦大众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

（马宝华译）

冯玉祥大帅关于中国局势的谈话^①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

莫斯科郊外一个别墅村中有一幢木质结构的平房，屋前的小花园面对着空旷的街道。这就是几个月之前来到苏联考察苏维埃制度和苏联现实的中国国民军创建人和领袖冯玉祥大帅的夏季“府邸”。按照别墅的惯例，外廊上放着一张饭桌。大帅一家就围桌而坐。冯玉祥高大魁伟的身躯在他的同事中显得十分突出。

为了便于进行谈话，我们进入一间安放普通别墅家俱的房间，只有一张堆满书籍和手稿的大书桌与房间陈设形成明显的对照。

十分自然，第一个问题是：总司令来到苏联以后印象如何？

冯玉祥说：“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这里许多事情都使我惊诧不已。不过我只想讲一点，这就是共产党的活动。我知道，共产党不仅为苏联的福利而工作，而且还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我有幸看到不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收入和非党人士一样，而且往往还更少些，但工作量却大得多。共产党的英勇无畏、高昂士气和自觉地意识到对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使我十分钦佩。

红军也同样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红军的训练方法极其有效，十分正确。这里根本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原先沙皇军队

^① 这是《真理报》记者采访冯玉祥以后写的一篇报道，原文署名为С. Я.——编译者注

所常见的那种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现象，也没有那种靠棍棒维持的纪律。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所做的一切，苏联所进行的全部主动积极的创造性工作，都是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

接着，谈话转到中国的事态。众所周知，近日来国民军同它的敌人进行了作战，国民军已从它所占领的南口阵地撤退。我冒昧地向冯玉祥提出，他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军事形势，以及他如何看待国民军的失利。冯玉祥并不回避问题，他说：

“在报道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方面，我必须指出，莫斯科的报纸所得到的消息并非都是真实情况，因为它们的消息大多数来自驻北京的通讯社和军阀所掌握的报纸。此外，对于长达二千四百里（一千多俄里）的战线上的事态本来就很难掌握清楚。半年以来，国民军第一军一直同最大的两个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兵力作战，这还没有把他们的力量较小的同盟者计算在内。国民军第一军从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得到的支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两个军几乎已不存在了。

国民军所以具有力量而且在同优势兵力作战中表现坚韧不拔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它同群众联系在一起并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就是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也应当认为：国民军和广州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在一起是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的希望绝不能排除。

但是当前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张作霖、吴佩孚背后有英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撑腰，从政治上、技术上予以支持。我坚信中国革命必胜无疑，但我要重复一句，过分乐观是不妥当的。

我以为，目前中国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全力投入解放斗争，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遗余力。

（二）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寄希望于人民和敌军进步成份

的觉醒。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期望正在实现。吴佩孚、靳云鶚和其他军阀的军队中正在出现骚动，不久以前有三个师转向国民军方面。中国军人民族意识和革命的觉醒正在取得巨大成效。

（三）我们期望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给予我们声援和帮助。”

我向冯玉祥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国民军首领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而国民军即据此撤离南口的消息是否可靠？

冯玉祥回答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纷乱不安和极其困难的时刻。革命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会有摇摆、涨潮和落潮。在国民军某些人士中确有同奉系进行谈判的想法。我现在远离中国，很难对此作出明确判断。但我仍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谈判是可以容许的，也可能是中国实际情况所要求的。”

在告别时，冯玉祥补充说：“《真理报》是宣传世界真实情况的报纸。我坚信，《真理报》会象以前一样翔实而公正地报道中国革命各条战线的状况，以便有力地促进革命事业。这也是国民军的希望。”

（乌传袞译）

关于国民军第一军的撤退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A·伊文

据塔斯社报道，关于国民军放弃南口这样一个构筑有坚强工事的山口阵地的消息，使中外人士大为沮丧。国民军撤退后到现地巡视过南口阵地的外国军事专家断定说，国民军第一军撤退时看来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些都足以说明，这次撤退无论如何不是作战失败，而是由于某些军事上或纯粹政治上的原因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军事行动。

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由于国民军同奉系之间达成了临时性的协议呢（昨天冯玉祥大帅在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协议是可以允许的），还是因为纯粹迫于军事形势国民军才不得不撤退，例如，弹药储备急剧减少，而国民军与海口隔绝，本身又没有兵工厂，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对此不敢妄加判断。

同样，在距离战场几万俄里之外预言国民军将撤退到何处为止，也是一种冒险。国民军是否将放弃张家口，或者不仅将放弃张家口，还将放弃察哈尔行政区，并且，如塔斯社曾报道过的一种见解所说，转移到绥远和甘肃，我们均无法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从“最坏”的方面来设想，即使张家口和察哈尔均将放弃，又会出现何种前景：国民军将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只不过变换一下活动场所？

首先从撤退本身来看，由于国民军的战斗力没有受到损失，实力是完全保存下来了。整个绥远铁路，不仅在绥远境内，而且包括铁路所经过的山西省境内那一段，仍然在国民军的牢固控制之中。山西督办阎锡山的军队目前要切断这一条铁路，就是在直系军队的增援下，也是极其困难的事。张作霖、张宗昌的军队通过张家口、察哈尔和山西北部追击国民军要冒极大的风险。恐怕对国民军威胁最大的倒是陕西战场，与国民军第二军抗衡的吴佩孚扶植下的刘镇华的军队几个月来一直包围着陕西省会西安府。

随着撤离南口，特别是一旦国民军退入绥远和甘肃，陕西战场对于国民军将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只要了解一下陕西省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陕西省的北部和西部与绥远行政区和甘肃省相邻接，即靠近国民军第一军的地盘。该省南部和东部（到黄河以南）则与吴佩孚的“世袭领地”四川、湖北、河南等省接壤。陕西省东部隔黄河与“模范督办”阎锡山的山西省相望。

如果在张家口附近或陕西战场不发生意外的变故，如果国民军第一军果真向绥远移动，毫无疑问，吴佩孚必将派出相当大的兵力前往陕西，并力图最后攻占西安府。因为西安府不仅是陕西省的省会，一个主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而且还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主要的通路。也是仅有的几条道路，都以西安为起点：一条向东通往河南和山西；另外两条向西面和西北方向通往甘肃；另一条通向本省南部，然后又分为两条路，一条通往四川，一条进入湖北。

吴佩孚如能攻占陕西省，则对国民军第一军的地盘造成直接的威胁。相反，如果国民军第二军即陕西军队在国民军第一军腾出的部队配合下得以解救西安府之围，控制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之间的潼关通道，国民军的阵地就无法攻破，因为陕西省有四

面环山，在战略上处于极为理想的地位。此外，**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湖南省，国民军如能在陕西站稳脚跟，将使直系（即吴佩孚）在湖北和四川的兵力陷入困难的处境。一旦出现这种局势，吴佩孚未必能够期望奉系会给他什么帮助。**

我们不能预先断定国民军是否有可能同奉系达成协议，或者国民军是否会同所有参加“联军”的派系进行谈判（塔斯社曾报道过这类传闻），也不能预先断定张家口和察哈尔是否必须放弃。我们只是想帮助读者理解，**只要国民军第一军保持了战斗力，即使退到绥远和甘肃，也绝不意味着国民军将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乌传袞译）

国民军的处境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A·伊文

据塔斯社报道，8月19日“联军”未经战争占领了张家口，国民军向西撤退。所谓“向西”，无疑应是指沿绥远铁路方向。这条铁路在张家口附近进入山西省北部，折向西南深入该省到达大同府，然后又几乎再拐一个直角转向北方进入察哈尔行政区。穿越察哈尔西南部以后，绥远铁路进入绥远行政区境内，通过该行政区首府绥远^①直达位于黄河左岸即北岸的包头。包头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从这里通往外蒙古各地区、中国土尔克斯坦^②和甘肃省的通商要道。

从包头到红色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商队通道要经过约二千华里（一华里相当上六百一十九点二五米）^③的草原地带，其间还杂面积广袤的荒漠地区。

另一条商队通路是从包头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这条路在我国的地图上相当于从昭寺（译音）到赛尔乌苏，然后再同从包头到乌兰巴托的公路相接。从赛尔乌苏起道路折向西北方向，沿原先帝国主义邮路到达乌里雅苏台，然后再向西北到科布多，^④转入水源丰富的草原地带。

① 应为归绥。——编译者注

② 指新疆。——编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④ 今为吉尔格朗图。——编译者注

从包头到中国土尔克斯坦沿商队通路乘骆驼行走约需六十天。第三条道路是从包头通往甘肃的。这一条路要讲得详细一些。从包头到甘肃的主要商业城市靠近绥远行政区边境的宁夏，^①计一千三百华里。自去年年底起，经国民军第一军的努力，已经建立了汽车交通线，使两地的行程从十一至十二个昼夜缩减到二十三个小时。此外，包头和宁夏之间，在黄河上约有五千只中国民船来往航行。沿这条水路行驶，从包头到宁夏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回程即自宁夏至包头只要十八天。不过从11月中至3月末黄河冰冻期间航行中止。旧的“小车路”这时十分活跃。最后，从宁夏经过中卫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据中国响导介绍，路上需走十一天。从宁夏到中卫一路是平原，但从中卫到兰州之间有大量荒凉的沙漠和高峻的山隘口。从包头到兰州的商队一般宁愿走北面一条较远的路，因为那一带都是草原，便于骆驼觅食。

必须指出，国民军第一军修筑包头到宁夏的公路，本意是一直把它修到兰州，然后从兰州通过平凉到达陕西省首府西安府，最后再从西安经过潼关修到陇海铁路终点观音堂。如能做到这一点，西北地区就可由铁路环绕起来。^②这不仅具有巨大的略战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因为西北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煤炭和其他资源，广袤的土地也亟待开发。只要多少有一些方便而费用低廉的交通道路，整个地区就会欣欣向荣。我们不知道国民军从宁夏修筑的公路已经修了多远，同样也无法知道甘肃其他地区公路交通处于何种状况。而且，即使道路已经修筑完成，甚至目前有道路，也并不等于说这些道路正在发挥作用。冯玉祥大帅在担任陕西督军时修建的公路老早就已变成了普通的，只是路面稍微宽一点的中国“小车道”，满是车辙，恐怕连一辆汽车也无法通过。因此，我们确有把握地说，在包头与宁夏

① 今为银川市。——编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之间可以通汽车。

今天塔斯社的电讯报道说，大同府已经被占领，国民军正向和丰镇和包头撤退。这样一来，原来判断的国民军已向绥远行政甘肃省退却的估计似乎已经得到证实。不过人们要问，国民军将退到哪里为止，一旦敌人追击又准备在哪里接战呢？我们认为，只要国民军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它绝不会不经战斗就轻而易举解弃包头和绥远行政区首府绥远的，同时它无论如何也要全力扼守住上面提到的从包头通往乌兰巴托和乌里雅苏台的商队通道。这是第一点。第二，鉴于吴佩孚还在很早以前讲过的话（“我不认为国民军会进入甘肃。它的一个师在甘肃已经被缴了械。它清楚地知道，那里不会好好接待它。”），我们必须讲一讲甘肃的形势。

去年，“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任命冯玉祥大帅为甘肃省督办（军事省长）。冯即派出刘业丰将军为代表和钱宏猷将军为副使率领两个师前往。他们第一件事是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付举行叛乱的原督办的支持者和他手下纪律涣散的军队。军队几乎没有流血就缴出了武器，所有武器均送往包头。当地一名师长李长清将军和包玉湘上校被枪决。这样一来，正如发自兰州的一份新闻报道所指出的那样，“在新政权与甘肃军政界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对此特别恼恨的是一些所谓镇守使，即下一级督办（这类长官在甘肃共计有八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军的统治一巩固，他们“独立”的日子就不多了。于是他们表面处处顺从，实际上却准备一旦有机可乘就给予他们所憎恨的国民军以打击。当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时，这些镇守使以为时机已到。不过公开举事的只有陇东镇守使钱蛟亚，他本人一心想登上督办的宝座。我们不准在这里详细叙述战事的所有细节，只是说明5月份国民军部队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发展到甘肃省会兰州几乎要被围困起来。其他镇守使未敢举行暴乱。其中有两名还以财力和

食物支援国民军。国民军不但击退了所有的袭击，而且本身转入进攻。发自兰州的一则消息说，“无论在甘肃的南线还是在甘肃的东南战线上，国民军都是愈来愈打胜仗。”这是7月初的情况。从那时起，甘肃的局势不是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发生了有利于国民军的变化。否则北京的报纸不会对甘肃的局势缄默不语。由此可见，国民军在前往宁夏和兰州途中，除了自然条件的困难之外，未必会遇到任何其他障碍。

最后，也即第三点，要认清真实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到陕西战场的形势。陕西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战场。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被击溃的第二天，吴佩孚就任命刘镇华为陕西督办，并且甚至答应授以陕甘巡阅使的职务，条件自然是刘镇华能把“赏赐”给他的两个省份夺到手中。但刘镇华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在从潼关到西安府的大路沿线占据了五到六个县，而西安府他只是毫无成效地围困了几个月。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西安府除了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作用外，在战略上也十分重要：从该地有大路通往陕西邻近各省，包括通向甘肃省。为了使读者了解得更加清楚，我们这里举几个数字材料来加以说明。从陇海铁路西端终点观音堂到西安府这一段已由刘镇华部占领的大路，行程最少为六至七天；从西安府到兰州需要十六天；从兰州到举事反对国民军的陇东镇守使驻地平凉需要八天（这也是指条件特别有利时的情况，尤其是指气候条件）。因为陕西省在雨季以及大雨之后的两周之内道路一片泥泞，根本无法通行。

如果吴佩孚打算无论如何要“消灭国民军”，他必然不惜给刘镇华派出相当数量的援兵，使其能够打下西安府并向平凉，即向甘肃挺进。从另一方面看，加强国民军第二军即陕军的残存兵力并把刘镇华从著名的潼关驱逐出去，对于国民军第一军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国民军第一军是否准备这样做和能否做到这一点，还

是很大的疑问。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联军”的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从观音堂经过郑州、北京和张家口直到大同府（现在很可能已直达丰镇）的铁路线，全程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如今全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联军”的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无论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乃至张宗昌，他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还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因此，子弹也好，炮弹也好，数量均很充足。而国民军可惜就没有这个条件。国民军的处境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但也绝非毫无出路。

（乌传袞译）

中国各种力量的分化改组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A·伊文

根据塔斯社最近以来的报道，中国的局势可大体叙述如下。说击溃乃至“歼灭”国民军是根本谈不到的。所有目击者都证实，国民军的撤退井然有序。其次，由于“联军主力在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之前不会向张家口前进，”而进行“追击”的只是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少量部队，国民军并未面临重大的危险。第三，这种“追击”说明，国民军同张作霖之间并未达成某种协议。第四，从南线即长江战线来看，广州政府军队的进攻发展顺利。唐生智军的左翼已进入吴佩孚的主要军事和财政基地湖北省境内。第五，孙传芳，与原先的报道相反，仍然继续坚守武装中立，只考虑到保存自己的地盘，暂时还没有为老上司吴佩孚火中取栗的强烈愿望。最后，第六点，就是必须强调指出塔斯社的一条简短报道：在邻近广东省的福建境内（当时福建也归孙传芳管辖）发生了农民队伍的起义。

塔斯社报道的有关各条战线的消息就是如此。

国民军第一军从南口、张家口和大同府撤退和进入绥远行政区和甘肃省，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使中国“国内战争”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看清全面的局势，必须大体了解一下中国相互竞争的各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首先来看一看张作霖领导下的奉系。这个集团除拥有一千八百万人口的满洲（即奉天、吉林、黑龙江这

“东三省”）以外，还控制着山东（三千万至四千万人）、热河行政区，以及直隶省（三千万人）的一半或（随着吴佩孚的注意力很快将转向长江一线）全部。随着国民军的撤退，察哈尔行政区看来迟早也将落入奉系手中。这就是说，奉系军阀将要控制的地区，因而可以横征暴敛的地区共计约有七千万至八千万人口。

第二个集团是吴佩孚集团，它主要拥有湖北和河南两省，人口共计约六千万至六千五百万。四川（约五千万至七千万人）由于内部派别斗争激烈未必会对吴佩孚集团有所帮助。

在陕西，吴佩孚扶植的刘镇华将军虽然围困省城西安府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他所能控制的地盘只是西安至潼关大路沿线的几个县而已。至于吴佩孚在直隶省所占有的部分地区，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如果 he 不想和张作霖完全决裂的话，很快就要撤离。

第三个有力量的军阀集团是孙传芳将军的军队集团。他拥有江苏（三千四百万人）、安徽（二千万人）、浙江（二千二百万人）、江西（二千四百万人）和福建（一千三百万人）五省，人口合计约一亿一千万人。此外，还有在这次战争中站在联军一边的阎锡山（他统治的山西省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盘踞在云南省（约一千万人口）的唐继尧将军，以及军事力量特别薄弱的新疆（或称中国土尔克斯坦，约二百万至三百万人）督办杨增新。这些就是目前同广州政府和国民军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抗的各个反动军阀集团。

如果说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在军阀联盟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半个陕西省（部分由刘镇华将军占领、部分由亲安福系的将领们占领）、河南省、直隶省、热河行政区，以及现在看来还有察哈尔行政区，即共计人口约六千万至七千万的地面，那末在这段时间内广州政府则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或者控制了）广西（一千二百万人）、湖南（二千八百万人）、贵州（一千一百万人）等省。加上广东（三千七百万人），整个地区人口已近九千

万人。

此外，国民军第一军目前占领着地区广袤、人口稀少的绥远行政区和甘肃省，两处共计有汉族、回族、蒙古族人七百万至一千万人。

溃散的国民军第二军残部，则只保有半个陕西省。

如果从居民人数、技术装备和财政实力来看，不仅国民军，就是国民军和广州政府加在一起，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军队集团，不只是远远低于整个军阀集团联盟，而且低于三个主要军阀派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中的任何两个。

这种情况使许多人对于国民军继续作战的前途，以及与这次作战直接相关的广州政府军队向湖北的进攻，都产生了消极的看法。悲观论者说，广州政府军队的进攻所以至今发展顺利，这只是因为吴佩孚的好几个师忙于在北线作战。如今，这一批兵力已经腾了出来，同时另一方面孙传芳又在动员自己的兵力，而英国也准备尽自己的一切可能给予联军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以求消灭它早已恨之入骨的广州政府。这样，广州政府的北伐必将遭到失败，最后连广州政府本身的存在也将受到威胁。国民军反正迟早不仅要撤离南口一线，而且要放弃张家口和大同府。这样一来，当前条件下进行北伐的唯一明智的理由，即牵制吴佩孚的兵力这一点，也已失去意义。因此，对于广州政府来说，不介入纷争，积聚力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解决广东省这样一个拥有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万人口的相当于整整一个国家的地区内的大量困难问题，不是要好得多吗！

不能说这种悲观论者的观点毫无理由。但是我们却不能赞同。当然，谁也无法担保广州政府革命军队今后向湖北的进攻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当1911年10月10日一批中国革命者在武昌举行起义时，谁又能担保起义一定会胜利呢？而结果起义竟发展成为“第一次”中国革命，并推翻了满清王朝，当时清王朝拥有一

大批由德国教官组训的精良的师团，而革命者在起义之前连一个师也没有。在当前情况下也是一样，民族革命力量的胜负问题不能单单根据在军事力量和财政实力上同敌人进行比较而随即做出判断。

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首先，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苦力，以及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而主要的还有中国主要的阶级——中国农民，他们对于军阀的憎恨绝不低于对满清王朝的仇恨，而工人与农民对于军阀的憎恨可以说更甚十倍。此外，无需证明就可以看出，今天不仅中国无产阶级而且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学生都比十五年以前有组织得多，觉悟得多，因而也有力量得多。至于说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那么任何一个研究过第一次中国革命同时也多少了解今年华北农民运动的人都会同意，这次以“红枪会”起义为最突出代表的农民运动早已超过了武昌起义前“哥老会”、“三合会”等组织的活动。当然这并不奇怪。且不谈由于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和中国资本主义关系不断发展所引起的整个经济制度的动摇，仅仅由于连年战祸和军队数量的急剧扩大，中国农村已被无比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了。现在农村赋税之重，是满清王朝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农民在军阀压榨之下已经走投无路。农民暴动此伏彼起，不管当局的镇压多么残酷，仍然遍及各个省份。除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安徽之外，我们又得知福建也发生了农民起事的消息。关于这个省的农民运动我们掌握了颇有价值的材料，但只能另外专门撰文介绍了。在本文结束时我们想要强调说明的是，当前中国的局势充满了革命的气氛，这个局势要求所有的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国民党、广州政府，以及国民军，担负起重大的历史任务。

(乌传袞译)

占领汉口以后（军事述评）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Д·萨赫诺夫斯基

占领汉口宣告北伐第一阶段业已完成。不久前还局限于一省范围内的广州政府，现在拥有的领土已经扩大，包括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五省，人口计达八千万至九千万人。国民革命军从偏僻的，同全中国隔绝的广东省已经进入长江流域，并在中国的中心的武汉站稳了脚跟。占领武汉以后，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获得了工业经济中心，而且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中心，原是反动势力堡垒的武汉，变成了革命力量的首府，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瞩目的中心。不必说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甚至商会这种代表大、中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都日益同情地关注着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广州政府和国民党的威望急剧上升。**这反映在邻近省份（四川、江西、福建）各种各样的将领都改变了态度，争先恐后地急于同广州政府进行谈判。张作霖所以犹豫不决和不断变换手法，其原因也在于此。张作霖虽然大张旗鼓地表示准备通过河南和江西分别“支援”吴佩孚和孙传芳，但与此同时却一再试探有无可能由广州政府和奉系这两大集团瓜分中国，并共同组织北京的中央政府。最后，**连一直无视广州政府存在的列强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美国人在中国、日本和本国办的报刊都十分关心地注视着国民革命军的各次作战。他们在报刊上对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毫不指责（而至今为止英国报刊还在这样做），甚至相反，还显示出某些含蓄的喜悦心情，并且所作的报道极其公

正。对于广州政府在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从美国各种渠道传来的评价都是表示赞许的。**美国对于广州政府和国民党的政策，早在攻占汉口之前就已有所转变**，但是自从北伐取得最新的胜利以来和万县惨案之后，在英国保守党报刊疯狂叫嚣进行武装干涉的喧闹声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更是特别明显。

至于英国，自然不能期待它会转变对华政策。广州政府仍然被它认作是一名死敌。国民党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对它不啻是一场灾难。尽管如此，英国不仅不中断同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关于经济抵制问题的谈判，而且撤回了不久前在广州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并且带着无法掩饰的愤懑心情准备同它所憎恨的广州政府进行协商。

这首先说明，英国人已经不再期望广州政府军队最近期间内会在华北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军队迅速向北挺进，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预见到不少情况，但就是不曾预料到“广东军队的作战竟会如此神速”（9月9日《每日电讯报》）。诚然，在最近两年以来广东事态的演变过程中英国人可能已经深信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关的行动在中国的条件下确是迅速和果断的。但是，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却忽视了年青的民族军队的成长壮大。这支军队充满了革命的情绪，受到坚决进攻精神的教育。因此，对于在国民革命军后退以后对它估计过低并因而采取了同广州政府加深分裂的方针的英国人说来，广州政府军队的迅速推进实在是极大的意外。这种进攻速度预先就决定了吴佩孚必然溃败的命运。当吴佩孚到达汉口时，他的军队已在这以前的各次战斗中被打得溃不成军，正在南军尾追不舍的压力下向汉口退却。**这种进攻速度也使孙传芳措手不及**。当广州政府军队攻占汉阳和汉口时，孙传芳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腾出来的兵力在江西集中完毕。看来，孙传芳原打算收一箭双雕之利，企图等到吴佩孚和广州政府的北伐军进入决战之时再参加某一方作战而决定战争的结

局。奉行这种狡猾的政策结果反使他自己不得不对付整个广州政府的军队，因为广州政府军队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吴佩孚，目前已作好同他作战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孙传芳的内部也不够稳固**。连毫不隐讳自己亲孙传芳观点的上海英国报刊也指出，在五个省中至少有两个省（安徽和江西）只是表面上服从孙传芳，这两个省的省长任何时候都会背叛他。福建的情况比较好。但福建省长周荫人即使决心援助孙传芳，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全部兵力，因为他在福建南部的一些部队正在进行归降广州政府的谈判。甚至在浙江、福建这两个孙传芳的主要省份，也有一些不能完全依靠的地方部队。简单地说，在孙传芳统辖的五个省的号称十五万至十七万人的军队中，他能用来对付广州政府军队的只有他自己直属的三万至四万人。

至于说到其他方面的援助，那情况就更糟了。吴佩孚在武昌城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一万五千多名士兵随着他向北退入河南。其他部队，除武昌守备部队外，命运已经注定：一部分已经溃散，一部分被解除了武装，一部分转到了国民革命军方面。**期待吴佩孚在河南军队的援助下举行反攻是不可能的**。河南督军对奉系军阀答应给予吴佩孚“援助”一事极度不安。奉系军队增援吴佩孚必须经过河南，这无异于把河南交给张作霖占领。正因为如此，河南督军不见得会把他驻守河南北部的军队抽下来作战。而且至今为止，他还没有镇压住省内的起义（冯绍闵和红枪会），并且对陕西的局势十分担心。孙传芳还存在一个希望，那就是张作霖的援助。丝毫不必怀疑，英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动用自己的外交家和塞顿将军一类顾问的力量，以便推动张作霖联合孙传芳同广州政府作战。不过英国外交人员的能量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在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不是每次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看来他们这次努力也将徒劳无功。

奉系的力量因在华北进行了激烈作战而受到很大削弱。虽然

取得了胜利，但财政状况十分不稳。奉系亟需进行休整和取得财政补充。同广州政府军队作战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广州政府同奉系的利益暂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奉系和广州政府是现代中国的两极，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一方对此均尚未作好准备。双方都力图在中国起主宰作用，但任何一方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夺取主导地位。从领土上说双方并不直接接壤，而孙传芳所辖最富庶的省份江苏以及上海却与张作霖的地盘相邻接。江苏已经落到过奉系手中一次。孙传芳赶走了奉系。张作霖和张宗昌（山东督办）对此不会忘怀。他们同孙传芳之间有一笔旧账。因此，孙传芳将从奉系那里得到的可能不是援助，而是背后射来的一支暗箭。所以说，孙传芳同广州政府作战归根到底只能依靠他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孙传芳同广州政府的冲突将会有何种结局呢？占领汉口以后，国民革命军只派出少量部队（八千至一万二千人）追击吴佩孚，对付河南也只局限于采用积极防御的办法防守北线，而**主要兵力则转而指向孙传芳**。决战可能在江西北部进行。孙传芳在江西北部已集中了五万至七万人的兵力（包括江西军队在内），广州政府军队也正以其特有的高速度分几路向那里挺进。中路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从湖南中部出发，于9月6日占领萍乡，正向临江和南昌（江西省会）方向前进。左路三至四个师（一万至一万四千人）进入江西，未遇顽强抵抗现已占领宜宁^①，似将向南昌方向前进同中路军会合。第三路还在北面，执行单独任务：占领长江岸边的九江。最后，第四路为四个江西的师（六千至七千人），是不久前刚并入广州政府军队的。击败了敌方南线部队，于9月初占领了赣州，并继续往北向吉安方向推进。这一路很可能不参加南昌作战，而用于掩护广州政府军队保

① 译音，可能是宜丰之误。——编译者注

障其免遭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

大家知道，要预言中国国内战争的结果是十分困难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大胆地断言，**击溃孙传芳和攻占江西、福建、甚至浙江，已是必然无疑的了。**能够挽救孙传芳的办法只有张作霖立即派兵援助或是外国武装干涉。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革命军内部团结削弱，因为大量同路人不久前才与广州政府联合致使人员总数过于扩大。

我们认为，无论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都不能解救孙传芳使其在即将于一、二周内在江西进行的**决战**中免遭失败。

(乌传袞译)

广州政府的胜利和中国的革命运动^①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广州政府军队最近击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将军，以及浙江省主动向广州政府靠拢，这使中国革命政府的权力几乎扩大到上海近郊。不久前还统辖五省的孙传芳专制政权迅即土崩瓦解。保持中立的军阀集团有的消失了，有的转到了广州政府一边。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局势：中国实际上处于张作霖和广州政府两种势力的统治之下。

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盟，正如预料的那样，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张作霖持中立立场的做法，实际上向广州政府提供了逐个粉碎自己同盟者吴佩孚和半同盟者孙芳传的机会。

看来，最近一个时期张作霖的北方政权与国民党的南方政府同时并存已是不可避免。民族解放运动在那些居民从来没有见过革命政权的地区获得了胜利。对广州政府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取得这些地区居民的信任，改善所辖各省农民的处境，进行政治改革。以前，国民党的基地只有**广州**这个小手工业城市，现在拥有大量产业工人的工业最大中心**汉口**也已成为广州政府的活动地区。这种局势有利于国民党完成任务，使广州政府能够巩固其地位并获得工人阶级对它的更大支持。由于目前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占统治地位的中间派同共产党协力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的同时，正好起着使国民党同工人阶级相符合的

① 此文原署名为Φ·N—B。——编译者注

纽带作用。

统率广州政府军队的蒋介石非常清楚，如果军事胜利不从政治上加以巩固，那么就有可能转变为失败。正确的政治指导，以及使国民党中间派和左派保持适当的接触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最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尽管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但居民大多数仍是农民的国家里，制定正确的农民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北伐需要大量资财。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广州政府为了取得必需的财力，自然不得不采取强征手段。这种特别征收的税款大部分要由农民承担。现在必须改变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有产阶级中间寻找税收的来源。

国民党政府在真正统一中国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它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在几乎半个中国贯彻实施孙中山的各项原则。在这一部分地区，广州政府必须摧毁残余的封建神权制度，使已联合起来的各省全面实现民主化，以及召开国民大会。

最近的所有事件都暴露出世界反动派的软弱无能。尽管国际帝国主义极端仇恨广州政府，但它却不能阻碍广州政府取得巨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做的事，最多不过是派军舰示威和派兵在沿海城市登陆。世界各国帝国主义分子支持某些军队将领。唆使他们互相斗争的惯用伎俩，已被证明是破了产的货色。广州军队刚一转入进攻，这些勉强拼凑起来的军事集团就象秋风下的落叶一样荡然无存了。与广州相对抗的唯一实际力量是张作霖，这两种力量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能的。其中之一迟早会获得胜利。广州政府的立场加强了它与国民军的联盟。国民军尽管在退却，但保存了有生力量。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与广州政府军队实行联合，从而使广州军队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犯重大错误，如果革命军能挫败个别军事首领的分裂主义企图而保持统一的整体，那么，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将走上正

确的道路。目前中国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灿烂。在这方面广州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

（高和平译，章任贤、乌传袞校）

广州新胜利的意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Д·萨赫诺夫斯基

旷日持久的江西战事即将结束。国民革命军自11月初（按计算是11月3日）开始的总攻发展顺利。广州政府的南昌军队集团得到围攻武昌的那个军攻克武昌后的支援而加强了兵力，看来，其目前主要任务是合围和粉碎孙传芳在南昌地区的主要兵力。九江是赣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孙传芳整个战略前线的主要据点。随着九江的陷落，孙传芳被赶出江西已在所难免，当然，这必须以广州军队能扼守住九江为条件。

必须给孙传芳及其军队以应有的评价。在赣北两个月的顽强防御中，孙传芳及其最亲近的助手表现出他们是一些即使在失利的情况下也不惊惶失措的头脑清楚的军人。

孙传芳坚决、果断、迅速地击退广州军队的进攻，这是后者所没有料到的。国民革命军无疑低估了孙传芳部队的战斗力，并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结果两次进攻受挫，损失惨重。这个错误之所以特别不能原谅是因为在去年孙传芳打败奉系之后他赢得了中国优秀将领的声誉。广州军队从1925年起就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粉碎敌军，锻炼自己，取得了节节胜利，而1924年末仅拥有一个福建省的孙传芳却在很短的时期内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军阀，表现出既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又是一个灵活的政治家。从他在这两年经历的种种事件中的所有行动可以看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表现了大胆和顽强精神。广州政府的军队

本应懂得，孙传芳才是他们真正的对手。要击溃吴佩孚及其五花八门拼凑而成的部队，只要给予一次突然而迅速的猛烈打击就足够了。可是，要战败孙传芳，除了作战时要果断、迅速外，还需要对战役进行认真的准备和保证取得兵力上的优势。拥有优势兵力是广州军队获胜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第一，孙传芳在接战时投入的兵力都是完整无损的精锐部队；第二，其部队的各种物资供应状况都比广州军队好；第三，作战地区（在赣北）的地形为他提供了内线作战的条件，而广州军队在第一次总攻时，却分成几个纵队，彼此之间又由难以通行的山区加以隔绝而相互孤立。这次对江西的进攻虽然大胆，但是准备很差，结果是广州军队遭到局部失败，被赶出了他们在9月22日占领的南昌。现在轮到孙传芳转入进攻，它的先头部队离被围的武昌只有三、四十公里。9月末这段时间是广州军队最为艰难的时期。

在这个紧急关头，国民革命军表现出比向汉口胜利进军时更加明显的所有优点。尽管损失巨大，但南昌军队集团很快重振军威，不仅阻止住了孙传芳的进攻，还迫使他在湖北的部队从汉口附近撤退。

广州军队目前进攻的条件比以前更为有利。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已出现的孙传芳部队瓦解的进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停顿地向前发展。这一过程的缓慢发展，广州军队的局部失利，江西一带的顽强防御，对夏超^①的镇压等种种事实，曾经使某些观察家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孙传芳将能对抗广州军队，保住自己在华中的地盘。在这里，他们完全忽略了一点：国民革命军在战局初期只动用了部分兵力，它在广东、湖北、甚至在敌军队伍中还有自己的后备力量。孙传芳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周就耗尽了自己的全部预备队，后来只能依靠灵活的机动兵力来建立自己的防御体

① 夏超系孙传芳所辖浙江省长兼杭州守备司令，受蒋介石利诱宣布独立。孙立即派兵将他击溃和俘虏，并就地枪决。——编译者注

系，广州军队却继续投入新的部队（尽管规模都不大），并且这些预备队的大量人员是由孙传芳部队的士兵补充的。孙传芳军队的兵力不断减少主要不是由于作战伤亡，而是因为某些部队的背叛。这种背叛活动先是在江西，其次在福建，后来在浙江，目前，根据尚未核实但确有可能的消息来看，在安徽和江苏都有发生。在同一时期，由于不断补充新的部队而惊人扩大的为数众多的国民革命军中却没有发生过一次叛变行为。

必须说明，孙传芳军队的主要核心是他1924年从福建带出来的，后来又随着他的发展和荣升而得到加强的那些部队。这些部队直至最近还保持着战斗力，过去他们作战顽强，将来也会死战到底。江西作战所以如此旷日持久，原因即在于此。广州军队可能还要费上一番周折，才能迫使孙传芳的核心部队全部撤退，或者把他们消灭掉。因此，在同孙传芳的作战中可能会再次出现障碍，但是，由于从一开始总的形势就不利于孙传芳，这种阻碍不会引起实质性的变化。**孙传芳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立因素正在苟延残喘。**目前，孙传芳作战既不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也不是为保护五省联盟的边界不受侵犯，而仅仅是为自己保住一、两个省的地盘。孙传芳早已转为防御，他今后的命运问题将由广州和奉天之间的协议来决定。

尽管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两股主要力量（广州和奉天）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它们的轮廓正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吴佩孚，孙传芳、杨森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剩余的和虚有其表的独立性。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投靠以奉系为首的反动阵营，还是投奔民族解放运动的阵营，这已是不可避免的事。

两股力量都在把中国政治的积极因素集结在自己周围：一个是奉系，它虽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但仅此而已；另一个是广州政府，目前它已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不管吴佩孚和孙传芳如何叫嚣，他们妄想恢复失去的地盘或者无视已

形成的力量对比而任意行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高和平译，章任贤、乌传袞校）

广 州 的 胜 利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谢苗诺夫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说：“西方应当承认，条约赋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美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应当取得关税自主权。不管中国的实际政权设在哪里，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西方在同它打交道时，只能按照这种精神执行对华政策。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会使问题含混不清，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主要是民族问题。构成俄国与东方的中间环节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未被承认的民族主义。”

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对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对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来说，遗憾的是他们已经错过了关税自主是中国的根本问题的那个时代。现在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受不受外国奴役，反动派能否立足，中国将来能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

中国最近的事态和广州军队的胜利把这些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决不会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高兴。革命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华南。广州军队不仅夺取了武汉三镇这个最重要的地区，而且几乎整个江西以及安徽和福建的一部分也处于广州政府的实际领导之下。浙江省已发生反对孙传芳的起义，可以看出该省承认广州革命政府的时刻即将到来。广州政府军队极其迅速地扩大战果，使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反动派措手不及，因此反动派现在要作出某种决定并非易事，尤其是考虑到广州军队所具有的强大战斗力以及广州政府在所辖各省建立新政权时表现出的良好组织

能力，他们就更难于作出决断。

《时代报》要求帝国主义分子迅速作出决定，尤其是尽快地予以实行。但是很遗憾，帝国主义分子目前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措施是非常困难的。各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在华利益仍然不一致，某些帝国主义分子不喜欢的东西，另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则明显地或隐蔽地表示满意而予以接受。目前，日本以及英国的其他“朋友们”并不曾忘记去年的经验。目前要想粉碎革命军队，只有在当地反动势力，尤其是张作霖军队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因为现在中国实际上已没有另一支能够与广州政府相抗衡的反动势力了。吴佩孚垮台了，孙传芳遭到了惨败，某些地方将领不敢冒险行事，出于各种考虑，包括出于保存自己的考虑而竭力向广州政府靠拢。张作霖去年登上全国舞台后的结局对他来说是很悲惨的。在那次进攻中张作霖遭到了失败，并且付出了自己精锐部队（郭松龄部）起义的巨大代价。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张作霖军队中某些将军的冒险行动可能会造成上述同一种局势，从而使日本在华投资的主要基地满洲受到威胁。日本暂时满足于他们既得的实际利益，而把较远的任务放到将来去完成，它无意为英国火中取栗，因为首先能利用张作霖胜利成果的当然不是日本。确实，如果由政友会上台代替目前的宪政会内阁^①在日本执政的话，那么日本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干涉中国事务，但是目前局势暂时肯定不利于这种干涉。此外，日本还期望，在同广州的关系中它采取较为和平友好的立场将比它公开进行干涉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当广州举行那场著名的反英大罢工时，日本在这方面就取得了一些经验）。

至于美国的立场，国务院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正式声明表示得很清楚。当英国在某些“利害有关”的国家里试图建立统一战线

^① 1926年日本首相为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1927年4月下台，由政友会的田中义一组阁。——编译者注

时，美国报刊和官方的言论都证明美国不愿在那个时期干涉中国事务。当然，这并不排除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改变政策的可能性，但暂时我们仅知道美国无意进行干涉。

目前的局势就是这样。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州能否巧妙地运用其策略。很明显，除了军事任务以外，广州政府现在还有一系列其他重大任务。需要真正对已占领的各省进行管理，需要处理好同归附的军队和将领的正确关系，需要对投诚兵士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需要设法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正确考虑革命可以利用的一切因素。广州政府需要制敌正确的政策，以便不让面临直接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有联合起来向广州进攻的机会。

今后可能出现一些喘息时机。当然，不仅广州政府，它的定人也都将利用这些时机。但是，中国革命派和反动派积聚力量的速度是不同的。广州政府得到中国广大居民阶层越来越多的同情，而反动派却谈不到这一点。反动派只能加强自己的军事基础，它可以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军事装备，但是它不能就此得到群众的支持。

不过，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分子将加紧准备同广州政府斗争，因为中国局势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仅仅中国一国的范围。除了军事和其他准备工作外，帝国主义分子还将采取瓦解广州政府牢固基础的种种措施，试图依靠目前支持中国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集团。从这些措施来看，本文开头介绍的《观察家报》的评论当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可能出现的暂时喘息时机不应使任何人感到不安。我们知道，中国各种力量的分化已经如此深刻，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不久就将出现冲突。从未来的这一冲突和中国前所未有的尖锐斗争的观点来看，我们应当准备好接受在中国事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

（高和平译，章任贤、乌传袞校）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瓦西里耶夫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组织中国革命力量方面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国民党的口号下进行的。国民党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执委会认为它的党拥有三十万以上的正式党员。毫无疑问这个数字并未夸大。此外，更多的群众同情国民党，并不同程度地支持国民党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谁领导国民党，谁就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1925年上海事件^①把中国无产阶级推上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先锋和政治领袖的地位。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决议精神，上述情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展现了远大的前景。但是，即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在1925年扮演了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这样的角色，这还不意味着这种地位已经必属它无疑。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扩大和加强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如果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没有坚定正确的路线，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可能丧失这个地位，甚至必然会丧失这个地位。

这个问题现在怎样了呢？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便可以

① 指“五卅运动”。——编译者注

在国民党内组织起一个党团推动国民党向左转，转向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但是，这一点能否实现呢？国民党就其成员的社会成份来看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和参加革命农民组织的贫农外，国民党内还有上海的一些颇有名望的工商业家、地主，以及旧行政机构的代表人物。这些社会成分形形色色的人物过去和现在是怎样联合在一起的呢？首先是由于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广东是国民党执政的一个省，在那个省里，一些旧制度的活跃人物有时也渗入到国民党的队伍里。他们公开说：“抬轿子的是人民，坐轿子的是国民党。我们当然是想成为坐轿子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等等。不言而喻，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收买国民党的右派首领并从中招募自己的代理人。

显而易见，既然社会结构如此复杂，国民党内部相互矛盾的派别之间必然要出现尖锐的斗争，国民党整个历史也清楚地证明这种斗争的存在。

l 国民党内部分明显地分为三派：右派、中派和左派。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旧官僚的一致利益。右派是明确反共的，反对一切稍微重大一点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极力想同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军阀妥协。国民党中派代表进步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没有什么坚定的路线，经常左右摇摆。从目前的这些摇摆当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倾向。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随着国民党的发展，中派越来越希望成为党的领导者并排挤左派。右派也在向中派施加压力，使它向这方面发展。

为了判断国民党内部这一斗争的力量组合和前景，必须了解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对比。这种力量对比非常明显：左翼拥有绝对优势。在国民党历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左派总是占压倒多数。今年3月20日以前，左派在国民党执委会和广州国民政府中都占多数。左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由此可知，今年3月20日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是领导力量。

到1926年3月20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左翼失去了在党内和政府内的领导地位。汪精卫离职后，在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以及局部在国民党执委会机构中，实行了相应的政治“清洗”，特别受到严格“清洗”的是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7月14日发表的决议中分析了3月20日事件，指出国民党这一转变是由于下述重要原因。首先，客观上的原因，即国民军败退，军阀和帝国主义勾结掀起反革命浪潮，吴佩孚重登政治舞台。其次，党犯了许多错误，其中包括全会指出的这样一些极其严重的错误：“指导国民党时，由于我们代替了左派的工作，实际使左派自己既不参与党务，又不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同时我们实际上妨碍左派在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妨碍国民党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右派和少数中间派在这些分子中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执行去年全会关于我们党更加独立行动和与右派在思想上与组织上进行斗争的决议，致使我们未能在群众中建立起充分巩固的基础（工会、农民协会、学生）”。

很明显，决议指出的3月20日事件的主客观原因本来就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而这些内部矛盾是其社会成分复杂的必然结果。共产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使这些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如果说在同一个阶级内部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正常都会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冲突，那么，对于国民党这一类型的组织来说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纠正对待国民党的关系在所采取的路线方面提出了一些什么办法呢？中央委员会7月17日发表的决议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下述具体规定：

- 1）．实行去年扩大会议的决议——我们各地及广东党部的独立行动；

- 2）．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同时改正以前束缚左派，及实

际上不使左派管理党务参与反对右派斗争之策略上的错误；

3) . 积极发展左派国民党的党外群众组织，对象是一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俱乐部、同乡会、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一些团体），通过这些团体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4) . 同左派一起公开和右派作斗争、

5) . 全力支持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反革命力量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揭发自己所犯的错误，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优点之一。这个决议毫不留情地分析了当时所犯的错误。但是，应该指出，到目前为止对所犯错误的批判尚未进行到底。决议认为国民党在1926年8月以前仍然是一个上层组织。这种说法同国民党拥有三十万党员的事实怎能不矛盾呢？解释是：国民党的三十万党员处于分散状态，各地方组织尚未建立，这些党员没有参加组织生活，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起领导作用的国民党左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可惜的是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发现得太晚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左派国民党的党外群众组织是正确的，那么下面两点则是不正确的：（1）这种外围组织必须是在各种组织达成某种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这些组织只应当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那么农民呢？工人阶级呢？不应当仅仅把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应当把农民特别重要的是把工人阶级作为国民党的基础。第二，为什么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一定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组成呢？首先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国民党象英国工党那样应以联合的方式建立起来呢？如果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它将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并有害于整个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还应考虑到在中国城市里有无数同情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社会团体。国民党应该按照现在这种个别吸收党员的方式建党。

此外，团结左翼可以不采取某些内部的组织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对团结是很重要的，行之有效的）。团结左翼可以只以符合参加左翼的各阶级和团体（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民主派知识分子）切身利益的行动纲领为基础。没有这样的要求，就不会有团结。但如果只有这些要求，而执政的左派国民党人不准备付诸实践，同样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团结。在后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会更坏——群众将离开国民党。

工人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是同统治阶级相对立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国民党。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完全独特的革命力量组织形式。这样，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迫切要求是否就意味着要取消国民党，要拒绝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呢？策略不正确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但这近似于政治上漫不经心的严重错误。中国现在面临的许多极其重要的任务当中，我们认为首先应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和为进行民主改革而斗争。如果在最近一个时期执行这一路线，中国进步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关心的将是尽快取得民族运动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应奉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当前时刻，必须坚持这样的路线，即除工人阶级和农民之外还联合手工业者、学生、中小资产阶级，而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大资产阶级，以便建立一个战斗的政治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这是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目前还面临着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但是，这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起到革命的作用，那就是当执行这个政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参加和可能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阶级和团体跟随自己和无产阶级前进，推动它们向左转，批评和揭露其不彻底性，等等。反之，统一战线政策将只能成为一种用革命词句掩盖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胡树林译，乌传袞校）

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伟大人民的伟大运动使全世界的革命无产者满怀喜悦和希望。国际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则为此而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中国的革命斗争的结果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人类当前的命运。

要判断革命和反革命的各种取胜的机会，要预见未来的前景，以及要弄清革命及其敌人的战略和策略，必须清醒地剖析中国舞台上的所有力量。

目前中国各种主要力量的格局是怎样的呢？

很明显，尽管国际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充满矛盾，但是对革命影响最大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乃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剥夺国际资本的所有帝国主义特权，结束“外国居民区”的罪恶专政，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撤走一切“文明的”军队，永远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斗争发展现阶段的中心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加速运动的发展，就有可能着手**全面解决部分已提到日程和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的更为宏伟的社会任务**。

封建军阀匪徒，即分别割据了大部分中国领土的反动将领，大大小小的张作霖之流，都和外国帝国主义有**直接的勾结**，这是帝国主义的中国“买办”（中间人）。他们自己剥削、掠夺和残酷镇压中国的劳动人民，同时又是外国资本雇佣的仆从。因此，

中国的所谓“民族”反动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的代名词。帝国主义分子正是通过张作霖和孙传芳之流实现自己的统治。代表帝国主义的势力成了反动将领们的主要职能。因此，革命军队直接和“中国”将领作斗争，实质上就是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

中国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加入了革命，相对说来它在经济力量方面是比较薄弱的。中国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在中国不起很大的作用。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大部分不是中国入的，而属于外国人所有。例如，上海纱厂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大量地直接落入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也就是直接流向国外。这就造成了中国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这就是民族工业积累缓慢的原因。它还使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处于优越的竞争地位而产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总的说来，中国资产阶级（工业的和商业的）的立场具有**双重性**。其中一部分主张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另一部分则主张和帝国主义妥协，委曲求全，同帝国主义“和平相处”。这部分资产阶级不是因为害怕革命继续胜利发展而径直脱离革命，就是自觉地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农民是中国人数众多的居民的主要部分。中国农民是外国帝国主义、军阀集团、商业资本和地主进行剥削的广泛对象。沉重的地租负担阻止着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农民的成分也不是清一色的，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大多数人是仅从事极小规模生产的贫农，也有少数人生活富裕，竭力想跻于地主行列。所以，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私有土地，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的绝对需要**。如果中国革命解决不了土地问题，那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城市就会脱离农村，而这必将导致中国革命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农民从1911年起，便开始非常缓慢地觉醒起来。现在他们已开始踏上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巩固了

农民和城市的联系。由于广州政府军队的缘故，农民现已卷进革命运动。农村已经出现革命组织，在农村已经可以听到土地改革的呼声。如果大部分农民群众暂时尚未积极参加斗争，如果他们还处于预备状态，尚未发动起来，那么争取农民参加革命，提出战斗的、为农村群众所能理解的土改口号，更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先进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身受双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剥削者的压迫），是中国**最受压迫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客观上受压迫深重，无产阶级就**最仇视帝国主义**。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方面以令人羡慕的速度成熟起来。几年前他们不是消极无为，就是沉溺于民粹主义的幻想（这不是较优秀的分子）。不久前他们还用“反对机器”的方式来进行反抗（上海罢工前不久），现在他们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口号，出色地进行了上海罢工，向世界帝国主义提出了挑战。现在，经受了政治洗礼的无产阶级已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自己的先锋队。不断发展的中国革命，**现在**已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今后革命越向前发展，斗争越尖锐，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然更加不可缺少。中国革命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取得彻底胜利——这就是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问题。

顺利发展的中国革命还未取得胜利。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占上风。但是广州**革命政权**的存在乃是中国**新的国家政权**的先声。革命尚未成功，前面还有许多艰苦的战斗。但是革命已经拥有了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军队**，它在纪律和士气上都优越于张作霖之流的雇佣军，是中国第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目前的规模，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软弱，无产阶级已站到斗争的最前列，所有这一切都把无产阶级直接推上了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地位。这大大提高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

任，使它面临着一系列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群众组织中赢得领导作用，推动广州政府走上彻底革命的道路，不要退出中国最广泛的反帝组织国民党，而是留在国民党内，引导国民党沿革命轨道前进，不断地走在革命群众运动的最前列。

目前，革命的中国面临着**两个**直接威胁广州政府的**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中国本身的反革命力量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也就是在革命面前结成一伙。面对日益增长的人民运动而惊恐万状的一批反动将领，看来似乎得到了外国的指示，在天津联合起来，并推选张作霖为最高领袖。天津匪帮公推他为全国的**刺巴索夫**^①，专门镇压革命运动。广州政府应该用中国各种反帝力量结成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用**更加紧密**地联系下层群众，来对抗这个经过整顿的中国反革命的统一战线。联合起来的中国反动派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和物质的力量，有外国银行家们的援助。但是他们没有群众的力量，而进攻的和不断**胜利**的广州政府就拥有这样的力量。只要广州政府方面的政治方针正确，又有果敢的政策，天津的“勾结”就无法阻止中国革命，而只能给予革命以推动，使革命增加新的力量，坚定其对胜利的信念。另一个危险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这一个危险正好在最近一个时期特别严重起来。对此，不仅**广州政府**而且**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应保持警惕。在汉口发生了肆无忌惮的公开挑衅。“文明的”刽子手屠杀中国的罢工者，并且还示威性地派军队在汉口登陆。扼杀了本国矿工的罢工活动后稍感“轻松”的英国帝国主义对此特别起劲。可敬的下议院振振有词地讨论了保证租界里英国“绅士”们安全的必要措施，不言而喻，“保障安全”就是为下一个侵略行

① Ф·В·杜巴索夫(1845—1912)曾任舰队司令，是沙俄的主要反动将领之一，血腥镇压过1905—1907年俄国革命。1905—1906年担任莫斯科总督期间，领导和镇压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编译者注

动寻找借口，为制造新的万县流血惨案寻找借口，为挑起冲突然后进行干预和帮助反动匪帮寻找借口。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首先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注视汉口发生的事件**，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矛盾重重，难于进行武装干涉，现在它们被迫小心翼翼地采取迂回策略来“影响”中国。但是我们也知道，**国际帝国主义始终包藏武装干涉的祸心**，每时每刻都在窥测方向，一有“可乘之机”，就会对革命中国进行当头一击。全世界无产阶级，首先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应注视各帝国主义政府在东方的罪恶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英国插手汉口。

（胡树林译，乌传袞校）

中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与汉口事件

〔北京来信〕

（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

П·鲁任科夫

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向汉口派出了军舰，以便保护居住在那里的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每月收入五块美元的中国工人竟敢宣布罢工，这难道不是骇人听闻的事？英国绅士们和女士们不得不亲自烧菜做饭，因为仆人们拒绝干活！英租界成立了罢工纠察队，破坏罢工者被人耻笑，甚至挨揍。更可怕的是竟然组织了示威游行！事情发展到中国人甚至敢于坐在英国公园的长凳上，而这在以前是绝对禁止的。当一个意大利水兵打了一个苦力一记耳光时，这个苦力居然回敬了对方两记耳光。罢工者甚至把一家英美公司的两位经理扣押了几个小时。是啊！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处于危险之中，因而向汉口派出军舰，开始了对中国工人的大屠杀。

但是，这次罢工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反军阀、反帝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决不能把这场强大的群众运动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斗争。最近以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成这样巨大的力量，这决非偶然。

中国各地军阀连年进行毁灭性的战争，破坏着中国农业的根基。他们公开掠夺，强行征税，压榨出中国农民的最后一滴血，毁坏一切生产基础，使本来已经极端贫困的千百万群众更加饥寒交迫，濒于死亡，迫使农民卖出为维持其半饥半饱生活所必需的

最后一点粮食。

这样一来，军阀们干的正是对外国和中国的商业资本及高利贷盘剥有利的事。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中国农业走上商品道路的部分原因。这些经济变化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民被迫更多地压缩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一份口粮。千百万群众从生产过程中被抛了出来。这支庞大的农业后备大军为了免于饿死，只有三条出路。部分农业剩余人口被迫去应募当兵，卖身给军阀。另一部分人沦为土匪，与军阀们在抢劫方面、有时还在灭绝农村人口方面一比高低。第三部分人流入城市变成奴隶，谋取微不足道的一点工资。这样便逐渐形成庞大的工业后备大军。工人的工资本来便已不足温饱，这样一来就更加降低了。

最近几年中国军阀胡作非为，他们破坏农业的根本基础，造成多如牛毛、到处拦路抢劫的土匪，以致搞垮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果是军阀们自己遭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对，甚至部分外商资本家也对其不满。

与此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一直在抑制中国工业的发展。手工业正逐渐消失。由于外国和本国大企业的竞争，成批成批的人被抛出自己的生产领域。近年来，这一过程发展得更快，结果使所有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不断提高。

这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如此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银币和铜币贬值以及物价上涨，形势更加恶化。北京的食品零售价格近五、六年来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上海上涨了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这是1925年5月上海大屠杀以后工人运动发展到如此巨大规模的一个原因。

工资是否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提高了呢？没有。熟练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提高了百分之十二，普通工人仅提高百分之八。由此可

见，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低了。

1925年，罢工浪潮使工人的生活暂时有所改善。但到1926年，工人的状况又开始迅速恶化。主要原因是：

1. 内战、捐税、交通运输瘫痪和土匪增多，所有这些更加破坏了国内市场。不断增加的捐税、驻军用费和盗匪抢劫引起物价飞涨，生活困难。

2. 中国庄稼收成欠佳，而且因为低于印度、日本和台湾的平均水平，所以粮价开始上涨到空前高度。米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甚至在新米上市之后也只下跌百分之一二至百分之二。

3. 1926年下半年，银元约贬值百分之二十。铜币在最近一年中贬值的速度同样很快，铜币的购买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还发行了大量纸币，所谓军事公债的价格更是狂跌，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1925年中国工人在改善自己生活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到1926年又全部丧失了。

这就是1926年8月上海（罢工者达十二万人）、汉口再次掀起罢工高潮的原因。现在就可以预言，罢工运动将波及广大的工人群众。

汉口事件证明这一点。上海一家英国人办的报纸《字林西报》自己承认，汉口的食品价格近两年来上涨了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另一家同样对工人和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英文报纸《汉口先驱报》承认，在汉口五口之家的最低生费用每月为二十七元。一个熟练的排字工人每月收入十六元，因此他要维持一家生活尚缺百分之三十八。工会已争取到把低工资提高百分之四十至八十，高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中国资产阶级为此立即组织起来，商人甚至以大批解雇工人相威胁。可是很妙，商人们又经常呼吁工人发扬民族团结精神。

在有些地方，中国公司支持自己外国同业所属工人举行罢工。另一方面，英国企业家则呼吁中国企业家团结一致，这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从中国商人的坚决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工会在这场斗争中发展壮大。11月，组织起来的工人还只有十万人，但罢工运动使这个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

英王陛下政府向汉口派出军舰镇压中国工人。这些工人正在成百地被屠杀。尽管如此，麦克唐纳还说是保卫在华英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民族革命运动要保卫受到军阀和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国民的生命！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盖利奥

如果把广州方面的胜利只看作是广州军队取得的军事胜利，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按照资产阶级的评价，广州军队也是中国一支新型的军队，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部队截然不同。虽然如此，但是决不能认为，这一支初创时期人数不多（九万至十万人）的军队，在进攻行动中无须依靠它所占领地区内工农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便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一千公里的转移，击溃吴佩孚和孙传芳这样庞大的两股军事力量。

广州军队在扩大广州政府的管辖地区和社会基础方面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呢？在北伐开始前，广州政府的影响仅限于广东省（二十五万九千平方公里，三千七百万人口。现在，广州政府的政权已经扩大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等省，以及浙江和四川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亿五千万。因此，**现在全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口居住在自然资源丰富、工商业发达的最重要省份。由于一些新的省份的归并，在广州政府的统治下又增加了许多工人集中的大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这一情况也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工人和农民组织日益发展的材料说明，广州政府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已解放各省工农群众政治积极性的继续高涨。例

如，在广州军队进入湖北以前，该省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全省共约九万人，现在仅武汉一市参加工会的工人就有二十多万，其中十五万是产业工人。湖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该省被占领前，参加工会会员约有十七万人，现在会员人数已增加到三十万人。在所有归并的省份，农民组织的增长也非常迅速，例如湖南现在有一百多万农民参加了农会。其余各省同样如此。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广州能否多少获得一段喘息时间，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去解决内部建设的问题呢？这是一个研究中国当前形势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吴佩孚和孙传芳对广州并不构成威胁。他们的力量太弱，不足以对南方采取稍许重大的行动。但是，广州军队取得胜利后，已直接面对着北方反动势力张作霖和张宗昌这两支军队。民族革命不可能也绝不会在华南和华中已到达的地区止步不前。革命的南方和反动的北方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任何人都一清二楚的事。问题只是：这场斗争是现在就开始，还是推迟到将来。在目前形势下，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民族革命的敌人。

眼前所有材料都表明，奉鲁集团内部以张作霖和山东土皇帝张宗昌为首的主张立即对南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派和以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为首的主张同南方妥协的一派之间的斗争结果，看来是主张向南方进攻的一派获得了胜利。最近期间，张宗昌已在安徽和江苏边界集中了庞大的兵力（将近五万人），其中一部分已开入南京和上海。与此同时，张学良的军队正在湖南^①边境集中，据未核实的消息，业已进入该省。不必说，**得到英国物质支援和政治支持的**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残部在这场斗争中将站在北方一边。

北方可能对革命南方发动的新战争的结局将会怎样呢？概略

① 原文如此，显系河南之误。——编译者注

分析一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可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明确的回答。

目前，国民政府的军队约有十五万人，其中大约有六、七万是广州政府军队的主力，其余的是最近以来并入广州军队的各派将领的部队。

敌方组成了所谓“安国军”，其兵力计有：张作霖军队约十五万人，张宗昌军队约九万人，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残余军队约五、六万人。

这就是说，北方的军事力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南方的兵力。但是，这里必须考虑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即张作霖和张宗昌由于自己的基地远离战区，又需要保卫自己辖区的边界并留下部分军队维持境内秩序，因此能用于积极作战的军队不会超过十万至十二万人。

此外，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广州军队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军，这就是说冯玉祥大帅领导的西北联军**。冯玉祥的军队自北京附近失利（从南口阵地撤退）后已经恢复了元气，在陕南击溃了拥护吴佩孚的刘镇华的吴心田将军的部队，解除了吴佩孚军队对老国民党员于右任将军领导的原国民军第二军残部的包围。因此，冯玉祥的军队**目前是一支拥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留在绥远地区的兵力尚不计算在内**。在湖南^①许许多多农民组织的支援下，**这支军队沿陇海铁路实施进攻**，很有攻占郑州的可能。郑州是陇海和京汉两条铁路的枢纽，吴佩孚的大本营现在就设在这里。

同样不应忘记，湖南、山东和湖北的农会数量甚多，遍及各地，它们是广州军队和冯玉祥军队的盟友。

因此，如果估计南北双方的兵力对比，**总的来说，南方具有一定的优势**。再考虑到导致北军战斗力削弱的一系列其他因素（群

^① 原文如此，显系河南之误。——编译者注

众同情广州政府，张作霖距离基地太远，北军没有给士兵提出明确易懂的政治口号，满洲存在财政危机，奉鲁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等等），可以认为，南军的优势是相当显著的。当然，这里所叙述的战争初期的兵力对比，在某一方获得局部胜利或遭到局部失败的影响下，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可能设法使中立派集团（阎锡山）参加到积极斗争中来或使敌方某些将领转到广州方面来，如此等等。但是，南军在这方面的机会绝不少于北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结论：如果中国革命的敌人采取进攻行动把战争强加给国民政府，不言而喻，会给南方造成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影响到军事行动。但是与此同时，这将是一个新的强大的刺激因素，可以更好地推动南方的革命力量去加紧完成自己的当前任务——在国民革命政府领导下用革命的方法统一全国。不管存在任何困难，这个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列 宁 与 中 国 革 命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K·拉狄克

卡尔·马克思在得悉太平天国起义的最初消息之后，于1850年1月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马克思一直密切注视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情况，并为此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马克思的继承者第二国际却极少关心中国问题，无论是义和团起义和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性进军，还是中国辛亥革命，都未能促使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到积满灰尘的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早在两年以前，我就表示奇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怎么会一点也看不到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态度。但是，在上海事件之后，梁赞诺夫发表了马克思为太平天国起义这一巨大事件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的第一篇。其他各篇直到今天我们还了解其内容，但仅这一篇就已表明，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也是马克思直接的、唯一的继承人。马克思写道：“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编译者注

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①

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速度。由于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太平天国起义在世界发展中未能起到上述作用，但是，马克思描绘的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忘记了马克思对中国问题所表现的巨大关怀。社会民主党很少关心在马克思逝世后已经遍及中国并为中国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除了考茨基、库波夫、帕尔乌斯写了几篇关于这个伟大民族觉醒过程的文章以及作过几次关于欧洲资本家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的宣传鼓动性演说以外，在战前第二国际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全部实践中，看不到任何迹象说明第二国际与近三十年来这一最重大事件处于同一时代。

*

*

*

列宁在战前没有专门研究亚洲关系，在他的遗产中我们只找到若干篇有关当时中国问题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与第二国际英雄们的文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列宁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洞悉这个具有巨大世界意义的事件发展情况的革命者，写下这些文章的。1912年1月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就中国辛亥革命问题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它“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②代表会议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同威胁中国革命的沙皇政府和支持沙皇政府的俄国自由派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编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编译者注

行斗争。列宁指出：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怎么会产生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在这个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①

列宁理解到四亿人民觉醒的世界意义，在当时就试图以其犀利的观察力揭破掩饰着正在太平洋发生的巨大悲剧**内在意义**的外衣，试图缜密思考**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1912年7月15日他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②一文直到今天还以其分析的精辟令人惊叹。这篇文章成为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列宁称孙中山是“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把三民主义称作“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③他开始把孙中山的观点和三民主义思想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头目的思想和政策进行比较。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媚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的。”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③ 同上，第423—424页。——编译者注

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①

列宁在首先判明帝国主义西方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这个巨大差别之后，并不满足于确定**中国革命的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哪些阶层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这个问题和他在确定1905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截然不同于孟什维主义。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②

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自由派袁世凯扼杀了中国辛亥革命，虽然他由于自己想登龙位而没有同皇帝妥协，可是却同为了扼杀革命而贷款数千万元给他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了妥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象孙中山这样的革命民主派没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能在短期内发动最广泛的农民群众。农民只是目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发动起来的，但这丝毫没有贬低我们导师的天才的洞察力。正如1905年列宁就提出过在俄国实行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实现，直到1917年才实现，而且只是到那时才导致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同样没有贬低工农联盟思想的意义。近几年来整个中国革命完全**证实列宁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警告**。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戴季陶之流的右派国民党人，如果他们一般说还有思考能力的话，他们就应当思考列宁的这个警告。

列宁分析了孙中山在1912年提出的观点，以及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愿望。在战前的形势下，列宁不同意这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并且提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即土地国有化纲领本身并不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相反，它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列宁并非仅限于不同意这种民粹主义空想——通过土地国有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还向我们指出**这种思想的革命根源**：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①

无论是列宁还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以后都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有了发展。尽管如此，上面引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用的列宁的论点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列宁对待1911年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空想的方法，对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现在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中国革命只有在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起来，具体表现为共产党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国民党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在为夺取民族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的同时，不去努力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根源，那就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正如列宁他在关于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观点的文章中试图表明的那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作为奴役群众工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表达其革命愿望的一种特殊形式。不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污秽之物而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耐心地向贫苦群众解释，共产主义纲领能更好、更清楚地表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这就是列宁所指示的道路。列宁在文章结束时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这条道路时，中国还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现代的工人运动。列宁在结束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时，写了下面一段含义深刻的话：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①

＊

＊

＊

爆发了大战，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开始了世界革命。列宁在任何一个时期中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注意。我已经在另一处地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讲过，列宁在大战期间侨居瑞士国时，曾多次预言俄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战斗团结，预言过孙中山的巨大革命作用。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忽视了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大战对中国的革命影响。它仍然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只看作是“一块肥肉”，并由于害怕日本的大炮而听任日本去宰割有四千万人口的山东省。这样一来，民主中国对英美自由主义的信念就开始崩溃了，中国学生为抗议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侮辱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成为战后中国新革命的起点。列宁重新论述了自己对整个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态度。列宁的这些新的论述是1920年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问题提纲中和在这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值得我们东方的同志认真对待。

那么，列宁对他以前提出的观点增加了哪些新的思想呢？

首先，他提出了关于蓬勃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事件的社会性质问题。在1912年分析孙中山观点的那篇文章中，他已经说过，孙中山纲领能实施到什么程度，“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对比而定”。^①

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时，说道：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更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在实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在革命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规定“若干阶梯”，无产阶级循序逐渐向社会主义前进。但是，列宁的提法显然加快了革命运动的速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在战前社会改革纲领仅以土地国有为有限的条件下，只不过是孙中山空想的民粹主义的东西，在发生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经动摇，苏联存在苏维埃政权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条件下，就不再是民粹主义的和空想的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扩大为土地、银行、铁路、大矿山、矿井均收归国有的纲领，这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纲领。**

列宁观点的第二个变化，或讲得更正确一点，列宁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明确说明之处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这一运动，他在提纲中写道：

“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2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经过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讨论研究以后，列宁又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观点，在提纲中提出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说“民族革命运动”。他在阐述这一点时说道：

“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①

列宁向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共产党人提出的战略和策略是按照下述各个基本方针制定的：一、把无产者组织为独立的无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级政党；二、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建立联盟；三、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四、同参加这个运动的各政党建立暂时的联盟；五、批判这些政党的不彻底性；六、只要这些政党准备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或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教育农民和被剥削者，就同它们进行斗争；七、支持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八、运动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通过一系列革命，经过若干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列宁在对东方各国包括对中国的革命者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他们对东方革命运动所负的义务，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说：

“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①

列宁对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则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②

列宁不仅给苏联无产阶级，不仅给西欧无产阶级，而且给东方工人，特别是中国工人，留下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系统的一整套政治观点。列宁身患重病时，犹在考虑革命运动的前途，鉴于西欧革命的发展停滞不前，他的思想转向东方。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写道：

“整个东方及其亿万被剥削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的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③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同上。——编译者注

③ 同上，第709—710页。——编译者注

东方革命运动的前途究竟怎样呢？列宁在指出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以后，写道：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

列宁说：为了加快这一胜利，——我们必须“**变得文明起来**”。^②在苏联，这个文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东方，则首先要使工农群众深刻理解我们伟大导师临终前向他们阐述的这一整套的政治观点，并进行顽强的革命斗争把它贯彻实施。

（章任贤译）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同上。——编译者注

中国的局势^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国事态的发展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随着广州政府军队的胜利推进，上海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港口进行的。这个一直为外国人，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视作“禁商”的城市四郊即将升起国民党的旗帜。

不难理解，由于那些在中国贸易以及在远东租让企业和殖民地企业中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的不断挑唆，英国政府正准备孤注一掷，或者至少摆出了一副准备孤注一掷的样子。当外交部一些比较谨慎的官员宁愿虚伪地与革命的中国进行“友好”谈判，并且把陆海军的准备工作轻描淡写地说成不过是“辅助性的预防措施”的时候，英国海军部的官员和陆军将领却在自行其是。

英国海空军的兵力正在向上海集中，十二个营的步兵被调往那里，印度军队也在为扼杀中国革命进行准备。

路透社，这个英国帝国主义向全世界进行宣传的喉舌，已经开始报道有关派往中国的英国军队在上船时的所谓“热烈场面”了。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巧妙。那些既为殖民主义商人也为英国军方人士竭诚效劳的英国保守党报刊，也在大肆叫嚷籍以恐吓英国居民。它们除了狂妄地宣称“大不列颠的旗帜永远不会在上海降落”之外，还报道了形形色色有关“杀人、抢劫”以及其他恐

① 这是《真理报》编辑部撰写的述评，原文没有署名。——编译者注

怖行为的无稽之谈，似乎这些恐怖活动正在威胁着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不幸的英国臣民。保守党报刊在大放厥词的同时免不了又要重弹关于“莫斯科阴谋”的老调，企图以此达到麻痹读者头脑的特殊目的。

其实，它们所以大喊大叫说上海外国租界（侨民区）正处于危险之中，还抱有别的目的。

英国千方百计力图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卷入干涉中国的漩涡中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才对上海寄予很大的希望。在这一块中国领土上，列强的利益往往相互交错。这儿不仅住有英国的，而且还有美国、日本、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业家和金融资本家。英国政府借口保护上海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妄想联合各大国共同反对中国革命。1月17日的《每日电讯报》对这一情况已经作了明显的暗示：“在上海威胁着英国利益的危险性，同样也在威胁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各国能统一行动保护公共租界，那么，在其他问题上看来也同样能采取一致的政策”。

遗憾！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打算和企图至今都未能实现。固然，日本、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也都派遣海军部队前往上海，并且也声称准备“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它们在讲这些话的同时，还发表了抱有不同想法的其他声明。

就在不久前，路透社散布流言飞语，说什么列强之间似乎已经就保卫上海的问题达成了协议，甚至还指出了各国应提供武装力量的比例。日本外交部的发言和凯洛格^①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证明，这些谣传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日本外交部的发言十分明确地阐明了日本所持的立场。它表示英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任意采取行动，但自己则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发言指出：即使上海发生骚乱（应读为“反对英国人”）^②，日本也不会派出军队。

① 凯洛格系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编译者注

② 括号内的话系《真理报》编辑部所注。——编译者注

美国的声明怀有同样的意图。正当英国外交界徒劳无益地力图拼凑各国反华统一战线之时，美国却发表声明大肆吹嘘其准备放弃一切特权、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监督和治外法权的决心，甚至愿意在没有其他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就此开始谈判。美国以此表明，它不反对使自己的竞争对手丧失所谓势力范围的这样的王牌，也没有放弃原来提出的“门户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口号，因为通过自由竞争美国将取得优势。再加上法国看来也采取与日本相同的完全消极的立场，这样就不得不承认，由于对中国进行剥削的列强之间存在矛盾，英国帝国主义的计划正在遭到失败。但是，这是否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已经消失了呢？没有，绝对没有。

帝国主义仍在向上海派兵，而且还将继续增派下去。英国军队在上海境内登陆的事实本身就说明武装干涉已经开始，因为英国人只拥有在上海市内保持警察的权利。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逻辑。如果把大量的爆炸物集中在一起，那就孕育着发生灾祸的危险。所有向上海派兵的国家都在玩火。就以美国那份大肆吹嘘的声明来说，只要美国军舰驻泊上海，而美国海军将领正在同自己的英国伙伴进行磋商，它所具有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革命力量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所有优秀分子现在发出警告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不准干涉中国！”的运动目前自发地从社会下层发展起来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连英国本土的各个地方各种团体都纷纷作出决议要求从中国撤军。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声色俱厉地重提1920年行动委员会的往事。英国工联会总理事会和工党的首领们只不过给陈友仁发了一封虚情假义、内容空洞的电报，其目的似乎专门为张伯伦先生主管的部门进行辩解和袒护，但是，工人群众则要求对行动作出明确的指示和决定。

“不准干涉中国！”的口号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像库克所号召的那样造成“战斗气氛”，这就是对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军事准备的最有力的回答。

（杨瑞芝译，章任贤、乌传袞校）

英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社论）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最近收到的电讯判断，奉军和山东军队侵入河南省已是既成事实。奉军部队前往与山东军队会合，力求迅速进入河南境内。据称，吴佩孚不等自己的“盟军”来到即已后撤，退向洛阳，而这时南方军队正在迅速调遣部队增援河南南部京汉铁路线上的信阳，并将驻在武昌^①的部队调往武汉。

因此，除浙江战场外（据英、美方面的消息说，那里的国民革命军得到来自江西的增援之后正向距上海约数小时火车路程的杭州胜利进军），河南战场已经愈益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然，广州政府军队和国民军同进攻中的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军队发生冲突还需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无论如何民族革命力量同中国反动势力即中国军阀的决战已经日益临近。这场战斗之所以会是一场决战，还在于当前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当然首先是英国，都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战斗的结局。

目前，中国军阀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勾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北京政府“不礼貌”地解除艾格利恩先生的职务，张作霖虚伪的爱国主义的声明，以及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故作姿态的反帝外交词令，都是骗不了人的。同样，张伯伦先生喋喋不休地称誉中国民族运动也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南昌之误。——编译者注

事实的真相是：英国帝国主义寄希望于张作霖，而张作霖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身上。固然，这对伙伴各自为了达到充分利用对方的目的而不断发生纠葛，但是，这绝不影响他们之间保持最密切的合作。事实上，究竟为什么张作霖和张宗昌经过几个月之久的摇摆之后突然决定前往（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湖北、河南和广东呢？！有人认为这与英国仓促派遣军队在上海和香港登陆一事毫不相干，这种想法不是太天真了吗？还有，为什么重新掀起反对广州政府运动的英国帝国主义的报刊近日来竟突然精神大振，想起了“北方军事领袖对英国的友好态度”呢？

的确，中国军阀在反对民族革命力量时主要或者说唯一指望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给予愈来愈起重要作用的援助；但与之相反，英国帝国主义对张作霖虽然寄予希望，但这仅仅是它所依靠的力量之一，而且它对此还在羞羞答答地加以掩盖。

《泰晤士报》写道：“一旦侨居上海的英国公民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一旦人们完全明白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并不支持任何一方而只是不容许无知的人们将它从中国赶入大海，到那时敌对的集团可能停止在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示威行动中互争短长，并且开始认识到双方以英国政府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真正好处”。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才是英国所依靠的力量。然而，不需要证明就很清楚，《泰晤士报》关于英国采取中立态度的言论只不过是掩盖事实真相而已；它还出于同样的外交考虑，认为实质上在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的同时有必要对张作霖进行恫吓，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以及帝国主义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援助，对张作霖来说几乎是取得胜利的唯—希望。

此外，英国仍然期望在意大利之后它最终仍能把美国拖在自己身后。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根据华盛顿政府近期的行动来判断，英国的指望是有某些根据的。华盛顿

最近提出的关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

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建立统一阵线的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英国与北方军阀实际上已经结成了联盟。中国民族革命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准备决战的，而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舆论对它支持的程度，以及取决于“不准干涉中国”的运动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对于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杨瑞芝译，乌传袞校）

广 州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C · 达林

当我们到达广州时，对香港的抵制行动才刚刚停止。经过十六个月的封锁性罢工，群众对香港已经如此疏远，以致抵制行动因惯性作用而仍然在继续发生作用。虽然抵制已经终止，我们这艘轮船并没有驶入香港，而是直驶而过，使我们得以纵览香港全貌，尔后轮船驶入珠江口。

英国人对于广州终止抵制的行动感到非常突然。他们判断这是广州同英国接近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政府需要钱，而香港的英国人有的是钱，因此终止断交肯定是广州政府企图向英国人贷款。这就是香港的想法。

广州和汕头工人对于终止抵制行动同样感到意外。汕头工人不服从广州的指示，很长时间没有终止罢工。

汕头工会主席是这样向我们说明情况的：如果停止罢工真是事实（他不相信此事），那么无论如何这只能意味着反对英国人的斗争的加强，而不是减弱。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工人纠察队在执行抵制，他们不准给英国轮船装货，不准同英国人贸易，不准在英国轮船上工作。一切都由工人纠察队执行。现在，我们将撤走工人纠察队，但是，我们将到群众中去，到工人、商人和居民中去。要做到即使没有纠察队，工人也应自动不为英国人工作，商人自动不同英国人做生意，居民自动不买英国货，让群众代替纠察队自动执行抵制。汕头工人对撤走纠察队的规定就是这样认识的。

广州则有不同的看法，但那不是工人的看法。广州报纸发表了一篇据说是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记者的谈话。这篇谈话在广州迅速传开了，而且当即被转载于香港英国报刊。这篇据称陈友仁的谈话说：终止抵制活动确实是国民政府政策朝着同英国建立正常友好关系方面的转变。聪明的采访记者知道抵制活动是工人干的，表示他不怀疑政府的善良愿望，但他怀疑工人是否也抱有这样的愿望，而能否结束抵制行动却取决于工人。对记者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工人反对停止抵制活动，那么就要给工人一点厉害看看。

英国人读过这篇谈话以后，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他们对终止抵制行动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香港总督也发表讲话对这篇谈话作了回答。

当然，英国驻香港总督不蠢。他非常了解中国，并且懂得，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凡不依靠群众的中国政府就是好政府。广州政府本身是中国最好的政府。它修筑新的道路，从而为在中国发展贸易创造条件。它还是中国最文明的政府。对这样的政府英国希望予以支持和加强，主要是帮助它建立秩序，发挥法律的力量。究竟谁是秩序和法律的破坏者呢？当然是被布尔什维克收买的群众，首先是工人纠察队。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不过请停止工人纠察队的非法行动，确立牢固的秩序，那么我们不仅将同情你们，而且还要提供贷款。“毕竟我们不仅是广州的近邻，而且希望成为广州的好友。”

于是，从英国人对悬挂苏联国旗驶抵广州的一艘轮船采取粗暴的行为开始，进入了“新时期”。这艘轮船停靠码头后，来了一批海关的英国官员，他们扣留随船运送的苏联外交邮件。似乎说，请瞧，我们又是这里的主人了，抵制已经终止。

只有完全丧失理智，才能在别的国家里扣留寄给第三方的外交邮件。

广州工人从报上看到这篇似乎是陈友仁的答记者问以及香港总督的讲话，开始掀起风潮。的确，十六个月来广州工人一直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十六个月来工人对香港进行了抵制，而现在请看，答记者问竟威胁起工人来了。

于是，广州工人纷纷举行游行以示抗议。这篇谈话在群众中造成如此大的波动，以致陈友仁不得不在报上辟谣，说他没有讲过如果工人不听话就要强迫他们服从的话。但是，这没有使工人们平静下来，他们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停止抵制并不是对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政策有所改变。直到陈友仁再次辟谣说这篇谈话完全是捏造的，广州工人才渐趋平静。

广州，工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机警地注视着以往在幕后进行的交易，注视着过去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对待的勾当。

广州最近五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从外貌简直无法辨认了。五年前到过广州的人，现在恍若完全置身于另外一个城市。五年前，孙中山开始实现其建设广州的计划。经过他的努力，建成了第一条从广州到近郊农村的汽车路，这是第一条宽阔的欧式公路。现在整个广州市已是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马路上灯光明亮。总之，广州已从一个只有小街陋巷的典型中国城市变成了现代化的欧洲型城市。从外貌已难以辨认它了。现在广州还没有电车，可是已经在议论此事。目前只有小型公共汽车在行驶。每当修筑好一条新路，公共汽车立刻就在那里通行。

公共汽车受到人力车夫的敌视，因为这使他们减少了收入。当广州市政当局决定扩大公共汽车交通，并在通行电车以前增设公共汽车路线的时候，人力车夫发火了，开始游行反对这项计划，市政当局在人力车夫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扩大公共汽车交通的打算。

广州的人力车夫组织得非常严密，要知道这是无产阶级中最

落后、最分散的一部分。一次，有个警察按照旧习气用棍子打了一名人力车夫，第二天全市人力车夫都举行了罢工。他们组织了示威游行，拉着自己的车子鱼贯而行，终于达到了把那个警察解职的目的。

广州变了，这里进行了极其巨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国民党唤起了广州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不用说已百分之百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连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都被发动起来了。公开的反革命——“纸老虎”队^①——被解除了武装。每天在室内和街头都有群众集会。出版了大量的革命普及读物。甚至最偏僻的角落也张贴有传单和宣传画。这里的政治生活朝气蓬勃。所有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街头。广州的街道总是挤满了人群：时而是罢工工人的示威，时而是庆祝国民革命军大捷的游行，时而是商人的请愿游行，时而是街头集会。兰色的国民党旗，红色的国旗和白色的标语旗交帜成五彩缤纷的巨流，滚滚向前。

当我们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权力是属于这种革命街头的，某些问题有时不是通过法令，而是通过斗争的各方在街头的冲突而解决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变成了某种仲裁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门口经常聚集着工人或商人，当然是工人为多。

那是商人在游行。他们一个个修饰整洁、衣冠楚楚、大腹便便，手持旗帜，以国民党旗为前导，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镇压农村的土匪活动。一些濒于绝境的农民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挺而走险抢劫商民，商人们控告这种抢劫行为，埋怨无法经商和把货物运往县城和乡村。

工人纠察队也同样举着国民党旗列队前进。号手走在前面用

^① 指广州买办资产阶级为发动叛乱而组织的反动武装商团。——编译者注

号声统一纠察队员的步伐。工人纠察队均着军服，头戴缀有国民党徽的军帽，手中紧握步枪。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帮助罢工工人战胜尚未屈服的商人。纠察队最初主要是由香港罢工工人组成的。他们连续十六个月使英国帝国主义惊慌不安。这是对外反帝战线上的斗争。但是，国内战线上也在同时进行斗争。

在广州最使你感到惊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连续不断的罢工。广州工人痛打了“纸老虎”。在国民党政权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期，他们帮助国民党打败了反革命。广州工人是政府实施革命措施最可靠的支柱，他们参加已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近十年来，本来就很微薄的实际工资平均下降了百分之十。有些行业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刚一巩固，反革命危险刚一减少，工人们就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除了工资低以外，在广州工人每天也必须干活十一至十五个小时，并非所有工人每周都有休息日。当学徒的还得从清晨到深夜无偿地劳动。广州工人决心改善自己的状况。国民党内的群众对工人是完全同情的。但是要从上面通过立法途径提高工资则不可能，因为资产阶级不会服从这种法律，而且监察机关还软弱无力。只有在街头通过斗争解决问题。广州没有一天没有罢工。

工人一方面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一方面注视着反动势力的动向。北伐开始以后，工人们纷纷投军当兵，主要是当民伕。

在南方，没有道路，没有马匹，没有车辆。而军队要战斗，要转移，要运送机枪、弹药和军用物资。所有这一切都靠肩挑，靠民伕运送。没有他们，军队就不可能前进。

准备北伐时，国民党中央曾专门发表了告工人书，其中写道：

“亲爱的工友们！世界上最可怜最痛苦的，再莫过于你们

了。工友们，你们要回过来想想，国民政府是不是你们的政府，肩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重任的革命军的北伐，是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凡是稍妨碍政府行动，有妨碍北伐前进的一切不必要的罢工，都要极力暂时忍耐避免……无论工农商学兵，都要集中在一个意志之下……绝不可稍有分歧，予敌人以可乘之隙。工友们，你们是国民革命的急先锋，北伐又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们要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一致拥护北伐，北伐胜利万岁！”

广州工人响应了这一号召，尽管戒严令第九条以不得妨碍军事行动为由禁止集会和罢工。他们当然是支持国民革命军的，但是并没有停止罢工斗争。而且停止罢工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州的织袜女工不可能只靠每月两元的工资生活。当兵工厂的工人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罢工，厂方就要实行同盟歇业时，他们举着国民党旗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声明说，如果宣布同盟歇业，广州将举行总罢工。在这之后，厂方没有敢宣布同盟歇业。

广州工人进行罢工，不听侈谈阶级和平的那一套。这并不是他们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他们只不过是希望迅速贯彻实施国民党的纲领。

有一次我曾同戴季陶谈过话。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典型的民粹派，典型的中国米哈伊洛夫斯基。他幻想人人平等，常说中国没有阶级。他曾一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①，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主张人人平等。可是，当他看到共产党人是要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个平等时，他离开了共产党人。于是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都追随在他的左右，利用他来反对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看到资产阶级利用否定阶级存在来反对工人和农民时，他又开始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戴季陶并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更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编译者注

左倾，重新修正自己的理论。

戴季陶是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他带领我们参观了大学 and 校图书馆，一直抱怨说图书馆内缺少苏联新书，他还想在中山大学设俄文系。他对我们讲述他在校内实施改革的情况，总是诉说困难重重。我们以为这些困难一定来自旧教授的阻挠，问他教授中有多少国民党员。他回答说，事情就坏在这里，所有教授都是国民党员，所有人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打着国民党的旗帜，阻碍改革，维护旧的一套。

所有教授都是国民党员，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凡是国家职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否则就被解职。当你同国民党党部成员谈到这一点时，他们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难堪，显然因为这些被迫入党的成分败坏着党的威信。

我们出席过国民党的许多会议。这里已经形成并牢固地规定了特殊的开会仪式。在会议大厅里通常挂着孙中山像，两旁是马克思像和列宁像。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礼堂到各县党部的礼堂，到处都是如此，肖像下面挂着总理遗嘱。每次会议，无论是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集会，还是小型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会议主持者朗读总理遗嘱。然后全体与会人员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随后选举主席团，正式开会。当大型会议结束时，全体人员再次起立，按照共青团员那样，齐声高呼口号，向国民革命致敬。

我们在广州亲眼看到两次群众性的节日庆祝活动，一次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另一次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

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在革命的中国是休息日。节日前夕，6日晚上，举行了专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会议。到处都有工人、学生、国民党组织开会庆祝。工人们在听完报告后还发表声明说：“现在已是我们应当学习俄国无产阶级榜样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值

得注意的是，既非共产党员又非国民党员的无党派工人群众，都说这种话。

晚上9时，街头演出了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节目。在最繁华的地点还搭起了露天舞台，使我们惊奇的是，我们看到演员们在舞台上扮演俄国资本家、白匪、工人和农民。我们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却完全看得懂他们所演的内容。第二天在中山大学操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会场上到处是国民党旗和写着无产阶级口号的标语牌。还有很多绘有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参加大会的以工人最多，但是在学生和士兵讲台周围的人也不少。这一次没有商人的讲台。我们在这里收集到整捆专门纪念十月革命的号召书、传单、报纸和杂志。

鲍罗廷和徐谦在中央的一个工人讲台上发表的演说，经常被工人热烈的喝采声“很好”所打断。广州工人是多么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的演说！单凭工人面部的表情就可以了解到演讲人在说些什么。当徐谦讲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工人的面容阴沉而严肃起来。徐谦继续讲述无产阶级是怎样粉碎白匪对莫斯科的包围圈的。你一望工人便可察觉，他们的面容逐渐开朗，喜形于色，在“很好”的高呼声中洋溢着一片欢乐之情。

但是，最使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少先队员。真是令人难忘的情景。他们一个比一个小，举着少先队旗来到会场。这些工人子弟，穷孩子，赤着脚，衣衫褴褛仅能蔽体，系着红领巾，背着伞状大草帽。这些小“无裤党”^①举起握紧的小拳头向我们致敬，并用中国话唱着《青年近卫军歌》。他们列队正步走过，绷着小脸蛋，握着小拳头，表示“时刻准备斗争”。每队都有一名年轻的女辅导员吹着哨子指挥行进的步伐。这些年轻女辅导员的走路姿态和衣服式样都与莫斯科的女共青团员一模一样。

① 无裤党系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穷苦大众讥讽的称呼，后泛指爱国革命者。——编译者注

苏联所进行的一切，广州工人都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事情。而且不仅对苏联如此。英国矿工是否知道，每月只有六至八元收入的广州工人，在他们同英帝国主义香港殖民地进行斗争的同时，还设法募捐来筹款帮助罢工的英国矿工。

11月12日的游行比11月7日范围更加广泛。除工人外，还有很多学生。前天一夜里，街上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

参加提灯游行的大多是工人。他们抬着孙中山像，举着国民党旗，用图像生动地表明自己的行业，并在一连串的灯笼上写着醒目的标语。这些标语仍然是：“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一切权力归工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五年以前，工人游行一直具有庙会的色彩：舞狮子，扮演奇物怪兽，敲打驱邪的大鼓。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已被军号、乐队和旗帜所代替。广州工人成长起来了，这一点从游行的形式上都能感觉出来。

现在广州工人变了，其他革命者也变了。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例来说，有一次学员们去调查一个村庄。农民向他们诉说到当地一个顽固反对农会的地主。这里曾经发生过几起杀害农会会员的事件。学员们在农民的帮助下抓到了这个地主，把他押到广州，关在讲习所里作为讲农民问题课程用的直观教材。

要描述广州的全部情况是困难的，更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包罗无遗。须知，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摇篮。革命在这里已经统治了好几年。这些年来，底层群众觉醒了，广大人民开始推动历史前进，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其结果是，一切社会问题几乎全部拿到街头去解决。

（章任贤译，乌传寰校）

中国的局势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A·伊文

从报道中国各条战线事态的大量电讯来看，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两支军队，由于一再遭受惨重失败，正处于彻底瓦解的阶段。以张作霖和张宗昌为首的中国军阀的主要后备队正代之而起，企图阻止广州政府军队继续胜利推进，首先是力图扼守上海。

《泰晤士报》郑重其事地宣告：

“在位于长江入海口处的上海，在这外国的利益和势力十分集中，中国的贸易与整个外部世界发生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人们正试图决定中国当前的命运。上海本身及其所拥有的高速轮船，巨额关税收入以及海上贸易，都是这场可能举足轻重的斗争的战利品。中国的国内战争，即使在上海四周，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关心备至。中国的国内战争从来不曾具有过这样的性质，致使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的外国利益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笔赌注。”

这就是说，如果相信《泰晤士报》的说法，那么，“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的外国利益”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将取决于奉鲁联盟能否在这场作战中取胜，而首先则取决于该联盟能否扼守住外国利益“十分集中”的上海。张宗昌守卫着通往上海的要冲，这样，他就不仅保护着自己或他自己一伙的利益，而且还保护着所有大国首先是英国的利益。可是，英国虽然手边就拥有（如果相信张伯伦的声明的话）装甲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坦克、以及大量的各种武器弹药，却不动用一丝一毫予以支援。竟

会有如此忘恩负义的行为，真是难以想象！

然而，局势骤变，开始对军阀不利。美联社报道说：“张宗昌无论在宣传方面还是在前线都没有能力战胜国民革命军，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而国民革命军声称，包括庐州（位于安庆以北150公里处）在内的大半个安徽省都已在他们手中”。不仅如此，“安徽督军陈调元也转到了国民政府一边。他的军队以及占领了芜湖的国民革命军已从后方对张宗昌造成了威胁。”还有，从最近的消息看来，国民革命军攻打苏州的战事颇为顺利。如果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事实，那么广州政府军队的迅速推进现在则不仅威胁着上海，而且还威胁着江苏的首府南京。这些都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苏皖一线的局势就是如此。

河南前线，奉鲁联盟的情况未必就会更好。

不少读者大概对国民军（即冯玉祥总司令的部队）突然停止沿陇海路一线的迅速进攻感到失望。帝国主义的报刊已经高兴得情不自禁，开始编造起国民军遭到失败的奇闻。但是现在，奉军入侵河南后，冯玉祥和原先吴佩孚部下的一些将军之间酝酿已久的协议看来已是既成事实。这些报刊理该承认，它们高兴得太早了。根据这些报刊的推测现在本应已经接近汉口的奉军，甚至还不占占领郑州，而只是继续威胁说：“奉系不能让河南省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落入那些愿意做‘红党’挡箭牌的人手中。”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是由于国民军在豫西进行的集结令人望而生畏，以及“模范督办”阎锡山管辖的山西省形式不利。阎锡山这个人令人很感兴趣，对他的情况不妨多说几句。

当阎锡山还是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他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著名革命团体“同盟会”。辛亥革命、即“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山西指挥一个团，并兼任军校校长。年青的上校公开站到革命一边后，爬上了“都督”（即军事总督）的位置。至此，阎锡山的革命前程也就到了头。从此他的所有心思都用于保

住自己的宝座。第二次革命时期，他站在袁世凯一边；段祺瑞和安福俱乐部得势时，他又成为安福系成员。他两次用金钱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一次是在段祺瑞倒台之后，一次是在第一次奉（天）直（隶）战争之后。就是在目前国民军同军阀集团之间的战争中，他仍能站得住脚，办法是，表面上站在“同盟者”一边，私下却一直同冯玉祥保持“友好关系”。

由于山西的地理条件（从这里既可以进攻陇海铁路，又可以进攻平汉铁路），阎锡山尽管没有很强大的部队，却能在一定的局势下起到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相当大的作用。很多迹象表明，这种局势现在已经具备。奉军越过了黄河；如果它下决心占领郑州并向湖北边界推进，那它就不仅必须同河南的军队作战，而且还必须组织强大的掩护队来对付国民军，同时又得冒另一种风险，即阎锡山随时会沿着从山西省省会太原府通往石家庄的铁路攻占平汉铁路，而这样就将在关键时刻切断奉军与后方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张作霖在听到阎锡山似乎在同冯玉祥和蒋介石的代表举行会议，以及国民党和国民军的拥护者在太原府组织公开游行示威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惊恐不安。

局势就是这样。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它对军阀们是不利的。但这还不意味着广州政府军队可以欢呼胜利在握了，因为不应当忘记，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所断言的那样，“近几个月内，英军的人数将增加到三万或四万人，并且都装备有重炮、坦克、飞机等。”换句话说，英国一国在中国的兵力将比镇压义和团起义时所有外国远征军的人数还多一半。组织这种需要花费巨额资财的声势浩大的“示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保护英国公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英国公民总计不到一万六千人）的生命和财产？何况英国国防大臣已经发表声明：“如果不发生任何袭击行动，那么，大概不会动用这些军队，”进行了意在言外的威胁。抱这种想法岂不是太天真了吗？

诚然，目前英国也紧接着美、日、法之后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歧上，把赌注押在国民党右翼即资产阶级一翼身上，准备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这些阴谋未能够得逞，但是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那怕他们获得微小的成功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损害国民革命力量当前的大好局势。

（高和平译，乌传寰校）

孙 中 山

——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C·达林

孙中山的名字现在已成为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革命旗帜。国民革命军高举着这面旗帜向前挺进，目前这面旗帜已在大半个中国迎风招展。孙中山的学说能够成为群众的革命旗帜绝非偶然，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为群众所接受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生活在中国革命运动和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而能随着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齐步前进。他是在反动势力摧毁南京太平天国的年代诞生的。反动派把太平军赶出南京后，还用了不止十五年的时间才彻底扑灭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这场革命。童年的孙中山深受这一激烈斗争的影响。又过了十五年，他亲眼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起义。这时孙中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镇压义和团起义和奴役中国的。他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倡导人。他担任过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他还是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首倡者。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政党。

孙中山诞生时，商业资本已经彻底破坏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是一场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反对大量土地私有的一场革命，那时，大量土地已经不是被满人，而是为中国商业资产阶级所占有。正因为如此，这场类似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农民革命由于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同盟军而遭到失败。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而商业资产阶级又是农民为之而

斗争的土地的占有者。商业资产阶级也有它自己的革命组织——三合会。当太平天国没有提出土地社会公有的问题以前，三合会一直同太平军一起反对满清王朝。可是当农民开始夺取土地时，三合会即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就转过来反对太平天国，从而注定这场伟大农民革命必然遭到失败。孙中山认真思考了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在论太平天国一书的前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满清王朝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人民。因而他把知识分子看作为中国这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站到人民一边，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

那个时期的孙中山理论是一种社会均等论。他写道：“在中国……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①孙中山逐渐成为具有非阶级思想的民粹主义者。他认为，阶级是没有的，人民贫穷的原因是满族的压迫，知识分子应当担负起使人民摆脱满清王朝压迫的使命。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在太平军幸存的群众中，也就是在农民中，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是三合会，也就是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予以支持。而这个组织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孙中山实际上是在同三合会结成同盟的情况下着手开展革命斗争的。那时他的革命理论逐渐形成，其内容是：首先组织军事密谋活动，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推翻异族王朝的统治，最后由他的政党夺取政权，在获得军事胜利后开始实行社会改革。关于孙中山的社会改革和社会理论的实质，列宁作了如下的叙述：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

^① 《孙中山选集》第79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①孙中山及其组织的本质是：“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②。

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进了一大步，因此，要使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基础上统一全国。

中国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能统一国家的自己的俾斯麦。俾斯麦的思想不仅存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脑中，而且也印在孙中山的脑中。他认为俾斯麦的思想非常近似于自己的观点，把俾斯麦看成是一个社会改革家，说他不是资产阶级人物，而是全体人民，甚至是工人的代表者。孙中山在他关于社会主义^③的第一讲中写道：“德国当俾斯麦执政的时代，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作工时间是由国家规定了八点钟，青年和妇女作工的年龄与时间，国家定了种种限制，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费，国家也有种种规定，要全国的资本家担任去实行。当时虽然有许多资本家反对，但是俾斯麦是一位铁血宰相，他便有铁血的手腕，去强制执行”^④。中国资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俾斯麦。对于他们来说，孙中山太激进了，过于是社会主义者了，他们寻找比较现实、比较资产阶级化的人物，于是选中了吴佩孚。1922年，当吴佩孚反对张作霖、反对孙中山的时候，得到了所有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这并非偶然。从1922年起，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就已不仅面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面对着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面对着农民暴动。中国工农不仅成为反帝斗争的先锋，而且开始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被这种阶级斗争吓坏了的资产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同上，第425页。——编译者注

③ 应是“民生主义”。——编译者注

④ 《孙中山选集》第782—78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于是逐渐离开革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所依靠的阶级已背离革命，宁愿同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妥协。阶级分化太明显了，于是孙中山的社会均等论与现实之间发生了矛盾。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位四十年来为实现其非阶级原则而奋斗的老革命家，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终于认识到新的形势，修订了自己原有的学说，作了倾向于广大中国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抉择。他不仅看到了城市中已成为中国最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而且看到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在1923年和1924年期间，孙中山的新观点终于形成。其主要依据是，按照他的说法，农民、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他开始懂得，反帝斗争不应仅由中国群众孤立地进行，而应当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因为国际无产阶级也同样反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另一条战线进行着同样的斗争。从这里他意识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后，他阐述了新的革命理论。在这以前，他的革命理论，正如我所说过的，始终是先进行军事密谋活动然后进行社会改革。首要问题不是组织群众，而是获得武器以建立军队。现在他修改了自己革命理论中这个基本观点，这反映为以下事实：首先他对他初期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作了评价。他在北上赴京（他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之前发表的宣言中写道：当前任务是“**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①也就是说，他得出结论，他过去屡次失败的原因是，他依靠的军事力量不是由革命群众直接建立的。因此，——他在1924年于广州发表的最后几次演说中讲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

^① 《孙中山选集》第8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①也就是说，他得的结论是：革命是由人民自己进行的，人民应有自己的革命军队。只有到那时，这种军队取得的胜利才是人民的胜利，才是党的胜利，才是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他得出结论，认为必须依靠新的军事力量。1924年10月11日，他在致蒋介石将军（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信中写道：“介石兄鉴：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②这就是孙中山所得出的结论。他看到革命首先是人民进行的，人民应当组织自己的革命军队，并且这支革命军队应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军队应有由革命者组成的指挥人员。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孙中山创建了革命的黄埔军校。

这就是孙中山的新的革命理论。他同时重新研究中国新阶段的社会基础问题。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社会基础，除工人阶级、城市贫民外，首先应当是农民。在这以前，他的农民纲领仅是消灭绝对地租和帮助农民解除赋税的沉重负担。1924年他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法与以往完全不同：“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③这样一来，农民为土地而斗争便成为中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而且孙中山准备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直到承认每一个农民（在中国主要是佃农）应当享有自己收获的全部产品，应当拥有土地。

他承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他认为无产阶级同他一样追求的是同一目的，即社会主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

① 《孙中山选集》第47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② 同上，第878页。——编译者注

③ 同上，第810页。——编译者注

有进行阶级斗争的权利，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特殊方法。承认无产阶级有权进行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的这一思想使孙中山更加接近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看法，他认为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紧密的联盟。1924年他在论社会主义的第二讲中说道：“此刻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①由此可见，孙中山尽管还在怀疑在中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否合适，但毕竟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是正义的，承认国民党必须同工人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盟，也就是说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思想上密切联系的、公开的、紧密的联盟。孙中山学说的新的社会基础就是农民、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显然，这个革命联盟，新的革命联盟，可能同反对它的某些阶级，首先是城市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发生冲突。这个新的革命联盟应当对这些阶级采取什么立场呢？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无须从理论上予以回答，他已被迫用实际行动作了回答。1924年，当国民党代表大会按照孙中山对自己学说解释的新精神通过党纲和作出决议以后，商业大资产阶级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组织了称为“纸老虎”的武装叛乱。这时，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

“介石兄鉴：运械来韶，如不能立办到，则其次为分给我同

^① 《孙中山选集》第795、79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志中之队伍，肯为我杀奸杀贼者（此指官长与士兵皆一致而言）。请兄与汝为细查其各部，何部有此决心，不为奸商所摇动者……立决死之誓，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①

孙中山对待1924年就已发动暴乱反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新革命联盟的反动势力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立场。这个联盟斗争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宗旨是使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孙中山认为，在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后，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工业。孙中山所设想的发展中国工业，不是指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而是国营工业。铁路、矿山，大型工厂、机器工业都应为国家所有。关于商业，他提出居民实行合作化的任务。合作化组织应能抑制私人商业资本的利欲。关于土地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工人问题也已涉及。在对外政策方面，孙中山认为必须首先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建立联盟。

这就是孙中山的学说，是他在逝世前最后几年总结出来的，他就是打算根据这种思想来改组国民党的。按照孙中山的计划，国民党应当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城市的贫民的政党。

孙中山逝世已经两年了。两年来运动正是沿着孙中山指示的道路前进。在这期间，工人阶级更加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已成为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现在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列。

与此同时，最近期间在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孙中山在世时只不过略有显露。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右派的形成越来越明显了，他们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与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相矛盾的。在这期间，资产阶级组织起来了，在这期间，他们强大了，成立了商会。在这期间，中国的地主面对农民群众的

^① 《孙中山选集》第87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译者注

斗争也加强力量并组织了起来。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国民党内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派系，他们不是始终不渝地贯彻实行孙中山的学说，而是企图在阶级之间搞折衷调和，采取既不得罪工农又不得罪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两面讨好政策。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形势下召开的十月代表会议（1926年），本应宣布由于胜利而应提出的任务。可是如果我们看看这次十月代表会议的决议，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决议乃是在阶级之间搞折衷调和的产物。所提的问题不是致力于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二五减租，也就是说，不提土地问题，不提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而仅仅提出了略微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

在许多问题上，譬如在财政问题上，由于不愿得罪地主而保存了使农民破产的旧赋税制度，因为要实现孙中山所说的改革旧的赋税制度，不先消灭掌握在地主和豪绅手中的旧的赋税机关，那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方面已经出现了向工人阶级进攻、同共产党决裂的趋势。一部分国民党人一直在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鼓动，主张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这实际上就是要向工人阶级进攻。由于这种在阶级之间搞折衷调和的政策，业已形成某些背离三民主义原则的情况。

现在，已进入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三年，国民革命军统治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在按照孙中山的精神实行各种政策的条件下，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都将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不过这种统一仅仅只能无条件地贯彻孙中山上述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正因为这样，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为彻底贯彻实行三民主义而斗争，即争取农民，坚决解决土地问题，组织农民，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紧密联盟；为粉碎把共产党员排斥出国民党的企图而斗争。只有在

这种条件下，也就是只有在按孙中山的精神执行各种政策的条件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也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中国的革命与国民党（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

伟大的中国革命正在向前发展。它是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一个以形势普遍趋于尖锐为特征的重要发展阶段。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为推翻封建军阀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人民革命运动，而且还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组织**。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一个拥有军队和管理等机构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起来。

北洋军阀政权靠的是残暴镇压群众、贿赂收买、阴谋诡计，帝国主义银行的施舍、外国军队的援助，以及对革命工人的血腥镇压和对公民自由的任意践踏。这个反革命篡权者和国际金融资本代理人的政权内讧不断，充满争权夺利的斗争，正出现四分五裂的现象，它在政治上已经开始瓦解。而广州政府靠的是下层民众的奋起，它从强大的革命运动中汲取力量，不断获胜，它顺应群众的要求因而不断得到巩固。

当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南方”与“北方”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革命军已逼近上海。一场争夺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的中心城市的战斗正在展开。现在，特别是现在**军事问题**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政治问题**。

形势之所以趋于高度紧张，原因在于革命不得不在**实际上已存在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帝国主义的军舰正在中国水域内到处乱窜，数以千计的英国士兵已进驻上

海，外国军事教官正在指挥“保卫”上海使其不落入革命之手的战斗。中国反动派与外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勾结已经由暗转明，发展到公开的地步。这种情况进一步促进了群众反帝运动的高涨，但从另一方面讲也造成了一种可能爆发种种严重意外事件的军事政治形势。

如果认为**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不是不可避免的矛盾，那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那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温情主义。参加中国反帝革命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分：既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农民和部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些社会集团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他们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斗争的坚毅精神相差极大，革命的彻底性和“动摇性”也各自相异。这种各怀不同社会目的和各有不同利益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不能不反映到，而且已经反映到革命组织、政府和国民党内来。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国民党右翼的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随时都想扭转革命方向，将革命拉向倒退；他们坚持奉行“戴季陶主义”；他们赞成“革命”，却反对阶级斗争；他们赞成同北方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但同时又主张同帝国主义友好协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觉醒感到恐惧；他们不反对向约翰·布勒暗送“秋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民党内存在一个代表群众利益并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强大的**左翼**。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很年轻，人数也不太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已经享有巨大的影响，连它的敌人国民党右派也承认，共产党已发挥着真正的“**中国革命火车头**”的作用。

帝国主义报刊出于某种极易理解的原因正不遗余力地吹嘘国民党右派的强大，似乎右派国民党人已将革命引上“温和的”轨道，赶走了“赤色工人”，并且控制了大权。帝国主义报刊曾预言，国民党将彻底瓦解，发生分裂，中国革命将停滞不前，以其

特有的方式发生“变质”。而按帝国主义报刊的愿望，战胜这种已经“蜕化变质了”的革命将不费吹灰之力。

某些有事无事都爱发表议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帝国主义鼓吹的这种中国革命变质的理论也极感兴趣。既然右派已占上风，既然革命已变质，那就应该为它唱挽歌，中国共产党人就应当“闭门思过”，放弃“伟大的事业”和宏伟的计划，这就是那些为资产阶级右派在中国革命中“已占上风”而高唱赞歌的可怜而并不高明的逻辑。他们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此为国民党右派效劳。他们不懂得，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合作，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中国革命势必因此而遭到失败。当代的取消派“没有觉察到”，他们这种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说教，就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

资产阶级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变质的喧嚣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反响都是司空见惯，不足为信的。面对反动势力他们“唉声叹气”，可是却不愿看见或者相信革命的力量。他们只看到国民党中的右派，而看不到国民党的核心和群众。他们观察形势时遵循的原则是列宁曾经嘲讽过的原则即“资产阶级一切都好，我们的一切都不好”。

然而，恰恰在最近一个时期，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我们且不说为革命事业而不惜献身的英勇的中国工人，也不说掀起伟大的中国革命风暴的先锋——上海无产阶级的英勇业绩。广大的中国女工们在不久前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渡过了国际妇女节。我们在这儿只想提一提不久前召开的农民代表会议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尤其是湖北和河南两省）。这些代表会议提出了反对地主、豪绅，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等左的革命口号。对于中国工农联盟的前途来说，这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良好兆头。

如今连国民党内和政府、军队中的右翼靠近右翼的人士也

不得不屈服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的压力。本报昨日刊登的中国军队总司令蒋介石的声明就是这方面颇为重要的一份文件。显然，下层革命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以致蒋介石在当前发展阶段也不得不耍手腕，宣誓继续忠于革命原则，忠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宣布服从人民大众的党——国民党的领导，并改变腔调连续发表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宣言。这样一来，国民党极右派曾视若珍宝，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又曾寄予厚望的那个鼓动将领们脱离国民党闹独立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连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只得承认右派的阴谋已宣告失败。

中国战士们面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们面前还有巨大的障碍有待克服。他们必须在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的环境下展开活动，为夺取政权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干劲十足，中国无产阶级志不可摧，伟大的解放运动前途无量。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去怀疑吧。中国革命将扫除一切障碍，战胜那些企图阻挡革命的人，向前发展。

（杨瑞芝译，马宝华校）

湖南农民运动（湖南来信）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朱湘江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只不过六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湖南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摧毁了封建农村中许多世纪形成的旧事物，着手建设新世界。所有建设工作几乎都是参加农会的贫苦农民进行的。早在1925年湖南就开始秘密组织农会，但是反动将领当局障碍农民联合，因此直至新的革命政权来到（1926年7月），农会还不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贫苦农民全力支援军队，因此无暇顾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但是，一当国民革命军在武汉附近已稳操胜券时，湖南农民便着手自己的切身事务，开始积极成立农会。农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逐渐成为农村的基本力量，以后又发展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巨大政治因素。

参加农会的主要是雇农，以及因生活困难而租种土地的佃农和土地很少的农民。这些成分是农会的主要骨干。农会中也混入一些仇视农民的分子，但为数极少，不会构成任何危险。中农站在十字路口，还没有明确自己的态度，但也逐渐站到农会这边来。地主则对农会持明确的敌对立场。

农会现在实际上领导着湖南一千万农民。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农会吸收了二百万农民。每户农民平均以五口人计算，总共为一千万，即占湖南全部农民的一半。农会是非常强大的组织，它实际上调节着农村的整个生活，其表现如下。

一、阶级斗争方面

农会宣布对多少世纪以来通过各种手段吸尽农民鲜血的地主进行无情的斗争。“有田在十六亩（一俄亩相当于一七·七七八亩）以上者就是地主”的口号开始在农民中流传开来。相当多的地主有田两千亩。农会要地主交代，他们是根据什么标准向农民征收国家赋税和怎样处理所收税款的，农会通过这些措施限制地主胡作非为地乱征税款，因为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地主中饱私囊，其收入超过地方政权（根据现行的征税制度，地主类似地方政权和农村纳税人之间的经纪人）。

同盘剥压榨农民的高利贷活动进行无情的斗争。

目前正开展着一个废除现行的由地主征收赋税制度的运动。这种征税办法只保证佃农及时向地主完租，而不管佃农所遭到的天灾人祸。这种制度迫使一无所有的佃农向地主借钱，并向同一个地主提交抵押，而地主则利用佃农走投无路的处境向佃农索取高额利息，一年后本息对翻有余，遂使佃农成了永远还不清账的欠债户，债款逐年递增，越还越多。

在为争取农民经济解放而同地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农会不得不同时进行政治斗争。农会甚至制定了对地主的“惩治条例”，凡对农民压迫特别残酷的地主，根据其罪行性质予以惩处。

1. 罚款。供农会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之用（离长沙约一百俄里处涟水岸边的湘乡，一个地主被罚款二万美元）。

2. 罚缴实物（粮食）。存于公共谷仓，以供救济急需者之用。

3. 戴“高帽子”。这种惩罚形式是给犯罪者头戴数尺高的园筒纸帽。帽上写有大字，列举地主对人民所犯的罪行。农民们牵着头戴高帽子的地主到各乡游行示众。

4. 逮捕并押送本县监狱。有时农会说明罪行的严重性要求判处极刑，有时则建议给罪犯判有期徒刑。

颇有趣的是，当地主不同意农会提出的处罚时，农民便对地主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周围农村的农民有时聚上几千人，敲锣打鼓、举着旗帜有组织地来到地主庄园，声明说，在地主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以前决不离开，而且在农民留在那里的整个期间，地主必须供给他们吃住。这种情况在湖南中部地区就发生过多多次。

那些不愿意屈服于新形势的地主们纷纷逃离农村。也还有一伙地主采取欺骗和恫吓农民的手段来寻求对抗农会的方法。这类地主竭力劝说农民相信加入农会是没有好处的。

例如在岳州地区，有一个地主为了想成立自己的农会与穷人的农会对抗，假意把两户农民的地租减少一半，并且扬言，任何农民只要参加他的农会，就可减少地租。但是，农民们看清了这个狡猾的圈套，谁也没有上钩。

二、农民的自卫

农会在改组民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团过去是地主手中镇压农民的工具。现在，农会把它改变成保护农民的武装力量。目前尚只有湖南中部和东部地区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其他地区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除这项措施外，各地农会会员用梭镖（长柄，一端安装有铁制锐器）武装起来。

三、争取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的斗争

斗争的措施是：

1. 降低米价（大米是主要食品）。农会通过下列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 （一）禁止从湖南歉收地区运出大米；
- （二）禁止超过规定标准囤积大米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 （三）多余储粮只准在本地市场出售；
- （四）禁止以超过农会规定的价格出售大米。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贫穷的农民现在只要花一年前粮价一半的钱就能买到粮食。

2. 把税款减少到保证农民能向地主交租的最低限度。

3. 禁止地主收回佃农所承租的土地。

4. 有些农会提出平均农民现有耕地面积的口号，以便使无田和少田的农民获得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5. 减租并禁止增加地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湖南省某个偏僻地区，农民们了解到某次代表会议上讨论过减租问题。在少数农民倡议下，农会印发传单说，应当减租一半。这些传单在农村到处张贴以后，农民们去找地主，要求按照传单减租。当地主试图反对时，农民们就说要向农会上告。地主立即屈服，表示同意。

6. 禁止地主从农村运走现金，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农村的货币流通体系。

7. 强迫地主改善交通状况：

(一) 修整乡间土路并加阔到一丈宽。

(二) 清理和加深水道，等等。

地主们不得不按照上述要求一一照办。

四、农会的文化教育活动

农会给自己提出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战斗任务。每个农会都设立一个农民学校。如果注意到整个湖南省已经组织了四千个农会那就是说最近期间将会成立四千个新的农民学校（据报纸报道，截至2月12日湖南已有六千八百六十七个农会）。为了设立这些学校使用了寺庙（教堂）的财产。农会强迫地主按期出钱供学校开支。农会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农民没有文化是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的结果，地主是全靠农民破产而发家致富的。寺庙都改作公共学校使用。

五、生活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农会开展活动同一切从身体上和思想上腐蚀和破坏中国社会环境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斗争。

1、农会严格禁止吸鸦片烟，强迫所有吸烟者，不论其地位高低，向农会交出烟具，而后将这些烟具当众焚毁。凡破坏禁烟措施者，从严罚款。

2、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赌博行为，如叉麻将，抹纸牌等。有一个村子收缴了约一百五十副赌具，并当着全体农民的面将其烧毁。

3、禁止上演一切伤风败俗、毒害农村青年思想意识的戏剧。

4、禁止一切不必要的、纯属封建的旧风俗习惯残余的“讲排场”，如农民大摆“筵宴”，延请僧道来家做斋等等。

5、禁止食用过分精美和贵重的菜肴。

6、农会积极同流氓行为作斗争，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结果，甚至地主也不得不承认，农会做到了行政当局多少年来没有能做到的事。

六、改组行政机关

同旧官员进行着一场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旧官员被赶走，行政机关进行改组。

农会享有极高的威信，具有强大的影响，城市行政机关在审理涉及农村的某些案件时，必须征求农会的最后意见。在双方发生争吵或甚至家庭内部发生纠纷时，争吵双方总是只找农会处理。这种情况使得旧官员不能从他担任的职务中捞取他过去曾经捞到的好处，因而他宁可不在新的制度下继续供职。

总的来说，可以得出结论，农村中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展开阶级斗争，彻底抛弃旧的传统和旧的生活方式，根据新的比较进步的原则建立新的社会。

1927年2月写于湖南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上海工人的胜利（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光复了！上海已在起义人民手中。反动派和中国的邓尼金——张宗昌的爪牙被革命工人赶出了上海。国民党红一青色的旗帜，革命的旗帜在上海上空飘扬。革命军正开进上海。

昨日电讯传来的这一消息可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消息。在现代中国，上海作用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的。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经济中心，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而且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海港。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从上海对中国进行剥削。数以千计的外国船只，难以计数的商品，各种各类形式的资本，源源不断涌向上海。上海是国际融资本在中国的据点，是帝国主义吸血鬼赖以向中国各地伸展其魔爪的城市。随同千万包商品一起输出国的是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上海纺纱工厂数以百万计的纱锭昼夜不停地在旋转，上海炼铁工人的无产阶级夜以继日地抡动铁锤敲出奴隶生活的悲音。可这个巨人般的城市正以神话般的速度在发展、在前进，并已成为整个庞大的中国工业最发达和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

在上海的大小工厂中，聚集着近五十万工人。上海无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最革命的队伍的代表。上海工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着（**并在继续发挥**）彼得堡工人在我国革命中发挥过的同样的作用。上海工人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倡导者。播及全中国的“祸害”就来自上海工人，他们第一个向帝国主义压迫者提出挑战。两年前，他们举行了震惊全世界的总罢工，并为

此而付出了工人阶级优秀儿女鲜血的代价。即使在孙传芳横行霸道于上海，刽子手的屠刀砍杀无产阶级的脑袋的时候，上海工人也从未放下武器。现在，他们赶走了山东军阀的土匪军。在上海工人英勇斗争之下，广州革命军正进驻上海。

占领上海的方式也是很有意义的。**上海是被上海本身“占领”**的，是被上海工人占领的。张宗昌的马留达·斯库拉托夫^①的骇人听闻的残暴行径，帝国主义军舰在上海港的驻泊，英国兵的登陆以及对准上海城的凶神恶煞般的大炮炮口，都阻挡不了上海的光复。通过这些事实便可衡量出上海无产阶级所建功绩的伟大，看到上海工人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首创精神。

上海为上海本身所“占领”。这再次说明了我们大家极为熟悉的阶级战争的一条规律。当群众中不断出现不满的风潮时，反革命的军队就注定要垮台。作为反动的军阀势力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革命军队和不断给反动势力以重大打击的革命后方。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上海工人的胜利同时也是前进中的**世界革命**的胜利。上海的光复为中国的革命斗争开辟了新的前景，连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也开始看到，这一斗争现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支柱上海的光复无疑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左转**的因素。上海工人将以自己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感染广大群众。中国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必将得到加强，它争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机会必将大大增加。占领上海一事还再一次地表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毅力是多么的强大。帝国主义报刊迫不及待地宣称，中国是一座已经熄灭的革命火山，可是上海工人的胜利宣告，伟大的东方火山还在继续喷射光彩夺目的烈焰。

当然，困难还很多。胜利尚需**巩固**。形势还**十分复杂**。上海

^① 俄国沙皇伊凡·雷帝四世的亲信。——编译者注

的街道已归无产阶级控制，可是，帝国主义的军舰还在上海港游弋。革命军虽然进了上海市，但是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也已在上海登陆。革命的旗帜在城市上空飘扬，但是，外国租界已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种种冲突事件已在策划中。

尽管如此，**上海已经攻占**。中国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还不清楚，伦敦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们怎样看待上海被攻克之事，但我们确切地知道，这一事件已使世界所有革命的无产者的心脏跳动得更活跃了。苏联的无产者通过蜿蜒数千公里的铁路线向远方的亲密战友，英勇的上海工人致以热烈的敬礼。

（马宝华译）

中国的战略形势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斯托林

攻占上海（据传南京也已攻下）使中国的战略形势和交战双方兵力兵器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

广州政府国民革命军在去年夏季开始的坚决行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战果。**这些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州政府军队指挥机关的出色战略和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而取得的。**

与之敌对的军阀已先后败下阵来，帝国主义尽力想把他们纠集在一起，但迄今未能成功，今后也未必会成功。国民革命军自南向北展开的第一个战局，重创吴佩孚军，攻占了长江中游一带。在这第一个战局以后，国民革命军挥师东北，朝上海方向又进行了第二个战局。这次战局从去年秋季一直持续到今年3月。它是由许多局部性战役组成的，这些战役之间在冬季曾有相当长时间的间歇。在南昌、九江一带经过激烈而持久的战斗之后，广州政府军队无论是直接向上海方向，还是沿浙江海岸的进攻，虽然速度缓慢，但不断取得进展，最后发展为迅速而坚决的行动。

现在，广州政府的地位已日益巩固。兵力兵器的对比完全朝着有利于广州政府的方向变化。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形势。

去年11月北方军阀在天津会议后组成的“安国军”，**现在实际上瓦解了。**吴佩孚同孙传芳一样，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舞台上**目前没有任何实际力量。**剩下的只是已经被打垮一半的张宗昌鲁系集团以及张作霖奉系集团。上面已经提到，“安国军”指

挥部不可能使各个军阀同时行动和协调作战。**广州政府军队得以将其各个击破、予以重创。**在国民革命军同鲁奉集团的第一次交锋中，便已明显暴露出鲁军和奉军的行动不相协调。当张宗昌（鲁军）把一半以上的兵力调往宁沪地区支援孙传芳时，张作霖只把为数有限的军队调到豫北，与张宗昌的行动毫无联系。由此可见，**这两个军阀在今后也未必能共同地、有组织地采取行动。**妨碍鲁奉联合作战的，一方面是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是山西的阎锡山对奉系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威胁的态度。

奉系阵营内部的形势也不太妙。。**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众所周知，是坚持主张同南军停战的，而吉林和黑龙军的督办吴俊升又拒绝把自己的军队派去同广州政府军队作战。**

奉系武装部队的总数为十四万人，但兵力过于分散。张作霖必须至少把五、六万人留在满洲，其余七、八万人用于驻守直隶，只以部分兵力（张学良部）开入豫北。

张宗昌军队将近十万人，但同样分散在各地。约三万人留在山东，不到七万人分散配置在徐州至南京铁路沿线。经宁沪一线多次恶战和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以后，现在**张宗昌必然已经损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

军阀今后可能展开总决战的战区，只有黄海与山西之间以及河南部分地区这个比较狭窄的地带。奉军的推进在豫中地区被原先隶属吴佩孚，现在成为国民政府盟军的靳云鶚将军等部所阻。因此，张宗昌的残存兵力可能因与张作霖军队隔绝而被歼。“安国军”占领的地区与广州军占领区相比，铁路网较为发达。但是，这些铁路有些区段通过河南，这就部分地破坏了这一有利形势。

因此，尽管奉军和鲁军的兵力较多，但它们却处于难以展开的战略态势，有可能被逐次歼灭。

南军则与此相反，由于沪宁铁路和整个长江流域已尽入掌

中，形势大为好转。长江是一条水深江阔的河流，甚至海轮也可以直达汉口。在未掌握长江水路交通以前，国民革命军战线的各个部分之间很少联系。由于没有铁路和多山，在浙江、安徽和湖北三者作战的军队彼此无法联系。现在，**因为占领了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能够给广州军队前线提供可靠保障，并为尔后作战行动创造崭新局面的强大基地。**长江流域内约有七百艘轮船，总吨位超过三十五万吨。仅招商局一家就有大轮约四十艘，总吨位约十二万吨。这个构成包抄态势的江河基地，随着今后不断占领新的铁路线和公路，必将使广州军队的形势日益得到改善。

国民革命军的兵力**在最近几次战局中增长极快。这是国内战争的一个特点。战果越大，战事越紧张，兵力增长就越快。**这与我们在各国之间的武装斗争中所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驻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力，加上陕西和豫西的冯玉祥的军队，共约三十万人（数字不精确）。

国民革命军今后将展开行动的战区，**具有某些特点。**尽管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均为广州政府的盟军所占，但这些地区的政治形势颇为错综复杂，毫无疑问，广州军队和冯玉祥军队在该省的推进可能遇到甚至来自某些盟军方面的阻碍，至少是不合作的态度。但是，**这种可能会遇到的阻碍不会起决定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国民革命军将会使用庞大兵力在宽广的正面上对北方军阀实行进攻。**

考虑到鲁军与奉军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兵力分散，在**战略上完全可以用主力对张宗昌的残存部队坚决实行进攻而将其彻底击溃，攻占山东，**尔后再与张作霖单独作战。在与张宗昌的交战中，奉系军队当然可能局部参战，但在目前形势下，它未必会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南京的攻占，毫无疑问，可以预期皖北的广州政府军队将会同转到广州方面的该省省长联合行动，**攻击在徐州至南京铁**

路一线的张宗昌部队。为达到这个目的，兵力是足够了。

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冯玉祥如何通过潼关山口向开封进军。他在该省的十万军队的后方将如何组织也不完全清楚。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只有进入开封地域，以京汉铁路为依托，才可以改善他的态势。这个战役从上面所说的政治角度来看也很复杂。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这样的推进有明显的好处，它可以保障广州政府集中庞大兵力，这无疑必将使尔后的进攻取得成功。

彻底击败张宗昌后，广州军队就可以与张作霖单独对阵。这种形势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山西省长阎锡山及其在战争中尚未动用过的五万新锐部队转到广州方面，在这方面，目前已经有了许多征候。与此同时，无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犹豫不决的杨森、刘湘等四川将领必然投靠国民党。

很难预言今后事态的演变，但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即**经济资源、有利的政治形势和兵力对比都将保证广州政府在同张作霖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以上是中国战略形势的概貌。国民革命军现在拥有一系列巨大优势，应当利用这些优势来对北方军阀实施坚决而大胆的进攻。革命军队战斗力强、士气旺盛，又有劳动人民的支援，这些都是中国革命今后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南京事件之后（社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南京、浦口瓦砾场上烟火未灭，又传来了英、美帝国主义及其小伙计们策划新的挑衅事件的消息。上海方面正在加紧进行军事准备。外国租界已构筑起坚固工事，准备受围困。街头到处设置防栅，晚上九时后实行戒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而举行游行时，外国人居住区的所有军队倾巢而出。外国驻沪指挥机构有意制造恐怖情绪，加剧紧张气氛，**寻找挑起冲突的口实**，借以策划新的迫害行动。这是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应当得出的结论。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报刊派出的记者正在精心炮制种种虚假报道，渲染外国人似乎遭到了危险。这种公开的、令人愤慨的谎言，其目的是在挑起欧美各国一般老百姓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心理，可是，这种谎言被这些记者自己推翻了。因偶然事件受害的外国人人数量微乎其微。上海有两个外国人受伤，南京，据**非直接情报**来源统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发自资产阶级报刊的一系列报道表明，外国人撤退时并无人押送，也未受到任何袭击。有消息说，曾有人企图进行抢劫，但为国民革命军所制止。

这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报道的事实。但是，黄色新闻记者仍在散布其所谓野蛮的狂暴行为和民族革命运动似乎对所有外国人都抱仇视态度的谎言。他们大喊大叫什么无知平民无法无天（指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活动）。

帝国主义报刊关于“工人恐怖”的叫喊反而彻底暴露了它们自己。因为它们不能不承认，它们到处喧嚷的所谓无法无天的野蛮

暴行和抢劫行为并无事实可资证明。它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在发生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工业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出现于中国历史之中；它一开始奋起便以欧洲革命战友的丰富革命经验武装了自己；它运用了最现代的群众组织形式并将本阶级的力量运用到中国政治斗争中以争取斗争的胜利。

帝国主义者粗制滥造所谓“黄祸”的恐怖以吓唬小市民群众，又以“保护外国人生命安全”的谎言，欺骗博尔这样的参议员，他们正通过这种方法疯狂地策划一场反对东方革命运动的大规模斗争。直到最近之前还因为对美国伙伴的立场存在令人痛心的怀疑而十分激动的英帝国主义，现在感到劲头十足。南京被枪杀的成千名牺牲者的鲜血凝成了英美的合作。无论英美之间的矛盾有多大，无论他们之间的协定多么不可靠（我们尚不清楚，是否具有协定形式），美国在南京事件中的行动本身就是要让英帝国主义放手去干。

英帝国主义者已在幻想着广泛的行动计划。如果说美国反动报刊《纽约先驱论坛报》认为“广州方面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对英国，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的话，那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戈华尔特**先生的讲话不过是重弹已经听腻了的老调。根据这位先生的看法，问题实质在于“**中国和印度**出现了可怕的苏维埃活动”（呵！那当然可怕了！），那儿现在“**正展开了世界革命的序幕**”。

从保守的政治观点得出的这一不无几分轻率的结论表明：英帝国主义对在南京的废墟上如此成功地建立起来的英美“合作”抱有多么巨大的希望呵。

美国半官方报纸对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出现的政策一致是否持特别欢迎的态度，现在还难说。从美国报刊的反映来看，似乎是假仁假义的表面欢迎和难以掩饰的内心忧虑参半，它担忧的是，英国会不会从美国的“帮忙”中获取过多的好处。

反动的《华盛顿邮报》一方面装腔作势地翻着白眼，一方面

感到高兴：没有再发生轰击南京之事。作为见面礼，使七千中国人丧生已经足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担心中国人对美国海军将领杀害他们的同胞会不乐意，担心这样做会难以将美国和英国区别开来（“其实他们的利益和政策都是一致的”）。

这种顾虑和忧愁使人想起初次“出海”行盗的土匪那种心神不安的心理状态，可与当年墨索里尼担心落入侍候英国人的地位时的心理相媲美。美国企图要弄手腕，再次给自己披上一张羊皮。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对这种花招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大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联合演出尚未达到高潮。日本仍然在独行其是。它是否愿意参加对付中国革命的共同行动现在还是问题。不过，紧张事态并不会因此而有所缓和。

全世界劳动者应当密切注视长江一带现在发生的事态。

帝国主义者现在公开宣布要抛弃一切测隐之心，要果敢地采取行动。劳动群众应当记住阶级敌人的这一忠告！

（马宝华译）

中国革命和国际帝国主义（社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利用南京事件扩大和强化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计划，正在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同人们的判断一致，是英国帝国主义。这并不奇怪。英国不仅是一个同中国有着最大利害关系和受到最严重损失的国家，而且英国帝国主义者的东方政策是同他们的欧洲计划紧密联系的。他们把帝国主义列强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看成是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南京事件在这方面使英国保守党人喜出望外。

《观察家报》不无名气的编辑哈文已经再次呼吁组织英美两国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死硬派”又感到浑身来劲，唾沫四溅地重新谩骂起“赤色的莫斯科”来。《泰晤士报》在评论南京事件时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英国在中国的主动精神（在派兵问题上）现今已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来自伦敦的消息说，列强正在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英国方面已提出建立驻华外国军队的统一作战指挥部的问题。英国帝国主义一心想要趁热打铁。

张伯伦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带有同样的性质。这篇声明对南京事件的描绘同充斥资产阶级报刊的谣言如出一辙。张伯伦发言的荒唐无稽是十分明显的。为了支持显然不能成立的所谓广州军队应承担责任的说法，他描绘了一幅所谓“经过精心策划的”

（！）暴行场面，似乎这些暴力行为是国民革命军士兵“在哨子和军号声”的指挥下进行的，简直象是拍摄电影的群众场面那样

清晰可见。

黄色报刊大肆渲染这类题目，什么有组织地进行劫掠，什么几乎是广州军队指挥部下令让士兵强奸白人妇女，什么搜捕外国领事等等，目的都是为了引起人们最卑劣的本能。帝国主义老爷们这一次使用的只不过是私刑杀害黑人的英雄们所惯用的手法，他们在野蛮残酷地迫害黑人居民时，最常用的借口就是诬陷黑人强奸白人妇女，而现在这种特别可能引起美国公众激愤的卑劣手法则是为了对干涉中国准备“道义上的理由”。

如果说英国外交部在力促同中国开战，那末其他列强则还举棋不定。美国仍然力图维持一种表面独立的对华对策，玩弄手腕，迟迟不下决心。一方面，美国向中国增派军队；另一方面，柯立芝认为有必要同狂热攻讦广州政府的驻华使节分清界限。一方面，美国报刊同英国黄色报刊一唱一和地大造外国人遭到杀害和抢劫的谣言；另一方面，白宫（柯立芝的官邸）的官方消息却强调说在南京受到损害的欧洲人为数很少。

一方面，美国外交部声明：各列强并未讨论联合行动问题，采取这种行动不是时候；另一方面，它又承认“存在防御性质的军事合作”。从所有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打算公开地和正式地束缚自己，但实际上又不断为英国帝国主义“友好地效劳”。日本的政策更加动摇不定，至今为止它在广州政府同北方军阀之间的斗争中一直奉行比较中立的政策，因为日本认为，南方政府如能取得胜利，受到伤害的首先是英国的影响和英国的利益，所以它力求利用这一情况从中渔利。这种观望政策受到坚持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日本军界的激烈反对。无论中国革命本身的发展，还是广州军队继续向北方日本主要权益集中的省份推进，都可能引起日本改变立场转而倾向于联合起来同中国开战的计划。关于日本外相敝原似乎赞许美、英两国相应计划的报道，虽因日本报刊提法隐晦婉转而未引起很大轰动，但仍然是一个信号。

法国帝国主义继续采取观望立场。这是因为英国外交机构给自己原先的盟友制造的不愉快事件未免太多，以致它们不愿一听召唤便立即忘却前隙投入针对中国的某种联合行动。当然，把上海的法租界同公共租界隔开并且在法国人同“西方文明”的其他代表之间设置铁丝网，只能看作是一种相当滑稽的纯粹地方性的纠纷。不过，这一纠纷也表明，由于英国外交机构在欧洲大陆多次玩弄手腕而心神不安的法国正想方设法在亚洲捞回一把。

中国革命正面对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手段。公开的和隐藏的敌人都虎视眈眈地伺机对中国革命下手。只不过有的敌人直截了当地把炮口对准中国革命，有的敌人则愿意先发表一通友善和解的演说。

值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国革命从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苏联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

（乌传袞译）

工人的广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C·达林

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当前事态的主要内容。在广州，这一斗争特别激烈。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对英国帝国主义视同珍宝的殖民地香港进行了长达十六个月之久的抵制运动。在这一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得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等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广州的两个商会也积极支持这一斗争。无论在广州还是在全国，这一场斗争都是由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坚强一致的，它的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影响着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力量。工人同资产阶级、农民同地主的这种斗争不断扩大，而随着这一斗争的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中，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为反帝革命的代表，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个新的联盟中逐渐取得了领导者的地位。

广州的工人运动同中国革命这种向新的轨道过渡有着直接的关系。

广州工人有严密的组织。不参加工会的工人几乎已经没有了。各种工会的会员达二十余万人。广州虽然也有现代化的工厂，但主要的生产形式是手工工场和作坊，手工劳动的比重远超过机器操作。因此，广州的工人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作坊工人。

两种因素决定着广州工人的处境，这就是农村的破产和使用机器。日益破产的农村把成千上万名失业者驱向广州，这使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急剧下降。机器又排挤熟练的手工业者。机器毁灭

着手工业工人，因为机器不需要艺术家的才能，而只需要劳动力。标准化的产品排挤着工匠艺术家手工劳动的产品。

这两种因素对广州工人起着同样的作用：使工资急剧下降，使工人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造成失业现象。这两种因素也迫使原先相互隔绝，极度涣散的广州工人团结起来。广州工人加强团结既有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制止工资下降。

广州政府连最低工资限额也不愿加以规定，于是工人只好自己来作出规定。而办法只有一条，就是罢工。

关于广州罢工的情况，我们已经作过介绍。这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罢工已成了广州工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如果仅仅把1926年一年内的罢工加以描述，就能写出一本极有价值的厚书。

就以火柴工厂的罢工为例。广州共有八家火柴厂，每月生产火柴一万箱。这次罢工的起因是由于其中一家工厂解雇了十六名女工。这家工厂的工人宣布罢工，罢工迅即蔓延到其他火柴厂。罢工期间，工厂经常举行群众大会。会上不仅报告罢工的经过，而且报告有关英国帝国主义的情况和北伐的进程。在中国火柴厂工人的群众大会上，演说以后喊的口号是：工人团结起来，支持国民政府，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工人为了提高工资不断进行斗争。自1917年起工资就没有增加过，而物价已上涨了一倍。冲突交由政府的仲裁委员会予以解决。这个委员会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未能平息罢工。工人整整一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在饥饿的威胁下只好被迫向资本家让步。企业主并没有睡大觉，而是在策划对付罢工工人的恐怖行动。他们收买歹徒杀害罢工领导人。拖延了三十五天的罢工终于结束了。工人就中止罢工印发了传单，其中说：“由于一个多月的失业。大部分女工和儿童面临死亡的威胁。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但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提出的要求取得了完全的

胜利，但我们仍然是满意的，因为我们原来受够了苦难。”

广州的罢工就是这样进行的。罢工常常处于病态的情况之中，时间拖得很长，而政府的仲裁更是十分软弱。如果工人不同意作出让步，仲裁委员会的会议就延期三天，然后一再拖延，直到工人因毫无收入而不得不退让为止。企业主则在这个时间内策划谋杀工人领袖。

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州每一个工会都有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这类武装工人纠察队保护罢工工人不受企业主策划的袭击，保护他们免遭工贼的破坏。

罢工期间，工人不准商人到举行罢工的企业中进行贸易活动。一旦发现有人做买卖，他们有时就把商人扣押起来，并且封存商品。发现工贼也加以逮捕。工人把逮捕的商人和工贼立即解往警察局。

资产阶级在市内散布关于工人纠察队进行恐怖活动的谣言。火柴厂的老板商议过把自己的工厂转移到香港和澳门接受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问题，并假借工人的恐怖行动作为自己逃离广州的理由。某些印刷厂的老板携带财物逃往县城。所谓“工人的恐怖行动”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企业主无法同个别工人打交道而只能同整个工会办交涉。由于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人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企业主或者散布谣言说工人进行恐怖活动，或者逃往工人组织程度较差、工资还比较低的县城。这就是所谓工人恐怖活动的真相。究竟是谁在搞恐怖活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为了在国民革命军的后方建立起一种和平的气氛，工人甚至避免进行罢工，心甘情愿地把冲突交由政府加以仲裁。

由于资产阶级散布了关于工人恐怖活动的神话，早在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①就已发布命令解除工人的武装，对

^① 当时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编译者注

于使用武器的工人加以逮捕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到10月份，反对“工人恐怖活动”的斗争达到很大的规模，以至工会不得不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和发出告居民书，以解释事情的真相。

这次会议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驳斥了关于存在工人恐怖活动的说法。广州国民党的报纸《国民新闻》对这次代表会作了如下的报道：“代表们宣称，鉴于物价飞涨，要求提高工资和罢工等等均属不得已之举。企业主私刑拷问工人并把他们赶出企业的事常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将企业封锁起来。毫无疑问，在当前北伐进行之时，维持安定和秩序极端重要。因此，每当发生冲突或骚动时，工人很希望主管当局能承担起解决冲突的任务。但事实证明，往往罢工拖延了几个月，而当局不闻不问。”代表们最后说，如果地方当局了解工人的处境，根本不会发出如此严厉的通令。

到12月份，这已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以后，才又公布了一项关于工人运动的通令。但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同以前的各次通令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一次当局果真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并且为此还动用了军队。

工会理事会又向省政府递交了一封函件，其中说道：“人人都知道，广东工人虽然有政治自由，但至今为止经济条件极其低劣……近五年来，经济情况变化极大。有的工人至今工资没有动过，有的工人收入反而减少……”。

“数量众多的冲突事件可以说明，工人十分急躁。但是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仔细研究工人的要求，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要求都只是改善他们可怜境况的最低要求……”。

“老板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假意答应考虑工人的请求。但就连最小的一点要求都不当场回答。更有甚者，他们关闭企业，解雇工人，组织对立的工会，雇用歹徒殴打罢工工人，收买流氓破

坏罢工……”。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工人才不得不扣押罢工的破坏者，对工厂和商店进行封锁，把扣留的商品保存在工会的仓库内直到冲突解决后再行归还。他们这样做并不是逞一时之快。当局负责代表不及时解决冲突事件。例如，政府原劳动土地部长离职时，遗留下来未解决的劳资冲突案件达一千七百起。”

国民党把自己看作是包容一切阶级的组织，认为中国所有阶级均受压迫，因此国民党一视同仁地既组织工人也组织商贾，既组织无产阶级也组织资产阶级。国民党设有工人部，但与之平行的还有商民部。从一个中央机关表现出两种对立的趋势。工人部组织工人，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此同时，资会阶级则对国民党商民部施加压力，试图把这个部拉到自己方面来。

国民党在广州共有二万多名工人党员(工人总数为二十万)。广州工人阶级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支持国民党的工人部。所有罢工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的，采用的是国民党的口号。而资产阶级也同样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对工人进行抵制。

可以拿缝纫工场的业主为例。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同业公会。他们的工场发生了罢工。罢工拖延了半年多，仲裁委员会一直未能解决好这次冲突事件。于是，业主同业公会召开会议，会议开始时，同国民党开会及工会开会一样，先诵读孙中山的遗嘱。

会议讨论了问题，通过了请愿书，然后全体与会人员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带着请愿书像游行示威一样前往国民党政府、省政府、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和社会治安部。商人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一、下令警察维持缝纫工场的秩序；二、严厉惩办引起骚乱的工人；三、如有发生工人纠察队扣押企业主并送往警察局或社会治安部审讯时，应予立即释放，免遭不公。

关于这次请愿的结果，《商报》于10月1日报道说：“收到请愿书后，社会治安部李部长当即对商人的请愿做了答复，并下

令各警察分署指示警察加强警戒缝纫工场，一旦发现商人同工人发生冲突应立即派出警察部队镇压骚乱。凡不听从警察指挥者，一律押送社会治安部进行追究。”

这次罢工期间，所有企业都贴有工人的标语：“为提高工资一致罢工”。就在近旁贴着企业主同业公会的标语：“在工人的压迫下，我们只好停工，甚感遗憾。”

尽管有的工厂贴出标语说：“此厂已同意我们的要求，允许其正常开工”，但企业主同业公会并未让步，仍在策划反对工人的斗争。

上述请愿书第三条的内容是：“命令缝纫工会不得反对自己宣布为商人并退出工会的工人”。

这是企业主在招募工贼，劝他们退出工会而参加企业主的同业公会。商人们就这样开始逐步分化缝纫工会，筹组工贼的工会。请愿书第三条的意思，就是要警察保护工贼的工会免受工会的干涉。这就是所谓这会治安遭到破坏的背景。

广州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广州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办法，不仅是正面打击和大批解雇工人，主要的还是分裂工人运动。广州发生的一切对全中国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广州的无产阶级比上海的无产阶级更具有代表性。

在广州，企业主和工人都参加的那种中世纪式的旧行会力量还相当强大。阶级斗争的发展使行会陷于崩溃。它们像肥皂泡一样迅即破裂。工人们纷纷退出行会，建立自己的工会。不过行会已有多年的惯例，有长期以来牵制工人的办法。各行业都有自己崇拜的宗教偶像，因而工人退出行会时，还得同这种偶像决裂。

例如，有一次在广西一个县城开会成立木匠工会，要演讲人和组织者向工人们讲清组织工会的必要性并没有多大困难。因此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突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工会是好事，但不知我们木匠的祖师爷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原先平静的会

场顿时乱了起来。直到一位机智的同志建议把祖师爷算作为木匠工会第一名会员，会议才安静了下来。在给祖师爷发了第一号会员证以后，其他工人才接受了会员证。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祖师爷神庙的问题。神庙是行会修造的，而建庙时为首的则是参加行会的富商。在木匠工会建立以后，也即是旧的行会分裂以后，工人和业主之间为争夺祖师爷神庙的所有权又展开了斗争。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有时就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不过广州的工人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了。行会的祖师爷如何看待工会的问题已经难不倒他们。行会还用其他办法使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收入较多的上层工人，同商人接近。一旦罢工使行会垮台而工人参加了阶级工会，旧行会的商人便立即吸收上层工人、失业工人和工贼另行组织自己的工会。

往往罢工一开始，工人就被解雇而流落街头，企业主则从自己的工会中招募工人。他们就用这种手段成立了二十六个工会，吸收了近二万八千名工人。这些工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所谓“广东总工会”，为首的是一名叫陈森的刑事犯。

在1926年7月29日出版的“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关于这个组织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机关报工人杂志《广东工人向导》上，我们找到一份关于陈森情况的资料：“从他出生之日起直到最近他又娶了一个小老婆为止，我们找不出他所干的哪一件事情是对工人有利的。他是恢复权利委员会的成员，可是他进行工作的结果是他在老家购置了一大片土地……不久前在广州市长选举期间，他可起了重大作用，结果是他变得更加脑满肠肥了……他利用广东总工会的名义伸手向资本家要钱。为了报答资本家，他就竭力为资本家效劳，阻挠工人举行罢工和要求增加工资……陈森唯一的事业就是为资本家建立自己的“工会”出力……参加广东总工会的工人一次也未能提高工资……他杀害过饮食业工会的三个会员，还帮助企业主杀害牙刷制造业工会的会员。”

陈森杀害饮食业工会会员还是1925年7月的事。工会多次要求政府惩办凶手。一年过去了。工会已经为纪念惨案发生一周年举行了为时一天的罢工，而陈森仍逍遥自在地在广州玩乐。最后还是饮食业和牙刷生产工人自己抓住了他。

1927年7月，牙刷生产工人决定举行罢工争取提高工资。为此，他们决定组织自己的工会。于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代表为此在各企业之间奔忙。当他们来到惠爱西街^①时，遭到一个牙刷生产企业主率领的六十名歹徒的包围。歹徒们杀害了三名工人。这一次袭击和暗杀就是由加入广东总工会的另一个由企业主组织的牙刷工会策划的。

1926年4日发生了蔬菜加工业工会和蔬菜加工业“工团”之间的冲突。“工团”是企业主组织的。两个工会为进行注册又进行了斗争。劳动局接受工会登记注册。企业主组织的工团参加了广东总工会，因而也成了合法组织。

9月份，蔬菜业工人举行罢工。约二百个企业接受了工人的条件。但是这也不是一次不流血的罢工。企业主组织的行会改称为“扬道工会”^②，参加了广东总工会。和工会一样，“扬道”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人纠察队”。不仅如此，这个“工会”还雇用了二百个流氓，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当真正的工会举行罢工时，“扬道”就袭击罢工工人。在街道上发生了战斗。八十名武装的“扬道”分子向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发动攻击。五名工人在搏斗中牺牲，三名受重伤，另有两名罢工领导人被扣留，带往企业主的“工会”，沿路遭到棍棒毒打。

平行工会之间进行巷战，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会同行会或企业主组织的工会之间进行巷战，在广州几乎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① 今为中山六路。——编译者注

② 此系译音，未查到原来名称。——编译者注

中国同志曾试图统计出这类战斗的总数。他们未能搜集到全部资料，因为关于这类巷战的消息在报纸上并不全部刊登。仅据不完全的资料，自1925年7月至1926年6月，就发生此类战斗五十四次，也就是说每周至少一次，而且很少有不死人的。

自1926年7月至年末，此类斗殴更加频繁。战斗完全按正规作战方式进行。宽阔的太平街是此类作战发生次数最多的地点。交手双方都带着旗帜，打得十分激烈。工人几乎总是遭到企业主杀害，原因就在于当局对工人问题不采取坚定的方针。

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行会终于一一崩溃、破裂。工会取代了行会。商人们则参加了商会。有时一个行会分出两个工会，一个是企业主的黄色工会，一个是革命的阶级工会。行会和同业公会解体后，广州工人运动一度出现分散状态。革命的阶级工会联合成立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参加了工会国际。这个工会组织在广州一地就有一百七十六个工会，拥有会员十七万人。

如果统计一下各行业工会的数量，对于工会运动的分裂状态就不难理解了。以运输业工人为例，他们共计有二十二个工会，会员总数三万九千人。其中拥有会员一千一百人的两个工会参加广东总工会。

木匠共计有十六个工会，其中有四个参加总工会。

再如，西式制帽工人专门组织一个工会，而中式制帽工人也组织一个工会。由此可以看到工会分散到何种程度。

准确地说，这些只能称作行业性工会。不过行业性工会正在消失。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产业工会。不过，这一过程进展缓慢，而且也同样少不了流血事件。

例如，往往同时出现两个，有时甚至三个平行的工会。劳动局只同意其中的一个登记注册。于是，为此又展开了斗争。每一个工会都力求自己能取得注册资格。这样一来，往往又要靠斗殴来解决问题。通过工人代表会总的说来尚能做好团结工作。不过

工人代表会有有的时候也会把行会吸收进来。有时还会把有老板参加的工会吸收进来。这种情况妨碍了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的工作。

但是，最主要的障碍自然是广东总工会。只要某两个行业工会一发生冲突，广东总工会就立即出场，力图拉拢其中某一方参加总工会。这样，为了吸收新会员和收会费又要发生冲突。一个生产部门中有了两个工会，每个工会都竭力吸收工人参加本工会。于是，又发生新的斗殴，酿成新的伤亡。

虽然困难重重，工人代表会还是做到了把个别分散的行业工会联合成为产业工会。不过这项团结广州工人阶级的工作受到广东总工会分裂活动的阻挠。广东总工会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总工会在右派国民党内，在警察局和社会治安部等其他政权机关获得支持，这一切倒也并不可怕。

同国民党的工人部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人代表会多次要求取消总工会并把这个总工会的工人同工人代表会合并到一起，但始终得不到任何结果。可是，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消除工人之间的斗殴。

与之相反，广东总工会则要求国民党和政府只承认它是合法的工会，因为“我们帮助政府联合工人支持政府实行的措施已经好几年了”。这一点就表现在“许多行会根据总工会的指示组织了工会。这就是说，我们把工人集合起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使国民党拥有了有力的革命根基。总工会是联合广东工人运动的中心。它调解工人之间的冲突，干预劳资纠纷，以普遍的福利作为自己的宗旨”。

这就是黄色的总工会要求承认它为唯一合法的工会的主要根据。

如果政府这样行事，那政府就将要站到参加工人代表会的十七万工人的对立面。因此，政府没有这样做，但它实际上还是承

认了总工会，因为劳动土地部同意总工会所属工会登记注册，也就是说使它们的存在同参加工人代表会的工会一样取得了合法地位。

右派国民党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人组织。这就是机器工会。在广州，熟练的产业工人只占二十万工人中的极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是广州的工人贵族。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要比普通的广州工人多好几倍。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约在每月六至二十卢布之间，产业工人则可拿到每月三十至七十五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多。这是广州的工人贵族，他们有自己的“机器工会”，下分六个工会，共拥有会员八千五百人。这主要是五金工人。广州一万零五百名五金工人中有七千人参加了机器工会。

机器工会既不参加总工会，也不参加工人代表会。

受机器工会之害最大的是铁路工人。机器工会存在本身就分裂了广州的铁路工人。因此，铁路工会同机器工会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其间许多工人因之丧生。

尽管军事当局严格禁止铁路罢工，尽管铁路工人理解作战期间交通运输的重要性，而且不少铁路工人志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他们还是不得不举行罢工。9、10月间，铁路开始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当局制止对铁路工人的非人待遇。罢工期间也发生了冲突。1926年10月5日，国民党的《国民新闻》报刊登了三水铁路工人的声明，其中说到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团的几十名武装士兵深夜闯入一家铁路工场，向工人开枪射击。声明说，伤亡人数尚未统计清楚。这次袭击的借口是，铁路电厂因负荷过重对该团驻地供电微弱。铁路工会要求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把第二十五团调往别处，支付工人的治疗费用，惩办士兵。

声明最后指出：“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为了保证自身生命的安全，将被迫对待违反国民党原则的士兵使用这些士兵所采用过的办法。”

政府接受了工人的最后通牒。

在铁路冲突期间，机器工会扮演了叛徒的角色，破坏铁路工人的斗争。其他工会则对机器工会进行抵制而支持铁路工人。例如，印刷工人就拒绝为机器工会印制任何东西。

机器工会从右派国民党和掌权的右派国民党人那里获得了支持。最近一段时期，在中央政府迁往汉口以后，广州政府就公开反对铁路工会而支持机器工会。

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分化广州的工人。广州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革命胜利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广州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在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巩固以后，它开始进行经济斗争。

资产阶级竭力分裂工人阶级和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实力。广州无产阶级正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乌传袞译）

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A·斯捷茨基

为了反对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动用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和手段配合行动。除了支持反革命将领和他们的军队之外，还使用帝国主义强列的军事力量进行公开的干涉，如增派海军和空军兵力，命令海军陆战队登陆，枪杀中国居民，搜捕工人运动领袖，等等。除了上述种种军事手段之外，另一种办法就是从背后打击民族革命运动，暗中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使之从内部发生爆炸。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参加民族革命的各种力量的组合和格局十分错综复杂。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中等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国大资产阶级。

促使这个联盟形成的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残余的斗争，是为实现国家民主化和摆脱分散割据状态而进行的斗争。这是既能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又能团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以前有所反映，现在暴露了出来，而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正在日趋尖锐化。

目前，中国革命的进程已经把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也好，解决土地问题也好，都不可避免引起工人、农民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道德同任何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野蛮道德毫无不同。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反对把外国资产阶级赶出中国或者限制他们的权益，甚至愿意为此出力。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他们希图取代外

国掠夺者的地位。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要求稍稍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火冒三丈。

可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广大阶层参加民族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作为领导力量的地位日益明显，共产党的作用不断加强，以及反帝斗争的逻辑本身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满足工人阶级和农民切身的迫切要求。而这样做将意味着**资产阶级同中国工农联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帝国主义强盗目前正是把赌注押在这种矛盾上。他们竭尽全力使资产阶级向工人农民发动进攻以加速这个过程，从内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

帝国主义者这一方针是无庸置疑的。他们力图**同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起一个反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紧密的联盟，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不久前，资产阶级的《红黑》杂志在今年4月8日的社论中已经把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个计划和盘托出。这家杂志强调指出，看来伦敦认定了支持“温和派”即右派国民党人的方针，随后写道：“这种政策现在所以特别需要，因为所有情况表明，国民党内部真正的民族主义分子同极端分子之间的斗争已经爆发”。

《红黑》杂志对于宣布封锁上海和“对煽动者和共产党员采取严厉措施”的蒋介石表示热烈欢迎。该报强调说，蒋介石采取上述措施恰好在张作霖捣毁驻北京苏联使馆之时。文章接下去说道：

“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政策同张作霖的政策在最重大的关节上是一致的。两人都致力于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并阻止莫斯科势力的扩张。这就是中国当前形势的特点。而这两个军事领袖并行不悖的政策是否成功，将最终决定远东的和平能否维持。”

这就是帝国主义阴谋分子为反对中国革命而编织的罗网：唆使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红党”，然后在此基础上让资产阶级的首领同张作霖联合起来。

同张伯伦关系密切的《每日电讯报》前不久对中国事态的预测也同样饶有兴趣。该报在4月8日安慰英国资产阶级说，不要过多少时间，“国民党（即右派国民党人——作者注）就不会再要求把租界地归还给中国，而将请求列强派出更多的军队帮助他们对付赤色极端分子……广州政府的温和派把魔鬼放了出来，现在已无法对它加以控制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资产阶级施加影响。他们对之运用大棒加蜜糖的政策，一面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一面又以和平协商的可能性进行引诱。

张伯伦在一次对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中描述了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和平解决和对外国人在华特权作出某些让步的前景。自然，他所提出的一些让步绝不会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看来，在12月和今年1月期间，英国参赞奥马利同国民政府之间已经就这些问题进行过谈判。

此外，英国帝国主义还采用了施加经济压力的手段。它曾以经济抵制威胁革命的中国，并且在汉口被占领以后实际上已经实行了这种抵制。英国人利用江西、安徽、湖北三省的银行大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情况，试图利用停拨贷款迫使中国资产阶级“变得明智一些”。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用“赤祸”、“平民专政”、没收财产、实现国有化，以及其他种种资产阶级闻之色变的东西进行恫吓。“消灭了红党，那时就有了进行谈判和协商的条件”，这就是英国人向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提出的要求。

来自上海的最新消息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联盟已经在促使这个方针付诸实施，而且采取了卑鄙无耻和野蛮残酷的方式。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正在倒向反动阵营。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工人领袖惨遭搜捕和杀害，工人组织被取

缔。

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反对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不得不付出百倍的努力来为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事态发生逆转，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都不是出乎意料之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重新分化改组曾经有过如下一段叙述：

“目前，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处于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前夜。在这一发展时期，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①

“在民族解放运动向新的革命阶段过渡的时期，大资产阶级看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反帝斗争正逐步脱离其控制，并在客观上危及其阶级利益。大资产阶级竭力要夺回领导权，以破坏革命。”^②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清楚地知道，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倒向反动营垒中去。

正因为看到了这种前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致力于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把国民党变成一个依靠最广大工农阶层的群众性的政党。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为使工农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变有所准备，不断揭露右派国民党人的犹豫动摇、他们反对工人的行动、他们想同帝国主义者和张作霖妥协的企图，而且多次指出，国民革命军的某些将领，首先是蒋介石，并不“忠诚可靠”，而是倾向于反动派方面。

不过，中国共产党并不想加速事态的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是，尽可能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共产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编译者注

② 同上。

党的战略路线是：在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之前，在工农组织得到巩固之前，不求过早地同资产阶级交手。

现在冲突已经爆发。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向革命发起了进攻。它使上海的工人阶级受到损失。从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资产阶级必将力求建立一个它自己的、冒牌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和一个它自己的、冒牌的、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以此同它已不能从内部加以控制的革命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在这种条件下，不言而喻，共产党绝不能把国民党这面旗帜拱手交给反革命。中国共产党将力促把反革命叛徒和出卖民族解放事业的人驱逐出国民党。它将继续进行工作把国民党变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政党，积聚并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继续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北方封建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倒向反革命营垒的所有阶层而斗争。

（乌传袞译）

上海政变（社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昨天和今天来自上海的电报，传来了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的消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对上海无产阶级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无产阶级的战斗小组和上海的赤卫队统统被解除武装。工人举行和平抗议游行的队伍，上海工人和他们的妻儿惨遭枪杀。在上海这个一度既是中国**革命的心脏**（上海工人居住区）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又是世界帝国主义摧残革命的前哨（拥有二万五千名雇佣兵，驻泊有帝国主义的军舰，而且在外国租界构筑工事，把它变成了一个堡垒）的城市中，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已公开抬头。

中国革命是在遭受种种严重折磨中发展的，它是在空前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南京事件，准备实行封锁），直到最近之前还存在反帝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国民党和军事指挥部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和力图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种矛盾正以其必然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发展着。

社会阶级力量正在发生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当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分化改组。共产国际曾经指出革命运动出现分化的必然性及“社会力量发生重大改组”的必然性。1926年12月，共产国际就曾宣布，中国革命处于跨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门槛的时刻，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开始退出”革命统一战线。从那时起，事态发展极其迅速，充分证实了

共产国际的预测。

上海和南京是从反动的军阀手中夺过来的。上海是上海起义工人从内部占领的。帝国主义者都躲进了租界，他们的军舰则还占领着中国的港口。中国同帝国主义者的关系已发展到极其紧张的程度。广大群众，中国的劳苦大众**迅速左倾**。与此相反，中国的资产阶级则一天比一天更惶恐不安，纷纷抛弃革命旗帜，逃离开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队指挥部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和他们的取消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对国民党，这是正确的行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经激化，而且在最近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右派遭到了失败。在下层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耍花招，声明他听从国民党的指挥，矢忠于革命和三民主义。但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同伙们却用另一只手在试探同**帝国主义者**结盟和实行勾结的途径。蒋介石在外部战线的作战行动推进速度越来越慢，相反，蒋介石及其帮手白崇禧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战”却越来越积极。为了讨好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蒋介石把枪口转向了工人。

三天前，他采用血腥镇压上海工人的办法解决这场危机，实行了反革命**政变**。4月11日，白崇禧派兵包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并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帝国主义者则通过有计划地制造挑衅事件与工人交火以**帮助白崇禧**。4月12日，事态愈演愈烈。白崇禧下令向举行和平示威的工人队伍开枪。上海的马路洒遍了光荣而勇敢的无产阶级斗士们的鲜血。蒋介石已成为屠杀上海无产阶级的**刽子手**。

上海政变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伟大的解放斗争的整个历史上又划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各种势力重新组合的情况已十分清楚。在蒋介石率兵与北洋军阀作战时，他干的是革命。但是，自从蒋介石沾满上海工人的鲜血，自从他可耻地枪杀六百名无产者

以后，他已成为中国的卡芬雅克^①，他和他的拥护者已成为**国内反革命**的中心人物和集中代表。蒋介石已站到张作霖一边反对革命，他已暗示有可能与张作霖举行和谈。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眼中，蒋介石现在已是**投入帝国主义营垒的叛逃者**。以前，国际资产阶级只是向蒋介石献媚，与蒋介石调情，现在，它公开为蒋介石拍手叫好，把蒋介石拉入了自己的怀抱。

中国已出现**新的形势**。种种矛盾都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全体革命人民现在都已清楚地看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方面的严重危险。我们怀有坚定的信念，相信在当前的困难时期，中国革命营垒一定会表现出应有的沉着和冷静。中国革命有足够的力量把一切叛逃者和变节者扫除干净。蒋介石既然向群众挑战，群众就必然奉陪到底。失败可给人以教训。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中国的革命者将从上海惨案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将更紧密地同**革命的国民党**，同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团结起来，更坚决、更顽强地把群众组织起来，结聚新的力量准备新的战斗，通过上海的失败走向最终胜利。

(马宝华译)

① 意即杀人的刽子手。——编译者注

中国革命问题^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H·布哈林

一、中国事件的国际意义

伟大的中国革命提出了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企图通过一次报告摆出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局限于阐述某些对于判断中国革命及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任务有重大关系的基本问题。

但是，有必要先谈一谈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

整个世界现在正进入其**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我们时代各种基本历史力量互相比量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世界面临着异常尖锐的**市场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在经过一段不长时期的沉寂之后，再次在这方面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攻势。例如，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现在就正以前所未有的劲头推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占领尼加拉瓜，从而激怒了整个拉丁美洲；它在墨西哥策动反叛行动；它十分积极地参与反对中国人民的军事行动。

怎样**对付种种革命潮流**的问题也尖锐地摆在帝国主义的面前。现在可以这样说，国际资本主义又一次感觉到了**来自革命运动方面的直接的世界性威胁**。

1912——1921年期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曾使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资产阶级感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已成为直接的**世界性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这在当时已是不言自明的现实，以致连马

① 这是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原报告只有六节，第七节是蒋介石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后增写的。——编译者注

尔托夫也写了厚厚一本关于“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事过不久，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如今资产阶级又一次处于世界范围的直接革命威胁之下，因为中国革命的战场如此广阔，卷入社会阶级斗争漩涡的人如此众多，这一事件造成的结果真是难以估量。由此也可明瞭，为何有关我们苏联的问题如今也特别尖锐地摆在国际帝国主义面前。

马克思曾讲过：“革命的党使反革命的党团结起来”。国际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日益巩固以及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形势，正使反革命力量麇集到一起，这一趋势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企图，想建立起反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统一联盟。

十分自然，由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一前所未闻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了。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摩擦和分歧——酿成帝国主义间重大冲突的前兆。这类冲突以后会急剧蔓延开来，导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严重对抗。但是，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串通一气来对付各个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在东段的战线被再次打破了，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下述事实的巨大意义。即在一年时间内，除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外，我们又有了一个革命的反帝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占有半个中国，这实在还是首次。现在的中国革命不仅具有国家的组织形式，还拥有一支客观上发挥着巨大革命作用的军队。如今，除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外，远东又出现了一个以越来越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后盾的革命的反帝的国家。

革命力量的这一发展导致反革命力量的集结。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易察觉，或者说在不太易察觉的情况下已经**接近，就实质而言，一场新的战争**，因为现在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一场以革命的中国为一方同以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国反动派为另一方的**战争**。我们不当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不存在通常伴随战争爆

发而出现的各种形式，事实上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再说从来也根本没有谁说过，每次发生的战争在外表形式上都只能是我国1914年情况的重复……。

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力一次又一次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所证实。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写道：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将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诚然，这一预言只实现了一半，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尚未被打倒。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欧洲反动派”来到长城跟前时看到的将不是法国革命的三个口号，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

1853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段话也颇令人感到兴味。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时写道：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②

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这一描述**几乎完全**变成了现实：英、美两国果然出动军舰去镇压给“现代工业体系的地雷”投进火星的中国革命了。

大家都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我们断言，我们时代各种主要历史力量的斗争已进入一个就战场范

① 《马克思选集》（德文版）第3卷第444—4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围之广阔来说前所未见的新阶段，这与列宁的充分得到证实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前不久，一家欧洲资产阶级报纸写道：现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上海，正在建起一条广阔的革命阵线，其队伍拥有的人口已达八亿。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这个强大的巨人已奋起战斗，而这就意味着，随着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孕育着军事冲突、破坏性战争、激烈的社会阶级动荡、伟大的革命）的出现而使人类面临的那场伟大斗争将格外激烈起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上面先说了一段一般性的意见，现在谈谈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此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因为对待任何新的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避免生搬硬套和公式化倾向，避免只是重复那些过去已说过的东西，而应当探索和找出该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独特的和不同于一般的特征，并进行分析和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中国革命的特点首先在于这是一次民族解放革命。它要解决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变中国为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使中国摆脱半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走上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

由历史进程提出的这些客观任务说明，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把中国革命称之为民族解放革命。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是一次单纯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一次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同十九世纪中期，譬如说，在欧洲先后发生的一系列民族解放革命是有深刻的区别的。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当时也存在统一国家克服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任务。但是，中国革命与这

些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深刻差别在于，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要使中国人摆脱殖民地式的半奴隶依附关系，因为殖民主义剥削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实行政治、法律和国家的压迫方面都有其特殊表现。“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众所周知的牌子最能说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态度，看到中国本身所处的地位以及从这种地位出发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构成了中国革命区别于上世纪欧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即以一系列民族解放战争为标志的那种斗争的第二个独特之点。

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这是一次**反帝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外国资本主义。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它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打破帝国主义的势力。

第四个特点也即涉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它在发展的**现阶段暂时还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当然不是说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在其发展的现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在国内的目标是反对封建残余，反对束缚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中世纪羁绊。这场革命反对的是**封建残余**，是这种封建主义的社会阶级代表，即同资本主义最高的也是最腐朽的形式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军阀”。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

最后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第五个特点**。我这里指的是，这场在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暂时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革命，**有一种经过若干不同阶段和时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它有最终将中国的发展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趋势。自然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场革命是这种转化的“典型”范例。

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极需加以强调。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里想先讲一讲，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转化本身成为可

能的呢，首先的一个前提是，**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较弱**。这并不是说，那里工人阶级已形成一种无人可与其相抗衡的巨大力量。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独特的力量对比这一因中国经济的特点而产生的事实。在中国大工业和铁路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有极大的比重。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往往不取决于本地资本的大小，而取决于整个资本的多寡，取决于所有工厂（不管这些工厂属于本国还是别国）的数量和规模。我们在谈到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时指的正是这种意思。

此外，中国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且也受**社会主义的包围**，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还受着**殖民地的包围**，尽管这种包围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十分显然，不能将它与日本、美国、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上述各点便是构成中国革命独特之处的那些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其复杂的特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问题也必然具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上述种种从总体上勾划出中国革命独特面目的特点中，有必要稍为详尽地谈一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久前由拉狄克同志的报告而在共产主义学院引起的争论中所提出来的。拉狄克同志在这所学院就中国国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在策略上得出的结论。问题首先涉及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从中国革命的阶级实质来说现阶段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

拉狄克同志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请看拉狄克同志发言速记记录稿中的一段话：

“我们一向把中国革命定为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这是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是工业资产阶级，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统治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国家中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着重号是我所加）

可见，拉狄克同志提出的论点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就其社会阶级实质而言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同意这一论点的。^①但是，拉狄克就在这同一报告中又提出另一个涉及中国社会主要阶级力量组合情况的论点。这个论点说：“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是很深的。中国革命的根基不比我们1905年的浅。可以肯定地说，那儿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要比我们1905年时强大，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必对付两个阶级，而只要对付资产阶级一个阶级。**”

如此这般，拉狄克在这里告诉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要对付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主，所及工人阶级同农民一起打击的**只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因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就比我们在1905年时具有更好的条件。

这样的论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拉狄克同志陷入了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的境地。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可以不必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可以针对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其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雅各宾党领导的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其基本内容在于

① 我们不打算对一些不涉及问题实质的不确切的或不正确的提法过于苛求。——原作者注

消灭这种或那种封建残余。按照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中国是没有封建主义的。那么，又怎么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呢？这种革命在国内又是反对谁呢？既说不存在封建主义，又说工人和农民仅仅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消灭封建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又从何说起呢？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怎样提出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孟什维克说，1905年革命基本上**解决了**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客观上已不必要，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列宁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列宁认为，如果这项任务果真已为1905年革命所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真成为历史的“多余之物”了。但是，这个任务并未解决。国内各阶级之间开展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国家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消灭封建关系残余**的任务尚未完成。只要封建残余存在，国内就存在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不管这场革命由那个阶级来进行，也不管在这场革命中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如何。

拉狄克同志还谈到“**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可是，既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那又怎么可以说土地问题空前尖锐呢？如果从理论上看问题，“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整个运动的中心内容，原因就在于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有两种途径：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式和“庶民”的方式。但无论采用何种途径，都要清除封建主义对社会的束缚，都要清除掉封建主义的“渊藪”。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所在。可见，拉狄克同志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一口气提出了两个论断，可是两个论断在原则上却相互矛盾。拉狄克同志的第一个论点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着资

产阶级的任务，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第二个论点却又断言，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论点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了。因为，如果封建主义已被摧毁，它的残余又是微乎其微，那么，所谓伟大的，在现阶段尚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也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必须承认，有许多事实看起来似乎能够证实拉狄克同志的观点，并且使这一矛盾很难得到解决。但这仅仅是乍看起来产生的印象，对此有必要稍加说明。

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必要的材料说明中国的土地关系。在这里打算只讲几个最基本的数字。

在土地关系方面，我们了解的基本情形是这样的：百分之五十的农民租种他人的土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即土地在一至二十亩之间的农民阶层，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由此可见，小农经济**几占全体农户的一半**，却只占有**百分之十五点九的土地**。土地在二十至四十亩之间的小农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拥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八的土地。两类农民相加，即将农民中最贫穷的两个阶层，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小农加在一起，结果是**百分之七十三的农户只拥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七的土地**。实际上各类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还要令人吃惊得多。

农商部的这份统计材料是经过若干次调查核实的，不久前，东南大学也进行过一次考察，其结果也大体证实了官方的资料。至于说到**地主**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十分不明确的。它概括了几种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较富有的大农户、所谓的“乡绅”、官吏、商人兼地主以及“名符其实的”封建大地主、半资本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大地主。

广州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在其根据中国有关资料出版的一本杂志中多处提到，有的地主往往占有**几十万亩土地**。但从总

体上讲，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不起最主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这种状况乍看起来在经济上令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如果中国是和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那末，初看起来，解决任务是十分容易的。既然地主不多，自然也就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封建主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拉狄克正是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他匆匆忙忙下个结论，一笔将中国的封建主义勾去，从而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内容也一笔勾销了。

然而，我们上面讲到的在经济上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十分明显，我们面临的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既不是“典型”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由“典型”封建主义转化为“典型”资本主义或近乎“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再现。

首先应当分析一下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地租**现象。如前所述，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从较为富有的农民或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在这里有必要附带说明一点，就是连我们住在中国的俄国同志，当他们在撰写书稿时，给“地主”一词下的概念也是时有不同的，往往隔几行就出现令人颇费猜疑的用语。不妨举几段文字来看看问题何在。例如，有一位在广州调查中国土地问题的同志写道：

“中国当前存在的地租形式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货币地租，二是实物地租，第一种地租形式多半为富裕的农民所采用，不甚普遍；第二种地租形式，即**实物地租**则与第一种不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广州》杂志第8—9期，伏林同志的文章）

他接着写道：“上述种种实物地租形式实质是变相的**封建代**

役租制，只是加上了一个地租的形式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劳动地租，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它不过是**土地占有者采取封建手段获取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同上书）

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上述引文已经足够了。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实际上存在着劳动地租、对分制地租和**占统治地位**的实物地租，等等。

拉狄克同志就此说道：

“半数农民是佃地农或半佃地农。而且这里所说的地租不是（这也是伏林同志所不明白之点）我们常说的半封建的地租，这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地租，地主是那些向农村放债的商业资本家、商人、官吏。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业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些人无法将资金投到工业中去，你们都知道，中国的银行很糟糕，就象谢得林所说的那样，是漏洞百出，工业又很年轻，既无经验，又缺乏领导者，缺乏关税保护，所以，把钱投入工业是要冒风险的。而在农村要简单得多，政府可以从庄稼人身上**预收四年**的税。庄稼人是躲不开的。于是他们**去向商人借贷**。这样一来，商人便成了所有主，他们从庄稼人身上刮去百分之五十一——六十——七十的收成**作为地租**”（《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稿》）。

首先，在拉狄克同志的这番议论中有一点令人费解：既然农民无处可躲，于是去向商人借钱，然后又按借款付息，那末，为什么要把这叫做**地租**呢？地租者，为所租土地付租之谓也。如果是按借款数字向高利贷者交付利息，这是不能叫做地租的。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不知地租又来自何处，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其次，拉狄克同志在同伏林同志展开论战中并未批驳下述基本论点。如果地租以实物形式缴付，如果地租以徭役和代役为基础，如果地租以实物偿还，而且实物形式居于统治地位，那末，

把这称作是外国资本影响下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是绝对不行的。这种定义把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统统搞颠倒了。①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同半封建主义地租形式的结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本人兼出租土地的事是存在的，甚至是很常见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就是土地占有者，其所得不算债息，而是租金，而以实物偿付租金的形式，便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最新的、最发达的形式，那就是不加区别地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了。

拉狄克同志在分析各种经济关系时走入了歧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面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面却牵强附会地把各种不相同的事实凑到一起，竭力为所谓中国没有封建主义的观点辩解。拉狄克同志没有觉察到，他这样一来就把他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彻底否定了。

总之，既然实物地租、对分地租和劳动地租等等在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那末，这就是半封建主义制度的残余。这种半封建主义的残余，毫无疑问，是同渗透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形式，首先是同借贷和商业资本形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譬如说，

① 请看马克思对此是怎样说的：

“因为**产品地租形式**和一定种类的产品及生产结合在一起，因为对它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还是不可缺少，因为农民家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和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所进行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本来就独立无关，总之，为了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个形式完全适于我们例如在亚洲可以看到的静止社会状态提供一个基础。在这个形式上，和在以前的劳动地租形式上一样，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并且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在无代价的情况下，事实上还是在强制——虽然这种强制已经不是出现在以前的野蛮的形式上——的情况下必须对土地（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所有主提供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930页）——原作者注

就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相当普遍的。^①

但是，远不能说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我们面前仍然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地主所有制在中国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却又是中国革命中极为尖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目前各种事件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点，即这些问题从经济上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迄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书刊，即使从“单纯描述”**事实**的观点来看，也没能提供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只好就如何最正确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提出某些设想和推论。

当分析到中国农村经济（按拉狄克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在**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些人断言中国不存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另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提出了比较周到慎密的论述。这场争论背后是有很深的根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地租时就曾提到对土地的封建占有，在此种封建占有的情况下，土地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皇帝的财产，法律上归皇帝所有，“王公卿相”等封建等级中其他一切代表人物是**这块土地的占有者，但不是所有主**。毋庸置疑，中国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而且事情至今并未完全发展到成为本身的对立物的地步。这种关系残余的某些方面还

① 但是，还必须记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影响早就同封建主义交织在一起了，而这种影响的存在绝不是用来证明“封建主义”“不存在”的理由。举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520年被拥戴为德皇的查理五世实际上是依仗着富格尔银行的势力“击败”法朗斯瓦一世的。当帝国后来采取一系列反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措施时，富格尔银行首脑便写信给德皇说：“众所周知，陛下若无我之佐助是难以获取皇位的，这可由您所派密使之签字为证”。然而，连这样的事实也绝不能否定当时封建主义的存在，谁都会看到，此类证据简直引人发笑。——原作者注

是存在的。①中国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制度，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构，在那里，受控于更大封建主的大封建主可以任意审判和制裁他人，他既是军事长官、当地的“王公”，又是地主，又可以征收赋税等等。在中国曾多次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封建领地显然曾多次毁而又建，建而又毁，现在已只是封建关系的残余。但是，旧的残余主要在于，地方上的主要行政长官、“省长”、“军阀”等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收土地税；从法律上讲，这种行政长官

① 下面一事实最能说明拉狄克同志所下结论草率到何种程度。拉狄克同志在其讲义（《中国革命运动史》教程（1926——1927）。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写道：

“中国是作为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迎接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书刊提到的有关中国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种种深奥问题皆产生于无知，皆由于一些欧洲游览观光者和浅尝辄止的中国问题作者听说，皇帝就是神，他势力极大，而且是土地所有者，于是便不加核实，毫无批判地把自己得来的消息公诸于众。而我们的同志有时不去研究基本的著作，只读这类政论文章，所以就无法驱散这类政论文章引起的在一些极为重要问题上的迷雾”（该书第6——7页）。拉狄克同志这番议论的主要依据是俄国埃肯夫神父的著作。且看并非无名的“政论家”卡尔·马克思是如何说的：“假设在这种直接生产者面前对立出现的，不是私有土地的地主，却象在亚洲一样，是那个对他们来说是地主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或者就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课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普通臣民对国家都不能没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必再有什么更加苛刻的形式。在那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那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那里，因而也就没有土地私有权，虽然对土地来说，既存在私人的也存在有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924——925页）。

这样一来，拉狄克同志盲目相信埃肯夫神父的记述，就把马克思说成是“不学无术之人”，是“浅尝辄止的著作者”、“游览观光者”、散布“迷雾”的“政论家”等等。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资产阶级政论家最惯于把私有制变成从创造世界以来即已存在的，并将“永世”存在的永恒范畴。

——原作者注

不拥有土地，土地不是他的世袭领地，然而，从土地上征收的税款他可以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旧的封建制度残余之所在。经济学术语把这称作“赋税”而不称作地租。但是，当这位行政长官征收的赋税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而且预征四年以后的赋税的时候，当他不仅剥削剩余的产品，而且常常剥削到必要的产品，致使居民彻底破产的时候，那么，就很难说这与“行政长官”拥有领地并利用农民的双手为其“耕作”领土有多大区别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封建制度虽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但却存在着。这并不完全是通常的封建主义，这一点无需争论。但是，中国经济生活方面许许多多封建主义的制度和特点仍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各自盘踞在“自己”省份的所谓“军阀”（实质上与古代封建公国无异^①）也往往都是大地主，他们可以动用自己手中的全部国家机器和镇压机构，可以运用自己的全部权力征收各种赋税。有时他们本身从法律形式上讲不拥有土地，但实际上土地属于他们，因为土地收入的极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他们占有的。这就是封建主义主要残余之所在。属于这种残余的还有乍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官吏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占有土地的（更确切地说官吏中很大比例是土地所有者），所谓“厘金”也属于这种封建主义残余。它虽是十九世纪实行的一种税收，但仍然是封建主义形式的（各方设卡收税，税款数额惊人，等等，等等）。

这就是使拉狄克同志感到晕头转向的那些表面矛盾的正确答案。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种概念：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北方军阀的战争。资产阶级革命的矛头

① “全国分裂为十八个省，这些省大部分是老的封建国家的残余，其中许多省大小相当于普鲁士王国……”（《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基础》，约瑟夫·赫洛威博士编辑，1921年柏林——莱比锡版，第4页）。——原作者注

所向，是针对这些封建主义强盗，针对这些地主、封建主的。他们中一部分人法律上拥有土地，另一些人法律上虽不占有土地，在实际上却享有从这些土地收获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在这些代表封建束缚、已成为历史发展**绊脚石**的“军阀”之间存在着纷争，民族资产阶级才可能起来（暂时起来）反对他们。说到中国国内的阶级力量，那么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所在。

关于封建主义方面，我还想指出另一个对解决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在一份关于1926年12月15日至1927年1月27日期间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有一段话明确谈到“农奴依附关系”。

现将有关段落逐字引述如下：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在广东奴隶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关系方面。在土地关系中也存在奴隶制，不久前我们无意中就看到**好几个地区有佃农充当奴隶**的现象。他们不得结婚，不得离开地主的庄院，除了口粮以外，他们每月只得到三个铜子的工资，外加一点其他的赏赐。要作出更详细的分析现在还有困难，因为在广东本身现在还刚刚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在中国其他省份，如山东，**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即一大批佃农实际上是地主的奴隶**。这却是事实”。

这也是给拉狄克同志的“最新的地租形式”提供的一个颇为不坏的实际描绘！

有鉴于此，有必要就**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的总构想**讲几句话。他的总构想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停滞不前”，资本才涌向农村，农业出现了迅速资本主义化的现象，所以封建主义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个构想把一切统统颠倒了过来。问题根本不在于：因为城市发展缓慢，资本主义才向农业渗透并造成了农业的破产。

实际上因果关系根本与此相反：**正因为**封建主义残余是对农民的严重束缚，**正因为**“军阀”肆无忌惮地对农民进行掠夺，**正因为**地主伙同军阀一起进行着各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掠夺和压迫，**正因为**农民在骇人听闻的沉重赋税压榨下，在地租压榨，高利贷盘剥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摧残下大批遭到破产，**所以**国内市场才日益衰败并遭到破坏；**正因为**这种赤贫化、穷困化等等的进程实在惊人地严重，**当地工业和城市**才失去了迅速发展的牢固基础。这反过来又促使农民或变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赤贫者，或不得不去当“土匪”或形成城市的乞丐大军等等，而不是成为无产者。

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拉狄克同志在报告中很少提到（这也是颇有代表性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这一点，对于研究判断中国革命的政治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帝国主义**首先同封建主义这一最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从国际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来，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便与其**反帝性质**融合在一起了。**反帝**同样也是中国革命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这是由对**中国实行半封建形式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所引起的。在我们俄国，外国资本也起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外国资本在我们这里“创建”了工业；因而也培养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资本与包括外国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相比，力量要弱得多。所以，我们这里无产阶级在数量方面可以说是大得不成比例。在中国，经济上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因而工人阶级与当地资产阶级之间的比例也更为触目。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资本向中国的输入又不同于昔日向沙皇俄国的输入。在中国，外国资本在更大程度上起着阻碍当地工业发展的主宰者的作用。它把中国当作一个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在俄国那时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这一特点**及其在经济上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必**

须摆到突出的地位。说明这一依附关系的数字当时是按工业的部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分别列举的。^① 这些材料表明，最重要的收入项目如铁路、水运、采矿、重工业等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外国资本**手中，象海关这样的财政管理部门则几乎完全由外国资本所控制。其重要环节都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银行和信贷也起着很大作用。它们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分散在各地的广大居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还有一点，即出口业务，特别是出口原料的采购业务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类业务是外国资本通过买办、商业资本以及经营有关业务的银行来同中国最广大居民，首先是农民保持经营关系的中间环节。

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即十分陈腐的封建关系残余及某种形式的当地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同最现代形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相互结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沉重地压在中国**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头上的剥削制度。外国资本同封建制度和军阀机构相结合，各省“头目”又靠军阀的刺刀掌权，通过这些我们真正看到了一部压在最广大居民阶层身上的残酷的剥削机器。现今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首先要反对的就是这部机器。

这种情形就排除了将中国革命同上个世纪**欧洲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加以类比的做法，因为中国存在的是一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这种情形也排除了同我国革命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因为，在我国，外国资本不象在中国那样面对面地同群众作对。我国群众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外国武装干涉时才同外国资本发生正面冲突。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在中国是如此严重，其压迫机器的压力一直殃及居民的最底层。对军阀（也就是封建统治者、封建主义强盗和行政长官），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这些挥舞皮鞭、宝剑和

① 见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原作者注

套索，带来前所未闻的剥削，同时又宣扬要对上帝恭顺的（外国人）之所以同样义愤填膺，原因就在于此。不言而喻，这种封建主义形式同国际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现象，使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规模并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由此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首先，在中国发生的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极为重大的世界性现象；其次，这一斗争是**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预先（因为我们以后还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实际政策问题）得出以下一个基本结论：**不同时注意和强调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无法“搞清”问题**。对于制订党对当前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策略来说，那将铸成大错。

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我想先说一说总的趋向，然后再具体分析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正在蓬勃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和运动的具体发展前景。

首先讲一讲**中国革命下一步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拉狄克同志对这一提法也进行了攻击，而且，顺便提一下，他还对“非资本主义的演变”的提法进行了攻击。

“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个老的术语，早在我们同民粹派的论战中就使用过它，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演变”是何种含义，也从未发生过疑问。为了不产生任何一点疑问，可以再强调一遍，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变。其实，问题当然不在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一种前途的意见，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另有一些说，

“我们有幸”第一个具体地对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不用说我们是以马克思关于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十分强调的那些设

想为依据的。可是，拉狄克同志在此却想“堵住这条路”，尽管他已经慢了一步。他说，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就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如果中国革命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当然是十分美妙的，可遗憾的是情况比这多少要复杂一点儿。不言而喻，如果象拉狄克同志那样把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任务一笔勾销，同时把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也一股儿忘个干净，那事情就十分“简单”了：既然封建主义并不存在，那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向社会主义发展。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既然尚未彻底解决，那末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事实就是如此。难道在实行某种妥协的同时继续进行斗争的前途就是不可想象的吗？难道“解决一半”任务的道路就完全被排除了吗？这条路现在还没有走过，因而也是可以“走一走”的。打军阀，但又不**连根**拔除封建残余和进行土地**革命**；打帝国主义，但又同他们达成妥协，共同对国家经济实行管理和进行资本主义的领导；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但又决不超出改革的范围；同工人一道前进，但又绝不要让他们独掌领导权和实行专政，这样的计划是**存在**的。如果中国不是一半为军阀所占据，如果帝国主义者已经遭到决定性打击，那末，走这条道路是完全不必要的。然而，尽管正在开展着的阶级斗争使越来越多的拥护过这条革命发展道路的人转而拥护**反革命**，这条道路现在**还是**不能排除。

另一种前途是迅速地将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进行到底，将这场革命转入另外的阶级轨道，因而也就是最终转入经济轨道，然后再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

最后还要说一句，对中国来说，**第一种**前途中还有一个方案，但这是拉狄克同志不肯承认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水平都比革命前俄国落后的国家。对这样的国家甚至可以设想一种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将进行到底，实行激进的革命专政，领导权也归无

产阶级掌握，但却**缺乏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在一定的国际形势条件下，即国际革命在世界其他地区处于停滞状态和苏联受资本主义大国包围，总而言之，在世界各种力量的组合发生不利的变化的条件下，提出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有人曾就同样的蜕变问题对苏联讲了许多“多余的话”。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善变能力是极为令人惊叹的，他对苏联感到十分疑虑，对中国却是无比地乐观。

他认为苏联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发生“热月政变式的蜕变”，或者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对中国却成了完全可能的事。他就是这样说的：不要让中国丢掉这种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时也许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玩笑”。可是，在拉狄克的全部方针中，这个“玩笑”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具体说就是：既然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最为狂热的“拉狄克信徒”“同意”某些“并非不学无术者”的意见，即早在公元前好几百年，中国就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那末，十分自然，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水平高于当时的俄国。

既然中国已经没有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我国曾存在封建残余；既然我们受到“文德”^①的**威胁**，而且联合问题还要打下一个大**问号**（我们的反对派是这样断言的），而中国的工农联盟要巩固得多，那末事情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我们来说是悲观的，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乐观的。

然而，稍微进行一点较确切的经济分析就会得出恰恰与拉狄克同志论点相反的观点。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前景要以国内阶级的巨大变动和国家政权的阶级变动为前提，也就是说，要以另一种社会阶级

①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的反革命策源地。——编译者注

结构及**国家政权本身**的另一种社会基础为前提。要赢得这样的前景，就必须先使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就必须彻底完成民族解放斗争，就必须最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最沉重的失败，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一环紧扣一环，运动将通过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转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意见。不过应当指出，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大加发挥的观点，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期间中国问题委员会已作过相当清楚的阐述。例如我们在讲话中谈到中国革命的阶段时讲了中国革命可能的**三个阶段**，说到已经过去的两个阶段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初开始时，斗争的倡导者是那些在工人、农民中寻求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此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都不起太大的作用。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工人阶级积极奋起，农民运动开始发展，结果阶级重心转向了小资产阶级。这时我们看到的是，尽管领导权还在自由资产阶级一边，但工人阶级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强，无产阶级已开始提出掌握领导权的要求。此时，资产阶级虽然对群众运动的高潮已开始产生恐惧，但还能参加反帝力量的联盟。最后一个阶段，即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概括地说，这个阶段革命战线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四阶级联盟向另一种联盟过渡的阶段，即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退出联盟。

目前正在展开的阶级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即资产阶级开始脱离革命，但尚未完全变成反革命。

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五花八门，阶级内部关系千差万别的国家。这当然不是

整个经济**十分成熟**的标志，而是相反，只说明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在技术上十分落后。我们可以看到半工人、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许多阶层，看到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差别细微的阶层，看到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种种不同类型的联系。所以十分自然，**资产阶级往往采取离奇古怪的曲折道路脱离革命**。不能认为那里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明显的区别，而现在这些大人物一下子统统离开了民族革命阵地。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属于这个阶层的有城市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小市民、独立经营的商人和那些生活艰难却有时雇用几个工人并对他们进行直接和间接剥削的人。就其对革命的态度而言，这个阶层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群众。一方面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中有十分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也看到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变得极为**反动**，因为它本身正受到所谓“工人阶级过份要求”的威胁。小资产阶级中的这些阶层唯大老板之命是从，同大老板一起叫喊所谓“工人恐怖”的调子。

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这是用手都可以摸得着的事实。它在民族革命战线内部阶级斗争领域的许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反映。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个思想，即这种脱离革命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过程。在解决策略问题时，对于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这种差异和区别，对于他们在先后不同时间内脱离革命的情况，无疑需要从战略和策略上加以考虑。

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从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期已经讲到过。工人阶级正更加有力地夺取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着斗争，正越来越明白无误地表示出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和民族革命运动主力军的作用，从而为整个**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顺便还要谈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是否走的通？特别是从**经济**上看是否可行呢？

中国革命，首先是从经济观点看，怎么有可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对这个问题需作如下回答。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彻底的、不妥协的解放斗争是以赶走帝国主义为前提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必要的随机应变办法和利用不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收大的企业。对重工业、纺织工业、铁路、采矿和相当部分的银行系统等等，再加上土地，都可以收归国有。当然，这要以政权的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为前提。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过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便是这一过程的政治前提。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没有国际力量援助的情况下是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危险的。不过，也有许多情况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苏联的存在；其次是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从欧洲经由苏联过境；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摩擦；第四，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会提供援助；第五，殖民地运动正在不断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都起着保证作用。当然，这些条件还不能给具体的策略问题和具体的策略任务提供答案。它们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政党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任何一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是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

五、民族革命战线和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革命现阶段比较具体的问题。在这里不打算赘述所有的细节，连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态度上的不同方针和不同色彩这样一些对说明形势颇有价值的特点也不准备细谈。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北洋军阀**同以武力反对中国人民的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的勾结是有一定的政治基础的。这个政治上的基础就是想**通过帝国主义势力、**

奉系军阀（即张作霖集团）势力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国民党人的联盟，孤立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在谈到“右派国民党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中间派也钻进了所谓国民党左派）。

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报刊都十分露骨地宣传这条路线，它们把情况说成是：只要赶走“俄国顾问”，赶走共产党，把国民党激进派连同共产党一起掐死，把工人运动打下去，把农民制服，那末事情就好办，就容易谈得拢了。张作霖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调子不止一次地声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方面，他同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他说什么他（张作霖）只不过是主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不可能一下子把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但这都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他和南军一样，反对“赤祸”，反对苏联的影响（说什么苏联在继续推行沙皇俄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政策）。在不同的阶级力量 and 不同的阶级集团相互角逐中，有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现象。奉系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引诱**国民党右派分子**，企图（而且是不无成就地）一步步把他们变成自己的走狗和代理人。奉系一些最左倾的头面人物（如被人称为奉系“灵魂”并一向以“左”出名的杨宇霆将军）就是主张采取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结盟，更严酷地对付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这种办法的最突出的代表。可以说，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奉系军阀所有的机构、国民党右派、左派奉系将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接二连三地在鼓吹这一点，这是**他们基本的政治路线**。十分清楚，以“赞成”或反对“红党”划线的公式是有深刻根源的，这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于该国的社会阶级阵线，在于正在开展的阶级斗争。它与自由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向右转的过程，与这个自由资产阶级纷纷退出共同的民族革命联盟并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摩擦、冲突、叛卖和政变尝试等等，有关这

些我下面还要讲到。这种向右转的过程本身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另一个来势凶猛的过程，即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千百万劳动者破天荒第一次投身到政治生活中来，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必然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决，一月比一月更为尖锐。这就吓跑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本来就是代表站在工农对立面的社会阶级集团利益的那部分人。连一些资产阶级观察家，譬如英国官方的商务报告的作者都认为①过去的一年是工人运动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的一年。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实证明，连那些天天在报刊上叫喊“穷鬼们的暴行”、“无法无天的平民”是对一切“文化”和一切“文明”的“威胁”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连这些人在其比较象样的出版物中也宣称，最近这一年在中国产生了汹涌澎湃的运动，这场运动越来越多地仿效着西欧的榜样（这不是从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而是从组织形式、纪律、团结程度等的角度来看）。

席卷中国的经济罢工已迅猛异常地发展为有**鲜明政治性质**的罢工。这些罢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无比顽强的开展罢工斗争，表现出情绪饱满地投入战斗的年轻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工人运动的日益活跃，还表现在共产党的队伍相对地有了重大发展。不久以前，共产党在数量上还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终于成为国家发展中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拥有三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其所起作用远远超过其党员数量本身可能具有的意义。共产党在工会中和农民中都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国际和我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份量就更大

① 此外“1925发生了中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除此以外，这一年还是有组织的劳动者（按西欧各国使用这一术语时所指含义而言），在中国奋起的一年。这种奋起是1925年上海一些日本人的工厂爆发罢工产生的直接结果”。（A·X·乔治：《关于1925年6月30日前中国商业、工业和经济情况的报告》第13页）——原作者注

了。因为民族革命战线的任何一个参加者，不管他想搞什么阴谋诡计，也不管他有什么打算，他时时会感到中国共产党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他时时都需要考虑到苏联对整个世界事务，首先是对中国事态发展所能起的影响。

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几个**中心地区**。这只要看一看**上海**就清楚了，这个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工人的彼得格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就从初级的、无组织的自发性经济罢工发展到了高级的自觉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上海发生的事件，工人们提出的口号以及上海工人参加战斗时高举着的旗帜上的标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工人运动已具有极不平常的规模，这个运动的发展极其迅速。时间不长，这个运动就经历了从阶级自觉最简单、最初级的形式到最高级形式的所有发展阶段；从极为原始的斗争方式发展到采用最高形式的斗争方法。因为工人阶级的最高斗争形式是起义，而**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思想标志着运动的阶级觉悟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它现在还不是一支统一的、完全一致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中还有许多在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上相差甚巨的阶层，其内部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以致有时甚至发展到在不同的工会之间几乎要爆发武装冲突的地步（如资产阶级在广州煽起的冲突），工人阶级中还有虽然影响不大但在每次冲突，每次罢工中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黄色工会**。总而言之，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工人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痼疽。但是，这个运动总的趋势是蓬勃向上，日益高涨，对这一点是不应有任何怀疑的。

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重大因素，那就是**农民运动**。这个运动同样正在从自发形式日益向越来越有组织的形式过渡。能说明这一现象的事实很多，

如“红抢会”的兴起；不同省份“农会”和“农会”代表会议组织的发展；这类组织还有计划地开展制定土地纲领的工作，并且把土地纲领的要求同全国的革命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等。因农村内部斗争日益尖锐而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横征暴敛，地租、赋税沉重不堪，内战连绵不断，整个农村疮痍满目，凡此种种都为农民土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工人运动一样，农民土地运动已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

运动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的阶级敌人，甚至包括其中在革命初期参加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工人不仅为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而且十分自然地要提出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以及承认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改善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国家和本厂的法律地位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不言而喻，提出的要求也必然会更尖锐，更坚决。在中国这声势浩大的革命中，任何阶级都要尽最大可能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完全避免这种“过火行为”是不可能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你在一处看到的是把资产阶级赶出工厂，在另一处看到的是没收和瓜分商品，在第三处可能又是没收钱库等等。这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这也是现今中国工人运动广泛深入的一种表现。

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资产阶级愈来愈开倒车，愈来愈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开始时，在中国有一种很吃香的理论和口号（这种口号现在还有），说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并不是资本家，工人是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商人也是工人最要好的朋友。据说，这还是“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反帝战线内部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的分野。如果说这种理论和口号过去一度很吃香的话，那末现在就很难这么肯定了。阶级的界限已发展到如此明显的地步，这类理论已无立足之地，它只能愈来愈暴露自己。

农民群众的反抗**不仅仅涉及封建主**。封建制度同高利贷资本紧密相联，而高利贷资本又通过银行系统同**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等连结在一起。农民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减轻赋税；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风起云涌；到处都出现一种不仅没收军阀、封建主的财产，而且没收大、中地主(其中一部分人介于地主和富农之间)财产的倾向；农民力图废除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起以**农民自卫军**为后盾的各种**农会**和农协等农民自治机构，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农村的资产阶级上层、“土绅”、官吏以及同他们有联系并日益感到强大的农民土地运动威胁的阶层产生影响。当基本的农民群众，譬如说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自耕农和小农投入到运动中来的时候，当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农村中同农民相对立的一面——封建主、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旧官吏也在加紧武装起来对付革命。这种动荡不可能不影响到**城市中**某些集团，特别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出租土地的人住在城里，而不住在乡下，他们又是通过银行这个渠道同城市资本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本身和工农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潮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族革命战线内部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对这种发展前景不能闭口不提，而应当谈一谈。我们在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中国委员会中就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必须在革命过程中的同盟军农民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有的同志讲，资产阶级是一支革命力量，我们应当把它拉到自己一边来，这是正确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尚未出现非在‘要么同农民在一起’和‘要么同资产阶级阶在一起’之间作出抉择的情况之前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对这一点也讲得相当准确而肯定。该决议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决议还说：“不

果敢地去处理土地问题……对革命将是危险的”。决议最后对阶级关系问题作了如下的表述：“当前形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必须在同资产阶级相当广泛的阶层结盟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这两种前途中的作出抉择。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就会丧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提纲和决议》）。有必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纷纷建立起了各种强大的组织，另一个结果则是革命的宿敌和现在离开革命转向反革命阵营的那些人也在拚命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常常可以看到社会上出现各种追赶时髦、胡乱模仿和以假乱真的现象。例如，现在职工会最流行，于是企业主也把自己的组织叫做“职业工会”。有时不得不问一声：这是什么样的工会，是工人的工会还是企业主的工会？正因为如此，往往弄出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来。例如，广州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工会，还提出要求，要提高他们做祈祷和圣礼的费用。连这竟也成了“工会运动”的一种独特形式！

在农村中，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而且正在迅速扩展的一种称之为“地主协会”的组织。这些组织同城市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店主“工会”和其他组织串联一气，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势力。这股势力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在政府中有得力的“靠山”，可以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且每每得到满足。这股势力在农村有它自己变相的宪兵——由“土豪劣绅”控制的“民团”。“民团”是一支军事政治力量，它在农村常同农民自卫队和农民协会的其他组织进行真刀真枪的交手，在城市则经常同工人的武装纠察队（赤卫队的前身）发生冲突。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同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分类似的现象。例如，资产阶级有一个口号是反对工人的“无理”

要求。这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口号。它是资产阶级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中广为运用的主要手法之一。所谓罢工“破坏”经济，在无休止的罢工和现在经济生活中到处出现混乱的情况下“无法办事”等等论调，都属于这种手法。反对“劳工恐怖”的叫嚣也属于这类货色。对于小资产阶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不是清一色的，而是许多阶层组成的，这些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正慌慌张张地离开革命，离开民族革命联盟。

十分清楚，现阶段各种阶级力量之间斗争总的情况是，正在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革命发展正处于**危急**时期。资产阶级的各阶层纷纷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同国内的封建主，同干涉者，外国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那些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结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正在**向右转**，其中不少人在当前发展阶段正变为越来越**敌视**革命的力量。因此，**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这种分化改组总是伴随着种种冲突和斗争，而且斗争的界限事先也难以预料。

在谈到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点不应忘记，即这个组织是一个由各有其本身组织形式的**几个阶级组成的联盟**。国民党没有一般政党所特有的那种严格的党纪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我们谈到国民党并把它分为右翼和左翼的时候，必须记住，虽然名义上在**一个党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两个党**（如加上共产党就是**三个党**了）。这两个党并不遵守共同的党纪。整个国民党的纪律，总的说来，同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党纪的概念是相距很远的。在我们谈到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指的是还远没有实现统一指挥原则的一支**雇佣军队**，军长们往往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而且经常相互倾轧。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国民党同一些国民党员将军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这些将军对自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的决定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而且违反党纪的事件常常带有相当鲜明的**阶级内容**。

国民政府或者确切一点说国民政府**某些部门**，某些机构在**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上的政策，即使从最基本的要求来看，也远远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革命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自由：罢工自由，集会自由，建立纠察队的自由等等，等等。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域中，我们看到的行动离**满足工人阶级和一个共产党可以提出的最低要求相距还很远**。这与阶级斗争总的进程以及**国民党本身和国民政府本身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有关。国民党出现分化早为人们所知：1925年右派在西山召开的会议便是一例，会议参加者后来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次会议提出了**同共产党、同“赤色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口号。它还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敌视苏联、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纲领。当然，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已被清除出国民党。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到，因为现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种向左转的情况，而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再以去年**蒋介石的三·二〇事变**为例。那时，在广州以“左派”汪精卫为首的集团已被翦除，所以蒋介石依靠效忠于他的军队在国民政府内部的阶级关系方面搞了一次“变动”。很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采取的态度已从有节制地反对发展到了激烈反对的地步。

再举一例。不久以前，国民政府迁出广州，那儿就留一个右派国民党人李济深。于是这位本身也是国民党员的将军把广州的国民党委员会解散了，自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一些地方的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往往酿成公开的冲突。令人愤慨的事件接连发生。汉口发生了枪杀参加占领外国租界的工人的事件，广东一些官方机构往往对“土豪劣绅”及其武装“民团”亲近，而对农民协会及其武装疏远，他们演的都是同一出戏。必须指出，土地改革问题至今没有在实践中摆到应有的地位。预定采取的主要措施——减租百分之

二十五，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纸上谈兵”，而且改变了方向，使享受减租的人享受不到。

官方机构，特别是军事机构采用镇压手段**对付工农组织**的事不胜枚举。毫无疑问，这是根据一定的阶级方针行事的。

诚然，各地情况并非一概如此，而是存在着极大差别的。但是仍然必须指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组织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政府机构或军队机构对工农运动采取的敌对行动，**正在形成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是正在蕴酿中的反革命路线。**

这里还要提一提右派国民党人想方设法试图同帝国主义集团建立联系的问题。虽然我们还未掌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特别具体的材料，但我们确信，这种企图是**存在的**。国民党内部的这一斗争表现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斗争**。右的倾向最近几个月突出地表现在**蒋介石的独裁**方面。蒋介石一身三任，既是总司令，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质上全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最主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职权都为他一人所独揽。蒋介石的独裁作法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冲突。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出现了两个中心：以蒋介石的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为中心的蒋介石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

这个冲突有其**深刻的阶级原因**，当然不能用“个人恩怨”来加以遮盖。这个冲突与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十分尖锐的斗争有关。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说明，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右派势力正在联合起来，这已是相当明显的了。

还可以举出一大堆事实来说明，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发展着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在**国民党内，在国民政府里**，还是在军队本身，都有反映。而且有些指挥官，有些政治活动家朝秦暮楚，时左时右。毫无疑问，从军队到中央政府，所有这些机构中发生的来回游离现象、重新组合和冲突，其基本原因是**社会阶级基础的**

变动。这个变动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最高层领导机构之中。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因为中国现在还只存在国民党一个执政党，它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而这些阶级之间的冲突又一天比一天尖锐。与各类军队和各军长保持着联系的国民政府即由这个国民党组成。军队中的指挥官很多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商人或这一类人物。此外，还有一点要考虑到，即在北伐过程中，还有一批将领是在国民革命的刺刀威逼之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中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发生种种冲突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社会阶级机构的种种摇摆不能不反映到各个方面，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的机构和制度中来。

六、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策略问题

这种情况就给我们提出了**极为复杂的策略问题**。解决策略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照套**俄国革命**的样子。不少同志常常倾向于把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俄国革命的经验机械地搬用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去。然而，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却告诉我们，这种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类比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把蒋介石比作克伦斯基，把国民党比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就过于简单草率了。说什么，开展阶级斗争导致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独裁。开展阶级斗争就是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垮台，就是布尔什维克**独树一帜**。由此而得出的策略结论是：采取公开推翻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方针；提出为反对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的政权而举行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的口号；**退出国民党**这个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组织；提出“十个资本家部长滚蛋”的口号等等。这就是类比的结果。我看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几乎直接地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有一点是他的独到之处，即当他接触到打还是不打，举行不举行起义的具体问题时，也总是马上模

棱两可起来。他总是说：“也许行，也许不行”。

这种类比和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独出心裁地把真伪、是非混杂在一起的典型。

我国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的整个形势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有着基本的区别，**克伦斯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而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现时在客观上奉行的是**反帝的政策**。这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本点。克伦斯基方面进行的战争和来自克伦斯基方面的进攻是帝国主义类型的进攻。我们不仅不支持克伦斯基保卫祖国，而且**反对**这种行动，设法**瓦解**这种保卫国家的行动，可是，在民族革命斗争中谁也不敢说共产党人不该支持北伐。不但如此，共产党人的立场，也就是说最彻底的、最激进的革命立场应当是：防止可能出现的种种妥协行为，进一步发展胜利的军事斗争，并成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坚决的代表，与此同时当然要考虑到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的可能性。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才能使情况改观，这一点极其重要的。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支持反对封建主和军阀的军事讨伐行动——北伐。可是拉狄克同志在占领上海前一两天所作的一个报告中却说：“同志们，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不在上海，不在于近期内是否占领上海。问题的中心在汉口。占夺上海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围绕着上海和上海问题，整个世界一度都议论纷纷。上海成了一切谈论的中心。说上海“很难占领”，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否定同军阀及其外国庇护人作斗争本身，意味着否定北伐的意义，意味着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同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彻底打败张作霖，必须彻底赶走帝国主义。所以，决不能把打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同原先曾是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开展的阶级斗争任务**对立起来**。北伐等问题摆在革命人民的面前，是回避不了的。在这方面，也

就是说在对军事战线任务抱支持态度方面，是同我们在克伦斯基时期所取的态度大不相同的……可见，尽管蒋介石“本身”决不比克伦斯基好，甚至比克伦斯基坏得多：克伦斯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工人组织和共产党还是得考虑到这项任务。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积极地**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克伦斯基，对他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可以支持蒋介石，**因为**他在未倒戈叛变之前尽管抽象地说来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比克伦斯基还“右”还“坏”，他进行的却是积极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拉狄克的论点中有哪些**正确之处**呢？他说必须把力量调动起来同蒋介石作**斗争**，蒋介石必然会**变成**工农的**敌人**，这是对的。那么，他的论点中又有哪些是**错误的**呢？错就错在他认为不存在**战线**问题。还有一点错误是，在**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时便要开展武装斗争。列宁教导要无畏地举行起义。可是，列宁也曾教导我们“**不要把起义当儿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支持北伐**（而在克伦斯基时期则应反对战争）；**支持**同军阀作战的蒋介石的军队，但同时动员力量**反对**蒋介石；在群众和军队中开展相应的宣传；采取把国民党右派排除出去的方针；采取先把蒋介石“围困”起来的方针，**只在**经过相当准备之后再同蒋介石开战，等等。

第二个“类比”。国民党就是孟什维克，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我们越早把共产党的队伍拉出这个联盟越好。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告诫。可是，他们忽略了另一个特点，即国民党是一种颇有点**特殊**的组织，它是介乎政党和有各种阶级组织参加的苏维埃那样的组织之间的一种东西。同社会革命党人（或同孟什维克）类比的做法是破绽百出的。从**阶级**观点看，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内则是**既有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自由资产阶级的组织是立宪民主党，这一党在**革命发展的很早阶段**便成了反革命的党）又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工

人阶级。从**组织**方面来看，国民党实际上不算是通常意义上的党。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比较便于从下而上地予以控制，办法是在内部进行**阶级**力量的调整，把**右派**，把那些凯末尔分子（把这些凯末尔分子同整个国民党混为一谈是愚蠢的）赶出去。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利用**这一特点，既应是我们的任务，也应是我们的义务。难道我们可以全然不顾这一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考虑到**这一特点并加以利用。如何利用呢？**必须越来越广泛地把国民党变成经过选举的群众性组织**。这是可能的，而且要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人应当时时刻刻努力从下层开始，把国民党的重心**扭向左转**。共产党人应当推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并以此**改变该组织的社会成分**。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可能的**。**谁也不会设想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一举告成**。但是，当这条路还可以走得下去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它，直到受各种力量严重冲突的限制而无法继续走下去为止。当然，有的人可以大叫大嚷，说我们把苏维埃同国民党“混为一谈”。可是，这并不能使他们有理由不去具体证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倒有几个例子。1925年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已经被**开除**出党，推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联合会（实际上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也在最近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被**除名**了。这几件事总还是有点意义的。谁能说再加把劲干下去就不能使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进一步**向左转呢？谁也不能这样讲。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肯定地讲，国民党内部力量的运动将始终靠这种转变，一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更大的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便爆发出各种矛盾。但是，争论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在理论上甚至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即连苏维埃也不能彻底为我方所“控制”，于是无产阶级的党举行起义来**反对**苏维埃。大家还记得七月前的几天我们是怎样在莫斯科举行武装游行**反对**莫斯科苏维埃的决定的吗？还

记得我们在彼得堡又是如何组织武装游行**反对**苏维埃组织的决议的吗？从理论上讲，举行起义反对某一种苏维埃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要知道，当时譬如说，在莫斯科就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依靠由真正的士兵组织的莫斯科“守备部队大会”，**反对**由社会革命党帮助盘踞的士兵苏维埃。这一点所有的莫斯科人都还记得。我们不知道，在国民党内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因革命的发展而导致国民党内矛盾的**爆发**，这种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利用国民党结构上的特点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

拉狄克同志儿戏般地提出退出国民党也即让**右派**吃掉国民党的观点之所以令人感到更加惊讶，原因在于拉狄克同志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这简直可以说“逻辑跑得无影无踪了”。

从理论上讲，我们退出国民政府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理论上可以作各样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我们会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但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要这样做。恰恰相反，现在需要为控制国民党而斗争，需要使出全部的力量确保国民党内部的重心向左转移。这就是现时应有的正确策略。这也就是从现今中国形势中得出结论。工人的政党应当在各地国民党基层支部依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支持从下层开始改变国民党的社会成分；从基层开始把**群众**中的代表人物推举到地方自治机关中去，推举到地方政权机关中去；把工农武装起来，把国民党变成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讲，采取夺取国家机构和军队等的步骤是正确的。

我们对阶级力量的判断，对阶级力量发展趋向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的估计是一清二楚的，各个环节也是一环扣一环地互相联系的，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说是另有什么“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民族革命联盟内部力量从一种组合向另一种阶级组合过渡的时期。为了顺利地完 成这一过渡，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进展特点充

分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贯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经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而要使这条路线得到实现，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必须不断发展壮大，它必须毫不掩盖自己与众不同的无产阶级面目，必须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可能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进行必要的抵制，而且能够同时不为那些以儿戏代替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的左的言词所迷惑。

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前景的估计是很现实的估计，它与事实是相符合的。这一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疯狂地进行反华和反苏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估计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指出，即一些最顽固的机会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自愿，也去支持帝国主义者。我们可以举托马斯的声明为例。

他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希望打仗，但由于某种不甚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谈判恰恰在我们差不多即将取得良好结果时中断了。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给政府造成麻烦或企图加强实力而在这种问题上捞取党派资本，绝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观点，也绝不是出于爱国之心（！！）（1927年2月3日在达比的讲话）。

于是，托马斯十分明确地说道：“在英帝国主义同中国革命之间的战争中，我应当支持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来反对中国革命”。

托马斯在另一处说：“反对派的任务不是进行抨击，而是向世界表明，它是支持政府的”。

或者以“我国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为例。他说，想把英国排挤出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幻想，也是十足的无稽之谈。或者再以中国工会代表团与**阿姆斯特丹国际**首领之间的会谈为例（关

于这次会谈的报导刊登在荷兰社会民主党报纸《人民报》3月10日号上)。这份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现逐字引述如下:

“对于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否准备派遣委员会去中国支持中国工人的问题的答复是,工会国际对此无能为力,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工会运动是一种**建设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竟是这样!),而建设只有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中才能进行。在中国国内政治秩序未恢复之前,工会国际不考虑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之事”。

这简直可以说是**公开的反革命观点**。唯一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就是共产国际,因为中国革命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发展过程中雄伟壮丽、声势浩大和十分壮观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过程的名字就叫做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国际革命。

七、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工人阶级的任务^①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上海无产阶级惨遭枪杀的事件,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将领们屠杀人民的罪行,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我们讲的“新的局面”不是指通常的情况变化,因为一般性的变化随时都在发生。我们讲的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事态发展已涉及到正在进行斗争的各类阶级力量的分化改组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标志着民族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这次政变使运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生了**变化**。对于因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得逞而造成的**新局面**视而不见或估计不足都是极端荒谬的。我们暂不谈**现在**公开同蒋介石交火是否正确;也不谈把武器藏起来暂不接战,从而不让别人解除自己的武装,及时将工人武装撤出战斗,而全力投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积蓄力量,待各种力量联合到有取胜机会之时再行出击是否更为恰当。再说一遍,这个问题

^① 本节写于蒋介石一伙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后,因此我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不包括这一节。——原作者注

我们姑且放在一边。

首先让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作一番**阶级分析**。根据前面讲过的情况，我们不难理解这一事态的阶级内容。蒋介石的政变是国民党右派的叛乱，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左派**的一次叛乱。我在前面叙述的事态演变最后以投向**反革命阵营**的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政而告完成。工农群众的反抗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足以使大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但**还没有达到在发生战斗的各个地方**给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回击的程度。

中国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已经结束**的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封建军阀，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组成的营垒；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营垒。自由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可以**参加革命**（这与俄国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相反），因为在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同于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任务也必然要有改变。

尽管如此，这个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两个营垒变为**三个营垒**的趋向：即封建买办和外国资本一个营垒；本国大资产阶级为另一个营垒；“左派联盟”（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为第三个营垒。

当前情况的特点是已存在这样**三个营垒**。蒋介石集团已在屠杀工农，但它还在同封建军阀作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不反对大力支持蒋介石，他们看到在所谓的军阀之中，有许多人在不久的将来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而且确定无疑是要垮台的。

这样一来，当前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即三个营垒在“新的基础上”变回到两个营垒，一个是本国大资产阶级同部分封建主和外国资本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

决不应忘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大部分人属于“左派”这一事实。决不应忘记武汉政府现在是“左派联盟”政府这一事实。决不能忘记一部分军队，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军队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政府这一事实。最后，还不应忽视冯玉祥的军队至今尚未投入战斗这一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还会遇到许多不测事件，还会有少数人发生动摇和投敌叛变。但是，**阶级斗争的逻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逻辑**将胜过这一切。

现在，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而且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在进行反对工农的战争的情况下，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已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态度，所以历史事件发展的力量将把他越来越推向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方面去。而且这种妥协不是狭义的“权变”性质的妥协，而是极其类似结盟性质的妥协。固然，蒋介石的军队也是雇佣军队，因而类似某种“嫡系部队”，这种情况可能延缓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垮台的过程。但这只能是**暂时**现象。只要回顾一下北伐开始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北伐的胜利不是因为南军装备优于敌人。而是相反，南军装备**不如**敌人。可是南军却打赢了。他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具有争取民族解放的高昂斗志，是因为广大群众把自己的阶级夙愿和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到来，是因为他们得到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支持。

伴随右派分子分裂出国民党和出现两个政府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内部的重大变更。**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南京**（蒋介石一伙）将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对其政策的日益赞扬而迅速丧失其政治资本。共产党的威信则必将提高，因为早在发生政变前共产党就曾斩钉截铁地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独裁者”。

武汉及忠于武汉政府的军队应当成为军队中的组织中心。武汉方面对蒋介石采取的断然措施（据悉武汉政府已发出通缉蒋介石的命令）是符合革命要求的适当措施。国民党在排除了奸细、

叛徒和破坏分子之后应当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绝对错误的。相反，必须把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处理。因此，现在，可以说**特别是现在**，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荒谬的。农民、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为了实现、相当长期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联盟具有坚实的基础。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极其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大胆果断地进行土地革命，进一步放手推进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下最大气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下狠心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农村建立农会和农协，组织工厂委员会，加强工会工作，建立罢工委员会或工人执行委员会，把这些委员会连同手工业者、小商贩的组织一起组成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武装工农，征集国民党员，千方百计加强共产党组织，所有这些任务现在都应提到首要位置上来。当前，做好**各地方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无论如何要使农民这支第二梯队跟上来，因为归根结蒂要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和这部分群众的有生力量来决定这场伟大斗争的结局。应当尽可能避免那种可能给中国革命的敌人用作指责所谓中国被“苏维埃化”的口实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有必要考虑到，因为中国那班反革命无赖在到处叫喊什么，“俄国共产党人”想在中国搞他们那套“俄国”制度，他们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上面提到的那批无赖就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十分要好）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过，中国革命在实践经验中找到了能够团结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一切依靠群众**，这个口号越来越必要，尤其是在现在。

中国人民还将面临艰巨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已经集中了大量的军事力量，他们收买了被工农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中国革命将克服蒋介石反革命的一时得手，冲破“爱好和平的”、“笃信耶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封锁，它将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因为这场革命已把千百万人发

动起来从事伟大的革命创造活动，因为它正使千百万不愿再戴上奴隶枷锁的奴隶们振奋起来。

共产国际已宣布蒋介石为叛徒和敌人。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必须竭尽一切力量，使这一场叛卖的得利者、“文明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遭到他们在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时期遭受的同样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命运。世界革命的战士们应当火速前往援助。

(马宝华译)

斗争的辩证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一日)

A·斯捷茨基

蒋介石曾经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支持。现在，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宣布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叛徒。

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支持蒋介石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它宣布蒋介石为叛徒的做法是否也正确呢？这两条路线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矛盾并不存在。这两条路线都是正确的。只有对革命斗争的逻辑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作出相反的论断。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极其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是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下进行的。

任何一场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情况变化异常迅速，无论革命营垒内部还是反革命营垒之中，各阶级、各政党、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常出现急剧的变化。

革命政党的责任就在于及时注意到情况的这类变化，革命政党必须及时把握住革命发展每一个当前阶段的特点，了解各种阶级力量组合的变化，以便依据情况的特点和自己的主要目的确定自己的策略，规定具体的任务和自己对各阶级、各政党、各种派别，以及对各类领袖人物的态度。而且即便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战略任务和它在革命中的战略路线是长时期有效的，那么它的策略任务和策略手段则甚至在二十四小时内也可能发生变化。

我们自己在我国革命年代就经历过急风暴雨式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策略手段。

现在，当我们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进行评价时，进行一些回忆是有意义的。

二月革命以后，我们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从2月到10月这一段时间内，这场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就经过多次变化。

在七月事件之前，我们的基本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七月事件以后，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就已认为照原来的形式提出这个口号已不行了。这个口号适合于革命和平发展时期，是从政权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转归苏维埃这种情况出发的。后来政权落到一小撮军人集团（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分子之流）手中，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此列宁指出，从这时起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应当立足于使劳动群众作好准备同军人集团、士官生、黑色百人团，以及他们的走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坚决的斗争。

1917年9月份，在十月革命爆发的一个半月之前，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还认为有可能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妥协，条件是建立一个向苏维埃负责的政府，而布尔什维克则放弃“立即要求将政权转交无产阶级和贫农”和不再用革命方法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可是，一个半月之后，我们已经拿起枪杆作战，同时不仅反对临时政府，而且反对支持临时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回忆一下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怎样发展变化也颇有意义。十月革命期间，他们同我们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他们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到1918年夏天，他们竟企图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暴乱。于是，我们把他们从政府办公室直接送入监狱，其中最猖獗的分子则被我们处决了。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之后在策略手段上的几次转变。

以上所述并不是为了说明目前中国的局势同我国十月革命前的局势一样，而蒋介石则相当于克伦斯基，等等。把这两者作等量齐观是极其错误的，从这种认识出发必然要引出错误的策略。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条件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条件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不但没有达到，而且还没有接近自己的十月。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压迫但又具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的一种革命。

蒋介石不是克伦斯基。蒋介石是在革命的一定阶段曾经反对过帝国主义压迫，反对过封建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诚然，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一场斗争中并不坚定，革命不彻底，并且摇摆不定，经常倾向于从革命的斗争方法转而向帝国主义表示妥协和投降。但终究是作过斗争的。

上面引用的例子都说明，革命政党必须具有应变能力，必须在情况变化时迅速变换口号和策略路线。

*

*

*

有关蒋介石的问题所以重要，因为这位将军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就是它们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及如何对待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时曾经说道：“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也属于这种资产阶级。”^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迄今为止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里的情况总的说来正好和上述列宁这段话中所讲的条件相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除少部分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以外，都表现出革命性，反对过帝国主义和以军阀统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

直到最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来得及像它在印度所做到的那样同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

中国资产阶级深刻地体验到帝国主义压迫的重负。这种压迫的表现之一就是关税保护制度完全被颠倒了过来：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相比，外国工商业在中国却享有优惠的地位和有利的经营条件。

这就是促使中国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的原因之一。

中国资产阶级为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军出过力。它对英国货进行过抵制。它还运用自己的各种关系瓦解军阀的后方。国民党不仅在国民政府管辖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后方开展工作，这种工作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质。不仅如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不反对依靠工农大众。工人、农民在国民政府执政条件下获得了结社、罢工、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共产党得到了在组织和团结工农群众方面开展工作的条件。而这项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达一百万人以上，加入农民组织的农民近二百万人。**

这就是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讲到的第二个条件，即“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在革命的中国是存在的。

不言而喻，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民族革命运动，同它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按照这一精神对待蒋介石问题的。只要蒋

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封建主，组织军队同他们作斗争，领导北伐以扩大民族革命的基地，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广大地区和中国的重要工业区，**他就是在干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应当支持他的这种革命斗争。**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已经投入反动营垒，并且同帝国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民族革命的联盟，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

情况的这种逆转也必然要求共产党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

产生这种转折的土壤，很早以前就已在准备之中。

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广大工农群众投入革命，必将导致资产阶级及其领袖倒向反动营垒。关于这种前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作了十分清楚的阐述。不仅如此，这项决议还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就处于这种危险阶段，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要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而资产阶级则将投向反革命营垒。

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农民组织日益增加，工人、农民为满足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不断加强，工人在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日，制定劳动立法等方面的压力和农民在减免地租方面的压力愈来愈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愈来愈倾向于反动派方面，愈来愈倾向于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

近几个月来，在不少省份，国民党右派的代表已不止一次地企图镇压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力图取缔工农组织。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逮捕工人领袖。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还只是在摇摆之中，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任务就在于：利用群众的压力，群众舆论和群众组织的压力来克服资产阶级及其领袖的动摇，同时**积聚自己的力量，巩固自**

己的组织，准备夺取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

被群众运动的发展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坚决转向反动派一边**。资产阶级的将领们已经把枪口对准中国的工人农民，解散工农组织，逮捕和枪杀工农组织的领袖。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者和自己的将领们的支持下，现在已在试图**建立自己的专政来镇压民族革命运动**。

这就意味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应当据此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任务并没有改变。其基本战略任务原来是现在仍然是：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并使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不过，在前一阶段，**民族革命**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现在工人阶级将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

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仍将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为此要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这一联盟，并且不仅要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将领们进行斗争**。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谁要是对中国国民党急剧改变策略恶意挑剔，谁就是对这种革命的辩证法一窍不通。

*

*

*

最近事态的发展必然引起一个问题：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进行的工作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由于不止一次有人提出共产党应当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从内部控制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为基础广泛而成员优秀的工人农民的群众组织，把右派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

这条路线是否正确呢？事态的进程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

的。

如今蒋介石不得不在南京组织一个自己的反革命的，冒牌的国民党和自己的反革命的国民政府来**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和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这一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可以看出，现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力量对比使反革命分子**已经无法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因此，反革命分子不得不采用分裂的办法。另外，从最近收到的电讯来看，蒋介石已被国民政府解除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它在国民党内成功地团结了一个坚强的左派。它成功地在工人农民组织中形成了一股支持左派的力量。这一点不仅现在十分清楚，其实早在前一次同蒋介石就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何处问题上的冲突中^①就已经可以看出了。

那末，今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将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呢？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也不能允许把国民党的旗帜交到反革命分子手中。

国民党是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中很有声望的一个组织。忽视这个组织的作用是错误的，如果采取取消国民党的路线则会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必将尽一切力量在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动员和组织群众。它将继续致力于把国民党改变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

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时期。革命斗争的局面更加艰难。但中国革命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现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已经有成千成万的劳动群众投身到运动中。他们已经觉醒，正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联合起来。

① 众所周知，蒋介石及其左右反对把首都迁往工业城市汉口，坚持要定在外省城市南昌，以免政府处于工人的影响之下。——原作者注

现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成了民族革命的决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

这个联盟必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乌传袞译)

欧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N·佩佩尔

一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革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第二国际试图不联系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孤立地对中国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俄国的反对派则力求不认真估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而“按列宁主义的原则”分析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拥有极其巨大的实力，这对中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异常强大的因素，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掌握着中国的铁路、矿山和大部分工厂。它们还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垄断权、银行资本、航运、关税、电讯、海底电缆。在任何重要的地点，中国人民总会遇到外国帝国主义的要塞——租界和特权。中国领海停泊着数以百计的帝国主义者的军舰。上海驻扎有用最新式军事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实力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军队。

原先满清王朝的“亚洲式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政权，首先是由帝国主义者将其推翻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也是封建式的督军政权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革命者把军阀称作为“帝国主义的鹰犬”，这种评价真是绝对确切。

帝国主义在中国采用的是这样三种手段：一是支持军阀；二是直接进行干涉；三是破坏革命战线的团结。如果不是由于欧洲帝国主义者用金钱和武器支持封建军阀，民族革命运动早就把他们彻底解决了。

而且，不仅仅张作霖，连蒋介石也是如此，没有帝国主义者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他们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帝国主义者在炮轰南京之后又用外交照会轰击汉口革命政府，还寻隙分裂国民党，收买中国资产阶级。这一切都促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民族反革命”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也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实力充作蒋介石军队的后盾。汉口革命政府的斗争所以会遇到如此众多的困难，也只是因为除了张作霖、其他军阀和蒋介石民族反革命派以外还有一个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外交、金融和军事机构。汉口政府在派出自己的革命军队对付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时，还同时承受着帝国主义列强驻泊在汉口附近长江上的五十艘军舰的压力。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所以能听得到蒋介石微弱的声音，也只是因为伴随这个声音的还有帝国主义大炮的轰鸣。汉口革命政府的处境大体上相当于法国一八七一年公社^①的处境。公社当时不仅要同凡尔赛军队作战，而且还要承受俾斯麦普鲁士军队的巨大压力。一九一九年，如果不是因为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承受着罗马尼亚占领军异常强大的压力，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三百名警察是不可能夺得政权的。**驻扎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停泊在中国所有港口的帝国主义军舰和实际上对长江进行的封锁，这就是中国反革命势力最重要的战略后盾。**帝国主义是中国境内影响最大的反革命因素，而中国的“民族”反革命在许多方面则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属品。

二

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建立起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帝国主义

① 指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时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编译者注

强盗们各自的利益极不相同。英帝国主义者首先关心的是保卫租界。它还力求保持住在金融上的主导地位，并极力阻碍中国独立工业的发展，以免其商品输入中国受到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则不仅企图获得租界，还期望从中国活生生的机体上割去整整几个省份。它不满足于向中国输出产品，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强大的工业。对日本帝国主义最为有利可图的，是夺取中国的煤铁资源，以便运往日本建立它自身的巨大工业。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美国原先主张“门户开放”政策。它进入中国迟于其他大国，没有得到租借地，因此它力主“自由”。后来，美国转而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国，支持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持发展独立的中国工业。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阶段所以采用这种政策，是因为美国与英国不同，不是向中国输出纺织品，而首先是机器，也即是未来中国独立工业的生产资料。当前，由于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一，美国的实力大为增长，于是不加掩饰地提出要求分享在中国的权益；其次，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愈是被迫后退，把领导地位让给无产阶级，美国就愈是激烈地反对中国革命。英国从阻碍中国独立工业的发展中可得到重大的利益，日本则最为关注阻止中国的统一，美国最主要的目标则是不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得以实现，并击败中国的无产阶级。

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各不相同。一旦中国革命有所削弱，帝国主义者之间分脏不均的矛盾便会立即爆发出来。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得到胜利发展，农民群众参加的人数日益增加，现今帝国主义者都抱成一团。当前，帝国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是主要的。当然，也不应该死板地就此忽视帝国主义者利益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存在矛盾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轻信了柯立芝“爱好和平”的词句或布里安“彬彬有礼”的言语，如果我们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强盗之间微小的并且在目前只是次要的策略分

歧，而不是自始至终记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帝国主义列强正在联合起来从外交上和军事上对中国革命发起进攻**，那么，我们的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就恰恰是为美国帝国主义或法国帝国主义效劳了。

三

帝国主义曾经千方百计地想把资本主义输入中国。但是，如果我们（像拉狄克所做的那样）**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力量雄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最终形成，那就根本错了**。尽管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这个庞大的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前的状态。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实力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同起来，那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术语，中国经济的基础仍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差不多全中国农村仍然是荒芜不堪。农产品很少有机会同家庭工业分离。农业村社仍然采用独特的关闭自守的管理形式。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氏族制和部落制。农业村社中甚至仍然存在着许多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行会和帮会。拉狄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关于中国已经再也没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论断同事实完全相反。中国和其他东方大国一样，像欧洲类型的那种典型的封建主义发展得很不够。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即大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在中国并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国家的分析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东方国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发展。科瓦列夫斯基和梅因的研究表明，东方国家只出现了封建主义化的某些过程，军事将领和省长没有获得私有的土地，而只得到在一定地区征收各种赋税的权利。

若干世纪以来，商业资本在中国已经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不应当把商业资本的这种巨大作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混

为一谈。恰恰相反，马克思甚至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规律”，即商业资本的作用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加得不到发展。拉狄克同志在中国到处看到的都是资本主义，他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中国没有大土地所有制和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也就是说没有典型形式的封建主义。他把不存在典型的封建主义理解成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理解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还是封建主义前的东西，即“亚细亚生产体系”。接着，拉狄克同志又给自己炮制出一种关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众多并且占据统治地位的毫无根据的论点。他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商业资本要比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陈旧古老得多。他还忽视了马克思提出的一条规律：**商业资本的作用和地位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展成反比。**拉狄克同志和俄国反对派宣布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无法解释像厘金制度和督军这些只在十九世纪才有的封建主义产物重新出现的原因。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断言，印度是在“亚细亚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和在英国资本侵入的影响下出现封建主义产物的。梅因的研究十分明显地表明，在英国资本侵入之前印度没有封建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入侵成了在亚细亚生产体系基础上发生封建主义过程**（在孟加拉出现大土地所有制和沦为奴隶的农民）的原因。马克思在当时就已断定，商业资本对于创造使用价值的旧的生产体系起着破坏作用。由哪一种新的生产体系来取代旧有的生产体系，不是由商业，而是由旧有的生产体系的性质决定的。**商业资本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开始破坏农村村社，族系和行会，这种破坏作用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封建主义的新产物**，而一旦中国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和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配合下取得胜利，就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拉狄克同志的确也说到中国出现社会主义前景的可能性。但是，他是从错误的出发点提出社会主义前景的。按照拉狄克的说法，中国现在已经

是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经历了所有阶段，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同欧洲一样将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根据列宁的论断、共产国际的看法和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只有在存在一系列因素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前景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在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农村村社、族系、原始共产主义残余的基础上，中国在较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下，真正从帝国主义者手中获得解放，并且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才有这种可能。

四

中国要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真正的解放，同时不仅是政治上的解放，而且是经济上的解放，那就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当然不能否认，中国无产阶级有可能遭到暂时的失败，中国革命在某段时间不得不实行退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能取得政权，也只能是在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和保持住政权，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者而获得独立。

一家日本报纸在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示欢迎时声称，蒋介石是中国的凯末尔，实现中国的“凯末尔化”是现时代的要求。

“凯末尔化”又是什么呢？凯末尔分子在土耳其的统治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主义从而使民族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

二、无产阶级力量薄弱。

三、国家不依赖于外国帝国主义者而独立。

土耳其的“凯末尔化”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由于土耳其的

无产阶级力量异常薄弱，由于不存在一个土耳其资产阶级必须与之作斗争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中国实行“凯末尔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同在土耳其完全不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政实力、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要大得多。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大工业，从而形成了较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强大吓得中国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把它赶到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了。**土耳其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就有可能获得独立，而中国要取得独立只能通过剥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办法，也就是说，要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国幅员辽阔，作为市场和原料产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土耳其。帝国主义列强也必然要拿出比在土耳其更加大得多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因此，只有中国最广大的群众以最大的努力参加斗争，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包括苏联无产阶级在内）的广泛配合之下，中国才有可能赢得独立。

五

一方面，帝国主义是中国反革命势力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欧美工人阶级战胜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前提之一。这个基本的事实必然把中国革命斗争同西方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斗争在于反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中国革命失败会使欧洲资本主义获得新的销售市场、新的资本输出场所、新的原料产地，这就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则将是破坏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资本主义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就认为：“**欧洲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吸取自己的力量。……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

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①

连丘吉尔在他最近一次关于预算问题的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得来的巨额财富支持了英国，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的影响下英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就会更加摇摇欲坠。在当前相对稳定时期，中国革命作为冲击这种稳定状态的因素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马克思在五十年代革命后的稳定时期在《资本论》中提到中国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所说的话：“我们想起来，当世界其他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②而现在中国革命正在“跳舞”。现在虽然没有一八四八年革命那样的资本主义稳定状态，但却总存在有限的，相对的稳定。中国革命的“跳舞”必将促使欧美的革命斗争活跃起来。

现在，既然帝国主义大国正在向中国派遣军队和战舰以维持那里的“秩序”，那么中国就应该象马克思有一次说过的那样在欧洲“破坏秩序”。欧美的工人阶级应当成为这种“破坏秩序”的动力，成为这场同帝国主义反华战争作斗争的动力。**帝国主义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因而欧美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竭尽全力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从而同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站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乌传袞译）

①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50—53页，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编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版。——编译者注

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A·斯捷茨基

在最近的某一期《社会主义通报》上，阿勃拉莫维奇就这样一个问题陷入了忧心忡忡的思考：为什么第二国际在殖民地国家毫无成就，为什么这些国家劳动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进行的。

答案并不复杂。原因就要看第二国际过去和现在是怎样提出殖民地问题的。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道：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于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①如果说这个评价现在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来说已不适用，那末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英雄们则仍然是适用的。他们不仅享用本国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果实，而且还**积极支持和维护这个政策**。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首领们对待企图扼杀中国民族革命的阴谋的态度，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口头上同情中国的解放而实际上支持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政策。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阿勃拉莫维奇还是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那些充当黄色工会哭灵人的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人民出版社版。——编译者注

行们怎样悲叹忧伤，第二国际也不可能在殖民地国家取得像样的成就。

第三国际之所以能在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中起到如此卓越的作用，是因为它在殖民地问题上彻底奉行革命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列宁主义最光辉、最主要的篇章之一。我们对列宁主义的这一部分内容研究得不够，研究得不透彻。现在，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必要学习列宁主义的这一部分内容。

可以大胆地说，列宁主义关于我们应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提法是崭新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样，列宁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学说。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早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步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指示。

不过当时，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和现在不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作用，是因为民族解放运动能消灭封建割据状态，导致建立大的民族国家，肃清农奴制度残余，为在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内部进一步开展阶级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和对这种性质的运动，无产阶级才能够和应当予以支持。不仅在被压迫国家中，而且在压迫别国的国家中，民族压迫都是开展阶级斗争的障碍。所以马克思说，压迫别国人民的人民不可能是自由的人民。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了不同的作用。正是列宁对于我们时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特作用和无产阶级在这个运动方面应担负的任务，提出了完整的表述。

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食利者的国家，它们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者主要依靠剥削殖民地来维持自己。对于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最残酷的侵略形式进行的。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时代，“剥夺剥削者”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愈来愈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任务。

因此，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殖民地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运动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统治，因此它就在动摇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本身，而且打击着无产阶级正在摧毁和推翻的帝国主义体系。如果说原来民族革命的进步意义在于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等级压迫，那么，现在这类运动的意义就不仅仅在这方面，而且与其说在这方面还不如说在于这种运动在发展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的力量和尖锐程度冲击帝国主义体系，并以此促进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如此，殖民地各国的民族解放革命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应当不仅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且应当取得对这个运动的领导权。

联系到这个问题，值得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一封信，特别有价值的信：

“如果说英国是欧洲贵族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爱尔兰就是能够通过它狠狠打击英国官方的唯一途径。首先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如果英国土地贵族在爱尔兰被推翻，那他们在英国也就必然会被推翻。在爱尔兰要做到这一点要比英国容易一百倍，因为在爱尔兰经济斗争完全集中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而且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加富于革命性、更加热情……。

“英国土地贵族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而

且还有自己精神力量的主要来源，这个精神力量就是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从另一方面说，英国无产阶级只要不去触动英国土地贵族在爱尔兰的实力，也就无法推翻英国的土地贵族……。

“因此，国际协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是明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此，必须在爱尔兰实施决定性的打击”。^①

这就是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指出的爱尔兰民族革命的意义。今天，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帝国主义的强大就是以剥削这些国家为基础的）的民族革命，对于推翻帝国主义来说，意义也并不比那时爱尔兰的民族革命更小。

全世界都已陷入帝国主义的罗网之中。金融资本不仅剥削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剥削着殖民地各国的人民，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其他国家的状况则有所不同，不仅经济结构复杂多样，而且落后程度各不相同。

因此，社会革命的发生不可能是别的形式，只可能是把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国家中的一系列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一个时代。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看做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不如此。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千千万万人民，现在已经作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出现了。**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8—38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①

中国的民族革命有力地证实了列宁上述预测和对殖民地运动的评价。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列宁极其肯定地强调说，由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非常落后，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在最初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农民是殖民地居民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在多数殖民地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不是只占居民的很少一部分，就是根本没有。殖民地社会制度的特点是，存在封建残余和封建割据状态，而帝国主义则大力支持这种状态，并利用它来进行剥削。

毫无疑问，中国的例子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即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在最初阶段在国内只能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土地关系上消灭封建主义和农奴制的残余；在国家体制上摆脱封建割据状态，建立起全民族的统一国家。这一点特别应当加以注意，因为现在经常出现一种把中国的民族革命机械地同我国革命进行类比的情况。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一点，绝不是说在任何国家都要由资产阶级在这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在这方面，近年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是由各个殖民地错综复杂的，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的条件所决定的。

目前，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土耳其几乎没有无产阶级。

在这场解放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它把土耳其的农民吸引到了自己方面，经过解放斗争，土耳其资产阶级捍卫了本国的**政治**独立，清除了许多过去时代的残余，建立了资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8—469页，人民出版社版。——编译者注

级民族国家。

波斯解放斗争是由波斯的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它最后战胜了封建贵族。不过波斯的农民没有参加这一场斗争。波斯资产阶级不可能坚决地提出消灭农村封建剥削的问题。因此，直到现在那里的封建关系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同时，波斯资产阶级丝毫也未能使自己的国家摆脱金融资本的奴役。

但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是沿另一条道路发展的。在最初阶段，那里的解放运动也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当强大的，组织严密的，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正确路线，并依靠这个联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中国的资产阶级投向了反动营垒，但中国革命仍然蓬勃向上，并进入了自己的更高阶段。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成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革命中国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保证其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此种类型的民族解放革命对于推翻帝国主义意义最为重大。

然而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绝不是仅仅限于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以及确定我们对这类革命的态度。

列宁还极其深刻地和在理论上十分大胆地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殖民地各国人民有可能**在自己的发展中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

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几封信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之间可能形成的关系时，恩格斯写道：“**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

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①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原理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对于争取解放的落后的殖民地各国人民是否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这个阶段。

“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末，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②这就是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为落后国家的人民所描绘的发展前景。

恩格斯和列宁提出这种前景的出发点，完全在于承认先进国家及其技术和经济对于落后国家能起主导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和列宁认为，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可以引导面积和人口比自己大得多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国家的问题比我国要复杂广泛得多，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也只占居民的很小一部分，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也处于简单商品经济和千百万农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因此，我们同反对派就我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而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反对派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能否取得胜利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变成了对于**世界革命**的悲观论调，对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问题上的悲观论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人民出版社版。——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反对派的理论家们由于自己修正列宁主义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死胡同。

(乌传袞译)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方针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十一日)

A·艾亨瓦尔德

一、国内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交织在一起

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其基本特点在于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同劳动群众反对“国内的”剥削分子、封建军阀、土豪劣绅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现阶段则为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对中国来说，帝国主义决不单纯是一种外部的无关紧要的力量。帝国主义正在中国社会内部试探，哪些据点和社会阶层可以充当其影响的传播者，成为其对外扩张的帮手和实行统治的代理人。帝国主义正把这些阶层连同与它们有联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一起变成其同革命力量进行较量的工具和阻挡革命浪潮猛烈冲击的堤坝。帝国主义采用提供财政支援、供应武器、派驻军队和军舰施加压力等种种方法，实际上想利用中国内部反革命势力实施其经过伪装的干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基本方针是，一旦正在兴起的革命横扫到代表干涉势力的阶层和集团，也就是说当经过伪装的干涉遭到失败时，它便要进行公开的干涉。这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分布和组合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同国内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一时一刻也没

有把争取发展民族革命的任务的斗争同工农群众为实现本阶级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分割开来。共产国际的所有文件都贯穿着一条红线，即把阶级斗争同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在土地问题上便是如此。这个问题毫无疑义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共产国际明白无误地指出，“彻底的土地政策**乃是胜利完成反帝斗争和使革命得以向前推进的前提**，无产阶级则是唯一有能力实行这一政策的阶级”。①“……必须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当作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将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能大胆果断地处理土地问题，并支持农民群众一切客观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将给革命带来危害。**因为害怕资本家阶级的一个阶层不肯坚决地、可靠地合作便放弃将土地问题提到民族解放运动纲领的重要位置上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共产党不应犯这种错误。”②

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分布绝非一成不变，随着革命的进展，同帝国主义结盟的阶层绝不会没有变化，**绝不会永远只限于封建军阀集团**。共产国际认为，发展的趋势是革命进展到一定阶段时，反帝斗争（以及反封建斗争），不可避免地将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的斗争。换句话说，共产国际预见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必然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力图怂恿民族资产阶级同革命联盟决裂”，“大资产阶级逐渐脱离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中国革命如不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便不可能消灭帝国主义”。

① 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编译者注

② 同上。

二、按列宁的观点，是否可以同资产阶级结成临时联盟呢？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阶段，共产国际实行的是何种策略方针呢？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联合和同盟是否可以呢？也许从一开始就应当同它决裂并且采用对待帝国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同样方法同它作斗争？不妨看一看列宁就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是如何说的。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答辩时说，“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①可见，列宁十分清楚地指出，“支持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也可能同帝国主义**一道反对革命**，由此应当看到，革命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将与反对该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可是，在一个问题上明白无误的态度并不妨碍列宁提出并捍卫下面这一观点。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

提纲中这条内容的实质在于，列宁承认共产党员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必要性，同时提出无产阶级运动应当绝对保持“独立性”，也就是说保持自己的阶级面目，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允许阻碍无产阶级运动“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无产阶级组织在广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③ 同上，第334页。——编译者注

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的时候，在明明知道资产阶级或迟或早会投入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下，简单地说，在无产阶级保持其独立的革命阶级路线和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在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同在下一阶段必然与帝国主义同属一个反革命阵营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三、关于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反对派的战略家对我们说：可是，为此无产阶级运动毕竟要有独立性，而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这种独立性，因为它遵照共产国际的方针，不愿退出国民党，不愿同国民党断绝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盟关系。这些战略家们不可能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真正的独立性究竟是什么。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同独树一帜**是等同的。要讲独立性，那就要退出国民党，就要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断绝关系。既然留在国民党内，既然竭力去同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那就没有资格喊什么独立性，在提到这个“引起祸患的”字眼时应该感到脸红，感到难为情。

从这些虚伪的左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从工联主义的行会习气到极左的歇斯底里）奉为依据的根本性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倾向”在于“**力争成为所有劳动者的领袖**，以使用革命推翻整个资本的统治”^①，不懂得自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独立性，与“同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以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作一定程度的接近，也可以说融合到一起”^②（着重号系列宁所加）的思想是绝对不矛盾的。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任务就在于制定自己独立的阶级路线，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以便帮助无产阶级“成为一切劳动者

① 列宁语，见1926年7月3日《真理报》。——原作者注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118页。——原作者注

的领袖”，同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无产阶级真正有了名副其实的**革命独立性**。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是**为了保证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具有**这种独立性**。中国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日益发展壮大的阶级组织，这些组织从未被溶化或与小资产阶级组织融合。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着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工作已经有很广阔的范围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扩充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成分”。中国共产党已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在国民党内部活动，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任务方面的措施时特别指出，必须“巩固党团，特别是工会的、农民协会指导机关的及**国民党的**，一定要使之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本身也十分清楚必须加强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1925年10月就曾作出相应的决定。1926年7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在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案中讲到：

“去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是，**继续留在国民党里，同时我们还应当……竭力为我们自己的组织争取更多的政治上的独立**”。“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

我不打算专门论述拥有百万以上工人且多数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其实不讲也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是使中国无产阶级组织保持并加强其**阶级独立性**。但是，共产国际与反对派不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防止把这种独立性变成为独树一帜而脱离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内便**只剩下了右派**，这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实行前所未闻的重大让步！国民党

内的小资产阶级党员将会象失去共产党领导的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国民党便将成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盟性质的组织，共产党的“独立”将成为**孤立**。到那时，两党联盟即使可能存在，也只能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即在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存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时又毫不懈怠地加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及对群众的影响，是中国无产阶级实现政治独立的组织前提。因为这条路线首先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治路线在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所有的革命力量，使无产阶级开展强大的工人运动，千方百计不屈不挠地为开展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而斗争并领导这一运动。这条路线在于争取使中国革命在本阶段成为逐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四、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策略任务

为争取革命领导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这个任务就是在当前的每一革命阶段都应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争取真正领导这些力量。争取利用一切今天尚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同盟者的力量，争取成为这些力量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总的策略任务。共产国际为此而进行了斗争，它一直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策略原则。十分清楚，这项任务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去争取，利用一切革命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利用，便不可能争得领导权，那样就等于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因为不去领导和利用一切今天还能起革命作用的力量，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便毫无意义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也就谈不上利用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更不用说资产阶级的力量了。只有充分而牢

固地掌握这种领导权，才能确保真正地利用这些力量，即使有朝一日革命的资产阶级同路人**不可避免地**转向帝国主义阵营，也能粉碎其破坏革命阵线的种种企图。

从这一观点出发，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中那些在蒋介石政变前还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应持的态度是，坚决地，毫不客气地从他们手中夺取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就是说，通过这种办法力求利用这些阶级以发展民族革命的事业。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表现在这方面。认为在这个时期应当采用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的同样方法对付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在策略上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荒谬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主要的策略目的——夺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采取了哪些具体途径和方法。我们打算极其扼要地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斗争的三个基本方面：在加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的同时，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本身的实力和影响；大规模地开展反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工农运动；**从组织上扩大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在政权机关内和军队里的影响。**

五、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同国民党左派一道工作；使小资产阶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员是最彻底、最坚决、最真诚地实现国民党的口号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就是首先依靠这一点争取并赢得了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只要看一看国民党的社会成分，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全部意义便一清二楚了。目前尚无国民党社会成分的全国统计资料，所以，我们举广东一省的材料为例。到去年年底为止，广东省国民党组织十五万八千零八十五名党员的社会成分情况如下：

国民党广东省组织社会成分统计①

(1926年11—12月)

社会成分	百分比
军警	2.9%
律师、医生、记者、科技知识分子	3.5%
政府官员	1.1%
农民②	40.7%
工人	20.6%
商人	9.6%
学生	21.4%
其他各种人	0.1%
	1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绝大多数党员（将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工人和学生。其余百分之二十是商人（可能多半属小商贩）、职员和军人等。共产党员加入这样一个以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主组成的庞大组织，便有可能对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广泛阶层产生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成分情况下，如我们所说，退出国民党就等于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大步向后倒退，将运动领导权拱手送给中国的资本家。下面这一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即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次政变结果总是打击了国民党组织本身，因为右派不可能赢得国民党基层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结果总是打击了国民党。这从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在李济深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情况中即可看得一清二楚，政变前党员为五万二千名，政变后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名，广州国民党组织实际上损失了四分之三。

① 数字引自1926年12月31日《广州日报》。——原作者注

② 农民一项数字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地主和绅士。——原作者注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采取的不是使中共与国民党决裂的方针，而是“让国民党右派退出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是“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的方针。

六、为开展群众运动而斗争

开展工农运动是共产国际坚持不懈一贯奉行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无产阶级为夺取领导权而斗争的第二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就坚决开展土地运动问题制定的各项原则。还可以举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为促使农民运动的发展制定斗争路线而通过的一系列决定。

一年多以前，即1926年4月1日，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即认为，“我们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壮大这些内部力量，也就是说，首先要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中来，要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

“同时，不言而喻，我们也不应忽视军阀集团相互之间时胜时负的斗争情况，不能被这些事件所迷惑，以致脱离了我们的基本政治路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在最近期间，广大工农人民群众的运动将蓬勃兴起，日益扩大。从我们自己而言，则应当**竭尽全力使这一运动具有最广泛的规模**”。随着革命的步步前进，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也日益明确，更加坚定。1926年末，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在农村开展斗争的同时，“利用有利时机改善工人的物质待遇和法律地位。尤须努力**把城市的斗争矛头指向大资产阶级**，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为“通过罢工”争取“千方百计改善工人的物资待遇和法律地位”，为“利用罢工运动巩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并加强其对群众的领导”进行了斗争。1927年3月，即蒋介石政变前一个多月，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再次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无论如何**”要执行发展工农运动，吸收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和把工人、农民输送到国民党中去的政策”。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做

到“无论如何要使国民党左派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具有基础”。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这条策略和路线的内容就是采取**开展工农群众的阶级运动的方针，组织好这一运动并赢得运动领导权的方针。**

反对派的“极左”战略家怎么也不能理解，开展工农群众的阶级运动并不会同北伐发生对立，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对立，尽管这次北伐是由蒋介石统率的。支持北伐同开展群众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北伐的革命意义决不局限于接二连三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在中国内部的代理人。

除这一情况外，广州军队的北伐等于是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壮大、巩固和加强组织扩大了地盘，使这一运动少受来自政权机关的限制。这一事实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广州政府进行土改和税收改革不力，对建立必要的工人法令毫无作为（至少是建树颇少），它装模作样地作出“超阶级”政权的姿态并采取敌视工农的行为，这些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予以批判的。但是，在“广州军队控制的”省份中，工农运动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势头，而在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的辖区内工农运动却受到千方百计的镇压，得不到发展，否认这一点也是荒谬的。广州军队胜利北进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扩大工农基地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一方面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北伐，同时，利用这一条件开展群众运动。这样就能**在打击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把群众运动推向前进。**而支持北伐是实现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的必要前提。

我们的反对派不懂得，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北伐战争同大规模开展工农运动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把支持北伐看成是放弃群众运动，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决议中，又把这种联系作了另外的、与此完全相反的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共产党之一，它是在前所未见的复杂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的。因

此，中国同志往往不能清楚地理解，开展群众运动不仅不会成为削弱反帝斗争的因素，相反，它是进行反帝斗争的唯一的真正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某些决议（均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之前作出）中可以感觉到存在一种担心，即害怕劳动群众毫无克制地“向左转”会削弱“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实际上只有使劳动大众“向左转”，只有把劳动大众发动起来，只有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运动，才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阶级联盟领导权的真正办法，才是消除由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退出“统一战线”而造成的危害的真正方法。所以，在开展群众运动问题上的任何动摇不定都是错误的。在共产国际作出上述一系列决议，指出必须更活跃、更坚决地开展群众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上述犹豫不决的状况，在发动和组织工农方面大大向前迈出了几步。近几日公布的一个材料说，从一九二五年一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员人数从一千人发展到五万八千人。在此期间，工会取得了巨大发展。农会会员在同一时期从二十万人增至九百八十二万九千人。中国共青团员从二千三百六十五名发展到三万五千名。此外，在武汉和南京因政府和司令部设置地点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个人独裁”，即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群众性抗议运动。所有这一切说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明白，开展群众运动的策略乃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唯一正确的策略。

七、从组织上扩大无产阶级影响的方针

在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即从组织上加强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运动“**关键部门**”的控制及掌握真正的“**权力工具**”和真正的政权机构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实行的路线也是相当明确而坚定的。

我在这里指的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等。中国无产阶级不应当以自己具有革命主动精神和已经是革命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为满足，中国无产阶级还应当在国民运动中，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拥有“**组织上的领导权**”。这绝不是说，共产党员不应当努力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共事。但这表示共产党员面临着一项任务，即反对国民党**右派**（即资产阶级）及不坚定的中间派对许多军政部门的实际控制。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普通党员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但是，政府机构，特别是以**雇佣制**为基础的军队机构则绝大部分控制在亲资产阶级，有时甚至是亲地主阶级的分子手中。国民党的许多党组织也可说是属于这种情况。

以今年三月十一日选出的国民党领导机关为例，下表虽不能说明其社会成分，但从中可看出这些机关的“政治成分”。

	共产党员	左派	偏左	偏右	动摇	偏向蒋介石	右派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	3	2	1	—	—	1
中央委员会工人部	2	3	2	1	—	—	1
中央党部	2	5	6	1	—	—	1
中央党部常委	1	3	2	1	—	—	—
政府委员	1	6	11	1	3	1	5
军事委员会							
将领	—	1	3	—	1	1	3
其他成员	—	4	2	1	—	—	—
军委常委会	—	4	2	—	—	—	1
监察委员会	1	—	2	1	1	—	—
共计42人中	4	9	18	1	3	1	6

当然，这个材料不一定准确，甚至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材料种类繁多也好，统计不精确也好，甚至对资料有争议也好，至少说明了一点，即无产阶级及跟无产阶级走的劳动群众还仅

仅开始从组织上扩大自己的影响。稍为仔细一点研究这些资料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领导机构的四十二名成员中，共产党员为四名，左派为九名，右派和明显倾向右派者为七名，中间派人数最多，为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左派在国民党党的机构中的影响比在军事机构中的影响为大。在军委的九名将领委员中，也就是说在直接掌握军权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一名共产党员。九人中只有一名坚定的左派，却有三名明确的右派，其余五名是左右摇摆的分子。谁都懂得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它包含着何种危险。

正因为从组织上扩大无产阶级影响的工作尚处于初步阶段，所以共产国际不得不特别提醒注意这个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肯定地认为，“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全会坚定而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的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应当“加入新政府的机关，使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得到实际的体现”。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中所作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着重号系我所加——作者）。”^①在说到军队问题时，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的工作。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是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编译者注

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④

在蒋介石政变前，无产阶级以群众运动为后盾，已在夺取“组织上的领导权”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蒋介石政变的部分目的正是为了对付和消除这种进展）：如共产党员担任农民部长和劳工部长；改组军事委员会；上海组成左派和共产党员占优势的政府等等。

八、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何在，弱点何在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从组织上扩大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国民党内，政府里和军队中）方面已经迈出了许多步。

可是，这些进展都还是初步的。如果说中国无产阶级在巩固中国共产党并加强其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结合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如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坚分子，在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阶级运动方面已积累了举行大规模经济、政治罢工以及群众性工会运动和组织大批农民协会的经验，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在从组织上扩大其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方面，所处的地位就软弱得多了。不要忘记，在中国革命早已过去的第一阶段，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寻求支持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推动力之一。资产阶级丧失其“极为重要的”革命作用及无产阶级开始发挥革命主要推动力的作用意味着“关键部门”随之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组。革命愈是深入，国民党右派愈是感到它被国民革命运动的活跃力量所孤立，群众运动的浪潮愈是高涨，资产阶级就愈会感到它有丧失在政权机关和军队中地位的危险性，它就会愈加拼命要保住这些阵地，不让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

在危机到来之前，中国无产阶级在加强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编译者注

之后，曾依靠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力争撤销他们的职务，力争推举真正的革命者担任军队中的关键性职务，力争武装工农，把各地农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政权机关等等。可是，上述种种工作还不足以防止资产阶级在倒戈投向反革命阵营时对革命阵线的打击并消除其造成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去和现在都在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在保持自己独立的阶级路线、阶级意识形态和阶级组织的条件下，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其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依靠其同国民党的团结**，赢得并发挥了对农民运动，当然，特别是对工人运动的无可争辩的巨大而全面的领导作用。从另一方面讲，年轻而且人数也不太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在于，它还没有把“权力工具”、中央机构、关键部门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或可靠的同盟者手中，这些工具、机构和部门多数还掌握在已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或不坚定的革命同路人手中。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这种力量和存在的这种弱点决定了这次发生的危机的性质。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未能**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单独地打击共产党和摧毁无产阶级组织，未能将他们逐出国民党。与蒋介石的本意相反，它把自己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对立起来，公然投入了帝国主义阵营。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讲，蒋介石终于使中国工人遭到失败，并且占领了许多中心城市。再说，他虽然实质上只能使国民党右派脱离出去（而未能将国民党基本群众分裂出去），但却在军队中造成了真正的分裂，带走了好几个军。总而言之，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弱点，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弱点和力量。

九、关于反对派的策略与共产国际 的策略之间的真正差别

如果根据上述种种分析对反对派策略上的建议作出评价的话，那么，说他们的建议客观上意在动摇或**消除**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源泉，意在贬低或无视中国无产阶级为克服本身地位上的**弱点**而进行的努力，是不为过分的。反对派的谋士们以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为理由，主张退出国民党，也就是说主张削弱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团结，从而使资产阶级易于夺得对这些群众的领导权。反对派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我们对待参加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嘲笑我们为争取控制军队和政府机构进行的斗争，挖苦“共产党员部长”，并通过拉狄克同志之口说什么，共产党参政当然是“可能的”，但尚未听说“因为这与共产主义的政策是相符合的”。拉狄克同志还特地补充说：“如果这还不算对列宁主义的修正，那么修正主义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在共产主义学院所做报告的记录稿）不过，需要顺便说一句，尽管反对派开了许多半真半假的玩笑，玩弄了不少模棱两可的字眼，它终究不敢公开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

既然反对派的中国问题“领袖”拉狄克同志能想出种种妙法给广东政府的社会实质发明七、八种不同的定义，那么对反对派上述种种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是否还有必要感到惊奇呢？而且拉狄克同志所下定义名目繁多，常常互相矛盾，有时称为“工农政府”，有时又斥为“资产阶级专政”。①

可是，反对派战略家们竟然还要在对确定共产国际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针有**指导**意义的另一个问题上指手划脚。要知

① 见1927年4月29日《真理报》（尼·多尔哥列夫斯基同志）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原作者注

道，对某个国家革命时机成熟程度的估计，是制定革命斗争具体方法的依据。譬如说，你断定革命在该国还排不上首要日程，而只能处于次要位置，那么，你就要在策略上得出相应的结论。总不能过了几个月便发表声明说：“我们讲过”，“我们写过”，“我们预见到”在这个国家决战必然到来，但他们不听我们的，所以发生了麻烦，招致了失败。

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讲它呢？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癖好之一是酷爱地理，但不是一般地爱好研究地貌，植物群和动物群等一类事物，而是酷爱预言世界革命的路线，

在1924年11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年鉴（1925—1926年）》^①发表的拉狄克同志题为《世界革命的前景》一文中我们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世界革命规定的最新路线。“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形势，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在欧洲，革命已提到日程上来，而**东方只能摆在第二位考虑**”，为了避免产生某种误解，季诺维也夫同志还宣布了一个简化的公式：“先欧洲，后东方，最后才是美洲”（着重号系我所加——作者）。对此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讲一点：发表过诸如此类声明的人在政治上再也不能允许其扮演“预见一切的”政治家、唯一革命的战略家以及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速度问题上专指责旁人错误的一贯正确者等等角色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反对派不久前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方针还是，“东方与欧洲不同，革命尚未提到日程之上，东方只能摆在第二位考虑”。可是现在却不顾过去说过的一切，企图重施故伎，跑在别人前面抢功，说是他们及时对危险发出了警告，对阶级矛盾发展的速度及革命危机的来临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原来共产国

① 《政治年鉴。经济与工人运动（1925—1926）》（德文版）第8页，

——原作者注

际除了其他种种过失之外，“对速度的判断也错了”。而拉狄克同志则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经过两年的研究之后，对广州政权的社会实质提出（请勿忽视）七、八个定义，敏锐地看出了种种危险和矛盾，看到了应采取的种种步骤和措施，并且第一个大声疾呼，预先警告说，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反对派大讲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企图**乘中国革命之危捞取一点政治资本**。

所有这类谈论正如俗话所说，有百利而“只有”一弊，那就是：这些谈论**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是粗暴地**歪曲事实**。众所周知，在1926年秋冬至1927年期间，如果不算前面列举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把东方摆在第二位考虑的建议，那么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特别的策略性建议了。今年3月13日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作报告，第一次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按反对派的说法是，他们第一个指出了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已经临近。而实际上今年3月3日联共中央已经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全面的、极为重要的决议，其中的某些段落已在我国报纸上公布。我们在这个决议中可以读到如下的话：“必须唤醒一切忠诚于革命的人士注意，**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中国革命现时**正处在危急时期**，只有采取坚决的**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将遇到巨大的危险**。”根据这一措词尖锐而明确的指示又拟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策略措施：“必须采取**武装工农**、把各地农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具有武装自卫能力的政权机构**的方针。”“必须实行**把国民党右派排除出去使其政治上威信扫地并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的方针。”“共产党不应当为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反动政策涂脂抹粉，而应当把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周围。”“共产党不论在那里都必须这样行动。”除此之外，还在夺取关键部门的问题及组织革命武装和培养教育新老骨干等问题上规定了一

系列重大步骤。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始终贯彻了一条正确而明确的路线。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还预见和预言了革命危机的临近，并就此制订了一系列必要的策略步骤和措施。反对派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策略不同之点，不是在于反对派看到了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革命发展中日益成熟的危机，而共产国际未看到这一斗争，未看到这一转折的临近。**反对派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策略不同之点在于：共产国际早于反对派指出危机已趋于成熟的问题并提出了正确的、具体的斗争路线，而反对派较晚、在共产国际之后才发表关于危机的看法，而且未能提出正确的策略路线，往往不是模糊不清、动摇不定，便是提出一些十分有害的、极为错误的建议。**这就是反对派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策略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别。

结 束 语

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和中国的现状看，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必要的临时联盟的同时，如不能预见到这一革命同路人不可避免的叛变行为，那将是一个错误。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共产国际预见到了这种叛变行为，并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一定阶段将倒向帝国主义阵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发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作用。抱住资产阶级不放，拖住革命同路人不放，害怕加剧阶级斗争会把他们吓坏，害怕这场斗争的发展将把资产阶级推进帝国主义阵营等等，这也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在前面也已看到，共产国际始终贯彻了一条坚决开展群众运动的路线，把群众运动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同资产阶级实力雄厚的阶层结盟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之间作出抉择”。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

人曾不顾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对和暗中破坏，组织并领导了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相信国民党右派，相信那些在政府和军队中控制着关键部门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样是错误的。所以共产国际始终不渝地坚持排除右派，撤消右派职务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夺取领导权的方针。最后还有一点，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反帝斗争对立起来，隔绝开来，分离出来也是一种错误。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正是使无产阶级领导反帝斗争，使其他阶级的反帝行动围绕无产阶级的活动展开，使无产阶级能为革命的利益而把在现阶段支持反帝阵线的一切力量利用起来。同时，共产国际执行着一条使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既保持本阶级的独立性同时又成为反帝运动内部主流的路线。所以，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发展的同时，一直执行着“使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理解，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修改自己基本的策略路线，而是要**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进一步贯彻、深化和运用这一策略路线。**

这一形势中主要的新情况是，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蒋介石已变成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之一，成为反帝革命的敌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任何一个无产者，任何一个农民，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分钟也不应当再受骗上当，不能再把蒋介石可能采取的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当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由来已久。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军阀混战还将继续下去。蒋介石的社会经济“面孔”同张作霖的社会经济“面孔”是完全不相吻合的。在中国革命的敌人营垒中，军阀之间将为争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和掠夺的势力范围而互相撕咬，互相倾轧。工人阶级和农民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自己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战胜他们，而且是为了把他们一个个地打倒并从地球上消

灭干净。

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吸取最近几个月的教训，能够深入地、加倍努力地继续贯彻自己的基本策略路线。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将比过去更有力、更勇敢地为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为组织好这一运动，特别是毫不迟疑地开展**土地革命**而进行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将比过去更坚决、更果断地进行斗争，使革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支为连根铲除帝国主义统治而斗争到底的、**真正可靠、真正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将比过去更顽强、更坚定地领导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加强同这一运动的团结，**为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

(马宝华译)

共
产

张伯伦和蒋介石的联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И·佩佩尔

张伯伦在英国国会的演说将永远是帝国主义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文件之一。这个演说是无比残酷和极端伪善的范例，而残酷和伪善则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政策中的不变因素。

张伯伦声称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英国不打算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新的照会，也不再因南京事件的“损失”对中国进行任何惩罚。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呢？难道是“死硬派”政府变成“温和派”政府了吗？绝对不是！张伯伦现在只不过是玩弄新的诡计，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

英国政府刚想发出包含若干最强烈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时发生了蒋介石叛变的事件，国民党右派脱离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所谓“政府”。当英国政府已经怀有封锁长江和占领汉口的“最良好的愿望”时，作为总司令首先应为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负责（英国千方百计要把这些士兵认定为“肇事者”）的蒋介石脱离了汉口政府，背叛了革命。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是引起英国政策在外交策略上发生上述转变的因素。

张伯伦的演说比任何一个文件都更加清楚地揭露了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派的最根本的内在联系。如果分析一下张伯伦

的演说，删去伪善的词句，那末演说的意思就在于：

（1） 南京事件是中国“抢劫、恐怖和屠杀”政策的顶点。要对这一政策负责的首先是第三国际。

（2） 这种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仅反对外国大国，而且也反对蒋介石。因此，第三国际是英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

（3） 南京事件和大国的行动大大地加速了国民党内部酝酿已久的分裂。所以，蒋介石作为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行为是大国在南京进行干涉的结果。

（4） 其实，蒋介石已经对南京事件的罪魁祸首共产党人进行了应有的惩罚。

（5） 蒋介石现在在南京，讨伐南京就会是反对蒋介石。大国根本不想给新的“南京政府”增加困难。

（6） 人们已看到，汉口政府已变为“徒有虚名的政府”。在南京事件之前汉口政府领导了整个中国南方。它本来还可能夺取北方。但是，它的“胜利的进军已经结束了”。

（7） 英国政府暂时“放弃”占领汉口，但它对**将来的行动保留有充分的自由**。

概括起来说，张伯伦演说的政治内容就是这些。应当特别予以注意的主要事实，就是他承认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反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南京事件以后帝国主义分子的行为给了蒋介石勇气，加速了他的背叛。蒋介石屠杀工人就是屠杀外国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帝国主义分子不想损害蒋介石，于是就不采取他们几天以前还用来进行威胁的那些惩罚性措施。中国“民族”反革命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按照张伯伦的说法，蒋介石代表着目前和将来的“当代英雄”，而汉口政府却是软弱无力，“徒有虚名的政府”。

但是实际上，“民族”反革命内部的不协调正转变为日益严重的士气沮丧。蒋介石现在已与他上海、广州的将领发生冲突。

他被迫整师整师地解除自己军队的武装，而他招募新兵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在后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共产党尽管已转入地下，仍继续在南京政府管辖的地区活动。

而另一方面，汉口政府却更加巩固了。国民党革命左派继续同共产党结成联盟。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群众组织起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内至少有九万名共产主义者，工会会员已达到二百八十万名，农会会员有九百万。这就是群众组织程度，即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基本条件的标志。已经听到关于新组织的农民委员会进行活动和初步开展土地革命的消息。不过，土地革命只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始。一旦无限广阔的农民大海洋的浪潮高涨起来，那么风暴甚至会将数以百计的帝国主义军舰荡涤干净。当蒋介石的军队开始瓦解和分化时，汉口政府的革命军队将会同西北方向的冯玉祥的军队向北方军阀发起进攻。

汉口的“徒有虚名”的政府日益强大，因为工农群众不断为它提供力量。不管张伯伦如何吹嘘，他的新盟友蒋介石只不过是中國革命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英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蒋介石，则是把自己在中国的前途建筑在沙滩上。汉口政府更加注意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更加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拥有世界革命这个后盾。因此，尽管可能会出现挫折和局部的失败，汉口政府必将把自己同中国革命的胜利未来牢固地联结在一起。

（高和平译，乌传袞校）

孙科谈国民革命的任务^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孙中山之子）在与塔斯社记者谈话时对时局所作评述如下：

“蒋介石必然一事无成。客观上他已经处于绝境。很有可能的是，为了摆脱困境他将谋求与北方的军阀妥协，同帝国主义者握手言和。为博得帝国主义者的赞许，他镇压工人运动、屠杀工人。照这样下去，蒋介石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住政权，但终将彻底垮台。不仅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蒋介石，他的前途已经完结，甚至作为一个军阀，他也已经自寻了死路。因为他已不可能长时期在他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保持统治。居民和军队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将很快使蒋介石倒台。目前仅有二至三个师还对他保持忠顺，其余的人迄今仍不明事实真相。这是因为他玩弄手段，散布捏造的消息，似乎汪精卫、谭延闿和孙中山的遗孀都支持他。他不过是靠着造谣才稳住他的大部分军队，但很快便会真相大白。

“蒋介石已被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宣布为叛徒。他已被开除党籍并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一旦了解真相，所有的革命军队都会将他唾弃。我们不怕他发动进攻，因为他的军队必定拒绝同我们作战。我们也不打算立即就向他进攻，因为他的政权必将自行崩溃。同奉军作战是我们面临的直接任务。当前我们的军队正开赴

^① 本文系塔斯社5月10日发自汉口的电讯。——编译者注

河南，以扫清河南省境内的奉军，并使冯玉祥和阎锡山有可能从后方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我们确信，三个月后我们就能进入北京。打击奉军集团、夺取北京，也就是打击蒋介石。因为这样就使蒋介石无法谋取妥协求得北方军阀的支持，进而巩固其在东南地区的地位。夺取北京之后，再要夺回广州、福建、浙江和上海就不难了。蒋介石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我们最近的前景看来很有希望，它使我们有权作乐观的估计，却无任何理由让我们忧心忡忡。”

谈到关于来自帝国主义大国方面的危险时，孙科声称：“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得到巨大的发展，因而无须害怕帝国主义者。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而帝国主义者也无能力摧毁革命。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甚至联合起来的世界帝国主义，都不能够摧毁中国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的起义，而一旦三亿五千万中国农民奋起造反并且汇集成农民革命，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镇住规模如此巨大的运动。

“蒋介石的叛变揭示了我国革命的实质。原先对我们的革命构成危险的是资产阶级和买办（买办是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中介资本的代表）在革命中可能取得主导地位，而这些人物的实际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革命可能离开工农道路，走上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而中国最终被奉送给帝国主义去统治。蒋介石的叛变消除了这种危险，而且使革命的动力充分发挥作用并使革命的前景更加明朗化。”

孙科接着声称，土地改革不会遭到来自土地所有者的强烈抵抗。国家统一后（这种统一当以夺取北京而告完成），任何力量都无力抗拒国民政府。照孙科的看法，将来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可能设在北京。

在回答有关国共两党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孙科声称：“事实上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反对

的是同一个敌人，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孙中山的主张是，中国要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而不经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国民革命要号召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一来，中国的国民革命就不仅与与世界革命意义相同，而且在现时还可能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道路及其目的与世界革命的道路和目的是相吻合的。”

(严邦畴译，乌传袞校)

上海事件的意义

——纪念1925年上海事件二周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Φ·拉斯科尔尼科夫

上海事件^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极其宏伟壮观的表现。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为抗议日本人在上海和青岛杀害中国工人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野蛮的开枪镇压。英国在上海的巡捕房总头目埃弗森在会审公廨解释自己的行动时无耻地宣称:“我奉到命令只有在别无他法的时候才能使用武器,但既然开枪了,那就得一枪致命。”

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在自己发表的号召书中完全正确地把上海事件的政治内容同1905年俄国革命中1月9日事件的意义加以对比。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的这一预测。

在中国纺织工业危机声中爆发的上海事件,是因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纺织企业大批解雇工人而引起的。这次事件震撼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促使他们行动起来。要理解上海事件突出的历史意义,必须弄清楚这一事件在它以前和以后各种事件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

如果把中国的革命运动从1911年也即推翻满清王朝直至今日看成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那么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包括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在中国革命这个最初发展阶段,站在运动的先头的是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资

① 指“五卅”惨案。——编译者注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那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的，上升的阶级，客观上起着进步的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参加了全民运动，当时还没有从总的劳动群众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在中国革命中负有特定使命的独立阶级。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阐明自己的阶级政治纲领，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口号，没有取得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只是跟着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行动，而资产阶级则如同法国的第三等级一度所做的那样领导着革命斗争。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只是由于工人运动处于孕育和萌芽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会，尚未拥有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中国政治斗争舞台上活动的不是工会。而是按极其狭隘的行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式的行会，参加各种行会的不仅有工匠和徒工，还有不少小业主和手工工场及小作坊的所有主。

1921年至1922年期间，阶级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改组，开始了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从这时起，觉醒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成为积极的，力量愈来愈强大的革命因素。从此，工人运动便以不可抗拒之势蓬勃地开展起来。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工会组织开始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参加这一次代表大会的只有十一个人，代表大约六十名党员。^①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还远不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只不过是一个以小组为基础的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成分复杂（甚至包含无政府主义者在内），还没有也不可能严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作并起了显著作用的就有现在已成为老奸巨滑的右派国民党人的蒋介石驻日

^① 原文如此。——编译者注

全权代表戴季陶^①，当时他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同俄国革命中的彼得、司徒卢威一样，对中国革命起了叛卖和反革命的作用。

1922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群众性的罢工，即香港海员大罢工，有三万多名远洋海员参加。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工人骚动浪潮，成千上万的中国无产阶级投身于斗争之中。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杀人如麻的吴佩孚将军的残酷镇压。1924年沙面工人举行了总罢工。这些罢工行动以及其他大量类似的事实证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已达到空前的规模。上海事件是这一阶段革命行动的最高潮。“五卅”惨案引起的上海工人总罢工中，约有二十五万名工人积极投入斗争。在这一段时间内，上海港口全部瘫痪，工厂停工。

上海事件最鲜明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第二阶段中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在这一阶段中，工人运动的外部表现形式是罢工和对外国货的经济抵制两种方式配合运用。因经济原因引起的罢工开始时提出的是经济口号，但很快就发展成政治运动，而且斗争的矛头所向直指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上海事件一开始只提出改善物质条件的纯经济要求，但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制造流血惨案后当即开始提出政治口号，这些口号最后又归结为把一切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上海工人的斗争从要求给童工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开始，最后转为争取中国独立、立即撤走外国军队、废除治外法权、争取工人结社罢工自由的斗争。上海事件划清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界限。在运动开始时，资产阶级同中国无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但随着工人运动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逐渐离开民族革命运动。上海商会最早背叛运动，分裂了统一战线，并且提出一个自己单独的要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戴季陶根本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编译者注

求草案同各界联合委员会的要求条件相抗衡，其中完全放弃了政治上的要求，而且忽视工人的权益。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达到了制止中国资本家工厂中罢工的目的。

这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上海事件以后，工人阶级开始坚定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公开为争夺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权而斗争。尽管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但中国无产阶级的积极行动和工人运动的巨大规模加速了资产阶级逐步倒向世界帝国主义营垒的过程。由于害怕本国的工人运动，中国资产阶级开始投向中国革命敌人的营垒中去。

上海事件也反映出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的弱点和长处。一方面，上海无产阶级得到中国其他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关心和声援。上海事件直接促成了持续十六个月之久的香港总罢工。上海事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开展群众性政治行动的学校。上海事件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组织程度的加强。上海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迅速发展，并且使自己保持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但是，另一方面，上海工人的事业当时还没有得到亿万中国农民的支持。在不少省份，特别是在广东，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兴起，但尚未发展到开展所向披靡的土地革命的阶段。尽管如此，上海事件大大促进了中国农民的政治觉醒，使他们开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惰性，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上海事件大大加快了资产阶级继续转向反动营垒的步骤，促使第三阶段迅速来临。大约在1926年秋天，第二阶段宣告结束。从占领汉口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转折时期，是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蒋介石的叛变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阶层离开了革命，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三阶段的开始。蒋介石的叛变在这一点上恰好为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划了一条界线。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比任何人都早一步预见到并且警告

说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离开革命，同时说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的领导成分”。^①中国革命新阶段的特点是：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规模空前，城乡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由于土地革命已经开始，广州政府军队的北伐得以进行，而这又反过来大大刺激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的进一步爆发。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就是土地革命。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愈来愈取得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愈来愈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性，愈来愈取得政治行动的主动权。占领汉口英租界就是由革命的工人纠察队自行决定的。直到工人已成为英国资本家在汉口这块领地上的实际主人，直到工人已使全世界面对这件既成事实，英国政府才签署了决定汉口租界命运的条约。还有，一度占领了上海的并不是广州政府的正规军队，而是由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加以夺取的。上海工人占领了兵工厂，夺取了武器，组织起工人战斗队，并像一群雄狮一样在上海街头奋战了二十八个小时。武装工人和建立农民军队成了当时的紧迫口号。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土地运动不可避免地自发开展起来。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中国革命力量的组合发生影响。被革命群众空前规模的斗争吓破了胆的民族自由资产阶级，必然而且已经倒向中国革命敌人的营垒。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所以离开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不断加强。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随着革命波及的地区日益扩大，随着工农群众愈来愈多的阶层参加革命，以及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也日益施加更大的压力。当年广州政府只在华南占有一小块地区，它对帝国主义者利益的威胁还是一种潜在的非现实的威胁。如今，北伐的行

①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编译者注

动已把武汉政府推上了全中国的广阔舞台，革命军队已经进入长江流域。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就遭受到实际的打击，因为外国资本家开设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转入武汉政府的控制之下。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早就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不断施加压力，试图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现在，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同蒋介石作斗争的武汉政府并非是一种虚构的事物。轻视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将是一种犯罪。自然，继续会有某一些社会阶层叛变和脱离武汉革命政府，这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某些靠拢武汉政府的军阀所以还在继续支持它，只不过是因为革命军队已经开进他们的地盘。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没有来得及跟随蒋介石离去，暂时还站在武汉政府一边。最后，还由于小资产阶级成分复杂，甚至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其中因工人罢工直接影响其本身利益而对工人运动的开展最为惴惴不安的一类人，象作坊主和小企业主，就必然会离开民族革命运动。对这一点必须有所预见，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预见到的后来表现为蒋介石叛变的阶级力量必然急剧分化改组一样。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政变使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受到局部的挫折。但不能由于这次政变而只看到失败的一面。这还意味着革命进入更高的阶段。如果对工农群众的动员能比资产阶级各阶层离开革命进行得更快，如果土地革命的开展能比其他社会阶层离开革命的过程更快，如果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加强和士兵群众的革命化得以粉碎个别军阀的背叛，那么中国革命事业必定仍能取得胜利。相反，如果资产阶级军阀集团的叛变和出卖造成的损失不能从发展群众运动中得到补偿，那么中国革命将要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这些暂时的失败和挫折绝不可能用来作为怀疑共产国际总路线的正确性的依据。谁认为只有保证不遭受挫折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在伊里奇领导下我们党执行的路线是完全正确

的，但这丝毫不能保证我们在7月不遭受挫折，而7月的挫折却又成为我们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发端。谁也不能担保中国革命能轻易取得胜利，但正确的路线可以为胜利创造较好的条件，可以加速胜利的来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乌传寰译)

中国革命和社会力量 的不断分化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A·谢苗诺夫

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在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时就已明确指出，在这以前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逐渐背离革命，它“承认外国资本的统治地位，倾向于同后者妥协”^①，同时指出，“在大资产阶级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可避免地要逐渐脱离革命的这一过渡时刻，无产阶级不言而喻应该广泛利用目前确实在进行反帝、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力量”^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认识到革命高涨时期武装力量所起的作用，明确地提出应建立一支能成为真正忠实可靠支柱的革命武装力量。那些在广州政府主力屡战告捷的北伐期间站到革命方面来的各军事集团，自然令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忠于革命，因为按照这些军事集团的人员组成，特别是其中指挥人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只是纯粹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才来帮助革命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的基本论点这时已被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充分地证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编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9页。

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断定民族资产阶级背离革命时指出，“资产阶级及其军事领袖蒋介石叛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工农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日益增强压力”。^①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确定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土地革命，其内容包括没收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全会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提出问题以后，得出了几点结论，其中包括关于军队问题的结论。全会认为：“目前应当十分尖锐提出的问题是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军队，密切军队与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把雇佣军改变为正规革命军等等。”^②

军队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期间之所以特别尖锐，正是由于中国土地革命蓬勃开展和农村阶级矛盾不断深化的缘故。这时，农村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不仅是农村中农会会员人数激增，而特别是采取“平民革命”的办法在当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组织和某些农村开始采取真正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往往不等待上级，包括武汉政府，作出指示。在农民运动发展势头最猛的河南省^③，逮捕和枪决地主，把他们赶出庄园，摧毁豪绅组织和民团等等事件日益增多。农民开始实际上没收地主土地，农村上层富农的土地也被部分地没收，全部分给无地和少地的佃农。地租问题也空前尖锐起来，因为农民已经不同意向地主缴租。其他各省几乎都发生此类事件。

土地革命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打击了在这以前站在革命方面或暂时依附革命的某些军事集团的利益。武汉政府的军队中有很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编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1页。

③ 原文如此，显系“湖南”之误。——编译者注

大一部分是唐生智统一指挥的湖南部队，其中一部分开往前线同奉军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终于在6月初到达黄河边。另一部分在湖南和湖北留守。

正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还打击了各军事集团上层人物及其指挥人员的利益，这些人很多都是地主。应该预计到这个军事集团及其同情者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因为他们实质上本来就站在右翼立场，在这以前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转到蒋介石方面。

夏斗寅发动的暴乱是军事阵营中许多同路人开始极力脱离革命的信号。夏斗寅被迅速击败了，并被迫“悔过”。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南主要城市长沙又发生了叛变（这是第三十五军一群军官制造的叛乱）。

据悉叛乱情况如下：第三十五军的几百名士兵在本部军官指挥下包围了许多工会和农民组织，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夺走了枪支。在发生冲突期间，一些工人被打死，二十人被逮捕，左派国民党军校被迫停课。由左派国民党人组成的省政府被迫离职，国民党省党部被解散。另行组织了新的省政府和新的省党部，其成员都是举行叛乱的各团军官和右派国民党人。

发动暴乱的湖南军官声称：农会不考虑有些土地属于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所有，竟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共产党员实际上在指挥着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已被共产党所软禁，等等。如果回忆起夏斗寅在发动叛乱时也提出类似的口号，而这些口号实质上就是投入反动阵营的右派国民党人所提的口号，那么，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些军事集团已经反戈倒向反动阵营。它们是在革命顺利发展过程中投靠革命的，目前在日益蓬勃开展的中国土地革命的冲击下开始脱离革命，投奔反动阵营。唐生智本人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暧昧态度，实际上这些暴乱分子就是隶属于他的。他的态度表明，这个事件决不仅仅限于长沙几个团发动暴乱

脱离革命的问题，而还要进一步扩大，将要涉及依附革命的湖南将领的基本兵力。在革命进一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参加革命的情况下，很可能这次事件将影响到至今还站在革命方面的其他军事集团。它们将逐渐地或突然地脱离革命，这样一来，随潮流卷入革命阵线的一切污秽之物均将清除干净。

当然，这次事件标志着目前时期革命军事力量的减弱，对中国革命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增加了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展开，随着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这种事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由此而带来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可以而且已经由群众运动的巨大发展所补偿。

中国革命中力量分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它将抛开革命的同路人，而把一批批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吸收到革命中来。在中国目前群众参加革命如此踊跃的情况下，个别人甚至整个军事集团脱离革命，叛变和出卖革命，对于革命来说都是不足惧的。中国革命应当锻炼出一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真正的革命军事力量。这样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开始建立。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新 阶 段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

E·采特林

最近几周来中国事态的发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断顺利发展的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危险。

武汉政府军队打败北方军阀，深入北方，为中国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两个月前，反对派在自己的发言中还正确评价北伐的巨大意义，现在却又说北伐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但正是这个北伐推动了大规模工农运动的发展。在疯狂对抗工农运动的资产阶级投入反革命阵营，而国民革命军取得新的进展之后，这个运动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把更多、更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吸收进来。

武汉政府军队的胜利因此使土地革命的进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曾正确地指出，只有发展群众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巩固武汉政府军队的胜利。资产阶级希望在不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下同军阀作战，继续北伐，因此，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使他们转到反革命方面。农村中革命浪潮来势越猛，资产阶级阵营与军阀阵营结合的趋势就越强。

但是，土地革命才刚刚开始。参加农会的农民，依靠自己的武装队伍，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沿着土地革命的道路迈出了坚决的、但最初的几步。有些地方，农民赶走和镇压地主，另一些地方解除地主队伍的武装，还有些地方则已经在夺取土地。在有些县，整个地方政权都掌握在农会和农民委员会手中。千百万农民群众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农民没收所有土地，也包

括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土地革命的锋芒不仅指向大地主，而且指向小地主，有时还指向富农。

但是，土地革命仅仅开始。左派国民党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对开展土地革命表现动摇。这意味着目前对农民运动还没有坚强的领导，运动在自发地进行，没有得到左派国民党人的有力支持。

因此必须密切注意并清醒地看待长沙事件。

镇压地主，解除民团武装，建立农民队伍（这个队伍已成为以农会为代表的地方政权的支柱），农民夺取地主土地，所有这一切引起武汉军队所辖某军军官的武装反抗。这群军官解散并残酷镇压了农民队伍，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国民党部和地方政府，成立了自己的党部和政权机关。这是在农民运动中心湖南进行的反革命政变。

夏斗寅的叛变、杨森的行动和长沙的反革命政变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随着土地运动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分化将越来越深入。阶级力量的主要分野已经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指出，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存在三个阶级阵营。

“目前形势正以存在这三个阵营为其特征。蒋介石已经在屠杀工农，但仍然同北方军阀作战。

然而斗争的整个逻辑正在把这三个阵营变为两个，但已是两个新的阵营，因为以蒋介石、白崇禧等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益与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接近，而且这一进程将加速进行。”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在历史上未曾有过这种先例，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每一个阶级阵营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家机构，并依靠各自的军队进行斗争。

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是反对拥有军队和国家机构的统治阶级的革命。革命击败并摧毁了地主的军队，建

立了由工农组成的武装力量。

国民革命政府的军队还不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军队，而是雇佣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由于同军阀也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起着巨大的历史作用。对军阀的打击必须进行到底，现在对军阀的坚决打击正在使资产阶级阵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对于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某些人来说，蒋介石是颇有吸引力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反对工农运动的斗争中采用了蒋介石的一套办法，还有一部分人正想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因此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要求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具有更高的觉悟。

蒋介石试图表面上继续与帝国主义者为敌，实际上在同他们进行勾结。在他的斗争中应把土地革命的口号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口号。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不断把大批已经受过某些阶级斗争锻炼的工人和积极同地主斗争过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军队中来。大力开展把所谓武汉政府军队改造成工农武装部队的工作，加强左派国民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监督，促使军队同工农组织接近，这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完成这个任务将能有力地保证，在最近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的直接交锋中使武汉方面获得胜利。

据此必须指出一个情况，就是蒋介石在同各派军阀的谈判中首先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主要条件，是张作霖必须承认三民主义。这种故作姿态地表示对孙中山学说的推崇是玩弄手法，其目的是提出一个能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土地革命的行动纲领。

得到帝国主义分子全力支持的蒋介石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这场斗争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能否尽快改正在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动摇态度，它们是否敢于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结局要看工人阶级能否把小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比任何时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惯用左的词藻的英雄们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如今提出“暂时无需退出国民党”（？！）来掩饰他们主张退出国民党的立场。

相反，最大限度地加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坚决实现国民党民主化，公开批判动摇和犹豫的左派国民党人，这就是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政策。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指出，一部分动摇的人，甚至左派国民党人脱离革命，以及某些将领和军事领袖的叛变，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土地革命将使阶级分化更加深入，将迫使表面上拥护民族革命阵线的人退出这条阵线。

值此长沙发生反革命政变之际，惊慌失措的反对派必定会掀起一阵叫嚣，说中国革命又遭到了一次失败。这种幸灾乐祸的大喊大叫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奇怪。我们的党始终不懈地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关心我们的战友中国共产党的成败，对中国革命的威力充满着坚定的信心。

长沙的军官暴动遭到武装工农的坚强抵抗，现在已被镇压下去。革命正获得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粉碎一切叛变和出卖行为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正确地、清醒地吸取某些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是使中国革命成功地摆脱它面临的无数困难的可靠保证。

（章任贤译，乌传袞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情况介绍^①（节译）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Н·布哈林

关于中国革命

现在谈一谈全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我首先说明对现今各种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然后介绍反对派的观点，他们在全会上又是怎样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观点的，以及我们批驳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最后，即第三点，我将简单叙述一下中国最近时期的事态。

一、阶级力量的分化改组

早在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通过了一项自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第一次关于中国革命的详尽的决议。其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对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各类社会阶级力量作了剖析和评价，对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作了判断，并且预见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各种阶级力量必然会进行新的分化改组。第七次全会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主要的策略路线。我之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召开的第七次全会谈起，是为了一开始就强调说明，早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前**共产国际就对中国各种社会阶级力量作过评价，并且预见到了它们必然要进行分

① 这是布哈林1927年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我们节译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部分。——编译者注

化改组。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的判断，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的，即社会阶级斗争的蓬勃开展，土地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自由资产阶级离开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入反革命阵营**，这样一来整个中国便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民族革命战线的阶级力量将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贩、小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之上形成。

蒋介石政变，尽管来势急剧凶猛，但也无非是第七次扩大全会所预见到的自由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阵营而已。绝不能把蒋介石的政变仅仅看成是个别将领的背叛行为。这个叛变本身就是农村土地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的阶级力量分化改组在军事上的表现。

现在这一次全体会议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从已经发生的事变吸取教训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当前在新形势下的策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政变。评价的基本精神是：蒋介石的政变标志着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背离了革命，这个社会集团曾在中国革命运动先前的各发展阶段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份量，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起过反帝斗争实际领袖的作用。全会决定今后的整个策略都必须以**阶级力量这种新的分化改组**为出发点。自由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场危机。伴随着这场危机而来的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因而任何一种以**原先的**社会力量对比，以原先的社会力量组合为出发点的策略路线或策略措施，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失败。蒋介石的政变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政策。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向自由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加速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

二、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

执委会认为，鉴于问题涉及革命内部的动力，因此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农民土地运动、重新分配土地和没收各类大（尽管数量并不多）、中、小地主土地的问题，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口号，这样的任务，已经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在这里广为宣传农民在中国居民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详细叙述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是多余的。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说明，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以及正好是土地运动的发展，完全驳斥了拉狄克同志所阐述的观点。他一再断言，中国没有任何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国农民土地运动无比激烈的事实变得无法加以解释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已经作了足够详尽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准备再讲了。总之，土地革命现时正处于事件的中心。广大农民群众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正在成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群众性的有生力量。执委会必须研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因此，全会通过的决议极其明确，极其清楚地着重指出，从发展中国革命的观点来看，当前主要的是由农民自己，由目前愈来愈多地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农民组织自己动手自下而上地**实际没收土地，实际打碎农村旧的政权机关，实际重新分配土地**。这个问题必须特别着重加以说明，因为就连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更不谈在国民党左派中了，现在都仍然存在着一种幻想，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这种幻想认为，这一土地革命必须自上而下地按照土地改革的方式进行，或者干脆把它推迟到中国统一之后再来进行。这只要引用一下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同志最后一次演说就足以说明了。这篇演说不久前曾在《真理报》上刊载。谭平山在这次演说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必须**实际没收土地**。在武汉政府中，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至今还存在着一种倾向，想在国内战

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静静地、和平地、用发布法令的办法越过当前现实关系的一定界限，并且大体上也用发布法令的办法解决农村土地革命问题。这是在任何一次革命的任何一段历史中从未有过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出现的。还可以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不久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提出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那就是要**推迟**开展土地革命，直到中国革命军队进入北京，打败张作霖，把他赶出首都以后再来进行。不过十分清楚，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反帝**斗争的观点，从**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即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巩固、捍卫和进一步发展武汉政府**的观点，从**动员大多数有生力量参加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观点来看，开展土地革命都是**顺利解决现今中国革命提出的任务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不开展**群众性**的土地革命，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就连组织**武装力量**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也必不可免地要求开展土地革命。道理很简单，不如此武汉政府就无法取得农民的信任，无法组建**真正忠诚**的部队，无法保证取得今后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开展土地革命**是一个中心问题、中心任务和中心口号。开展这一场革命的方法是农民自己动手自下而上地没收土地，废除地租，在各地乡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政权，**武装**农民群众，武装保卫从各类地主阶层手中夺得的土地，等等。

三、群众组织、国民党、共产党

毫无疑问，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的组织问题就愈来愈重要了。因为，**如果**现在的主要方针是开展土地革命，也就是发展群众运动，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预见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群众组织**，如农会、农民委员会、职工会、手工业工会、小商贩工会等等，都会争先恐后地迅速涌现。我们自然主要着重发展**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和农民的群众组织**。根据这一方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理解，执委会面临一个**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成立时，无论

从社会阶级结构，还是从组织结构来讲，都是极其原始的组织。党内有构成所谓右翼主要社会阶级基础的**纯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国民党还是孙中山在世时以各种各样的军事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讲，这是一个各种特点应有尽有，唯独缺少党内民主的组织。不少国民党的领袖不仅握有“充分权力”，而且实际上“**绝对独立**”，不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约束。正常的会议和正常的选举是根本不存在的。如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而且如不进行这种根本上的改变，国民党就不可能起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随着民族革命战线的分裂，随着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国民党也发生了分裂**。国民党的这种分裂表现为蒋介石组织了自己的**右派**国民党，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留在**左派**国民党内的是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集团，以及大资产阶级激进阶层中只起较次要作用的一小部分人。

如果采取**土地革命**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按照“农民化”和“工人化”的方针迅速改造这个左派国民党，不仅是党的成份，而且**地方和中央的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要实行“农民化”和“工人化”。

前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一个同志来到这里。他证实说，左派国民党**上层**的阶级成份比例，从国民党党员群众中实际的阶级对比来说，与国民党的内部结构是完全不相适应的。他报告说，加入国民党或形式上接受国民党影响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革命将要愈来愈发挥重大作用的群众力量，都处于共产党人的有力影响之下。自然，中国的共产党人并非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必须记住。而且整个说来也不应该忘记，**即使**向共产党人提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

要求，也不过是用某些幻想来安慰自己，**我们的党**在建立时就是一个由吸收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全部马克思主义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团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都是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另一种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是从孙中山的民粹主义脱胎而来的，**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是最近以来，由于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建立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才开始形成。不应当忘记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一特点，而且要加以考虑。

正是从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出发，从必须开展工人运动、发展群众组织出发，同样也是从必须发挥国民党的良好传统出发（在这一组织中，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直接保持接触，并能够领导这些力量），共产国际作出了自己的指示。全会决定，现在必须在集体吸收所有这些形式的群众组织（即职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士兵组织、小手工业者组织等）参加国民党的基础上坚决改组国民党。国际执委会决定，也要从内部结构上**改组**国民党。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强调说明了**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和共产党同**左派国民党**关系的特殊形式。执委会指出，共产党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害怕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害怕开展土地运动的情绪。就因为**共产党自身**的上层领导存在这种过分的谨慎和摇摆，所以对于**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犹豫和不彻底性的批评也就出现了过分的“谨慎”。国际执委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既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强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党的独立性**，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批评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动摇、犹豫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它无论如何也要对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和犹豫进行批评，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把这些激进的左翼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推到彻底得多、坚定得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群众

斗争中去。

四、武装力量和革命

军队问题和**整个武装力量的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左派国民党也远远不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党内还有一小批激进的资产阶级首领。武汉政府的情况也是如此。武汉政府还远远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它有可能向这方面发展。武汉政府中还有激进的**资产阶级**首领。对于他们应当说，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或者说一定会**投向**敌人方面。但是，如果说某些左派国民党首领，某些目前参加武汉国民党政府的成员可能会这样做，那么对于**军事机构**就更加应当指出并**强调**这一点。至于谈到国民党，我并不认为现在党内就有这么大的离心力，能卷走**很大**一批人。这一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群众**（我是把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和**上层人物**加以区分的）确实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成份、将领、基干军官**并不是绝对可信赖的力量。你们必须对事情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大家当然知道，旧的军事将领是可以使用的，但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就是整个**革命的政权已经巩固**，旧制度（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打破，以及这些将领在政治上**独立**存在的基础已经被粉碎。目前武汉政府管辖范围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难道能说那里的阵地，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阵地**在**经济上**已经巩固了吗？不能。在农村中，地主、半地主和他们的宪兵警察（即所谓“民团”）还**没有**被清除。总的说来，连武汉政府本身都还不够巩固。由于**当前政府**是否巩固表现在军事上，所以武汉政府的巩固还是没有保证的。因为它所依靠的军队**内部**并没有足够的忠实可靠的核心力量。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政府**军队**的结构同我国红军的结构绝不相同。整个说来，军队仍然拥护武汉政府，但无法保证能这样继续下去而不发生重大的纠纷、冲突、叛变，这是

绝对无法保证的。不仅如此，“叛变”**非常可能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武装力量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同样必须强调指出，**不开展土地革命，绝对不可能组织建立起完全忠实可靠的强大武装部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有生力量来补充现有的部队以充分保证其忠实可靠。应当在蓬勃兴起的土地革命浪潮的基础上武装工人、武装农民，从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远景的概貌。

中国革命和反对派

现在谈一谈反对派通过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的发言以及季诺维也夫的提纲等等所提出来反对我们的一整套观点。在这一方面，我们手头有反对派的大量的各种提纲、文章、声明、文件、宣言等等，因而我绝对不可能把其中每一份文件都加以说明。所以我只谈谈主要的内容。

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由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采取了“招致毁灭的”、“罪恶的”、“背叛性的”“可耻的”策略，致使蒋介石得以挫败了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策略所以会如此，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因为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深深地陷入了孟什维克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回顾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而且引证了列宁的“原话”。列宁的这段话大致是：

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支持资产阶级，——这是孟什维克的说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斗争——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列宁的这一段原话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同孟什维克在1905年

革命中的区别就在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同态度。我们以工人和农民的平民联盟来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包括成为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而孟什维克则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不理解农民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

但是，**除非**列宁只写了上面这一段话，**除非**中国处于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状况，**除非**中国资产阶级自1911年直到1926年都同**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一模一样，那么孟什维克的称呼我们才完全当之无愧。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托洛茨基和所有我们的反对派既**不真正知道**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不真正知道**事实的真相**，所以说他们敲鼓并没有敲到点子上。应当把我国1905年那样的革命同**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具有反帝内容的革命区别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列宁那里可以找到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应当并且能够不仅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且应当并且能够同资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盟**（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和这样写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决不能变，那就是要保证我们党的独立性，保证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等等。不仅仅达成协议，而且还“建立联盟”！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自由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和1905年的俄国**不同**。在1904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曾对沙皇制度表示不满，而在1905年十月罢工以后，自由资产阶级就已经成为公开的反革命了。鉴于它一次也没有象样地反对沙皇制度，鉴于它其实也**不可能**反对沙皇制度，鉴于它必然——而且还是极其迅速地——投向反革命阵营，我们才确定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等等。那么现在，蒋介石叛变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的了么？是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反革命。但是，从1911年到1926年期间，难道它起的是反革命的作用么？谁能硬**这样**说呢？现在它转向了反革命阵营，但就它**多少**年来所起的作用，我们**应当**予以支持，**应当**加以利用，**应当**同它结成联盟。共产党诞生之初，工

人运动刚刚兴起，而自由资产阶级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了，甚至还进行了武装斗争。就在蒋介石叛变前不太久，他的军队还进行了“北伐”。试问，对于北伐我们**应不应该**加以支持？应不应该支持拉狄克称之为辉煌革命业绩的“北伐”？

若干年以来，不是几个月以来，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起着**客观上革命的作用**，后来这种作用才逐渐消失了。这完全不是1905年革命中俄国自由资产阶级那一种政治上的“昙花一现”。资产阶级能起**这样的**作用，是由于中国社会力量结合的特殊情况，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由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不存在的一系列**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不能断章取义地宣称：列宁说过，我们和孟什维克的不同在于孟什维克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我们则反对同它们达成任何协议。要知道列宁谈到这一点时指的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关于**东方革命**列宁的讲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最令人气愤的是，恰恰正是托洛茨基同志及其一伙**否认**同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知道，无论托洛茨基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他们都不止一次亲自投票赞成援助广州政府等等。当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任何**表示，说这样做不对。可是现在，还是这些人却放马后炮，说什么这是出卖、“叛变”、“可耻”等等。如果有什么可耻的事，那就正是这样一种行动，再加上对列宁著作的阉割和歪曲。

因此，如果反对派提出不允许同中国自由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论点，那么这才是对列宁学说的直接歪曲。对于俄国和中国，对于1905年和1927年，对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等，不作任何区分，这种方法是绝对错误的。这是不分青红皂白，事实上对事物不作任何分析，对中国发展的特点毫无认识。

总之，根本不允许同中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论点是**错误**的。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我们提出来。可以说：好吧，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但你们自己又在说，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总**是要转向反革命阵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也是这样说的。然而，你们为了保护无产者和农民又做了些什么呢？你们为了防止他们遭受失败又做了什么呢？你们不是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了吗？蒋介石的叛变难道不是使你们措手不及了吗？这难道不是由于你们过分热衷于同蒋介石“结盟”的策略所造成的后果吗？提出**这个问题**是应该的，这个问题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来把它搞清楚。用来反对我们的最方便的论点是说：上海工人遭到了失败，**这就是说**你们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

不过，对于这种提法应当坚决地予以驳斥。在1917年我国革命时期，我们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七月事件之前我们是否就已看出事态发展的结果呢？**已经看出来了**。但是在七月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挨了打。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我们为什么会挨打？道理很简单。尽管我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我们还是来不及聚集自己的力量**，做到在敌人向我们开战的时候达到比敌人更加强大的程度。我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强大**。由于受到当时阶级力量组合情况的限制，虽然我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我们也来不及达到能够打败敌人的地步。在中国，我们的同志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如果要详细讨论每一个错误的话，是可以也应当谈谈这些错误的，毫无疑问，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中，为了开展群众运动所能够做的事情并没有全部做到。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违背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土地革命。但是，有一点是我无论如何要坚持的，这就是即使一

切可能做的全部做到了，我们仍然不可能在这一阶段同蒋介石直接作战中取得胜利。第七次全会发出的指示要求开展群众运动，从国民党内清除右派国民党人，在军队中夺取战略地位，武装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组织。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条路线**，总的说来是**唯一可靠**的政治保证。但是，即使一切能够执行的都已执行，这是要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海是事件发生的中心。当时在上海有：①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军队；②蒋介石的军队——整整一个军（只有两支部队比较接近工农），而且蒋介石在革命的前一阶段还赢得了极大的声望。此外，还存在一条北方军队的战线，等等。尽管如此，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提纲中竟然提出了这样一种“美妙无比的”保证：上海无产阶级当时应该举行反对蒋介石的**起义**。这在我们看来真是**荒谬透顶**的政策。如果上海无产阶级举行反对蒋介石的直接起义，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无产阶级将被**连根拔除**。因为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反对工人、反对继续发展中国革命的一切力量**，必然会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果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那么**蒋介石、张作霖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及**所有一切敌视革命的力量**，都会**联合起来**彻底铲除上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有人竟然说我们执行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老实说，列宁从未宣传过**任何时候**都举行起义的政策。硬要这样讲就是**胡说八道**。我想，反对派分子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如果季诺维也夫试图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即一旦爆发起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会“援救”上海无产阶级，那就更是**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在美国，除了一个力量微弱的共产党之外，工人阶级的所有改良派干部全都是被收买了的、出卖工人阶级事业的败类。而你们竟想要这些败类来“援救”中国工人阶级？你们竟想要他们捍卫中国革命，而正是美国无产阶级的这些“领袖”**首先**提出要搜查苏联的机构，搜查我们所有的文化机

构？！要知道，遗憾的是跟随这些坏蛋的还有大量的美国无产者。应当记得，甚至**欧洲**的无产阶级也不是那么快就能发动起来的。把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作一种论据提出来，那真是在所有人面前明目张胆地**撒谎**！我们清楚地知道，援助会怎样来到的。援助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来到，而是**几个月，几年**之后才能到来。要使这种援助到来，需要进行极其大量的工作，而帝国主义者**在武装冲突中只要一天功夫就可以屠杀上海的工人**。散布援助迅速到来的这一类幻想，根据**这一点**制订政治路线并建议用来取代我们所提出的策略，又因为我们不接受这种冒险主义的策略而指责我们背叛，这意味着滑入了庸俗的、卑劣的蛊惑宣传的泥坑，已经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和无产阶级的责任感。

反对派用来攻击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维埃**口号的问题。这个口号听起来特别显得激进，因此我们的英雄们特别紧紧地抓住这个口号不放。他们提出立即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又因为我们认为现时提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他们为此竟指责我们背叛。这里先要说明一点。1923年，当德国发生极其重大事变的前夕，在**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临近的时刻**（不是中国这样的革命，也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而是**德国**），在**工人阶级占多数**，拥有强大的工业中心，工业发达，力量雄厚的德国（在这个经历过1918年本国革命，又**已经有过建立苏维埃经验的国家**），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坚决反对苏维埃的口号**。他那时提出的论据，经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但这些论据中并没有丝毫“背叛性的东西”。他当时是这样说的。运动席卷了大量群众，这个运动是通过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进行的，而群众运动就表现为这种工厂委员会自发地增多；因此，工厂委员会就是事件进程现时具体提出的组织形式；应当在工厂委员会**这种特定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去发动力量等等，至于有可能发展为苏维埃或者不需要苏维埃，以后会清楚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列宁也曾认为，革命，甚

至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总是**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列宁同志这样的论述，即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革命，甚至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另一方面，苏维埃的形式不一定必须表示无产阶级专政。例如对于英国来说，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采用工会政权的形式或某一种其他独特的形式也都是可以设想的。列宁是十分审慎的。至于对待1923年**德国**的具体情况，这样讲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暂且放下不提。在这里我只想特别强调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临近时候托洛茨基同志是**反对苏维埃口号**的。而且谁也没有卑鄙到**因此**而把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责都套到托洛茨基头上。

这一点大家都记得。可是现在，因为共产国际不认为在中国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是适时的，托洛茨基同志竟敢指责为背叛和其他等等。客气点说，这难道不是过分的……**自信**到极点了吗？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是不对的呢？我们认为，现在革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武汉政府甚至还不是一个工农专政政权。事情刚刚向这方面发展，而实际上存在着由整个发展进程提出的**国民党**组织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特定的组织形式；正是**这种形式**现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丰富的革命传统，它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包括在内，还拥有向各方面扩大组织的巨大能力。我们现在难道应当说我们对整个这套机构嗤之以鼻，而另搞一套？**这个问题**应当解决。策略上的分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策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一旁**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或与之直接进行冲突的苏维埃。十分明显，这条路线将导致什么结果？无疑，这样一来，就是唾弃国民党，任凭右派去糟塌它，从而也是唾弃武汉政府，实际上变为**立即**同武汉政府进行冲突，并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这是一条路线。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提交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纲中写道，应当提出苏维埃口号，但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个提纲中

他们又写道，无论如何必须千方百计**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成革命的组织中心，“从那里反击卡芬雅克们”，即反击蒋介石。后来问题已十分清楚，这两者是**相矛盾的**。于是，托洛茨基在他后来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个人”提纲中，更确切地说在他的**文章**中，直接建议说（也就是所谓摊牌）：我们现时必须建立**反对**武汉的苏维埃政权中心以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武汉政府“一文不值”，左派国民党“微不足道”，我们应当建立另外一个政权中心，**为此**就需要苏维埃。

大家可以看出，这里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在第一个提纲中（托洛茨基加季诺维也夫）一下子既提议全力**支持**武汉，又提议建立**反对**武汉的苏维埃，既把武汉看作为革命的中心，又要执行**消灭**它的方针。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中，这种矛盾通过一个简单的魔术手法被“消除”了！实际存在的武汉政府被宣布为不存在，左派国民党也是这样。的确，这样一来就无法理解，还怎样能谈到两个政权的并存。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同志在提出支持武汉的建议两三天以后摊牌了，公开要求奉行通过建立两个政权来推翻这个“中心”的方针。这样，他就暴露了他的苏维埃口号的真实内容。不过这样的说法是不行的。事实上对于左派国民党的各种不同色彩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总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众组织**。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还在共产国际的时候，他曾经写道，国民党有四十万人。现在国民党大大扩充了，分裂出去的右派国民党只是**少数头面人物**，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多数人**还留在国民党内。武汉政府现在还在**进行斗争**。它的将领**可能**背叛，但武汉政府的存在是连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也承认的。怎么能把它一笔勾销呢？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和他在1905年犯的错误一样，那时他就想要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农民。他的不断革命论，他在1905年的关于“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公式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也是

这样，他想越过国民党，想越过在两天之前他还宣布为“抗击卡芬雅克们”的中心的**武汉政府**。我们认为：当前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开展土地革命、在各地组织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武装群众等的基础上，广泛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当然，分裂的情况还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发生。但也不能否认，武汉政府可能被这种分裂行动所瓦解或被敌人打败。同样也不能排除部分左派国民党人会从上面抵制土地革命，因而不可能象原来那样地支持由原有成员组成的这个政府。这一切在理论上都不能排除。但决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当对国民党这样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众组织嗤之以鼻。1923年，托洛茨基不成功地“理解”德国发展的特点，想用工厂委员会来取代苏维埃。而现在他根本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实际存在的特点，它所独具的特征。

*

*

*

现在我谈谈中国最近的事态。

目前事态的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不断取得重大胜利。

但是，武汉政府的处境相当艰苦。军事上的危险还很大。军队并不是始终掌握在十分可靠的人手中。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将激怒军队中的军官和将领。长沙的叛乱造成了一个反革命基地，类似的叛乱可能接踵而至。另一方面，财政经济状况也极其困难。仅仅为了维持军队，就必须购买给养。要想不花钱取得，则只有从农民手中征收，这样做在政治上又不行。在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地区，有最大的纺织厂和大型矿业公司。大资产阶级关闭了大部分工厂，跑到上海，把存款从银行提走了。部分中等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也逃之夭夭，这给经济生活带来损害。资产阶级在逃跑。我们在决议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工厂和企业掌握到自己手中。写上这一点是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有象流动资金这样的“东西”，因为要采购原

料，要雇用工人等等。局势引起重重困难，武汉政府必须在对待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对待中等资产阶级的态度上相机行事。这种经济形势，加上军事形势，再加上军队不巩固的情况，应能使你们懂得，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们要解决的是多么复杂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坚决消除自己队伍中的犹豫动摇现象。开展农民群众运动，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采取别的策略现在都是犯罪。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组建可靠的武装部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国民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有效地制止分裂、逃跑、背叛、投敌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保证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完全不受侵犯，保证国民革命军的士兵能获得土地等等，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吸引他们参加斗争，把军队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并且利用群众满怀革命义愤对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憎恨来挫败——趁还有力量的时候——一切反革命企图。

我不想再讲其他问题了。最后我只想说一下，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的行为是如此出乎寻常，我再重复一遍，连最能克制、绝不喜欢“打架”之类的人，最后也愤怒起来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对反对派采取更加严厉得多的手段。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斥责反对派的决议后，托洛茨基宣读了一项声明，其中说，“他们”将继续斗争到底。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涉及的事情极其严重，由于我们的反对派现在已经采取行动，宣称不能“一般地”提团结一致问题，而要提“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问题，而“列宁主义的”基础指的就是**他们的**基础。既然这样，他们这样兜圈子想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结果就清楚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有权而且**必须**就反对派的发言作出决定，这项决定已经在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中写清楚了。通过时只有一票反对，那就是武约维奇同志的一票，他本人也是受到

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判的。

必须说明，反对派分子拥有最充分的发言自由。他们各人有四十五分钟或一小时的时间发言，而且不止一次。我谈到的所有这些文件，厚达几百页，全都散发了。所有的代表都已看到这些文件，都听到他们的论据。我们决定向反对派开战，因为这一套我们都已清楚，而某些外国同志可能不完全清楚。作战已经结束，结果是十分明显的，**所有人都坚决地**认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必须至少也要采取我们在执委会决议中所决定的手段。

同志们，关于我们的反对派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甚至连某些同志提出的托洛茨基个人具有“骑士”风度和仪态、敢于维护自己的观点等等“高尚品格”的假面具，也都被撕得粉碎。现在谁也**不相信**反对派了。10月16日，反对派提出了“庄严保证”，而现在则对自己的“真心话”不屑一顾了。10月16日，反对派宣称它庄严保证不同乌尔班——马斯洛夫集团保持任何来往，而现在反对派同这个集团交往亲密，而且这个集团的中央机关正在变成反对派的中央机关。如今反对派指责我们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是背叛，指责联共（布）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定阶段同中国资产阶级携手行进。可是任何人都知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自己正好坐在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并参与了所有这些工作。在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上，他们又射出了最后一支利箭。骑士的“美德”在执委会全体会议上现了原形，反对派在反共产国际领导和我们党中央所采用的伪装也已经被撕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使各国共产党干部更加紧密团结的道路。整个共产国际通过这一段内部斗争，团结得更加巩固，变得更加坚强。当然，对所有人都产生极大震动的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我们现在面临巨大的困难，英国帝国主义率领它的所有仆从国家反对我们，张作霖的力量也在和我们作对，英苏关系破裂已成事实等等。事态的发展瞬

息万变。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却提出了以下论点：**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联共党和共产国际内的党内体制！**既然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既然人们看到的主要“危险”**在于此**，既然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党内体制是**主要**敌人，那么就对这主要的敌人开火吧！至于张伯伦之流以及其他等等，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可以推迟一点再说。不管反对派如何打扰我们，不管反对派如何干扰全会的工作，全会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摆在面前的问题，而且是按照共产国际领导应该做的那样解决了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各国共产党的壮大，随着我们力量的团结一致，1914年的情况不会重现，不会再有一个1914年。在1927——1928年间，共产国际将会在决战中发挥出有分量的布尔什维克的作用！（热烈鼓掌，欢呼，全体起立。）

（乌传袞译）

革命过程和“动摇”的势力（社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国事态演变的惊人速度最为鲜明地反映出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北伐开始至今还不到一年半时间，国民革命军即从广东出发挺进至长江流域，登上了广阔的全国性舞台。短短几个月中，事件层出不穷，阶级力量对比急剧变化，事态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这都是我们现在分析局势时所要考虑到的。在此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一个接一个地被打败。又有数百万工农群众投入到革命中来。工农运动汹涌澎湃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公开压力从两个不同方面加速着民族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蒋介石叛变了，迄今一直起着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也同他一起投入了反革命阵营。领导权越来越多地、日益明显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方针路线和方法也比以前更为复杂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现在已不可能单线作战，而必须两面作战。它既要对付北京，又要对付南京。农会自下而上采取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分化。长沙发生了反革命军官的叛乱。

事态和局势发生如此急剧的演变是有其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国情的。这个国家既存在着最新和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又存在着最野蛮的封建主义残余；在那里，千差万别的各种制度和关系共存于一个极端复杂的体系之中。上海和四川，两者之间不仅远隔千里，而且在经济发展上相差好几个世纪。由于差异极大的各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由于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严重

不平衡，它们对帝国主义，对外贸易和整个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差极大，加之封建残余在这些省份或地区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产生了极端不同的利害关系，出现了大量的中间性阶层和集团。在当前阶级力量重新组合远未完成的阶段，上述情况尤其值得注意。

“小资产阶级势力是一种动摇的势力”。将列宁这一论述运用到当代中国，那就是说，不能认为蒋介石的叛离就是最后的叛离，随着蒋介石向反革命方面的叛离，拥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势力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势力就泾渭分明了。情况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将日益深化和日益明确，武汉阵营内部将进一步产生分化。国民党中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其阶级本性，不可能不发生动摇，不可能制定并推行果敢坚定的路线。因此，要对发生新的叛变和新的叛离有精神上的准备。闭眼不看这种前景就会产生马尼洛夫式的幻想，或由幻想一变而为惊慌失措。

蒋介石已公开叛变。但与它相近的许多阶层仍在国民党队伍之中。工农运动的声势一开始就吓得资产阶级纷纷叛离。工农运动的不断深入，从下面掀起的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必将促使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集团进一步叛离。长沙发生的军官叛乱事件是这方面最为明显的征兆。武汉军队的军官也已出来反对准备夺取土地和农村政权的革命农民。就社会政治意义而言，这种行为和蒋介石的政变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

但是，最能说明小资产阶级模棱两可、犹豫动摇和优柔寡断的代表性事例是，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未能一举摧毁长沙的反革命。到了需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明赞成土地革命的时刻，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非常明显地表示出他们这股势力是动摇不定的势力。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最大的危险也就在这里。

武汉许多政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中的“动摇势力”之所以日益增强还有下面几种原因。北伐是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

在它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举行的。而在这项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在民族阵线内部就出现了分化，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叛变。武汉既同南京作斗争，又同北京作斗争，但是，武汉和南京又都反对北京。这种表面上的目标一致在国民党发生分裂后依然存在，它对某些国民党将领有很大影响，而在适当的时机又成了他们同蒋介石结盟和实行新的背叛的有利借口和方便的伪装。

由于中国的斗争所采取的各种独特形式，发生新的背叛事件和这种背叛事件带来的危害性就更加严重。我们这里发表过的许多言论和文章都谈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在于，活跃于这一革命中的各个阶级集团都有自己的政权机构和军事机构，都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个特点是历史的产物。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主要缺点在于旧的管理机构和军事机构一开始并没有被革命彻底打破，而后来却又被革命扶植起来作为革命的机构。旧官吏和旧军官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原有的位置，他们不仅在武汉的军队中，而且在整个武汉管辖区内无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随时都可能形成一支反革命势力。长沙军队发生叛变便是最明显、最有力的证据。

对于蒋介石公开彻底的反革命行为，国民党应当以坚决彻底的革命政策予以反击。赞成还是反对土地革命？赞成还是反对农民运动？赞成还是反对工人组织？对于当前发展阶段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不容有任何模棱两可和半点犹豫动摇。不能只靠言词，而要用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

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并组织工农群众运动是夺取胜利的唯一途径。强调土地问题的重要性绝不意味着取消武汉政府面临的军事任务。把国民党的军事任务同政治任务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客观上会给反革命的气焰火上加油。“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革命”的论调客观上不仅会造成国民党与工农群众的脱离，而且最终会给那些依然想把蒋介石看作是反张作霖斗争中的

同盟者的动摇分子们提供思想上的武器。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象我们的反对派那样，脱离开军事任务一味去强调国民党的政治任务，那就不仅仅是给革命制订一条极其有害的、招致失败的路线，而且会给蒋介石提供材料，有助于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反北洋军阀的唯一重要人物。

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不依靠群众，不组织和武装群众，国民党就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层中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点不理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对群众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必须加以克服。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当前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利用来自群众，来自下面的压力，拨正国民党的方向，制定出明确的革命路线。

如果象我们的反对派那样，把激进资产阶级上层的动摇看成是同国民党实行决裂和自我孤立于国民党之外的理由，那在当前发展阶级等于是奉行取消主义，拒绝参加广泛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克服右倾，在行动上对农民实行革命的领导，当然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能把自己孤立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

土地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形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将首先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斗争，并作为群众利益唯一的、始终不渝的和坚定彻底的捍卫者去赢得自己的领导地位。

今后还会发生许多背叛事件，还会遭受许多失败，革命也将出现高潮。但是，不管近期还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中国革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紧密联系下，必将取得胜利。

(马宝华译)

同路人的叛变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A·艾亨瓦尔德

几乎天天都有报道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国内的发展进程的电讯。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社会力量出现分化，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到斗争中来，这就是中国革命在国内发展进程中经历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这一发展，从一方面看，正在扩大革命的力量，因为**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各劳动阶层的运动的浪潮正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和气势**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发展趋势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造成了新的困难，因为面对最为深入和最为广泛的革命运动，所有暂时还与革命同路，但又与中国统治阶级有联系的力量已经开始动摇或公开投向反革命一边。然而，与我国1917年革命时的情况不同，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实际权力和武装力量很大部分控制在革命暂时的同路人手中，而不在真正的主导力量掌握之下。因此，今日革命的武装，明天可能变成反革命的武装。而且，我们现在就看到，原先革命的力量**正渐渐变成蒋介石反动派的力量**。

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战争是靠不坚强、不可靠、脚踩两只船的同路人的雇佣军队进行的；在客观上起着**土地革命策源地**作用的一些地区，政权在极大程度上控制在一些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劣绅有密切关系或至少是不敢坚决反对这些阶级的人士手中。这就有可能成为使中国革命遭受惨重失败的根源。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而**比革命势力本身拥有更多武装的革命同路人**奉行着动摇不定的或叛变革命的政策，这样就必然发生直接的冲

突。国民运动的某些小资产阶级领袖在工农革命这个平民式的、以暴风骤雨之势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妖魔”面前，在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招来的“妖魔”面前，感到十分恐慌，纷纷向后倒退。

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领袖渐渐变成了这部分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障碍**。革命的军事指挥官渐渐变成了屠杀革命的**刽子手**。这就为革命增添了新的困难，在革命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几乎所有来自中国革命战斗前方的消息都向我们说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方面。

第一，世界上人数最为众多的被压迫、被蹂躏、过着半饥半饱生活且毫无权利的中国农民群众已经觉醒，奋起斗争。农民们投身革命，脚踏实地，正在将国民革命变为**自己的**革命。

在**湖南**，农民起义几乎遍及全省。许多地区完全掌握在农民手中，农民们没收并分配地主的田地。农村中农民打土豪的武装斗争正在兴起。在发生针对农民运动而来的长沙（湖南的主要城市）反革命事变以后，许多地区又爆发了新的、零星的农民起义。农民自卫队和其他农民武装联合向长沙发动了进攻，但被举行反革命兵变的军官们的部队所击退。在**湖北**，农民协会在没收土地的口号下迅速发展。3月，农会拥有会员八十万，现在已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会员。许多地区的政权已为农民所控制，旧的政权机关已被彻底摧毁。农民正以飞快的速度武装起来，自己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要求：他们没收了地主价值二千多万元（中国元）的土地。

这就是武汉所辖地区内的情况。即使在蒋介石、李济深和张作霖实行独裁统治的地区，农民运动也并没有平息，而是有所加强：以**广东**汕头地区为例，李济深发动政变以后，该地农民队伍和正规军之间的真正战争从未停息过。这毫不足怪，因为政变刚

一发生，地主便又重新提高了租息，农民协会便遭到破坏。在张作霖及其同盟者的压迫下，河南、安徽、陕西、直隶等省的农民队伍“红枪会”、“硬肚会”等同奉军进行激战，不断消灭他们的部队，夺取武装和大炮，这些农民队伍包围城市，破坏铁路运输等等。这是对张作霖后方的打击，使他的部队军心涣散，有时甚至引起了士兵的大量逃亡。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为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坚实的基础，因为在得到无产阶级领导并由无产阶级组织的时候，谁还能够使这如大海咆哮似的农民运动平息下去呢？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意味着中国革命向成为不可战胜的革命迈出了一步，因为谁还能够战胜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千百万劳动群众真正参加的运动呢？

第二，不论听起来多么令人奇怪，中国革命力量增长的另一面是革命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也相应地增多了。而且，在革命力量增长过程中中国革命不可能只是节节胜利，还会遭到**局部的失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群众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会使革命的同路人脱离革命并投向反革命阵营，而为革命服务的主要武装迄今为止一直是掌握在这些同路人手中。因此，同路人的叛变投敌不可能不伴随着反革命对革命的沉重（但不是致命的）打击。当上海获得光复时，当上海为英勇的上海工人所占领，从而把革命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当共产党的影响因此而在群众中、在国民党内、在政权机构甚至在军队里迅速增强的时候，蒋介石曾企图使革命失去领导，将革命淹没在工农的血泊之中，进而攫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现在，中国农民犹如一股巨大的洪流汇入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的积极力量，从而将革命发展为土地革命。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大有彻底扫除横行霸道的地主、土豪劣绅、旧官吏、高利贷者和其他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们”之势，于是革命同路人中另一阶层开始叛变或动摇

了。

开始时是属总指挥唐生智指挥的一些军官，效法蒋介石和李济深，在长沙策动了叛变。

接着，冯玉祥看来也已开始转向蒋介石一边。有关冯已叛变的消息是否完全属实，尚不得而知。但这些消息极有可能基本上是可信的。冯玉祥声称，“商人、店主、工厂主和地主正遭到工人和农民方面的压迫（！）。人民（！？）要求制止这种专横残暴的行为……有人却为少数人的目的效劳，力图使国家陷入新的动乱之中。”可见，中国反革命及其同盟者的言论同他们在别国的同行们的言论别无二致。冯玉祥已公开出来反对中国的工农运动。他提出的“指责”，也正是当年俄国的“祖国和秩序”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为反对俄国工人农民所提出的那些“指责”。同时，在武汉国民党领导层中，不善于或不愿意同叛变和反革命行为斗争并将其镇压下去的倾向已隐约可见。国民党中央对长沙事变作出的回答就是一项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决议，说什么“工会、农会为一方与军队为另一方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均应停止，否则将严加惩处”。

几天以后，国民党最高机构决定授权唐生智去处理，使农民队伍停止军事行动。同时，奉派前往长沙了解情况的武汉政府代表周斓反成了所谓“救党委员会”（摧毁工农组织的司令部）的名誉委员。

十分清楚，在作出此类决定之后，无论如何不可能再使人相信，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他们中一部分人对企图与蒋介石和好的将领们的叛变行为束手无策或寻找种种借口暗中促成）是不善于运用土地革命的力量与他们进行对抗的。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应当是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针对将领们的叛变和国民党上层某些集团的动摇，中国共产党应当加紧开展斗争，发动农民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封建——高利贷剥削

和官僚压迫进攻，使这一斗争成为武汉地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将领及其追随者们阻挡革命运动发展的企图应当作出的回答不是退却和惊慌，相反，应当组织群众向老的和新生的军阀、地主、土豪劣绅、高利贷者及其他剥削分子发动新的进攻。

靠降低群众提出的要求来争取别人留在革命阵营里的做法当然是极大的错误。共产国际**随时**都提醒中国共产党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不应产生丝毫类似的情绪。只有坚决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纲领才是促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国民党所有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的纲领。只有坚决有力而顺利地开展群众运动，才能或多或少地消除种种动摇行为造成的危害，才能使中间分子继续留在革命阵营里。因此，不是靠摇摆不定和轻易让步来巩固革命形势，而要发动群众施加更大的压力和发挥更高的进攻精神。

由此便可清楚看出，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着什么样的策略任务。

首要的任务是**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组织“**农民战争**”，组织土地运动。目前看来，农民运动虽已具有相当力量和声势，但仍属于缺乏配合的和分散的自发性行动，往往缺少有组织的领导。这些暴动看来不仅没有统一的指导中心，而且缺乏共同的口号和统一的、通俗易懂的纲领。严重的危险就在于此。不能忘记，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便会被分散，便形不成集中的打击力量，整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便会成为零零星星的、局部的和失去鲜明目标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浪潮可能会席卷许多省份，甚至动摇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从根本上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并巩固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土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有“无代价地没收地主占有的地产”，“没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庙、教会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

民”。无论如何必须想方设法，采取明白易懂的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传播这些没收土地和消灭农村封建压迫的口号，使这些口号成为**整个农民运动**当前最迫切的口号，使所有农会和国民党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这些口号之下。其次，必须争取刻不容缓地将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动变为武汉政府所辖各省境内普遍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对那些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真正忠于革命的军队的官兵例外。另一方面，每个农民都应当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国民党掌权意味着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实行镇压并将土地交给农民，而蒋介石分子掌握政权则意味着地主和高利贷者卷土重来，夺走农民的土地。

但这还不够。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必须克服脱离广泛的农民运动开展活动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往往只顾自己开展活动，而农民运动往往也是自己作主与地主和民团进行斗争。农村群众的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城市的组织之间根本没有有机的联系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即使有也很薄弱。象“红枪会”这样强大的农民运动几乎完全没有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政治面貌方面存在着许多损害其革命意义的表现。

这种状况孕育着种种危险，而且是不可容忍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脱离生气勃勃的农民运动的现象无论如何必须消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应当成为土地革命的指导中心。两党的领导人应当成为**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领袖**。

在中国农村的被剥削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红枪会”、“硬肚会”、“农民协会”、自卫队等——所有这些组织都是汇集着这种革命潜力的自发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最首要、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调动和利用农民的革命潜力。

诚然，在中国，要使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实行组织上的联合是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的。要明白这一点，一是不要忘记一般农民

运动的共同特点，二是要记住处于国内战争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但要知道，在中国，已经有了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农民协会；这些农民协会还举行过省一级的代表大会；中国城市中已有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会员几达三百余万。还要知道，中国还存在着有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参加的国民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成长并通过战斗的锤炼制订出正确的路线。

当然，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完全消除农民运动的自发性和不平衡状态，甚至还会出现某种混乱状态。但所有这一切可以为协调不同地区和省份的农民暴动奠定基础，甚至有可能**把农民分散的、缺乏配合的起义和暴动统一为反对封建地主和军阀的革命行动**，即在**统一的组织**，或者至少是互相配合的组织领导下，具有共同口号的进攻。所有这一切还可以为把互相隔绝的、大半属于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队、一部分“红枪会”、工人纠察队和其他武装（遗憾的是目前还武装得很差）组成一支统一的工农革命军队奠定基础。这支军队——更确切些说是这些军队——初期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游击习气。共产党应当竭尽全力，给这些军队应有的武装和训练并加以组织，以便至少从中培养出一批军官和教官，使工人成分成为这支农民军队的中坚力量。

在目前形势下主要的任务是，必须毫不含糊地提出关于把国民党改组为人民群众的真正的革命民主组织并使其成为土地革命强大推动力的问题。以革命分子为代表的国民党，或者是把反动派直接和间接的帮凶清除出领导机构，把土地革命领导起来；或者是丧失作为革命行动机构的作用，自行灭亡。由叛变和投敌行为造成的危险正对武汉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即使发生新的叛变和来自背后的严重袭击，以致使工人运动和土地运动的中心遭到摧毁，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领导土地运动的正确方针，中国革命仍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严邦晞译，马宝华校）

艰难的阶段（社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伟大的中国革命正经历着极其困难的阶段，对于中国工人和农民来说，这个阶段孕育着种种巨大的危险。反动势力正加紧行动，高中级军官的叛变时有发生，胆小鬼和犹豫动摇分子日益增多，被革命浪潮卷进自由阵营的人纷纷离去。反革命叛乱的毒焰此伏彼起。反动阵营在扩大，它既包括有中世纪式的封建暴君，又有刚刚学会耶稣和议会那套伪善的披上“进步”外衣的现代反革命暴徒。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消息，证实冯玉祥将军已经**可耻地叛变**了。冯玉祥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叛变了，他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名逃兵和**叛徒**。他背着中国人民在徐州同蒋介石进行了肮脏的交易，他背着国民党同上海反革命事件中沾满烈士鲜血的“英雄”，几分钟前才踏着上海共产党人尸体爬到中国工农头上的南京的“拿破仑”勾结到了一起。

冯蒋合流是徐州“会晤”的结果，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冯玉祥和蒋介石拟定了联合宣言，制定了共同行动的计划。这个联盟表面上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事实上是以摧残革命，镇压工农运动为原则。蒋介石的左右手胡汉民公开宣称，

“两位军事领袖决定联合双方力量，奋力消灭中共，完成国民革命”（应该作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两位“军事领袖”一定会奋力（现在已在努力）采用威胁和发出最后通牒，以至采用直接军事行动等手段去恫吓武汉政府。他们两人一定会起来保护地主

的财产免遭中国贫苦大众的“蓄意糟踏”和农民群众“过火行为”的破坏。他们两人必将在政治上力图使中国无产阶级失去自己的领袖，使中国无产阶级丧失已赢得的革命成果。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或“半公开的同盟”，冯玉祥也同样与帝国主义者进行勾结，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同蒋介石一样，冯玉祥也将发表革命的“反帝”的伪善言词。

冯玉祥的叛变是在反革命势力实行普遍联合的背景下发生的，它**直接威胁**着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冯玉祥的叛逃行为将在革命的后方，在社会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中，在“同路人”和各种各样的偶然的同盟者中引起更多的背叛革命的事件，将因此而加深革命过程中的苦难，增添领导革命的艰辛。来自张作霖、蒋介石、冯玉祥、帝国主义的海军将领、旧官僚、封建主以及城市和乡村富豪等形形色色反动势力方面的压力正成倍地增大。现代中国的一切内外黑暗势力，尽管它们内部存在种种矛盾，在下列各方面它们的纲领是一致的，即摧毁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赶出和“清出”国民党，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快地**使共产党孤立于群众之外**，使无产阶级丧失夺取领导权的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党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更加不能允许的。谁现在推荐这种策略（我们的反对派过去掩掩盖盖，现在则完全不加掩饰地鼓吹这种策略），谁就是想把**失败主义**当作**宝贝偷偷塞进**共产国际，就是让反革命匪徒去吃掉国民党。提议采取这种策略就等于“脱离”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去附和帝国主义报刊的“口号”，同整天盘算着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冯玉祥唱同一个调子。冯玉祥和南京的匪帮现在发动对武汉的斗争，其目的就在于把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同共产党隔离开来。

现在要求中国的革命斗士具有高度的革命自信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实行始终如一的革命方针。只要使下层工农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即使在目前这种极端困难和极端复杂的条件

下也能继续成功地进行斗争。大胆依靠群众的方针，从上到下对整个国民党机构实行民主化的坚定路线，把工人和革命的农民武装、武装、再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促使革命的领导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其他道路对于国民党来说将是毁灭的道路。叛变从军队开始发生不是偶然的现象，共产国际过去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一点是不无原因的。注视高级指挥官的动向，对他们持高度谨慎警惕的态度，**不轻信**高级将领，这是所有中国革命者、工人和农民必须注意的任务。

中国革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险。但这决不排除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和胜利的巨大可能性。因为社会底层的基本群众仍和过去一样具有激情，而且这种激情一月比一月增强。因为革命的群众性“物质力量”在不断涌现。国民党刽子手在几个小小的地区都要杀害成千上万的农民，才能使那些地区的“土地暴动”稍稍平息下去。蒋介石营垒内部也并不平静。蒋介石刽子手们现在越来越手忙脚乱了。英勇的上海无产阶级在监狱中奋起。即使革命中心地区部分土地被反动军阀占领，革命仍能在敌人后方找到千万个同盟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革命现在虽然遭遇到特别严重的困难和危险，却仍有能力打断反动派的脊梁骨，踢开一切叛徒和投敌分子，胜利地向前推进的原因所在。

(马宝华译)

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

日·布哈林

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困难的发展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渐次麇集起来，正一步步分化武汉军队，并把攻击矛头指向社会底层的群众运动，指向工人农民，指向手执土地大革命利斧奋起同城乡维护教化的“名门显贵”、“才子学士”们搏斗的“庶民”。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个人之间的纠葛冲突，将领官佐间的尔虞我诈，文官和军界的外交手腕，以及庄严隆重的公开宣言和同样庄严隆重的刽子手的检阅混杂出现，侈谈“三民主义”的动听言词和致人死命的绞索交错运用，“华夏礼仪”和执行枪杀的号令并行不悖，等等，在这一片离奇古怪而又变幻莫测的画面背后，在这一阵阵嘈杂刺耳、极不协调的喧嚣声中，可以令人清晰地感觉到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和炽热的阶级搏斗的金鼓齐鸣，而许多人对这一场鏖战的悲壮残酷的程度还并不完全了然。

冯玉祥同蒋介石结成联盟一事表明，国内的阶级力量还在继续分化。当前局势引人瞩目的特点在于，出现了三个社会阶级营垒（就事态发展的概略情况而言），而它们又各自组织了代表国家的中央机关。诚然，像拉狄克同志这类急于下结论的研究者的确曾经“悖于理智逆乎自然”^①地否认中国存在封建主义。诚然，他们的确以此种“分析”为依据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诚然，拉狄克

^① 出自俄罗斯作家格里勃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意指丧失健全理智。

——编译者注

反对派的其他同伙对拉狄克的错误确实一字未提。（而这种做法居然也被称之为“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是，事实毕竟还是事实：以觊觎新皇帝宝座的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是一个反动封建势力的营垒，是完全听命于帝国主义者营垒，是一个除了让“大帅”黄袍加身以建立新王朝这唯一“变革外”，对其他任何改革都丝毫不予考虑的营垒。现在，这一营垒显然已在日趋衰微。

第二个营垒是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营垒。

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这个营垒暂时还是一支稳操胜券的力量，并且在阶级斗争中处于完全独特的地位。这也是目前局势的一个特点。

将领们所发动的反人民政变的阶级基础已经相当清楚了，自由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就是其阶级基础。看来在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中国农民掀起的使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惊恐万分而又气急败坏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也带有纯属中国固有的特点。如果说在俄国，夺取土地的行动一开始就几乎把一切农民阶层都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并调动所有农民去反对同农民壁垒分明的俄国贵族大地主，那么在中国，由于土地少，大地主也很少，但是有小地主，而小地主又和富农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农村中的内战要激烈得多，受到土地革命浪潮冲击的阶层也广泛得多，因而也广泛地波及到城市自由资产阶级。

阶级分化产生了一个蒋介石，蒋介石又影响了冯玉祥，而冯玉祥的背叛肯定还会引起其他将领的叛变，从而使武汉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加上冯玉祥，再加上其他将领，再加上（有可能）左翼“奉系将领”——这就是资产阶级联盟在军事上的表现。当前，这个联盟在相互争斗的三个营垒中暂时是力量最强大的，它的力量在近期内无疑还会进一步增长。

应当十分清醒地判断形势：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会对已经动

手屠杀工农的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

这一**自由反革命派**的营垒所以有力量，是由于：第一，它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其次，它的**政治立场**不同于**封建主义营垒**的政治立场。在这里我们应首先谈谈这个“其次”。

我们不止一次地写道：资产阶级营垒已经在屠杀工农了，但是还没有同反动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完全合流。它有这样的趋势，而且当工农起义对它的威胁越大，这种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但是，它现在毕竟还没有与之合流，还有一定的独立性，还有较大的**表面上的**独立性。这一点使它在国内更拥有政治实力。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这一点可以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首领们的纲领性声明中明显地看出来；从国内战争的“事实”来说，这一点又可以从他们同奉系的作战中明显地看出来。

蒋介石的宣言（南京政府的《行动纲领》）的第十项声称：

“在中国面前有三条道路：

（1）屈服于军阀和帝国主义；

（2）走共产主义道路；

（3）真正实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自由派异常狡诈地运用了这一立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真正解放者，标榜自己和共产党人完全不同，利用彭加勒、张伯伦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精心炮制的谎言，诬蔑共产党人是“俄国”的间谍。上述宣言第四项中有一条奸诈、狡猾而又巧妙地（从愚弄群众的本领来看）把这个内容表述为：

“国民党（当然是蒋介石一伙右派。——尼·布哈林）主张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并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世界革命（不要视作等闲！——尼·布哈林），而共产党人宁肯听从俄国的摆布”。

自然，群众会日益看清这种谎言，因为自由派的“解放者”们越来越多地用杀人的钢枪和铅弹来同中国的工农说话，这将会

（并且已在）揭露他们的谎言；标新立异的“世界革命”拥护者对土地革命和大多数中国人民大肆镇压也将是对这种谎言的有力揭露。就是我国反对派的谬论对这类谎言终究也是无济于事的，不管他们怎样居心叵测地诽谤我们党的政策，把它说成是“民族主义局限性的政策”和“民族保守主义”的表现，并用这种言论助长仇视苏联革命影响的最险恶的敌人的气焰（因为如果在这一点上反对派是对的，那么，蒋介石关于“俄国的摆布”的话也将是对的）。但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承认，同北洋军阀的真正作战和利用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这些因素总的说来还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它目前还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利息。

我们不再谈南京《纲领》的其他各条，如：狡黠地利用武汉的失业现象（由于资本家关厂逃跑所致），许诺“将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等等。在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提及自由派反革命的另一个长处，这就是他们在第三个营垒即武汉方面有代理人，而相反的情况却不存在。

现在来谈谈**第三个营垒**，即**武汉**方面。它的弱点在哪里？

首先，这个营垒和这个中央没有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它的军队正在瓦解。由于冯玉祥的叛变，它失去了最精锐的（就军事方面而言）部队。剩下的由唐生智率领的部队也不可靠，指望蒋唐之间的私隙是不行的。阶级的“血缘关系”要比私隙更为有力，阶级斗争的逻辑胜于私人冲突的逻辑。虽有少量真正可靠的部队，但显然不敷需要。其次，武汉方面的弱点在于，在这个营垒中（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政府里），不但确有蒋介石的奸细，而且也有始终动摇不定而一到危急关头几乎肯定会追随自由派的、卑鄙无耻的小资产阶级典型政客。他们对土地革命抱有本能的恐惧，惊恐万状，极力加以阻挠。这种恐惧心理一到危险关头必然会大大加剧，能使他们投入自由派蒋介石之流的怀抱。如果回想起连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还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那

就不难理解，同底层群众的壮大处于完全对立地位的武汉**政治领导集团**的极度软弱无力和意见分歧，这正是武汉方面最大的弱点。

如果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确实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的活动不受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能大力进行；**如果**组建起忠实可靠的军队；**如果**有一条为群众所了解的政治路线；**如果**关于实现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能够认真执行……那么，对武汉方面说来局势就不会那样危险了。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同它的党员**群众**之间，以及领导机构和实际**运动**之间的不相适应，甚至达到某种程度的**矛盾**，这是武汉方面**最主要的**缺陷。

整个这**第三个营垒的力量**，在于强大的工农运动。革命必将把那些前怕狼后怕虎的空谈家和敌人的奸细，以及那些动摇不定、胆战心惊的“领袖们”抛在一边。经过一次次严重的考验，革命将对他们作出抉择。群众运动的规模如此巨大，参加运动的阶层如此广泛，奋起斗争的人数如此众多，人民即“庶民”的自发势力如此强劲，这是任何阻力也无法抵挡的。

各阶级的状况大致如此。

现在不难看出，“当前的形势”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道路**问题，即我们一开始就从理论上提出过的问题。同任何时候一样，与“灰色的理论”相比，生活的内容总是更加丰富，意义更加重大，范围更加广阔，表现得更加“巧妙”。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实际重要意义完全得到了证实。

尽管看来荒诞反常，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营垒暂时总还在反对封建主义，有时也反对帝国主义（固然也常作让步、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由于自己这个方面的“工作”还勉强保留着少许解放斗争传统的痕迹，但与此同时，它却又疯狂地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变成了残害工农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从而成了最凶恶**最残暴的反革命**（这就完全抵消了其他一切）。

然而，这正是两条道路问题在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上的具体表现：第一条道路是采取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的解决办法，即经济上接受帝国主义保护（后者也作出相应让步），国内同封建势力达成妥协，在“牢固的”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求得中国的统一；第二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由“庶民”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坚决铲除一切封建主义残余，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建立工农专政，进而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换一种说法来表示，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正进行着争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即在中国革命发展中走自由资产阶级的道路还是走“庶民”的道路之争。**这就是当前阶级搏斗的内容。**

当前的形势越危急，就应当更加大力地支持第三营垒，就应当更加坚决地**动员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场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伟大历史性决战中，“庶民”应当组织和发动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在“齐头并进地”枪杀和绞死工人和农民，烧毁农村和工人住宅区，声嘶力竭地齐声呼喊反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恐怖活动”。

共产国际的政策非常明确：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开展工人运动，坚决同叛徒和变节者作斗争。“工人和农民们，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吧！不要相信将领和军官！组织起自己的武装部队！”这应当是最主要的口号之一。现在，斗争已全线展开。思想必须绝对明确。必须大力反击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变相代理人的任何妥协倾向。必须贯彻从国民党上层清除此类动摇分子的方针。必须把那些无论遇到何种危险和挫折都能坚持斗争到底的真正雅各宾式的“庶民”骨干团结起来。冯玉祥已经倒向与人民革命为敌的营垒，应当同他**进行无情的斗争**。

如果认为共产党人、工人、农民现在还应当同冯玉祥之流妥

协，那简直太天真了！这种策略的基础，只能是对土地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庶民道路采取绝对取消主义态度。

但是，这种想法没有任何根据。即使处于敌军重围之中的武汉一旦失陷，斗争仍将采取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用军队来占领整个工农大众的中国，绝非易事。湖北省在5、6两月已有三千多农民被杀害，国民政府辖区内的地主武装已屠杀了近二千名农会工作人员，可见斗争已经达到何等紧张的程度。

然而，无论军官和贵族这一伙暴徒多么猖獗，即使庞大的军队也无力占领必将燃起农民暴动熊熊烈火的广大地区。靠屠杀成千上万乃至几万农民是丝毫解决不了革命提出的现实的客观任务的。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甚至连农民土地问题的一半也无力解决，因此无论他们对革命人民取得多么轰动一时的局部胜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除此之外，还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下面一种情况：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群众的战争越激烈，资产阶级为了乞求援助而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就越快。但是，资产阶级把自己剩余的政治资本消耗得越快，它的失败也就来得越快，而人们也就会越加看清楚：在中国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

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即有关**苏维埃国家**政策的问题。人们会问，**苏维埃国家**是否应当断绝同南京政府的一切关系？

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只有智力极度贫乏的政客和非常“幼稚”的人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在于不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任何联系。恰恰相反，保持一定的联系才是合乎情理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为了保持所谓原则的“纯洁性”而“取消”苏联的外交机构和外贸部门。既然苏维埃国家在西方和东方的资产阶级国家有自己的代表，既然它同张作霖大帅的封建主义国家保持交往，既然它在墨索里尼先生的法西斯乐土上派驻有自己的代表，那么，就没有任

何理由不同南京政府发生联系。这种通常的联系形式必须加以保持。不仅如此，既然苏联外交机构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考虑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存在着相对的差别，那么，它就更应考虑到觊觎统一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同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之间的对立，因为后者不论“统治形式”如何，总是想把中国洗劫一空。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实际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我们对这种区别的解释，甚至对于张伯伦来说也是相当浅显易懂。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绝对不是出于“赞同”资本主义的或者封建主义的剥削者的政策。而共产国际与“列强”既不进行贸易谈判，也不进行外交谈判，因为它直接组织革命。

再回过头来谈谈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我们多变的反对派，总是“愤怒”、“抗议”、“愤慨”，仿佛人们捏造事实把退出国民党的口号“妄加到”他们身上，可是，现在他们却公开声明：要求采取退出国民党的做法。

试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动摇吗？难道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只不过是“群氓”？从什么时候起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取决于它最“高”层人物的表现呢？

现在，所有的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派都致力于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孤立和包围他们。所有的反动势力都在亦步亦趋。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工农组织，从社会阶级构成来看，是处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的。众所周知，蒋介石集团所以进攻武汉，正是因为他们把国民党左派看成为共产党的“奸细”。最后，众所周知，逮捕和处死鲍罗廷，把共产党人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清除出去，正是蒋介石的口号。

在这种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从貌似“革命的”观点出发由我们自己来实现这些老爷们的要求吗？

决不能采用这样的策略。应当在国民党内不间断地加紧工作，把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形形色色的叛徒清除出国民党。然而，自己却要退出国民党，而且正好在敌人营垒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这样做，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策略！

在蒋冯会谈的徐州会议上通过了一个纲领，其内容大致如下：1、武汉承认自己的“错误”；2、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3、解除鲍罗廷的职务；4、“协议双方”共同向北京联合进军。

“奸细”们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不是指汪精卫，他比别人坚定）。而我国的反对派简直是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这个《纲领》！

不应当如此幼稚，而应当**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阵地。在国民政府内则应除掉奸细并加以揭露，同时尽可能坚持住，直到最后一刻。在摆脱这些累赘之后应在上层把“真正的左派”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旗帜而战斗。

不过要是不成功呢？如果敌人的力量现在处于绝对优势呢？这是可能的。武汉可能被打败；万一真正的雅各宾式的“左派”，即某种武汉“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不起来，政府的中央机构可能被内部矛盾所摧毁。但是，仍应当为争取实现这样的结果而奋斗。当国民党内的多数党员群众还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时，更必须为坚持和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阵地而斗争。如果国民党不开展土地革命，它必将灭亡。但是，共产党所关注的并不在此，它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国民党这个组织中的影响并使国民党迅速扩大，把它变成一个强大的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变成一个民主革命的即“庶民”革命的组织。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对这种可能性不加利用，实在是愚不可及。

让那些垂头丧气的怀疑派为叛徒们的一时得手而凄惨地哀鸣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知，无论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筑起什么样的堤坝，无论反动的封建势力使用哪种处决的方法，无论外国占

领者使用什么样的大炮轰击中国的城市，中国革命群众苏醒了
的自发力量必定会开辟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乌传豪译)

在危险的转折关头（社论）

（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

中国的事态简直以疯狂的速度在发展着。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断“改变着对人们事物的看法”，使阶级力量的分布日新月异，变化不定，使本已十分尖锐的局势更形严重。事态瞬息万变。

群众运动的冲天巨浪，特别显示出它具有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的兴起正越来越促使反革命的势力结聚到一起。反动势力对革命发动了严重的进攻，使革命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中国革命无疑正处于其历史发展中最紧张、最危急的时期。可以直率地说，中国革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反动派打击中国革命时打的恰恰是中国革命战略上最薄弱的一环——即由一些面目不清、不足信赖，甚至是反动和不讲信义的将领指挥的雇佣军队。自从蒋介石实行血腥镇压，投敌叛变以来，**将领叛变事件**接连发生。紧跟蒋介石之后走上叛变道路的是冯玉祥。冯之后是**冯玉祥系统的军阀**。现在，**唐生智**也成了反革命凶手。也从长沙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出的蛮横无理的电报，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唐生智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把工农运动宣布为“恐怖世界”。他公开为长沙的军官叛乱事件辩护。他**反对**“鼓吹阶级斗争”，**主张**采取镇压工农以开展“救党运动”。他**赞成**反革命，**反对**革命。他同样是投敌变节分子和革命的中国人民的可耻**叛徒**。

伴随军队上层和高中级将领叛变而来的是，**武汉政府内部的**

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武汉阵营内部已有蒋介石分子在暗中活动。蒋介石的爪牙正力图影响军队和政府机构，力图同国民政府中和国民党中与他们社会地位相近的阶层建立联系。他们正向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导人施加压力。他们到处散布惊慌失措和怯懦动摇的情绪，怂恿国民政府投降，拉拢国民政府同蒋介石联合，订立公开的同盟。

武汉政府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它是怎样对叛变将领的行动作出反应的呢？它是否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回击了呢？它是否在捣毁内部反革命进行活动的巢穴呢？他是否在唤起和动员群众和社会底层人民呢？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武汉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这类行动。更有甚者，它还表示“不去妨碍”反革命军阀**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穷人手中的武器。国民政府的核心领导人物不仅为上述行为辩护，而且一再予以认可。它为蒋介石一类叛徒打**掩护**，为将领们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掩饰**。

它以**解除工人武装**的政策代替了**武装工人**的政策。而且十分清楚，既然它今天“不去妨碍”军阀**解除工人的武装**，它明天就不可能去妨碍军阀**枪杀工人**。国民政府这种政策显然背离了革命道路。这是武汉作为革命中心的**自我毁灭**的政策。武汉国民政府日益清楚地暴露出它不愿意或不可能走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呼吁它走的道路。它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它不是赞成开展土地革命，而是主张镇压土地革命。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在这方面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对其进行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认为武汉政府农民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采取的行动是一种错误的行动。谭平山声称：“正确指导农民运动之责”对他已是“力不从心”，故请求准予离职休养。这种撒手不干的策略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对原则问题的解决采取所谓外交手腕和回避态度是什么事

也办不成功的。如果情况果真已发展到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反击企图倒向反革命方面的政府上层人物，无法迫使国民政府上层人物悬崖勒马，改弦易辙，那么，应当采取的态度不是请求恩准外交“休假”，而是要毫不含糊地、公开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的原则问题并寻求其他的革命途径。

毫无疑问，中国的形势是严峻而危险的。但是，即使是现在，如果“看不到”**革命**依然存在极大的希望，那将是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的表现。中国在政治上不会有风平浪静。尽管叛变事件屡见不鲜，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依然到处存在并正向纵深发展。反动势力在进攻，武汉政府上层在反动势力打击下吓得浑身发抖。但是，无论在武汉地区还是武汉地区以外，千百万下层群众的压力是十分强大的。发动进攻的反革命势力无法摆脱对其抱敌视态度的社会后方。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工人运动都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革命的一个组织中心瓦解了。但中国革命将冲破叛变、投敌、动摇和蒋介石、唐生智一伙的屠杀，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马宝华译)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

H·布哈林

中国革命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现在正处于紧急的转折关头。

许多事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蒋介石到唐生智，**将领们正互相勾结**在一起。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的主要军队全都麇集到了南京的剑子手周围。

蒋、冯、阎联合，实际上表明这个营垒已经形成，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冲突与矛盾，李济深的粤军也同这个联盟沆瀣一气、疯狂反对工人和农民。

冯玉祥的声明^①对这个联盟的阶级基础和阶级目的提供了绝妙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武汉地区“商人、店主、企业和土地占有者 (factory and land owner) 受到**工人和农民**的压迫。中国人民(!! ——布哈林注) 不要这种专制主义。甚至前方士兵的家属也遭到迫害，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且许多暴行是打着国民党的名义犯下的……某些**赤色分子**已为自己渗入党内铺平了道路，以便控制(to control) 国民党……”

这就是冯玉祥在向武汉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中提出的理由。

武汉政府的立场是彻底投降的立场。它同南京合流已成为事实。一些人(汪精卫、张发奎)的“动摇”和另一些人(邓演达)的逃跑并未给这一事实增添新的内容。一方面分裂的迹象已清晰

^① 见1927年6月25日《曼彻斯特卫报》。——原作者注

可见，另一方面投靠南京的方针已确定无疑。问题不仅在于局势十分危急，也不仅在于将领们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了武汉政府，只要社会阶级基础稳定，革命立场坚定，个人和集体都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问题**主要**在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被土地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声势吓破了胆。现在只有一种选择，容不得“拐弯抹角”，也来不得“模棱两可”：要么**负起**土地革命的**领导责任**，要么向农民**开枪**。正是这个无比尖锐的问题使武汉紧步冯玉祥一伙的后尘投入了**反革命**营垒。武汉的革命作用也就此告终。

这一点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加紧策划**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毫无疑问，国民党中央必然接受冯玉祥将军这项最后通牒的要求，不仅是由于“恐惧”，而且是出自“内心”。

与此同时，开始了有计划地采取**武力和迫害手段**对付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唐生智在“调查”长沙事变后表示完全赞同枪杀农民的行动。结果倒是农民犯了“错误”，成了罪人。唐生智杀害了四名共产党员，开创了对我党实行恐怖手段的先例。他的部队开始驱散工会，工人赤卫队被解除了武装。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说，驻在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下令把共产党员一律逐出该军部队，自愿留下者必须公开宣布退党，违令者一律枪毙。

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武汉已经瓦解，武汉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作为“革命力量”，作为“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武汉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再存任何希望，尽管它还可能作出某些革命的“姿态”。对无产阶级的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出的结论是：**一刻也不能再留在武汉“政府”之中**。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无比正确的，它十分及时地发出指令，要求共产党员立即退出武汉政府。

退出政府应公诸于世，并以党的名义发表政治声明，说明党

加入政府时所抱的宗旨，揭露武汉的现行政策和它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人运动的行为，揭露它同南京同流合污，对枪杀、迫害群众胆怯地保持沉默和对人民群众怒目以待的恶劣行径。

共产党还应在这个声明中表明自己对**国民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方面应从当前局势中得出何种结论呢？在退出**国民政府**之后是否一定要退出**国民党**呢？

我们的看法是**不必**如此。正如英国“工党”领袖的变节行为绝没有取消英共为争取参加该群众组织而斗争的问题一样，国民党上层的叛变行为同样不能迫使我们全面退出国民党组织。况且中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基层，在地方组织，特别是在那些以工农成份为主的组织中不仅有影响，而且常常起着**领导**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即共产党现在应当转入**地下**。假如中国共产党想成为真正革命的党，想号召群众起来同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结成了自己的阵线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那么，它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地下机构。但是，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同国民党组织全面决裂的做法是十分错误和十分荒谬的。

在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态度应以这些**考验**为依据。共产党人应当呼吁国民党的党员群众起来造他们领袖的反。共产党人应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基层的工作，贯彻自己的行动纲领，坚决谴责“领袖们”的行为；他们应当提出最易为群众接受的要求，并围绕这些要求把国民党的基层团结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筹备**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即使国民党中央作出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这几乎是肯定的），共产党人也应当象英国共产党人在工党中以及在英国职工大会中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进行斗争。

一时一刻也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之中，因为那样就将意味着要对国民政府采取的种种反革命步骤承担责任。

可是，留在国民党内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其**领导机构**的行为负

责，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正是**为了“撤换”这些领导。

不言而喻，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而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一些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因带领群众进行战斗而殉职，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错，某些托派谋士会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路线的正确就在于它能培养出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可是，这种超级指手划脚的超形而上学，是地地道道的自作聪明的表现，其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荒谬绝伦。因为只有从最终结局才能看出“正确的路线”是否培养了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否则，在从外部提供的正确路线与某一国领导昏庸无能之间就永远不会产生矛盾了。只有那些无法理解世界上竟会有人不听其指使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事实是共产国际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以及促使国民党实行民主化。

共产国际日复一日地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越来越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行动不够坚决和所提口号往往失之片面等毛病。

在对**国民党**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就曾指出，如果不采取开展土地革命和组织基层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这种坚定的路线，国民党就不可避免地将变成反革命将领手中的一个可怜的，一钱不值的玩物。

共产国际在其指示中不止一次地、始终如一地指出将领们必然变节，因此必须依靠致力于土地革命的农民击败反革命军官，组织起革命的法庭审判反动军官等等。

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指出阻碍**土地革命**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毫不拖延地发动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占土地**。

共产国际对组织由革命**工人**组成的部队极为重视。它在指示

中明确地提出要动员一大批共产党员去专门组建若干个由工人组成的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个别代表人物的路线受到了国际极为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警告说，如果中共不改变这一方针转而果敢地开展工农革命，共产国际就不会停止在报刊上对它的公开批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翻阅共产国际先后发出的指示从文件上得到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不承认这些事实可以有各种理由，但决不是出于客观分析事实的愿望。

反对派的那些不诚实的政治家们后来又说什么“布哈林的指示**根本不对头**，所以贯彻不下去。得到贯彻的指令则恰恰不能对预定予以支持的阶级有作用。”这些不诚实的政治家简直是为那些抵制执行共产国际的革命性决议的行为开脱责任。只有丧失了起码的品德，变成闭眼不看事实的恶毒中伤者，才会写出并散布这类玩意儿的。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经受住“火的洗礼”。应当毫不加掩饰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垮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把对北京的军事行动与革命的内部问题对立起来，始终阻挠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它提出的革命公式大致是：“把注意力都转到对外的统一反帝斗争上去”，似乎“施魔法”“念咒语”便能使阶级矛盾停止发展，那就等于把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进程拉向后退，好象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为夺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而斗争，而是为反对这种斗争而斗争！

陈独秀的态度和公式是“先打北京，以后……以后再看”；“长于发表自由主义言论”的谭平山的“离职修养”声明，是一份可怜的、胆小鬼的准（quasi）宣言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投票表决**反对**共产国际决议（6月26日），把它斥之为“不切实际的”决议；此外，不但没有对武汉的反动派组织**反击**，实际上还

帮了它的忙（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自愿交出了武器）。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也存在**社会民主党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党内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是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样便于他们更加脱离群众，从旁边搞玩弄手腕的政客活动。

与此相反，共青团中央在这紧要关头却无保留地赞成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决定，并作出决议，反对中共中央的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它在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和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等问题上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由此必须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得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结论）：

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说因为整个党还很年轻，所以党的领导人物存在这种无能为力的糊涂想法，那当然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原谅”也有一个限度。共青团并不比中共中央年纪大，然而它却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正因为党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所以不能不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从中央的行为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向全体党员发出呼吁，要求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尽管在当前情况下这样做是多么困难。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向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极其艰巨而且十分复杂的任务。

现在，阶级斗争的壁垒已经泾渭分明，其格局如下：

以“独裁者”大帅张作霖为首的**封建暴徒**；

以蒋介石为首的“进步”将领的**自由资产阶级联盟**；

倾向于资产阶级而目前尚举足未定的武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

以及**奋起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

如果热衷于同“俄国”进行类比，那末可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四类人，即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可是，说中国的各个阶级集团可以找到“俄国”当时相应的阶级集团相对比，这只是就其**阶级特性**而言。这种历史类比归根结蒂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同是这几个阶级，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仍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尽管这些“斗士”同时在屠杀工农。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几乎已同自由资产阶级**同流，但尚未完全合污，不过，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农民**的斗争中，这三个社会集团正采取着**并行不悖**的行动，并在对共产党采取共同的政治“手法”的基础上日益相互接近。四面八方都在朝共产党开枪。在此种情况下尖锐地批评一个正在遭到那些欲将其置于死地的敌人的疯狂杀戮的兄弟党，不是十分令人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当对国民党上层予以信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执行信任国民党上层的政策，那末必将使一批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因而牺牲，党的全部骨干力量都有可能被一网打尽。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对这一点都必须毫不含糊地认识清楚。

已经牢固控制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代表中央政府的势力，它虽然还在反对帝国主义，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已是反革命了，它必将对无产阶级政党猛烈开火。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无产阶级应当给予回击，方法是在实行**工农和城市贫民专政**的口号和其它相应的口号之下，把群众团结起来。

革命在**城市中**实行何种**经济纲领**问题，是讨论得比较少的问题之一。而且，如果对情况深入考察一下的话，可以看到，武汉

的激进派政府即使在其极盛时期，在**经济上**并没有坚实有力的后盾。当它还允许和容忍工人运动并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时候，工农群众是在前进。大资产阶级逃跑了。工厂关闭了。银行也关了门。来自资本家方面的怠工破坏活动十分严重。“经济命脉”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而武汉的激进分子却不敢前去占领这些部门。可是这些部门对整个经济有着不小的关系。这样一来出现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武汉并未考虑过实行任何一种共产主义，也不具备任何“军事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可是却存在着许许多多“军事共产主义”的严重缺点。换句话说，由于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立场，结果在经济上几乎失去了一切立足点。

工农专政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经济命脉各部门的所有主破坏生产，便将这些部门**收归国有**。这个决定是唯一正确的决定。这项决定本身将为大大加强在**工人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创造条件。从另一方面讲，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将获得大得多的经济力量。武汉政府时期存在的那种根本性矛盾将不复存在。

下层人民的联盟，即工农联盟先于一切——这就是共产党当前的口号。

革命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前途**呢？这样的**联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敌人的军队很少溃散，它在战场上也都相当稳定，原因何在呢？

这里有必要再一次说明，**所有的**军队无一例外都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雇佣军队，这些人大部分早就脱离了生产过程。对他们来说，当兵就是**职业**。他们领取薪饷。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薪饷首先是来自农民。这些人往往同城市贫民和农村都无多大联系。谁给钱就为谁效劳。当然，决不能把这一切都看得过于绝对和过于简单。但是，即使了解并承认这种种情况，仍应得出一个结论，在这里革命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然而，不应忘记**主流**，这就是城乡下层人民波澜壮阔的运动。各方面的报道都说明，尽管上海的恐怖活动极为猖獗，工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准备参加新的战斗。广州也施展了种种手段，从金钱收买到各种酷刑，样样俱全。可是，在工人阶级的一些关键性组织中仍然有共产党员巍然屹立。农村中到处都在捕杀农会领导人。可是，农民运动仍然此伏彼起。资产阶级报刊怀着惊恐的心情报导着这一运动。例如：伦敦《泰晤士报》^①在向读者报导冯玉祥占领地区的情况时写道：

“红枪会”运动的规模十分惊人。据估计，其武装人员数量达二十五万之众……“红枪会”发展很快，而且渗入了许多共产党的宣传人员，这些人不断完善“红枪会”的组织，宣传共产主义，并且一开始就成功地（！！）将他们谋划的自卫队组织逐步变成摧毁私有制和反抗任何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对付“红枪会”，它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危险。

“尊敬的”《泰晤士报》当然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它的中国代理人，想促使其加紧进行血腥镇压。《泰晤士报》当然是在夸大“危险性”，并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摧毁私有制”。不过，如果农民已经被打垮了的话，那末“道貌岸然”的敌人也许就要唱出别的什么调子，炮制出另外一类报导了。

这是**事物的主观阶级因素**方面。

客观方面如何呢？客观方面在于自由资产阶级未必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社会危机。所谓的“革命的客观任务”在于使中国工业获得市场，而在农民走向赤贫化的情况下无法获得这种市场。要创造这种市场是可以的，但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重新

① 1927年6月23日《泰晤士报》。——原作者注

分配土地，二是逐步清除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可是，社会关系又如此的错综复杂，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第一项任务，即土地革命的任务。它也无法解决**第二项**任务。因为在反对本国工人、农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和考验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客观基础。

这绝不是说工人和农民是注定要成功的。

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平民革命有极大的成功可能。

问题实际上将通过斗争，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解决。中国共产党现在就要为这一目标，为工人和农民夺取胜利而工作。

*

*

*

现在，让我们稍微作一些回顾。

看看我们反对派的领袖们就武汉事件写了些什么吧！他们写道：

“……把赌注下在武汉政府身上，把它当成‘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方针，对中国革命来说已经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我们党的领导在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孟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的典型尝试（7月7日的声明）。”

这就是说，以武汉为“组织中心”的方针所以垮台，是因为这种方针是孟什维克的方针，而且是典型的孟什维克方针。

再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英雄们的另一个杰作，也就是他们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后来由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同志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今年5月末）的决议草案。在题为“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这一节中有一段话：

“必须给武汉以最强有力的全面支援，并从那里组织对卡芬

雅克们^①进行反击。近期内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地协助武汉政府做好组织和巩固工作”。

当然，下面还接着谈到清除不可靠分子等等。但这些在共产国际的历次指示中都谈到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尊敬的反对派批评家们可曾把“赌注”下在武汉政府身上没有呢？他们有没有把武汉政府当作组织中心呢？他们是否建议给武汉政府以全面支援呢？

只要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到，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多么的拙劣，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的**不诚实**。既然支持武汉政府这一点本身就是孟什维主义，那么这些人又怎么会有那么大勇气这么快就忘却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

我们再往下看。就在这同一个声明中，反对派就武汉事件得出了下面这样一个结论：

“事情不单单涉及中国革命的命运，而且关系到苏联的命运，因为战争的危险正因汉口事件而日益临近，并且异常地尖锐起来，对这一点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这讲得很好。可是，既然武汉政府原来就同南京政府等并无任何区别，那么，它改变政策又怎能使“战争危险”“异常地”日益临近呢？

最后还有一点，既然原来就不该下“赌注”等等，那么为什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不提出退出政府的建议呢？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加入政府的明显“孟什维克”策略又为什么不进行谴责呢？

只要稍稍“触及”这些问题，就足以看清，我们党的“救星们”对我们在中国的政策的根本性问题是多么糊里糊涂，多么束手无策。

① 卡芬雅克——法国将军，曾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1848年的六月起义。
此处泛指屠杀革命的刽子手。——编译者注

有必要在以后什么时候把我们反对派首领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言论作一番归纳，看一看在我们的反对派的“思想宝库”中各种极端对立的论点、“路线”、“策略”、“战略”口号等等是如何离奇古怪地交织在一起的。**拉狄克**说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季诺维也夫**则说中国的封建主义相当发达；在**托洛茨基**看来，资产阶级在中国从未发挥过革命的作用，而**拉狄克**认为资产阶级曾是“工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提议必须千方百计支持武汉政府，**托洛茨基**（在同一时期）则认为不存在什么武汉，但又必须毫不拖延地另组织一个与其对抗的政权中心。**拉狄克**本人一方面建议要到国民党政府中做事，同时又认为必须退出国民党。**阿尔斯基**疯狂地攻击党（当时）支持国民党的路线，同时却又专为国民党著书立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是“随心所欲”。

毫不奇怪，有了花色品种如此繁多的“杂货铺”，不管生活中发生何种情况，随时都可以找到“证据”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条拙劣可怜的、折衷主义的、毫无原则的“路线”。

反对派“批评家”一拥而上，攻击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目的还是想“证明”他们是多么正确，而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等等。

以托洛茨基为主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本冗长巨著的作者们在引证我说的关于自由资产阶级目前在军事和政治上还占有优势的话时“揶揄”道：

“到底是谁帮助反革命的自由派在军事上占了优势呢？是谁鼓动别人去信任蒋介石的呢？是谁要求共产党人实际听令于蒋介石的呢？又是谁支持了冯玉祥并为他大吹大擂的呢”等等。他们还问：

“是谁用这种传统（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布哈林注）去武装自由派的呢？又是谁专门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在四个阶级联盟

的支持下完成民族革命的抽象理论的呢”？……等等。

“布哈林该再去照一照镜子”，而且不要“脸歪怪镜子”。

我看有托洛斯基的生花妙笔写出的这几段绝妙文字也就足够了。“阿尔卡季”讲得“美极了”，只可惜无多大奥妙，玩的是作了暗记的纸牌游戏。

我先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再进行一些概括。

我们先从“四个阶级的联盟”说起。反对派使马尔丁诺夫十分难堪，把他搬出来说成是创造这一理论的鼻祖，恶毒地攻击中央委员会是搞孟什维主义。

事实究竟如何呢？

1927年3月15日，拉狄克同志在描述中国事态发展总形势后说：

“广州政府利用这一会给各军阀之间造成分裂的局势，决定进行北伐。这次北伐使**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盟**在中国那些对资本主义有决定性意义的省份这样一个大舞台上经受考验。”^①（着重号系拉狄克本人所加）

不错，这儿没有提到“四”字。但是，我想，反对派也会懂得，这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因为扳开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拉狄克同志讲的联盟中刚好是四个阶级。不过，马尔丁诺夫与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点区别。这区别就在于马尔丁诺夫说联盟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而拉狄克说……

拉狄克是这样给广州政府的性质下定义的：

“上海事件（指1925年“五卅”惨案，拉狄克曾著文纪念这一惨案一周年——布哈林注）加强了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即广州政府”。^②

① 拉狄克：《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载1927年3月15日《消息报》。

——原作者注

② 米夫：《上海事件的教训》。拉狄克同志的序见该书第4页。——原作者注。

可见，拉狄克说过“四个阶级的联盟”，这是确有其事的。不过，马尔丁诺夫指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拉狄克则事先就把这个联盟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这些人干了这么些勾当后还竟敢到处指手划脚！！！！

可能有人感到兴趣，究竟是谁支持并吹捧冯玉祥的？也许你们在这儿也想照一照“镜子”？

好吧，那请便。看看拉狄克这位反对派中的中国问题主角在谈到1923年事件时是怎样写的吧：

“当时民族运动有**两个全国性中心**，整个运动都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形成。第一个中心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另一个中心是**北方的冯玉祥将军的军队**”。①

可见，是拉狄克同志把冯玉祥同孙中山相提并论的，而对孙中山的革命贡献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也许是中央委员会建议不要吓跑了资产阶级，并且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策略的重点？

不妨再以拉狄克同志一本著作为例，该书第159页有这样一段话：

“**广州政府的政策应当尽可能做到不要过早地采取步骤把资产阶级各阶层赶跑**，与此同时，广州政府不能不懂得，对它威胁最大的主要危险是工农群众对广州政府漠不关心的（且不说是敌对的）态度”。

而这是1927年2月他写下的话！

这些就是例证。现在我们再来综合地谈一谈总的问题。

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分歧有哪些呢？

第一，反对派**不诚实**地否认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时谁也不反对**支持广州政府，支持冯玉祥和其他人。可**现在**反对派装做

① 拉狄克：《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时代》第3册第149页。

——原作者注

当时它不曾参与其事。

第二，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曾认为在**一定阶段**上同那些虽与无产阶级处于阶级对立地位但却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结成联盟**，在策略上是适当的。在这一时期，反对派理论家们则迷失了方向，不止一次地过度赞扬资产阶级（试比较一下拉狄克对资产阶级的吹捧，他给资产阶级戴上了无产阶级的桂冠）。

第三，不妨把反对派这种“把戏”暂搁一边，只当它不存在。那样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如今**反对派可真看出了中央委员会策略的原罪在于，中央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可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根据列宁的思想则似乎**根本**不允许这样做的。无论托洛茨基（出名的列宁主义大师），还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其他人等，都说这种策略违反了列宁关于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的学说。而且他们还引证有关布尔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的论述为例。众所周知，**孟什维克**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盟，而**布尔什维克**则持反对态度。

如果中国是俄国的话，这个论据是能说服人的。“批评家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混为一谈，把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同这一政策的客体混为一谈。

其实关于东方，列宁曾写过下面一段话：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

与**真正**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资产阶级势力结成联盟，对此过去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现在却遭到了非议。

与此同时，列宁精辟地指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这种联盟和同盟，他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也属于这种资产阶级”。①

共产国际就是照此行事的。当“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尚符合这些条件时，我们便支持它。当它不再符合这些条件时，我们猛烈地反对它。起初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的是这个办法，**现在**对国民党**左派上层分子**也是采用这个办法。

我们最终赢得了什么呢？

我们在团结群众力量方面，即革命的最有权威的“论据”方面赢得了胜利。

不错，**托洛茨基**同志至今仍然否认明显的事实。例如，他对北伐的结果作了如下的描述：

“北伐的后果是加强了资产阶级而削弱了工人阶级。”②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会更相信反对派的“中国通”拉狄克同志，他写道：

“农民组织起来同地主及其武装民团进行斗争，同土豪劣绅，即地主势力在农村的代表进行斗争，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和农军，这就是**北伐最主要的成果**。”③

反对派手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说我们老是跟在事态发展的后面“磨蹭”，总是迟迟才按照反对派的指点行事。

但是，这个论据只能令人发笑。因为它是“来自托洛茨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编译者注

② 因手头无俄文译本，故译自德文。——原作者注

③ 拉狄克：《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原作者注

的论据。

托洛茨基同志对列宁就曾这样想过，他认为列宁 1917 年才“改变观点”，而托洛茨基老早就预见到了世界上的一切。全党都十分清楚，反对派中这些大吹大擂的现代毕非亚^①指出的“有说服力的”论据究竟值几文钱。

（苏华、文吟译，马宝华校）

^① 毕非亚是古希腊阿波罗神殿女祭司，以后作为对预言家的带讽刺性的称呼。——编译者注

中共领导为何失败？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T · 曼达梁

中国大资产阶级已公开投入反革命阵营，开始镇压工农运动。北方的农村资产阶级（冯玉祥）和湖南的官僚资产阶级都被它拉了过去。武汉政府内部爆发了种种冲突。在中国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心城市纷纷落入资产阶级反革命之手。在此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表现出不能胜任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它充当了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尾巴，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国反对派的头头们说：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是它们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上了孟什维克的道路。

让我们看一看事实究竟如何。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认真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对斗争中的阶级力量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全会除其他各项任务外，给中共提出了四项基本任务。**第一项任务是给国民党打下群众基础**，把它变成“真正的人民的党，成为坚决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牢固的革命联盟”……**第二项任务是无论如何要把广州军队争取过来**，不让资产阶级分子在其中扎根。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项任务是参加革命政府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以便“利用国民革命政府这个实际上最便于接近农民的机构。共产党人及其革命盟友

的任务是：渗入到新政府机构中去，使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得到实际的体现。办法是通过国家机构**没收土地**，减轻赋税并给农会以实际支持……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派反对右派软弱动摇的政策。”

共产国际认为**第四项**任务是**开展农民斗争**。它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将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害怕资本家一个阶层不肯坚决地、可靠地合作，便放弃将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民族解放运动纲领的重要位置上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应当不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右倾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这一“机会主义”决议了呢？是的，他们接受了。但只是在形式上，而且是经过了两个月的顽固抵制后才接受的。他们对决议中提出的所有四点指示均有保留。他们对参加政府和大规模地把工农输送到军队中去均持反对态度，也不同意把国民党变为群众性政党，不同意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问题策略的分析。他们把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几乎搁置到了月初还不向本党传达。那时，右倾分子虽还未敢公开反对共产国际，但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想用表面上接受决议的办法欺骗共产国际和自己的党。只有党的少数领导人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坚决而无条件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全会的决议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力量在思想政治上赖以团结自己和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基础。这是第一件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在2月末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就曾痛斥蒋介石的一次讲话，指出它是“背叛和分裂革命、从背后射向革命的一支暗箭”。3月3日，联共（布）中央在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提醒中共谨防出机会主

义的错误。信件指出：“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不断集结，中国革命现时正处于危急时期，只有**采取坚定不移的掀起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必须采取**武装工农**，把各地农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具有武装自卫能力的政权机构**的方针。共产党不应当给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动政策**涂脂抹粉，而应当把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去揭露右派”。信件接着指出，无论如何必须全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把国民党变成群众性的经过选举产生并有内部纪律的组织；将工农分子输送到国民党中去；撤换国民革命军中的**右派将领**并以左派和共产党人取代他们。

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一信件时，表面上只是不同意其中的一点，即必须把产业工人大量输送到国民党中去（关于这“一小点”的意义，我们下面再讲）。但是，在表面上接受联共中央提出的总路线的同时，中共中央实际上采取了对整个路线阳奉阴违的态度。同一天（即占领上海的第一天）他们拒不接受派工人加入左派军队以武装工人的建议。直到4月11日，即到蒋介石政变前夜为止的二十天内，中共中央始终反对武装工人，致使左派手中掌握的五千条枪悉数落入蒋介石之手。虽然作出了派遣几千名工人和共产党员去军队的决定，可是，直到蒋介石发动政变前，没有一名共产党员或工人被派往军队。而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在十二月扩大全会上便已指出，争取军队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斗争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第三个事实是，3月31日，当资产阶级政变已迫在眉睫的时候，共产国际曾发出指示：要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策划中的政变和反对右派，但暂时不要进行公开的战斗（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已极为不利），**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时就把武器隐藏起来**。可是中共领导是怎样做的呢？它没有作出反击的准备，它力图把历史进程扭向倒转，想通过个人关系去影响国民党右

派，如此等等。尽管中共领导比谁都清楚，政变已不可避免，可是，它却并未作任何**退却**的准备。4月11、12日来到了。工人却被解除武装。在此之后，那些昨天还同资产阶级抱成一团的党内右倾分子才决定要“斗争到底”，可此时力量对比已经是一比一百了。党的领导人已不再相信群众，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于是提出要孤注一掷，要“砰的一记关上大门”，声明**“我们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蒋介石已堕落到何等地步！”**他们在一份告工人书中写道，“死于北伐军士兵之手要比死于北洋军阀之手光荣！”只是由于**共青团**省委的有力干预，才防止发生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动，使上海的革命无产阶级避免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蒋介石政变之后，中共（已在武汉）是如何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中共党内的右倾分子已从阳奉阴违发展到公开抵制，发展到与共产党的传统决裂的地步。

历史记载的事实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此相反，正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那些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在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国际指示有计划的、有时是经过巧妙伪装的抵制行为是否出于偶然的呢？不，绝对不是。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他们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去理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任务和目的。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应俱全，理论一片混乱，策略摇摆不定，这一切合在一起，便把党拉向右转，拖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三月初就共产国际决议发出的附函中，右倾分子表示：我们以往的错误在于，我们想一口气把两个革命一个接一个地在中国完成，而共产国际看来认为只应当搞一

个革命。右倾分子用左的词藻掩盖自己这一机会主义观点，他们的“理论家”之一彭述之，一位善于使用左的言词的能手，就曾说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应当全力以赴地领导国民革命，把它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则应当同时准备在将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信誓旦旦地说，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是谁也不能提出异议的（那为何他还需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呢——谁也不清楚）。抛弃这些有关无产阶级生来就拥有领导权的空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实质上把这场革命看成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并把政权交到资产阶级手中的革命。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对中国是否存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那么这场革命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中国的右倾分子回答是针对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可是他们对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封建地主却讳莫如深。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无农民之参与，革命很难获胜”。“很难”还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有人要党相信，革命（什么革命！反对谁的革命！）即使没有农民也可以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而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中土地问题这一核心问题不知何处去了。**一九二六年，当农民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从广东发展到湖北之时，彭述之感到迷惑不解：**“难道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

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些象拉狄克同志的观点呢？

在土地革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阶层的时候，若让农民去参加譬如说那种“反关税”的革命，自然是既不必要也不恰当的。农民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这一点不满意，它力图说服农民不要去触动地主，因为地主也有好有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其“反关税”的革命总方针出发，得出了自认为正确的结论。既然革命斗争的主要打击对象

不是地主阶级，那么农民运动只能是对革命的一种干扰。于是便想施什么魔法控制和影响排山倒海而来的农民起义。共产国际曾告诉中共：“**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而中共中央至今仍在推行这一政策，不肯放弃其危害革命、危害党的路线。

这样一来，农民就好象退出了革命阵线。那么这个阵线中还剩下了谁呢？还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且看党的理论家彭述之是怎样进一步简化这个公式的吧：中国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幻影，而小资产阶级是必然跟无产阶级跑的，无产阶级则“天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既是一个幻影，所以无力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在2月15日上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道：“买办资产阶级不一定是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一定都革命。买办阶级亦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亦有绝对反革命的。”

党的领导为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但把农民撇到一边，而且把小资产阶级也撇开了。这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之日起^①，右倾分子一直想退出国民党。他们在口头上说的是不愿让同资产阶级的交往“玷污”无产阶级，而实际上他们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原因在于，退出国民党才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最好形势。党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曾说过：“我们极象小孩子似的和当时的左派赌气，站在旁边批评别人以保持所谓‘独立’而不积极领导左派，形成左派群众。”对国民党的怀疑态度反映出他们藐视小资产阶级，只希望同大资产阶级打交道。难怪一位国民党左派人士柳亚子说，共产党就象一个把孩子（国民党左派）放在地上不管而去（向国民党右派）讨

^① 原文如此。事实上共产党并没有参加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编译者注

食吃的奶娘。

党的北方委员会在1926年初就国民党问题发表的言论详尽无遗地反映了党内右翼的路线，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在经过我党一段时期的领导之后，现在早该是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独立活动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必为国民党扩大组织，我们自己也不应当再在国民党机构中工作，我们不当把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中去，更不当幻想在国民党内树立什么纯左派思想。**”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党放弃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放弃同大资产阶级争夺对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影响的斗争，使城市贫民、农民以及国民党去受“纯右派思想”的影响；放弃一切控制和掌握国民党这个享有极大影响的组织的尝试，一句话，就是放弃对国民党进行革命化的改造。这样一来，共产党便自愿将国民党拱手让给自由资产阶级，向戴季陶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右派投降。

由此可见，我们的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在中共机会主义分子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军。

如果这也称作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那么还到哪儿去找孟什维主义呢？

由于共产国际施加了压力，中共才勉强承认有必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党之所以能掌握群众运动，党和工农组织之所以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把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阵地统统交给资产阶级。

中共中央一直坚持不愿将国民党变为群众性组织，并禁止工人大批加入国民党。在接到共产国际就此问题发出的第二个指示后，陈独秀在3月23日还说：“我们不想让工人参加国民党，因为那样他们将会受右派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把加入国民党看成是等于投降，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才是**向右派的要求投降**，才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跟着资产阶级转。各地工人自发

地成批加入国民党，以便把右派赶出去，而党的领导反而禁止他们的这种行动。很明显，一只脚站在国民党外是不可能去动员群众同右派斗争的，要想把军队争取过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结果是不搞国民党的群众化，而搞上层交易，靠利用各将领之间的“矛盾”和上海资产阶级亲日派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并以维持统一战线为名遏制工农运动的开展。

今天，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陈独秀终于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要求。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他们对加入**革命政府**问题的看法也同对国民党问题的看法一样。事实上既然党的领导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而力图悄悄退出国民党，那它自然就不愿意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政权机构了。而且这条归根结蒂属于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用华丽的革命词藻掩盖着的。江西省有一批当地共产党员当上了县级官员，中共中央竟写信给省委说：“这些同志将会脱离群众，我们党将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因此，他们必须辞去职务，或是退出共产党。”

这是使农民协会失去上层支持的行为，是事先就放弃对政权施加影响的机会，是以保持“原则的纯洁性”的虚伪口号为借口解除农民的武装！资产阶级便利用共产党的这种“独立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收缴武器，设置**自己的**机构并把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2月间，武汉与南昌，即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中共中央对这次争执保持“中立”，说什么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执，与我们无关。汉口的党组织和工人主动支持左派同蒋介石斗争，而中央委员会却不愿“卷入”到这场是非中去。

只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才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但结果这些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不是为了同右派作斗争，而是起了掩盖右派政策的作用。中共党内的右倾分子开始不

参加政府，想背着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参加政府后，他们仍然不顾群众的压力，顽固地抵制同右派的背叛行为及国民党左翼领袖的动摇倾向作斗争。

党的领导对**军队**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共中央在1924年还坚持“断然拒绝采取军事行动”的观点。到1926年实行北伐时，中共中央仍与我们的反对派一样，不理解同北洋军阀进行战争的伟大革命意义，不理解北伐虽是民族资产阶级为夺取革命领导权而发动的，但它客观上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党内的右倾分子对南方革命军抱有很大的怀疑，不止一次地声称，这些军队实质上同一般的军阀部队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他们把军队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而不作任何争取军队的尝试。**从二次革命论观点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党的领导**拒绝**在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支部**，**拒绝**将工人输送到军队中去。当上海提出这一问题时，党内右倾分子却说：**为何将工人送去当兵，要知道那是去给资产阶级充当炮灰。我们最好还是建立工人赤卫队。工人将会参加赤卫队，而不应当兵。**右倾分子就是这样掩盖自己不愿为争取军队而斗争的行为的。工人赤卫队归共产党管，军队（连同武器）归资产阶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造成了什么后果。这种策略为蒋介石的政变提供了方便。**如果不是如此卑鄙地抵制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不能完全制止这次政变，至少也可以把它局限在东南地区。**

中共领导所做的一切使无产阶级和党孤立于其它劳动阶级之外，把它们都交给了资产阶级。在上海期间，中共领导突出工人赤卫队，使其与军队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双重政权。但这不是经过民选的双重政权，不是国民党左派支持的与蒋介石军事独裁相对立的具有广泛民主组织的双重政权，因为资产阶级一直抵制这种民选大会，共产党人也不愿意让它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政策下产生的双重政权是以工人赤卫队和上海工会（非常独特的、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军队对立的工人政府）为基础的，小

资产阶级和农民（其中包括一部分穿军装的农民）则持中立态度，中国的资本家也十分圆滑地保持中立，共产党员则……勉强地参加进去的。

蒋介石改变后，看来连最没有经验的年轻共产党员也该懂得共产国际“当兵去！”的口号了，可是中共中央不仅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公开拒绝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从而为武汉反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不妨引用瞿秋白同志在蒋介石改变前一个月即3月初写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来进行归纳。他在谈对党中央的策略时说：

“……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阱’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

瞿秋白同志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思想之雏形。”

*

*

*

中国共产党这个年轻的党，它的党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以奋不顾身的忘我精神进行斗争的。对于这个党领导层中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表现，共产国际一直采取公开宣布其事实的态度。我国的反对派便利用这一点，乘中国革命之危，攻击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他们的中国政治伙伴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一古脑儿推到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头上。

只有那种找不到其他出路的人才会在党内斗争中采取这种手段。

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从远处去指导一个党的策略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连获得情报这样的问题往往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一点反对派是十分清楚的。恐怕谁也不敢夸口在中国问题上绝对不会在判断、阐述和评论方面出现任何差错。但对我

们党来说，最基本的一点是，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的是**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的则是一条直到最近还用**极左词藻**掩盖起来的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反对派的观点极其相似，这并非偶然。譬如：否认中国革命的土地革命性质；不正确地评价中国资产阶级；轻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作用；忽视国民党左派；要求退出国民党；拒绝把国民党变为群众性组织；对革命政府采取抵制态度；不去争取对革命政府的控制；对北伐采取怀疑和批判态度；放弃争取军队的工作（说什么军阀部队可解散而不可争取）；以孟什维克的观点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等等。

问题当然不在于“组织上的联系”。反对派好象绝未与中共右派领导人发生过联系，而且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是**最近几个月**才匆匆忙忙炮制出笼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反对派在政治上同共产国际又一个支部中的机会主义是沆瀣一气的。这一点不能不使反对派的支持者（这种人当然是有的）认真地思考一番。

中共中央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运动，始终抱住“汪蒋破裂就是革命的毁灭”的公式不放。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也就失败了，似乎从这个观点就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和他们同唱一个调子，叫喊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我们的看法则是，即使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离开了党，中国革命也不会就此完结。失败是事实，失败也是惨重的，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个党已拥有年轻的精力充沛的革命领导骨干，这些革命领导人没有那种不求甚解的学究作风和绅士派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是一定能够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一切必要的教训的。

（马宝华译）

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社论）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中国革命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每日每时都暴露出新的矛盾，出现阶级斗争新的激化。汇集了民族解放运动各类分子的唯一重要组织国民党，在最近四、五个月期间走过了它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几个阶段，眼看其社会成分和组织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考虑中国革命发展中不同**阶段的更迭**，不考虑这些阶段的**不同特点**。没有比这种错误更严重、更不符合辩证法的了。阶段的更迭要求无条件地改变“口号”，要求**转变策略**，不仅要认准“远大目标”，还要善于随时随刻按列宁主义原则发现此时此刻应抓住的**当前首要“环节”**，以便下一步能收到带动“全局”的效果。这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到今年春天之前为止，国民党总的来说一直领导并进行着反对张作霖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帝国主义分子的民族解放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上海政变之后，国民党发生了分裂，失去工人支持并拜倒在帝国主义者跟前的极右派已从国民党分离出去。国民党已经一分为二，而且左派国民党政府——武汉政府已宣布蒋介石为叛徒。

蒋介石从左派国民党中拉出去的并非**全部**资产阶级。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新的叛变革命的事件，不过现在都发生在“国民党左派”内部，冯玉祥，唐生智，以至国民党中央本身，也把斗争的主要战线转向左边反对起工人和农民来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仅企图而且已“正式宣布”将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今天的电讯报道，国民党中央头目们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的反动时期业已开始。资产阶级“领袖们”力图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的目的是企图单独控制工农群众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坚决回击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共产党员在其中尚有影响的正直的国民党组织应当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员应当主要依靠国民党中的工农分子，依靠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去反对已明显暴露其资产阶级面目的领导人。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坚决斗争定会给共产党带来重大的成果。

我们尚不清楚，电讯中关于“革命组织”领导人中存在“情绪低沉”的话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情况，它指的又是谁。至少在共产党领导人中不应当存在任何“情绪低沉”的表现。国民党中**有**能够与资本主义走狗的“骗人勾当”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工农群众。在同国民党中央进行斗争中，共产党还可以把以邓演达、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等为首的真正左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产党可以联合这批反对将共产党排挤出国民党的人士一道前进。

当然，不能排除，而且极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前景：即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领导机构的活动和反抗，把左派国民党改造成成为工农革命组织的道路终于被堵死。正因为有出现这种前途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党外**的群众组织中，如共产党一直享有巨大影响的工会和农会中开展最强有力的工作。不管国民党当前的危机出现何种结局，革命的发展一定要走国民党内工农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同这些工农组织相结合的道路。

迄今为止，中国革命的进程尚未将俄国和一系列欧洲国家工农群众本身在革命年代通过创造性的组织活动建立起来的群众性组织——苏维埃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上**，资

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它曾是革命的阶级。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独特性质，那里建立的不是苏维埃，而是既有工农又有资产阶级参加的组织国民党。在这个阶段上，试图通过“宣布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强行建立苏维埃”，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是不适当的。共产党当时的活动只能限于加强其他的群众组织——工会和农会，在这些组织中造成可依靠的力量，以便影响国民党并进行反对国民党内革命不坚定的分子的斗争。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作用已成为过去。阶级矛盾在国民党内也已表面化。**争取**国民党的斗争结局如何，尚未得出最后答案。但是，国民党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共产党员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把它们作为劳动群众的机关与资产阶级的组织相抗衡。即使争取国民党的斗争获得良好结局，也不能排除国民党组织本身有发展为苏维埃的前途，所以我们就应该立即在中国宣传这种思想。

革命的急剧转折往往要求我们迅速地改变口号。当然会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认为干革命只要一开始认准“远大目标”就行了。我们也清楚，在中国革命当前的转折关头，必定会出现一些乐于搞政治投机的人。这些人，请注意，正是“早先”曾要求“建立”苏维埃的那些人。而他们的错误恰恰在于他们是在“早先”，在革命的另一阶段，在**应该讲**和可以讲这种话之前讲了这些话。

然而，这将是可怜的小本经营。因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最早”拥护者就曾力图采用简单地“宣布”新口号的办法去代替争取群众，争取**国民党内**工农分子的斗争，他们曾号召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他们想迫使群众“跳越”那些尚未被群众运动证明已经过去的阶段。

所以，以谁最先讲了“开始！”来进行投机是不会给投机者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好处的。

中国革命正在翻越与其命运攸关的险崖。国民党正经历**决定其命运的**危机时期。在此时刻采取正确的路线，不受惊慌失措和犹豫动摇情绪的影响，就要确保共产党能继续保持并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这些群众的利益、斗争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事业。

（马宝华译）

论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B·阿斯特罗夫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没有列入这场革命的议程之内。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其直接任务是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这种一般性的提法不仅是我们党和反对派所承认的，连孟什维克也是承认的。但是，只要稍微越出这一提法的范畴，便会出现严重的分歧，使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泾渭分明。

孟什维主义的口袋里装着实行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现成“处方”，那便是把领导权全部彻底地拱手交到**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革命就要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在其领导下进行并最后完成，这就是孟什维主义陈腐不堪的信条。

我们在一部分现在还是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彭述之身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十分典型的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和错误。

共产国际多次强调，**特别是从1926年12月起**多次强调指出，必须把资产阶级从国民党和南方政府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可是由陈、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拒不执行共产国际上述有关指示。这些右倾的同志不惜牺牲农民运动以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抵制武装工人的工作，不去扩大工人和共产党员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影响，对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分子也不作

应有的斗争。正是他们这些右倾分子要求退出国民党，从而放弃了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国民党内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的斗争（如陈独秀）。正是他们，这些右倾分子实际上站到了拉狄克同志否定中国革命具有反封建性质的立场一边。彭述之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难道中国的革命是农民革命吗？”

把这些错误归罪于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这是反对派的恶毒中伤和**无耻诽谤**。T·曼达梁同志的文章（载7月16日《真理报》第159号，题为“中共领导为何垮台？”）提到了我们所列举的上述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该文**指出**犯上述错误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违背了共产国际1926年12月、1927年2月和3月发出的各项指示，明显地，甚至是**有意识**地对抗这些指示（中共中央曾公开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曾作过尖锐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内右倾的实质表现在把“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理解为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并放弃**争取无产阶级**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的斗争。

这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投降。不过这种投降还是比较公开的，对谁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的情况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稍有了解的人对此都不会产生疑问。

而对那些以“左”的词藻和“左”的口号掩盖起来的投降行为则必须与之进行斗争。我们的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就是这种投降主义的行为。

当陈独秀、彭述之和其他一些人为奉行被其错误理解并盲目崇拜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路线而牺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在其递交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提出的主要“指责”就是：

“对中国革命的正式指导始终（？）贯彻着一条‘**全民族统**

‘**一战线**’或‘**四个阶级联盟**’（指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

“用始终”这个字眼显然是故意歪曲事实。众所周知，1927年4月后，即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没有谁提过，也不可能再提“四个阶级”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早就预见到这个“**战线**”会破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作好应付这种破裂的准备。

可见，托洛茨基提出的“指责”其“思想”内容不过是否定现已完全成为过去的革命阶级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他写道：“……我们同蒋介石的合作使中国无产阶级放松了警惕性，从而为蒋介石发动四月政变提供了方便”。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难道不‘还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吗？这个论据同样是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词。所有国家的妥协主义者在类似情况下都力图让工人相信自由资产阶级是反对反动派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帮助只是为了同这类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人。北伐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变得强大起来，而工人阶级却遭到削弱。导致这种结果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

托洛茨基同志的社会民主党论调是如此高深莫测！难以用言词给予恰当评价。因为他们干的是什么呢？他们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即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义者”要人们相信这些“自由”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等等。这是社会党人采用的典型手法。社会民主党人把殖民地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成**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这个集团和那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忘记了**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基于这种认识，英国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支持还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同志基于同一机会主义立场，干着英国改良主义者所干的同样事情，拒绝支持中

国资产阶级去反对英国资产阶级。

列宁对此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用最尖锐的语言驳斥过与托洛茨基观点相类似的观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① 列宁又进一步谈到：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②（加重号是B·阿斯特罗夫加的）。

由此可见，列宁与“第二国际英雄们”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之点在于，他善于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在“压迫”国家中，支持资产阶级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这是妥协主义者干的行当，而在殖民地国家中是允许并且必须（“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运动（从以上所引列宁论述中可以明确看到，列宁讲的正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列宁在上述论述中还提出，对不同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运动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果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又允许我们“组织和教育”被剥削群众，那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支持”这样的资产阶级。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共产党人就要向殖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4页。

民地的资产阶级宣战。

在明白了这个原则之后，难道还不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在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国资产阶级还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且被迫为我们教育和组织群众**提供方便**的阶段，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就给予中国资产阶级以**支持**。不言而喻，就是在那个阶段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也一直在“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独占领导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性一面的斗争。

当资产阶级转而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便停止这种支持，宣布资产阶级为反革命并同这种反革命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

相反，正是托洛茨基才是从资产阶级似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反革命这一“抽象原理”出发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托洛茨基采用十分明显的手段牵强附会地把事实套进自己抽象的公式，这还不清楚吗？他断言，北伐的结果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变得更加“薄弱”！**那么为什么工会和农民组织又能发展呢？**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犯了许多错误，而中国共产党为何恰恰在北伐时期逐渐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呢？

如果按托洛茨基的所谓工人阶级力量变得更为“薄弱”的说法去思考，那就不能不得出极为悲观的结论。就是说，革命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就是说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应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毫无希望？

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议论时忽视了**群众**：他只看到蒋介石政府的成就和蒋介石的骄横跋扈，却看不到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他文件里还有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仅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同各国妥协主义者的说教“作了讨人喜欢”的类比，而且还把那种策略同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

略作了相当“得体”的比较。“类推法”再次重放“智慧”与“机灵”之异彩：一个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与另一个其资产阶级不但无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且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敢置一词的国家竟成了同类国家！反对派的“策略和战略家们”已淹没于抽象概念之中，一遇到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现实时便毫无办法了。

同中国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问题，现在已是过去的事了。但是必须看到，反对派在为否定同资产阶级结盟寻找理由时，却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宣布北伐（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进行的）为“革命的行动”。不过前后不一贯的说法，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其辩护的理由或者证明其正确的根据。

*

*

*

但是，反对派在否定中国已过去的革命阶段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时，企图把事情说成仅仅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看法上的分歧，这是徒劳而无济于事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农民！**

难道反对派的“中国问题专家”拉狄克同志不曾为所谓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的论述进行过辩解吗？难道他的发言不是托洛茨基下述论调的前奏和“准备”？

“中国的国家关税受帝国主义各国控制，这**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根据这一**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

难道季诺维也夫、叶佛多基莫夫、拉狄克同志没有和托洛茨基同志一起在其他稿件中签名赞同下述同类型的论点？

“**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面讲，关税问题是主要问题。”

这样一来，关税问题既成了中国**内部**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问题，又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主要”问题！这真堪称是无所不包的思想，包罗万象的“问题”，是对中国革命万无一失的解释！

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为提高被资本家强行降低的关税而斗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阶级最关心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呢？

难道是工人（忘记了把外国资本家赶出中国和没收他们工厂的任务）首先为设法提高关税而操劳吗？

这似乎不太合乎事实真相。也许是农民已经心甘情愿受地主剥削，现在举起斧头为提高进口货物的关税而斗争？！这种说法也是极不真实的。

当然，殖民地国家为对付帝国主义竞争者而采取的关税保护措施是可能有并且已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关税问题绝不能成为工人农民的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只能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主要课题。我们最最革命的反对派采用把中国革命的旗帜交给中国资产阶级这样一条小小的理论就极其顺当地进行了思想“分娩”！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革命阶级，而蒋介石是民族革命的领袖。

列宁在谈到这些空谈革命的英雄们的行为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本应到这一房间，却去敲另一房间的门。”

像这样的民族革命“理论”对谁和对什么有益呢？对那些在这场革命中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人有利，对在资产阶级面前投降的人有利。犯有右倾错误的中国同志在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后，就在随时准备不经战斗便将这个组织交给资产阶级这一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策略口号上与反对派的上述理论一拍即合，这绝非偶然。

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曾在反对派的这些文件中多次强调，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封建主义成分：“地主的奴役”，“对农民根深蒂固的剥削”等等。季诺维也夫同志企图通过这种办法与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分子拉狄克划清界线。可是，天晓得这种努力是多么可怜而无价值啊！既然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已不属于革命的基本内

容，既然季诺维也夫同志已把这个斗争摆在运动的**次要**位置，那么他作这种努力又有何用呢？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声称只有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才能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呢？这只能是爱开玩笑的人的表白，只能是那些连在概念的表述上也不能自圆其说的折衷主义者的声明，而不是革命家关于战略的言论。

只有那些把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反对地主的农民运动看成是国内关系方面的革命的**主流**并承认中国革命的对外任务是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国家”关税）的人才能严肃地断言，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和农民才能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没有这样的前提，把工农运动当作儿戏来消遣是可以的，但要理解并领导这个运动却不可能。

*

*

*

在分析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产生了一个问题：正是过去和现在喜欢喊叫极“左”口号而且在中国组织苏维埃的问题上也比党“高明”的那些人现在落到了与纯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民族革命理论同流合污的地步。这种奇怪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不过是老一套的重复罢了。把列宁的口号当作“上帝保佑”那样背诵下来是不够的。在如何对待这个或那个革命问题上只有抽象的论述是不够的。列宁特别是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问题方面一再强调必须对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今年春开始，反对派就要求在武汉政府范围内组织苏维埃，要求成立左派国民党。与此同时，反对派又发表声明支持武汉政府。

在中央四月全会提出后，又由托洛茨基和维奥维奇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1927年5月末）全会提出的草案里，在“我们的主要任务”一节里写道：

“必须**极其有力而全面地支持武汉**，并从那儿组织对卡芬雅

克的反击。在近期内**必须集中全力，千方百计帮助武汉政府组织并巩固起来。**”

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同“千方百计地”支持左派国民党政府这两者是否一致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苏维埃。

我们党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对苏维埃作出过评价。以1906年布尔什维克向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对苏维埃所作的评价为例。该决议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非党组织”。其组成及活动内容“在斗争进程中必然会发生变化”，变成“整个革命斗争的机关”；因为这些“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所以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绩。”最后，决议提到：“在扩大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和影响的同时，必须指出，这些机关如果不依靠革命军队，如果不推翻现政权（即不把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一定会遭受失败。”^①

由此可见，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建立**政权**机关的口号，就是建立起义机关的口号。能不能一方面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全面地”、“有力地”支持武汉政府，而另一方面却同时抛出建立起义机关的口号去**反对**这个政府呢？

不妨回忆一下1917年俄国的经验。难道布尔什维克在组织苏维埃时，为的是“全面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吗？难道他们当时也象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那样参加临时政府的吗？！

可惜，1917年的经验也帮不了反对派的忙。

托洛茨基同志直截了当地写道：之所以必须建立苏维埃，是为了建立“双重政权”。

“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号召人们**通过‘双重政权’的**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31页，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译者注

过渡时期建立起新政权实际而有效率的机关。”

只有那些从1919年起便以我党的“思想改造者”自居的人，才认为上述口号酷似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别，即布尔什维克利用双重政权进行过渡不是为了“千方百计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是为了对这个政府进行无情的揭露。这是卡芬雅克们的政府，而不是可以寄予希望“赖以”反对卡芬雅克的人们！

反对派千方百计在党的面前逞能，为的是好在以后编造出一套理论来说明党奉行了“尾巴主义”，而列宁的策略……不比他们的“远见”高明，这真是大家常讲的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既然武汉政府不需要推翻，而需要“极其有力地、全面地予以支持”，那么，在现阶段就不应该建立苏维埃。

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有可能从下层自发地建立苏维埃呢？或者说为什么在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在不久的将来，共产党员有组织地号召各地立即建立苏维埃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呢？

因为左派国民党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组织，迄今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在革命进程中为了在**一定的阶段**进行共同斗争而联合起来的不同阶级的人们。现在这个组织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叫嚷要整顿“纪律”，甚至禁止国民党内“党派活动”，从而把国民党建成资产阶级一家独霸的政党。资产阶级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现在我们是否还可以**完全像三个月前那样**讲，应给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政府以“极其有力的、全面的”支持呢？**不，不能**。因为现在我们已有可能谈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已有可能宣传苏维埃作为政府机构迟早必将**取代资产阶级政权**的思想。

有人要问：“难道这短短的三个月竟使局面发生如此的变化？”如此频繁地（真是这样吗？……）变换口号，不是尾巴主义，缺乏明确路线和“远见”，以及反对派按其教条历数的其他

过错的表现吗？

俄国在**八个月**内即由沙皇俄国变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在这八个月间布尔什维克**几经变换**口号。4～7月和9～10月间提出的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7—9月间则暂时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本身**在二月革命后（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和在十月革命中有着**不同的**意义，甚至有**不同的社会内容**。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好唱“远见”高调自诩不凡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归根结底，我们从**反对派**“立即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中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左”的**词藻**，而不考虑武汉的**具体情况**，一味沉溺于历史的对比，在策略上反复无常，常常出现与反对派本身提出的其他口号自相矛盾的现象。再就是反对派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作一些耸人听闻的动作，企图利用我们党的一些党员对中国情况不太熟悉之机以营其私。所有这一切随你怎样讲，也不能**说成是**列宁提出的苏维埃**口号**，提出这个“革命”口号，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掩盖其远非“左的”，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

反对派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反列宁主义的货色硬塞给党员群众。他们把我们的党员群众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忘记了我们党是有多年列宁主义实践经验和受过列宁主义教育的党。

（胡树林译，马宝华校）

中国的工会与革命^①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С·洛佐夫斯基

亲爱的同志们！

我谨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和苏联工会运动，通过你们的代表大会，向中国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敬礼。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起伏和反对民族压迫、社会压迫的伟大斗争，予以深切的关注。当前，正如为争取生存而激烈斗争的十月革命时期那样，没有置身事外的人，因为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另一个阵营是中国革命的朋友。那些靠别人劳动为生、在国内剥削人民大众的人，那些认为只有根据资本主义原则，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千百万人民的剥削世界才得以存在的人们，所有银行家、地主、资本家、主教以及他们的走狗，全都反对中国革命。而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们，一切同丑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斗争并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的人们，全都站在你们一边，援助你们，为你们的胜利而欢呼，也为你们的失败而悲痛。

全世界都凝神屏息地注视着你们那里事态的发展，各国的革命工人对此尤为关心，因为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纲领和策略把你们中国工人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工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成员，因此工会国际殷切地期望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取得圆满的成

① 这是С·洛佐夫斯基1927年6月1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刊登在同年7月31日的《真理报》上。

——编译者注

功；希望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了使你们的大会在历史上占有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得到的一席位置，必须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并确定中国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阶段中的各项任务。

我们在此聚会，并不是为了相互说些毫无意义的恭维话，而是为了对严肃的革命工作进行探讨，因此，我认为可以就几个最突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正使国际工人运动受到干扰，是否能够正确加以解决，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必须预先声明，我对中国情况了解很少，我之所以想在大会上就中国革命的任务谈几点想法，是因为中国革命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形式，但还是受着已经被人们所研究和确定了的法则的支配。马克思和列宁所制定的历史和革命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中国。正是从马列主义的观点和革命实践出发，我认为可以就中国工人阶级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的几点意见。

首先，什么是革命？革命，这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革命和反革命各自依靠着某些阶级，一些阶级想用暴力建立新的关系，而另一些阶级则企图借助暴力保持原来的一切。尖锐的阶级斗争使国内战争无法避免，因此，任何革命必然导致国内战争。可见，企图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整个阶级的利益。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即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他阶级的利益，而自愿放弃本阶级的特权和优越地位。和平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千百万人吸引到运动中来，而一旦广大群众投身运动，奋起斗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然而，革命的进展是否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以及如何与之斗争。如果我们记住，反革命，即力图恢复旧秩序的这股势力，是以某种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为依据的，那么就会懂得，同反革命的斗争必然具有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性质。当前，危险的倒不是武汉政府外部的反革命（如张作霖、蒋介石、李济深之流），而是在武汉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反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才是最危险的。他们所依靠的是哪些阶级和集团呢？那就是：（1）地主，（2）豪绅，（3）买办，（4）宁愿要旧制度而不要新制度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大资产阶级，（5）一部分与富裕阶级有联系的军人，而这些富裕阶级对不剥削人民大众的制度是不加以考虑的，（6）外国资本及其银行，（7）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时准备通过本国的官方代表或非官方代表给予一切帮助和支持。请别忘记，所有这些阶级和集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丰富的组织经验，它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拥有大量资金。由此可以看出，反革命势力是多么强大和危险。你们需要例子吗？好吧，我就举例来说明。

是否需要证明地主和豪绅是反革命势力的代表者呢？难道策划破坏湖南、湖北农民组织的不正是他们吗？这个问题看来还是清楚的。再说，是谁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制造金融恐慌呢？又是谁策划抵制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呢？这一切都是外国银行伙同本地金融业和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一起干的。难道制造金融恐慌和抵制使用国民政府货币还不是反革命行为吗？

夏斗寅叛变和湖南事件^①证明，在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人员中隐藏着反革命分子，他们正伺机采取行动和扼杀革命。湖南的流血事件值得深思。的确，正当国民革命向北发展之时，革命队伍中却有那么一些人成了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不仅如此，当湖南数以千百计的工农组织领导人惨遭杀害时，在武汉却有人抱观望态度，并派人去湖南规劝和说服杀人的凶手。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

^① 指1927年5月在湖南发生的反革命“马日事变”。——编译者注

呢？难道对于反革命能够说服吗？反革命是应该加以消灭的，然而至今并未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去消灭反革命，周斓将军和湖南的刽子手们却奇怪地谈判起来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另外，就在几天之前，江西的朱培德将军把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遣送出境，并封闭了当地的所有工农组织。朱培德将军自认为是革命的将领。而这位革命将领想依靠的却是谁呢？是哪些人呢？每一个将领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还算什么革命？江西所发生的一切，是复辟的第一步。这说明，反革命在这个地区也在蠢蠢欲动了。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有一个，即工人和城乡劳动群众必须对将领和所有军人实行监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革命必将失败。

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反革命会怎样准备进攻和怎样获得外国的支持。1918年，英国领事洛克哈特在现场被我们逮捕，因为他向保皇党提供金钱，并策划和支持阴谋活动等。法国大使努兰斯也曾出钱供炸毁桥梁、火车和进行政变等使用。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英、法、日、美都向反革命将领们提供金钱、武器以及其他物资。你们知道，帝国主义列强是支持张作霖、蒋介石之流的，然而，你们真的认为，夏斗寅叛乱和湖南事件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们全然无关吗？帝国主义只要能达到从背后打击革命的目的，随时都准备支持任何阴谋活动，帮助任何一伙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向他们提供金钱、武器和教官，并将自己的租界供他们避难之用。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切，即便一分钟也罢，那也是十分幼稚的。

由此可见，反革命势力是十分强大的。这就表明，必须认真地同它进行斗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要拼个你死我活。斗争应该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展开。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削弱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也就是说，只有在农村彻底实行土地革

命，在城市贯彻大工业和银行国有化的方针，才能给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土地革命将使反革命分子失去立足之地，而使革命力量增长数十倍。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必须坚决主张迅速没收地主的土地，将豪绅赶出农村，撤销农村中旧的行政机关，并建立起经过民主选举的农民自治机构。我知道，这样彻底的纲领会把一些人吓坏的，但是，那些害怕土地革命的人并不懂得，这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倘若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在数十年内仍将听任帝国主义和军阀们宰割。

我们之所以必须认真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其原因还在于，反革命分子经常钻入革命组织的心脏，在内部制造混乱，挑起争端，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不正确的方向。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当然，你们也一定发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尤其在湖南发生流血事件的前夕，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所谓破坏社会秩序问题。一个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强大的湖南农民运动，被说成是破坏社会秩序。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归咎于整个运动，而湖南农民竟成了一群土匪和痞子。污蔑湖南农民运动对谁有利呢？对地主、豪绅和反革命有利。谈论什么湖南不断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又对谁有利呢？对反革命有利。这话对不对？当然是对的。所有这些宣传鼓动必然是为军队政变制造舆论。也是为了在群众中散布对湖南农民及其组织的不信任。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时，血腥镇压就发生了。由此可见，所谓破坏社会秩序的问题，看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是我们革命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地主、豪绅因受到农民革命的冲击而悲号，许多革命者竟寄予同情，上了他们的当，也谈论起所谓破坏社会秩序的问题。殊不知，不破坏社会秩序的革命是没有的。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把革命想象成一对对戴着白手套的舞伴在舞厅翩翩起舞。这不是革命，而是对革命的一派胡言。由千百万被压迫的人们所掀起的革命，并不象在镶木地板上那样平稳而顺利地向前发展。革命是

极其残酷的。当缺少文化、一贫如洗的人民大众奋起革命之时，他们需要的不是优美的语调和文雅的谈论。要知道，这些没有文化的、落后的、贫困的农民大众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事业，而那些文明的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的文武帮凶们，却干着反对世界进步的卑鄙勾当，要把中国和全人类拉向后退。这才是最主要的，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农民能如愿以偿，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便会停止。

当前，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说什么农民和工人追求的是“狭隘自私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必须对劳动群众的要求加以限制。这种理论对革命是极其危险的。它曾多次在中国造成反革命事件，而且很可能再一次引起反革命暴乱。实际上，提出这种理论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其用意是只在政治上使农民和工人得到满足，而绝不能在经济上满足其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把城市和农村中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进一步说，即使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所谓“自私”的要求得到满足，又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革命能满足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要求，有什么可非议的呢？难道你们认为，群众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革命也会发生吗？有人说，首先是民族，其次才是阶级。可是，什么是民族呢？对我们来说，民族就是指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对资产阶级来说，所谓民族，则仅仅是指一些有财产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论持什么态度，只要反对工人、农民的“自私”利益，那就是反对革命、反对中国人民。

因此，下面我想再谈一个理论问题，即关于中国工农运动的幼稚病问题。最近一个时期，这种理论已经得到公认，人们在谈话和文章中都离不开这个问题，甚至中国工会的某些领导人也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我是坚决反对这个理论的，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实践是革命工人运动所不能接受的。首先，我来谈谈这个理

论。一些人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呢？他们说工农运动还年轻。事实确实如此。然而其他革命组织难道不年轻吗？在中国，资历最老的要推商会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资格老而得出结论说，它的政策就为劳动大众所接受。一切革命组织都很年轻，这是事实。可是，正因为它们年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实，这个理论企图说明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意思，即工农组织既处于幼年时期，就应该严加管束，经常进行监督和观察。必须对工农组织进行改组，改派其他领导人等，然而，这必然会遭到最坚决的反对，因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工农组织的革命领导人。我们应该让数百万建立了自己组织的工人、农民起来纠正领导人的错误，而不要另派一些对工农大众的沉重生活和艰苦劳动没有体会的人去担任工农组织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革命过程中，最危险的事莫过于犹豫和动摇了，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最危险的人莫过于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进行调解的和事佬了。现在，武汉就有很多这种和事佬。有一些人专干这类调停的勾当。他们想方设法使武汉政府同蒋介石言归于好。可是，与蒋介石和解意味着什么呢？这等于宣告蒋介石背叛革命无罪，杀害工人有理。谁主张与蒋介石和解，谁就是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这是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和每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应当讲的话。**同反革命没有任何妥协、和解的余地，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和平可言**，这就是为捍卫所有工会的旗帜而应持的态度。

同志们，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中国工会作为保卫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所负的特殊任务。中国各个工会用自己的战斗表明，它们是身先士卒的。这是中国工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功绩。其次，中国工会还证明，它们将全体劳动大众的利益置于某个集团的利益之上。这是中国工会运动的第二个重要功绩。再说，中国工会于不久前曾组织罢工以示抗议，这证明了它们准备同反革命进行斗

争。这是中国工会运动的第三个功绩。总之，中国工会业已证明自己是革命阶级的组织，它不愧为红色工会国际的一员。然而，你们在短时期内所做的事情还很不够。首先，你们应该更多地吸收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同那些在蒋介石和李济深羽翼之下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工会展开无情的斗争，并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将革命工人拉入法西斯工会的敌人。必须进一步加强所有工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提高每个工会和每个工会基层组织中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必须从基层，从男女工人中选拔新的领导人，必须广泛实行社会劳动保护法和工人及妇幼保健法。应该高度重视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区和大的国民经济部门（如煤炭、铁路、水运、冶金、纺织工业等）开展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应该在每一种生产部门建立起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应该巩固工、农、兵的战斗联盟，并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就共同向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达成协议。应该进一步巩固中国工会与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首先是苏联、日本和印度工人的兄弟联盟。应该更加积极地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活动，并与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

上面所说的就是摆在中国工会运动和中国革命面前的巨大任务。我深信，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定能在当前复杂、尖锐的形势下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能给群众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他们提出正确的口号。你们是继苏联工会之后最大的一个工会国际支部。因此，我深信，你们将光荣地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把中国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打倒反革命及其包庇者和帮凶！

打倒妄想使革命与反革命妥协的和事佬！

打倒法西斯工会及其组织者！

土地革命万岁！

城乡全体劳动者统一战线万岁！

革命的中国工会运动万岁！
统一的、战斗的、阶级的工会国际万岁！

(杨瑞芝译)

附 录

译名对照表

说 明

- 一、本书专有名词因当时俄译者对译法无统一规定及受方言的影响等原因，俄文译音常有出入。我们尽可能查出人物原来实际姓名，少量难以查考的采用音译，并注明。本表中对原俄译名未作更改。
- 二、同一名称有两种以上译法者，在括号内说明，并相互引证。
- 三、原文中直接用英语名称者，列于俄文译名之后。
- 四、表中译名分人名、报刊和组织机构名称三类，均按原文字母顺序排列。

(一) 人 名

Абрамович	阿勃拉莫维奇
Айхенвальд	艾亨瓦尔德
Амануиллы	阿迈努拉
Астров	阿斯特罗夫
Бай-Цзун-ши (Бай цзун-чжи)	白崇禧
Бао-Юй-сян	包玉湘 (译音)
Бор	博尔
Бартоп	巴顿
Бебель	倍倍尔
Бернштейн	伯恩斯坦

Бисмарк	俾斯麦
Бора	波拉
Бородин	鲍罗廷
Бриан	布里安
Бухарин	布哈林
Ван-Чен-Бин	王承斌
Ван-Чен-тын	王正廷
Ван-Чун-Хуй	王宠惠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Веленский	威廉斯基
Велингтон Ку (见 Ку, Велингтон)	
Волин	伏林
Вуйович	武约维奇
Гайлио	盖利奥
Галкович	加尔科维奇
Ганди	甘地
Гарвин	哈文
Гардт	加德
Геллер	格勒
Гернзон	赫森
Гордон	戈登
Го-Сун-лин	郭松龄
Гу-Ан-Сю	光绪
Гэй	海 (约翰)
Дай-Чи-тао (Тай-Чи-Тао)	戴季陶
Далин	达林
Дауэс	道威斯
Деникин	邓尼金

Джордж, Генри	亨利·乔治
Дуан-Ци-Джуй (Дуан-Ци-Жуй)	段祺瑞
Дубасов	杜巴索夫
Евгений Чен (见 Чен, Евгений)	
Евдокимов	叶弗多基莫夫
Ен-Си-Шан (Ян-Син-шен)	阎锡山
Жерар	热拉尔
Зиновьев	季诺维也夫
Иванов	伊凡诺夫
Ивин	伊文
Иен	颜 (惠庆)
Йо-Вей-Цзун	岳维峻
Йшин	石井
Канг-Ю-Вей	康有为
Кандль	康德黎
Карахан	加拉罕
Каутский	考茨基
Келлог	凯洛格
Кемаль	凯末尔
Керенский	克伦斯基
Кленелль	克列涅尔
Ковалевский	科瓦列夫斯基
Колчак	高尔察克
Коннор	康纳
Конфуций	孔夫子
Корнилов	科尔尼洛夫
Ку, Веллингтон	顾维钧
Кулидж	柯立芝

Купов	库波夫
Лансинг	兰辛
Лейнбарджер	莱因巴泽尔
Линкольн	林肯
Ли-Ти-син	李济深
Лиу-Еу-Фын	刘业丰 (译音)
Лиу-Чен-Хуа (Лу Чен-Хуа)	刘镇华
Лиф	利夫
Ли Хун Чанг	李鸿章
Ли-Чжан-Цин	李长青
Ло Вен-Гань	罗文干
Лозовский	洛佐夫斯基
Локкарт	洛克哈特
Лу-Юн-Сян	卢永祥
Ляо-Чун-Кай	廖仲凯
Лю-Сян	刘湘
Лю Я-цзы	柳亚子
Люко-Дун	陆浩东 (译音)
Макдональд	麦克唐纳
Макей	麦克莱
Мак-Муррей	麦克默里
Мандалян	曼达梁
Мартов	马尔托夫
Маслов	马斯洛夫
Менчце	孟子
Меттерних	梅特涅
Милляр	米勒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米哈伊洛夫斯基

Монтескье	孟德斯鸠
Морган	摩根
Мусин	穆辛
Муссолини	墨索里尼
Мэн	梅因
Нокс	诺克斯
Нуланс	努兰斯
О' Малли	奥马利
Оуен	欧文
Паду	帕图
Парвус	帕尔乌斯
Пеппер, Джон	约翰·佩佩尔
Портер	波特
Пуанкаре	彭加勒
Радек	拉狄克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拉斯科尔尼科夫
Росс	罗斯
Рессель	罗素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
Руженков	鲁任科夫
Рязанов	梁赞诺夫
Сахновский	萨赫诺夫斯基
Семёнов	谢苗诺夫
Сеттон	塞顿
Симпсон	辛普森
Скулатов	斯库拉托夫
Слепак	斯列帕克
Спир	斯皮尔

Стеббс	斯蒂布斯
Стецкий	斯捷茨基
Сторин	斯托林
Струве	司徒卢威
Сун-Джау-Ен	宋教仁
Сун Фо	孙科
Сун-Чуан-Фан	孙传芳
Сун-Ят-Сен	孙中山
Сунь-Ио	孙岳
Сю-Чен	徐谦
Сяо Ду-ин	夏斗寅
Сяо-Чао	夏超
Тан Пин-сян	谭平山
Тан-Ци-Яо	唐继尧
Тан Шао-и	唐绍仪
Тан Шен-чи	唐生智
Тин-Ю-Э (Цзинь Юнь-Ао)	靳云铭
Троцкий	托洛茨基
У-Дцюнь-Шень	吴俊升
Узанкей	吴三桂
Уйле, Путнам	普特南·韦尔
У-Пей-Фу	吴佩孚
Урбанс	乌尔班斯
У-Син-Тин	吴心田
У Цзин Льян	吴景濂
Фан-Ши-Мин	冯绍冈
Фурье	傅立叶
Фын-Ю-Сян	冯玉祥

Ху-Хан-Мин
 Ху-Цзинь-и
 Цао-Кунь
 Цао-Чжуй (Цао Жун)
 Цейтлин
 Цзинь Юнь-Ао (Тин-Ю-Э)
 Ци-Сие-Юань
 Циан-Хун-Ю
 Цси Си
 Цю Цю-бо
 Чан-Кай-Ши
 Чан-Тяо-Я
 Чан-Цзо-Лин
 Чемберлен
 Чен, Евгений
 Чен Ду-сю
 Чен-Цзяо-Юань
 Чен-Шен
 Черчилль
 Чжа-Лан
 Чжан-Цзо-Сян
 Чжань-Сюэ-Лян
 Чжен-Цзю-Мин
 Чжоу-Инь-Чжень
 Чжу-Сян-Цзян
 Чу Пей-тек
 Чжан-Цхун-Чан
 Чжан Шао-Цзен

胡汉民
 胡景翼
 曹锟
 曹锐
 采特林
 靳云鹄
 齐燮元
 钱宏猷 (译音)
 慈禧
 瞿秋白
 蒋介石
 钱蛟亚 (译音)
 张作霖
 张伯伦
 陈友仁
 陈独秀
 陈调元
 陈森
 丘吉尔
 周斓
 张作相
 张学良
 陈炯明
 周荫人
 朱湘江 (译音)
 朱培德
 张宗昌
 张绍曾

Чечерин	契切林
Шен-Хун-Инь	沈鸿英
Ши-Инь	石瑛
Шкловский	什克洛夫斯基
Шерман	舒尔曼
Щефер	舍费尔
Шидехара	币原
Эберт	艾伯特
Эверсон	埃弗森
Эглен	艾格利恩
Эдди, Шервуд	舍伍德艾迪
Ян Сен	杨森
Ян Син-Шен (Ен-Си-Шан)	阎锡山
Ян-Цзен-Син	杨增新
Ян-Юй-Тин	杨宇霆
Юань-Ши-Кай (Юаншикай)	袁世凯
Ю-Чжен-Чен (Евгений Чен) (见 Чен, Евгений)	
Юй-Ю-Жен	于右任
Eddy, Shervood	舍伍德·艾迪

(二) 报 刊

“Асахи”	《朝日新闻》
“Берлинер Тагеблатт”	《柏林日报》
“Вашингтон Пост”	《华盛顿邮报》
“Гильд-Пресс”	《商报》
“Джапан Кроникль”	《日本纪事报》
“Джапан Таймс”	《日本时报》

“Джи-джи”	《时事新闻》
“Дэйли Телеграф”	《每日电讯报》
“Кокумин”	《国民新闻》
“Кантон”	《广州》杂志
“Куо-Мин-Син-Вен”	《国民新闻》
“Манчестер Гардиан”	《曼彻斯特卫报》
“Момент”	《时代报》
“Невская звезда”	《涅瓦星报》
“Новая Рейнская Газета”	《新莱茵报》
“Нов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新共和报》
“Норд Чайна Дейли Ньюс”	《字林西报》
“Нью-Йорк Геральд Трибюн”	《纽约先驱论坛报》
“Нью Йорк Дэйли Трибюн”	《纽约每日论坛报》
“Нью-Лидер”	《新领袖》
“Обсервер”	《观察家报》
“Пекин энд Тянь-Цзин-Таймс”	《京津时报》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社会主义通报》
“Сюга-Сиогно”	《商业周报》
“Таймс”	《泰晤士报》
“Тан”	《红黑》杂志
“Ханькоу Геральд”	《汉口先驱报》
“Хочи”	《报知新闻》
“Чайна Викли Ревю”	《密勒氏评论报》
“Чень-Бао”	《晨报》
“Чикаго Трибюн”	《芝加哥论坛报》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经济生活》
“Capital and Trade”	《资本与贸易》
“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	《中国电讯快报》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Foreign Affairs"	《外交季刊》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商业日报》
"The Kwantung Workers Guide"	《广州工人响导》
"Morning Post"	《晨邮报》
"The New-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ew-York Tribune"	《纽约论坛报》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The World"	《世界报》

(三) 组织机构

Агенство "Асошиэйтед Пресс"	"美联社"
Амстердан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阿姆斯特丹国际
Английская Табачная фабрика	大英烟厂
"Ангоцзюн" ("армия умиротво- рения")	"安国军"
Ассоциация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в Китае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Бюро труда при Лиге Наций	国联劳工局
Всекита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проф- союзов	全国工会联合会
гуандунский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广东总工会
Домынхой	同盟会
Зубощеточный союз	牙刷工会
Иокогамский Спешу Банк	横滨正金银行
Шанхйский Мунидаьяньй	上海市政会议

Кита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англий- ских купцов	在华英商联合会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судоходная компания	中国招商局
Китай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в Лондоне	驻伦敦中国新闻局
Клуб Аньфу	安福俱乐部
Консейкай	宪政会
“Красные пики”	“红枪会”
Общество в зрелости Китая	兴中会
общество Триады	三合会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рузей революцион- ного Китая	“革命中国之友”组织
Профинтерн	工会国际
“Рабочий институт” обработки овощей	蔬菜加工业“工团”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обработки овощей	蔬菜加工业工会
Рейтер	路透社
Сейюкай	政友会
Смешанный суд	会审公廨
Совет профсоюзов	总工会 (广东)
Союз механиков	机器工会
Союз рабочих делегатов	工人代表会 (广东)
Спичечная фабрика Чун-Ко	中国火柴厂
Томинху (Тун-Мэн-Хуэй)	同盟会
торговая палата	商会
Тун-Мэн-Хуэй (Томинху)	同盟会
Управление соляной монополии	盐务专卖局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评论报》

Шанхайский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совет

“Associated Press”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上海市政会议

美联社

国际银行公司

(花旗银行)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